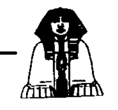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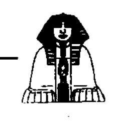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的话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改变对过去以及未来的看法。虽然人类的发明、成就以及行为，确实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但是，人类个体甚至是国家都根本无法控制的自然之力，却通过改变引发人类集体行为的环境，从而在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方面起到了比人类自身更大的作用。

对历史的决定论的看法，已在人们心目中失宠几十年。本书虽然并不准备为过去那些决定论思想的极度简单化的本质鸣冤叫屈，但是，本书想要在人们心目中重塑决定论的基本概念的地位。每个读者都应当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

在本书中，我将要描述的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人贴上“改头换面的决定论”的标签。虽然我的研究的确表明，归根结底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让世界经历了公元6世纪和公元7世纪的大部分变化，但是，我的研究还表明，这些变化的关键方面都是由继这种自然力量之后而来的生态的、政治的、流行病的、经济的、宗教的、人口的以及其他方面的



机理，在最后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达成之前的那段多事的100年里，通过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此外，在本书接近结束的章节里，我对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公元6世纪的气候大灾难作了推论。我对自己在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引发了气候与历史的连锁反应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正如您将要看到的那样，当从地理学上详查这一事件时，我的笔调就不是十分肯定了。因为后者是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并且，只有将来的地质研究和冰核研究才能证明，我所搜集的环境证据是否确实指出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虽然本书的大标题是“大灾难”，也就是说，本书将主要讲述引起了很多连锁反应、使得历史发生了永久性剧变的自然灾变引发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将会以任何方式否认在数个世纪里推动了古代世界终结的大量的其他因素。然而，我确信，引发剧变的终极决定因素，还是本书中所描述的6世纪中期的神秘灾难。同时，我也确信，那场大灾难是惟一一个与剧变有关的世界性因素。

正是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整体化地谈论公元6世纪和公元7世纪的世界历史。由同一个诱因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政治影响，甚至包括在远至蒙古和非洲东部所引发的政治影响，都会互相作用，共同写就人类历史。而不论是旧世界的文明，还是新世界的文明，都被同一次大灾难永久性地改变了。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这些改变都为我们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描述公元6世纪和公元7世纪后古代世界的出现时，选择了地缘政治的术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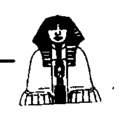
非经济的或者甚至是文化的术语）——使用了“原现代”这样一个术语，而不是“中世纪早期”这一术语——的原因。此外，我认为本书所包含的资料及论点已足以证明，我们是可以讨论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公元6、7世纪原现代地缘政治起源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限于欧洲和中东地区。

为了帮助人们改变对历史的旧有看法，我尽可能地用一种简单易懂的笔调来写作本书。我尽力使自己在本书中赖以立论的资料和讯息尽可能地准确，并且在时间上都是最新的。事实上，为了确保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曾求助于17个国家的20个不同学科门类的50多位专家和权威机构。

我认为，公元6世纪中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气候大灾难，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同时，我认为，这次大灾难在推动古代世界走向终结并帮助奠定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基础方面，是一个主要的世界性因素。

这一点，在欧洲、中东、非洲以及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美洲这样的主要由考古发现而不是历史记载来提供相关证据的地区，这一看法仍被证明是正确的，只不过表现为受环境因素影响更大。而在南美洲这样的公元6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历史根本没有文字可考的地区，研究者就不得不依赖相对而言不是十分准确的日期以及往往遭到多方置疑的对纯粹考古发现的阐释了。但是无论怎样，我都认为，即便就是在上述的地区，关于这次气候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也是肯定存在的，而惟一还没有得到完全证明的，仅仅是对发生变化的可能机理的合理推论而已。

最后，我想，这本书并不仅仅讲述了历史及其对现在的影响，我还希望这本书阐明了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这样一个大问题。这后一点与我们当前的现实尤为息息相关，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威胁程度，已经达到了自公元6世纪的那场气候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本书3/4的篇幅，都是关于黑暗时代的那场灾难的——它应该足以令我们对自然大灾难可能引发的这个世界历史的彻底改变有所警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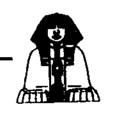
序　　言

公元535和公元536年，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神秘灾难。这次大灾难很可能是一次大型火山爆发，甚至有可能是一颗小行星撞上了地球，这次大灾难才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

这次灾难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掩去了太阳的大部分光与热，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在每一块大陆上都造成了气候混乱、饥荒、迁徙、战争以及政治方面的剧变。

作为引发了世界四大区域——非－欧亚（从蒙古到不列颠，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南部非洲），远东（中国，朝鲜，日本），中美（墨西哥，中部美洲）以及南美——的地域内剧变的原动力，大灾难使得世界历史发生了永久性的根本的改变。

大灾难发生过后的100年，是世界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的核心岁月，并由之构成了古代世界与原现代世界之间痛苦的、并且往往是充满了暴力的界面。那段岁月见证了古代世界那些超级大都市的最后岁月，见证了古波斯的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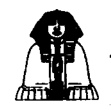
亡，见证了罗马帝国被拜占庭帝国取而代之，见证了古代南阿拉伯文明的终结，见证了天主教在古代的最大竞争对手——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末日，见证了最伟大的古代文明——具有世界中心地位的特拉奥蒂华坎王国的分崩离析，见证了伟大的玛雅超级大都市提卡尔的陨落，见证了南美洲谜一般的纳斯卡文化的消亡。

但是，那一段百年历史也见证了伊斯兰教的崛起，见证了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这些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以及土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诞生。同时，那段历史还见证了中国的重新统一，见证了南美洲第一批大帝国——印加帝国的先驱——的诞生。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在地理区划上分布相当分散的灾难与新生——恰恰发生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交替之前和之后——视做是各不相干的事件。现在，我们第一次——正如本书的研究结果所示，可以将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起源归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由共同的理由紧密联系的整体。

在公元6世纪的第四个十年里，地球这颗行星上的气候确实是完全失控了。

在本书中，我力图要论证的是，这场气候大灾难通过以下途径将罗马帝国摧毁了一半：它释放了位于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的中亚野蛮人部落，引发了阿拉伯对其南部侧翼压力的地缘政治进程，招致了使得其人口数量剧减的一系列致命疫疾。



我将证明：由气候引发的阿拉伯的地缘政治改变以及最终由气候引发的地中海地区的末世天启氛围，是如何合力促成了伊斯兰教的诞生。

我将揭示：这场气候大灾难及其后续的流行病的影响，是如何摧毁了西欧的人口与政治现状，并由此带来了至少4个主要国家的诞生。

我还将证明：这场灾难在西亚如何引起了突厥人的崛起——一个逐渐导致突厥的影响遍布从印度直至东欧的广大地域，并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出现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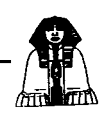
同时，我也将尝试着证明：正是这场全球性的气候紊乱，摧毁了远东许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系统，为中国的重新统一、统一的朝鲜的出现以及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开始开辟了道路。

我还将力图证明：这场气候大灾难是如何引发了一次摧毁了古代美洲文明当中最伟大的墨西哥特拉奥蒂华坎帝国的大众革命；而特拉奥蒂华坎帝国的崩塌又是如何解放了中部美洲，并且导致玛雅文明的快速增长以及继之而来的分崩离析。

我同时还将证明：在秘鲁，气候的紊乱如何使得力量中心从干旱的低地转移到了较为潮湿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以及它又是如何逐步为若干个世纪之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最伟大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元535和公元536年的神秘的气候灾难确实再次令世界历史同步。

当代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称之为“最恐怖的征



兆”。他的话可谓是再恰当不过了。虽然他不可能确知自己所描述的究竟是什么，但是他接下来所描述的确实是一次全球性气候现象的一部分，而恰恰正是这一全球性的气候现象开启了一个恐怖的世纪，并且有效地催生了一连串令人类历史发生永久改变的事件。

普罗科皮乌斯对当年的气候作了如下描述：“在这一整年当中，太阳发出的光芒就如月光一般黯淡。”有关这一事件的其他记载则称，太阳在长达 18 个月的时间里变得“暗淡”、“灰暗”。太阳的光芒“就像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影子”，而人们则为太阳可能再也不会正常发光而忧心忡忡。

在罗马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了农业歉收以及饥荒。

在英国，公元 535 年到公元 555 年这段时期，是公元 6 世纪当中气候最糟糕的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天降大雪，“人民之中弥漫着悲伤”。而在阿拉伯，则是洪水继之以饥荒。

在中国，公元 536 年，发生了干旱与饥荒，并且“黄色尘土如雪般降下”。随后，农业因 8 月中旬的大雪而再次颗粒无收！在日本，“大王”发布了一条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法令，其中说“黄金和上万串的钱是不能疗救饥饿的”，财富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言毫无用处。在朝鲜，公元 535 年和公元 536 年是那个世纪当中气候最糟糕的年份：先是肆虐的暴风雨与洪水，继而又发生了干旱。

在美洲，情况与此相似。从公元 6 世纪的 30 年代开始，一场持续时间长达 32 年的可怕干旱毁掉了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北美洲，通过对今天美国西部地区古代树木年轮进行分析发现，有一些树木在公元 536 年及公元 542～543 年这



些年份里面，其生长实际上是停滞了。事实上，直到23年后的公元559年，树木的生长情况才恢复了正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西部，也有类似的树木年轮方面的证据证明，在公元536年至公元542年间，树木生长速度递减，直到公元6世纪的50年代方才完全恢复正常。

在某些地区，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情况恶化——具体的气候细节情况将在后面章节述及——是在以一个较为正常的树木生长速度减缓循环周期为背景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此次树木生长速度减缓则是从公元6世纪20年代中期或者公元6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的。但是，只要对树木的年轮变化情况进行仔细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事件，是过去的两个千年里最严重的个体事件（就树木生长速度减缓而言）。

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气候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从公元535或公元536年开始）恶化到如此地步，然后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方才完全复原呢？

当然了，太阳的黯然失色（毫无疑问是由于某种大气污染所造成的）以及突发的世界范围的气候恶化现象表明，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爆炸，而在此次爆炸中，有成百万吨的尘土和自然合成的化学品被抛进大气层。

但是，那场大爆炸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已经弄清楚在若干个世纪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在本书结尾的章节里面，为了证明这一令人惊愕的灾难究竟是什么，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是，您在阅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之前，您首先会看到内容详实的细



节情况：有关那场灾难对当时的整个世界的影响，以及一场古代的灾难是如何塑造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

在进行本书的研究工作时，我对自然力量以及它们改变历史的能力的尊重之心大为增加。这样的一种尊重之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新的观念，改变了我对于历史本质的看法。我们必须用一种整体的目光看待历史，而且，历史本身也确实是作为一种综合的、全球性的现象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如果我的工作做得还不错的话，那么您可以把您即将阅读到的这本书，看做是对大灾难的成因及其影响的一个分析，看做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迄今尚无先例的解释，以及对于人类未来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





美国兰登书屋独家授予中文版权　全球最具争议性的考古纪实新著

大灾难

[英]戴维·基斯　著

Keys

第一部分

黑暗时代

“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个瘟神，它毫无怜悯之心地践踏、摧残着上帝的杰作，许多城市的居民……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illegible]之中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人们[illegible]，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illegible]之外，散发出了死亡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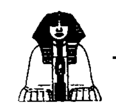
——汉斯[illegible]

第一章 “上帝的愤怒”

“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在死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仍然停滞在与没受感染的人同步的地方，而后者的身体依然健壮。有些人在死去之前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恶性脓疱突然性地发作，并且夺去了人的性命。有些人感染了一两次又康复了，但是等待他们的，不过是第三次感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而已。”

公元6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对在公元6世纪及公元7世纪中、晚期摧毁了罗马帝国以及更广大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瘟疫的可怕症状作了如上的描述。

罗马帝国属地当中最早遭到瘟疫席卷的地区是埃及，第一个发生瘟疫的城市是地中海港口培琉喜阿姆。该地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埃及的敌人的传统侵入点。波斯人、叙利亚人、罗马人、希腊人，甚[illegible]帝本人，都是从此地侵入埃及的。但是，[illegible]敌人并没有趾高气扬地身披着铠甲出现。没有人能[illegible]因为它是隐藏在四处乱窜的老鼠身上登陆的[illegible]海



抵达培琉喜阿姆，并如法炮制，取道苏伊士运河——这条由图拉真皇帝在4个多世纪以前开掘的用于沟通印度洋与地中海的水道——进军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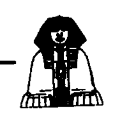
在摧毁了培琉喜阿姆之后，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到了亚历山大港，继而就是君士坦丁堡以及罗马帝国全境。帝国人口的1/3死于瘟疫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而在帝国首都，有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亡。

大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圣徒传》作者兼历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这样写道："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台榨汁机，毫无怜悯之心地蹂躏、挤榨着上好的葡萄——许多城市的居民。"

在有关人们所遭受到的不可想象的痛苦的、感人而逼真的描述当中，他描写了由瘟疫所引发的人们的极度恐慌："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作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备感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约翰试图逃离瘟疫，但是，不论他逃到哪里，瘟疫总是接踵而至。直到最后，他再也无处可逃。在约翰寻找安全的



避难所的亡命之旅当中，在他绝望之后，他目睹了瘟疫如何以其摧毁城市的同样的残暴摧毁了乡村。

"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

在旅途当中，"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的补给站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了每一个碰巧走进其中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徜徉，根本无人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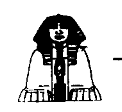
他看到，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他还发现了"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约翰相当详细地记录下了大灾难的恐怖程度：

"当这场灾祸向这座城市袭来的时候，它的首选目标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阶级。

"在一天当中，这一阶级当中的 5000 到 7000 人，甚至是多达 12000 人到 16000 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政府官员们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以及城门处清点着死亡人数。

"这样，君士坦丁堡人濒临了灭绝的边缘，只有少数幸存者。如果仅仅考虑那些死在街头的人——若有人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实际上曾经统计过的具体的死亡数字——有超过 30 万人在街头毙命。那些负责清点死亡人数的官员统计至 23 万人后，发现死亡人数简直不可计数，所以不再清点死



亡人数。从那以后，尸体就不经清点而直接拉出城去了。”

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有的瘟疫感染者尚能苟延残喘几天，而有的病人则在发病后几分钟内死去。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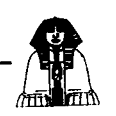
“一个人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从各方面来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归于零、被摧毁掉了，转而只剩了悲痛与葬礼上的哀伤。整座城市就如消亡一般停滞，因此，城市的食物供应也中断了。”

最初，在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于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

“在海滩边上，船只装满尸体。在每一次航行当中，所有的尸体都被推进海里，然后，船只再返回海滩装运其他的尸体。

“站在海滩上，可以看到担架与担架之间可谓摩肩接踵，先装运两三具尸体，并运到海滩上，然后又回来装运其他尸体。其他人则使用木板和棍子运送尸体并把它们一具叠一具地堆起来。有些尸体由于已经腐烂，同席子粘在了一起，所以人们用棍子将尸体运到海滩，再把这些流着脓水的尸体扔在海滩上。”



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脓水则流入海中”。虽然所有船只穿梭往来，不停地向海中倾倒它们装载的可怕货物，但是，要清理完所有死尸仍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被指定执行这一令人厌恶的任务的高级官员是皇帝的大臣之一，一个名叫西奥多的男人。皇帝“指示他尽可取用所有必须的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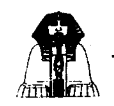
西奥多下令在城市正北、金角水道另一侧的一座山上挖掘这些巨大的坟墓。“他召集了许多人，给了他们大量的黄金”，要他们来挖这些深坑并开始埋葬死者。

“他安排了一些人往坑里运尸体以及翻转尸体，并且像堆干草一样将尸体一层层地压紧。

“西奥多还在深坑处安排人拿着黄金鼓励工人和平民运送尸体，每运送一具尸体就奖赏5个、6个甚至是9个、10个第纳尔。一部分人站在深渊般的大坑底部，另外一些人则站在大坑边上，后者把尸体如投石机投掷石块般扔入坑内，坑底的人则抓住尸体并按交替相错的方向将它们一排排地叠起来。

“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头朝下地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在坑底摔成碎块。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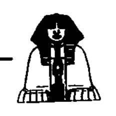
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以弗所的约翰），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粘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是因为就算是所有的口舌相加，也是无法叙述它的；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记录下这一切的呢？

“但是，我接着又想，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约翰所描述的是公元541年至公元543年的流行病——瘟疫的第一次天谴。但是，此次疾疫的全部社会及政治的影响，还在于其毫无怜悯之心的习性：它会再回过头来夺走那些它曾经放过了的人的性命。

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并在这些瘟疫当中失去了绝大多数的亲人。公元593年，在他58岁之时，他以一种非常悲痛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我想整个人类都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在有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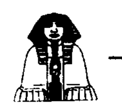


市，疾病肆虐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将城中居民清洗一空的地步"。由于伊瓦格瑞尔斯身处瘟疫传播的发源地，而且当他还是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被疾病所感染，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记述这些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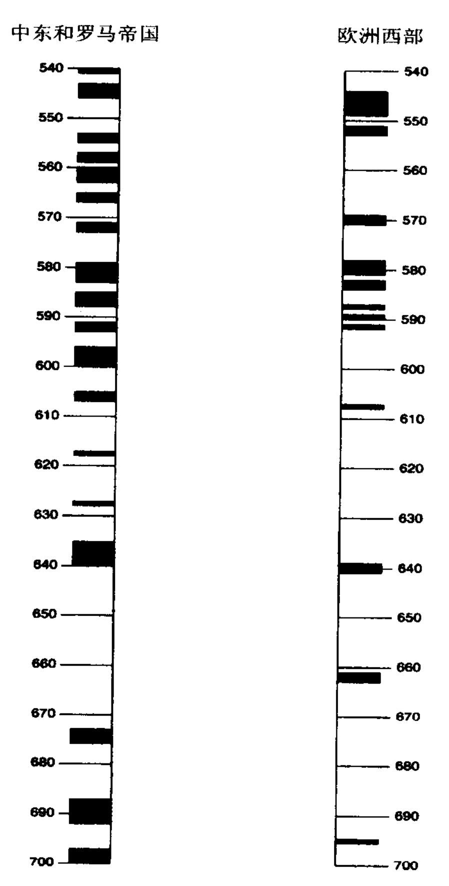
"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天谴当中，我的许多孩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许多曾一度幸存下来的亲人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离瘟疫第四次爆发、袭击安提俄克还不到两年。在那场灾难当中，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她们追随我在以前失去的那些亲人去了。

"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有些人是因为彼此结交以及生活在一起，有些人是因为身体接触，或者是因为居于同一居所，或者甚至是因为在市场上的接触。有的人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并且他们本人也的确非常健康，但是，他们却把疾病传播到了没有生病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健康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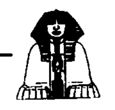
许多历史学家曾试图将在公元6世纪与公元7世纪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流行瘟疫，视为是由各不相关的一系列瘟疫发作构成的。连一些当时的教会和历史学家都持与此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又往往从对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大城



黑暗时代的瘟疫：一张年表



黑色横标所示为历史上有记录的瘟疫在罗马帝国、中东或者西欧某些地区泛滥的年份。



市，比如君士坦丁堡、安提俄克和亚历山大港有利的角度来看待大灾难。

显然，主要的疫病和为数不多的主要瘟疫爆发地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事实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应当被视作是一个整体的事件，虽然这一事件的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80年到210年之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采取广泛撒网的方式，以搜集有关瘟疫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证据，而非仅仅阅读浩若烟海的当代历史学著作。

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在那200多年里，有几十次瘟疫发作，而那还仅仅只是记录在案、有据可考的瘟疫及其发作情况。自大约公元600年起，罗马帝国表面上的瘟疫减少，也许仅仅是因为公元7世纪有文字可考的资料太过稀少的缘故。实际上，历史上有所记录的瘟疫的发作情况，在所有的发作情况当中也许只不过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这些历史记录当中能够流传至今者则更是少之又少。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流传至今的关于各地瘟疫发作情况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往往都不仅仅记录下了某一年的情况），这些记录所涉及的年份为公元541年至公元543年、公元555年、公元558年、公元560年或公元561年、公元567年或公元568年、公元572年或公元573年、公元580年或公元581年、公元585年或公元586年、公元592年、公元598或公元599年、公元607年、公元615年、公元639年、公元673年或公元674年、公元687年或公元688年、公元697年、公元716年或公元717年以及可能大约为公元725年、公元735年和公元745年。

此外，据信瘟疫曾在以下年份袭击西欧：公元543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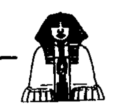


公元547年、公元551年、公元571年、公元582年、公元584年、公元588年、公元590年、公元591年、公元640年以及公元664年。此次瘟疫随后还侵袭了中国与波斯，也门在公元6世纪40年代的某一时间也终于未能逃脱厄运。而另外一些广大的地区，例如非洲或者中欧，虽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可考，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地区也肯定遭到了瘟疫的感染。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瘟疫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类，有时又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在其不可预知的传播道路上几乎从未终止过。在每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并由此产生大量荒弃的耕地。有时，瘟疫会在一年之内席卷无数的城镇与村庄；同时，瘟疫有的时候又会在某些宁静、偏远的地方潜伏下来，只不过为了在若干年后，在这些无名的死亡之所突然爆发。

实际上，在公元541年至大约公元750年的这段时间内，在地中海地区及其腹地，几乎从未出现过瘟疫完全销声匿迹的情况。在那一段持续了200多年的岁月里，瘟疫只不过有落潮期与泛滥期之别，但它从未完全消亡过。

瘟疫在罗马帝国首次爆发的时间是公元541年——仅仅是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混乱开始袭击地球之后6年——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第二章　开启死亡之门

沿非洲东海岸向南航行25天之后，就到达了一个被称之为拉帕塔的“大都会”。

上面这条由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普托勒米所记录下来的信息，是目前所知的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有关拉帕塔的记录。拉帕塔这座当年曾在今天的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海岸盛极一时的大都会，现在却是湮灭已久。

另外的有关拉帕塔的历史记载，见于公元1世纪的一本领水员指南——《埃利特里亚恩海周围及邻近地区》，其中称拉帕塔是“大量的象牙与龟甲”的产地，城中居民都是些“体格巨大的人”。

“大都会”位于一条“离海不远的”河边，它在作为象牙与龟甲的产地之外，还输出“犀牛角与少量的鹦鹉螺”，同时输入玻璃珠与铁器，特别是“斧头、刀具以及小锥子”。

根据大约写于公元40年的《周围及邻近地区》一书记载，此地是由来自也门的阿拉伯商人所控制的。他们可能与当地妇女联了姻，并且向当地首领赠送了葡萄酒和谷物作为礼物。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也门皇室的批准，从当地征集向也门皇室进贡的贡品。

根据《周围及邻近地区》一书及普托勒米的记载，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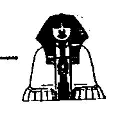
显，拉帕塔是非洲东部从北至南的4个古代贸易港当中最偏远、也是最大的一个。这4个贸易港分别是奥篷（今索马里哈丰角）、埃辛纳与托尼基（此二地皆位于今索马里巴拉韦附近）以及拉帕塔。

奥篷实际上坐落在一座岛上，该岛与海岸之间有一个30英里长的沙洲相连。该城面积为5英亩，城中居民约有几百人，其商贸往来看起来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某一时间歇业的。考古学家最近在该城遗址处所发现的陶器，其距今时间皆始于公元5世纪或公元6世纪早期。到那个时期为止，该城曾一度是地中海地区、非洲及印度的商贸往来中转站。

另外3个港口埃辛纳、托尼基及拉帕塔，迄今为止在考古方面还一无所获，个中原因也许与奥篷相似：人们在中世纪来临之前就终结了这几个城市的生命。

我们通过对已经进行过考古调查的22个非洲东海岸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人类定居地及贸易地进行研究之后，的确可以发现，这22处当中的19处的崛起，只不过是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事情，有两处可能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突然出现的，只有一处可以肯定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奥篷附近的一个被叫作达阿马的遗址，再加上可能也在其中的埃辛纳、托尼基以及湮灭了的“大都会”拉帕塔，都在公元6世纪之前完全歇业。而到目前为止已知的非洲东部海岸中世纪考古遗址当中，约有90%的时间是从公元7世纪以后起算的，之前的历史情况则是一片空白。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在紧靠公元7世纪之前的一个时期，历史发生了严重



的断层。此外，在非洲东部海岸地区，瓷器的类型也在同一个时间突然发生了变化。在公元6世纪前，考古所发现的所有瓷器都属于是铁器时代早期（即所谓的科威尔瓷器）的作品，而在公元6世纪之后，所有的瓷器则都是铁器时代晚期（即所谓的塔纳瓷器）的作品。与此同时，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从集中于农耕到更倾向于游牧经济的转变。

毫无疑问，公元6世纪是东部非洲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这是一段快速衰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港口完全消失了，而农耕经济则发生了萎缩。但是，隐藏在衰退背后的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导致了东部非洲公元6世纪历史的断档呢？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罪魁祸首是瘟疫——在同一个可怕的世纪里摧毁了欧洲及近东的同一场瘟疫。事实上，瘟疫正是从东部非洲的一种作为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古代动物身上爆发，进而感染如此广大的古代世界的。

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和一种中间携带者），瘟疫就在这些特别的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以下地区——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但是，为什么公元6世纪的瘟疫是自非洲而不是自亚洲发源的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首先，亚洲主要的人口集中地区中国，直到地中海地区遭到第一次天谴之后的半个世纪才受到瘟疫感染。事实上，中国所受到的感染乃是地中海地区的瘟疫取道中东地区传播至中国所致。主要的中东大国波斯则是在瘟疫袭击罗马（拜占庭）帝国之后就遭到了感染。



很明显，波斯人是从罗马士兵身上感染这一瘟疫的。其次，中世纪晚期以前，没有证据说明瘟疫是亚洲大草原上的地方性疾病。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同一时期的证据：出生于叙利亚的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确有记载称，瘟疫是源自非洲（“阿提奥皮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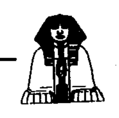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第一个遭受瘟疫袭击的地中海世界城市是培琉喜阿姆港，也正是经由此地，罗马世界所经受的瘟疫传至了苏伊士运河－红海，以及那些发自非洲、卸载于此以待运往罗马和世界其他各个地方的货物。此外，位于非洲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地区中点上的也门，似乎也是早期的瘟疫受害国之一，其遭到瘟疫袭击的时间约为公元6世纪40年代的某一时间。

但是，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话，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在几乎是半休眠了数百年——也许是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为什么它会訇然开启其细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答案是确信无疑的：一切皆因天气所致。

综合当时与之同时期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变化，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气候混乱，引发了把瘟疫和死亡传播至这颗行星上的大部分地区的流行病过程，并且，在令其后的历史发生剧变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已为全球历史研究、冰核研究及树木年轮研究所证明了的发生在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及晚期的气



候大崩溃，据我们现在所知，因其对也门影响甚巨（正好地处非洲东北角），因此它也将会席卷印度洋西北部地区。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叙述中看到。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虽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但是，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因之而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而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更快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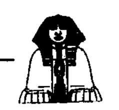


瘟疫起源及传播情况

500 英里
500 千米

大不列颠西部及爱尔兰
法兰西
意大利
伊利瑞卡姆
西班牙
希腊
君士坦丁堡
小亚细亚
安提俄克
叙利亚
美索不达米亚
巴勒斯坦
亚历山大港
培琉喜阿姆
图拉真运河
埃及
北非
非洲
也门
奥篷
埃辛纳的可能的地理位置
瘟疫病菌库-啮齿动物聚居地
托尼基的可能的地理位置
拉帕塔的两个可能的地理位置

图例
○将瘟疫传播至地中海世界的可能的非洲港口
⊙已知的最早遭到瘟疫袭击的4个罗马城市
←瘟疫传播情况及遭到瘟疫侵袭的地区
—当代国境线



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但是，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公元6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公元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即公元6世纪30年代晚期。

这一切就如手和手套一般完全吻合。但是，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虽然，天气无可置疑地是驱使瘟疫在非洲东部地区蔓延的原动力，但是，真正的病菌携带者乃是低贱的跳蚤。

虽然作为瘟疫野生库的啮齿类动物对瘟疫具有免疫力，但是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跳蚤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跳蚤死于瘟疫。但是，正是其自身的死亡对它们传播疾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一只跳蚤感染瘟疫之后，它的部分肠道会被繁殖的瘟疫菌和血液凝块组成的混合物所阻塞。这样，这只跳蚤就会感到饥饿，并且变得极其贪婪，它会跳到任何移动着的动物身上去，而根本不管这种动物是否是其正常宿主。当然，由于其肠道被阻塞住了，所以不论这只跳蚤（为了寻找血液而）跳到何种动物身上，其饥饿状态都是永远不可能有所缓解的，它只会继续觉得饥饿难耐。因此，这只跳蚤只有[illegible]



地从一个宿主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吸它们的血，同时在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饥饿之旅”中将瘟疫传播了开来。疾病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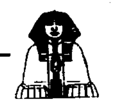
在非洲东部地区，对瘟疫具有免疫力的、作为疾病库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沙鼠和多乳鼠。

沙鼠——一种褐色的老鼠，通常每年产仔两窝（总共生产 10 只幼仔）。沙鼠是一种领地观念非常强烈的动物，为了寻找一块专属领地，一只沙鼠在一个季节当中需要行走 2 到 3 英里。这样，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随着沙鼠的数量的增加，由于每一只沙鼠都需找到自己的专属领地，这就导致了携带着瘟疫的沙鼠个体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扩张。

多乳鼠是一种深棕色的鼠类，其大小与金色大颊鼠差不多，大约每 50 只聚居在同一块领地上。多乳鼠的妊娠期为 23 天，每年产仔两窝。在正常情况下，多乳鼠每窝的产仔数为 5 只，但是，一旦食物充足，这个数字会增加两倍，达到每窝 15 只。一对多乳鼠在一年当中可产出 1000 多只幼仔。时至今日，多乳鼠仍是一种主要的非洲瘟疫病菌携带者。

很可能沙鼠和多乳鼠将疾病传染给了更多的多乳鼠，以及一种被叫作“阿尔维坎瑟斯”的类似于鼠的生物。虽然后者对瘟疫并不具备免疫力，但是，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其繁殖速度甚至超过了多乳鼠。

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这种动物的密度可达到每英亩 100 只，并且，它还能在一年之内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儿子”、“孙子”等等。不论是多乳鼠还是“阿尔维坎瑟斯”，都不愿侵入人类的居住地，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与不具备



瘟疫免疫力的黑鼠有直接的接触。黑鼠是一种特别喜欢滋扰人类的鼠类，在农场、仓库、房间、农村、城镇、市场、港口以及船只上面，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气候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的数量少于平常情况时，一对黑鼠在一年当中可以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后代。据我们所知，这一种类有房鼠、船鼠以及黑鼠之分，它们具有相当的侵略性，而且适应能力非常强，它们几乎可以吃掉任何东西——昆虫、种子、肉类、骨头、水果，甚至是“鼠吃鼠”！

一旦不可计数的饥饿的跳蚤从沙鼠身上跳到多乳鼠身上，再跳到“阿尔维坎瑟斯”身上并进而转移到黑鼠身上，那么，首批人群感染瘟疫将不过是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事情。

接下来，黑鼠戴上了“水手帽”，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逐步使得更多的人群、更多的船只以及更多的老鼠成为了瘟疫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了瘟疫病菌的携带者。

考古发现证明，当瘟疫顺红海北上袭击埃及之时，其所经之处，在东部非洲以及南部非洲，所有的生命都倒下了。“大都会”拉帕塔的居民是铁器时代早期的班图人，奥蓬、埃辛纳及托尼基等其他港口的居民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库希特人——或者有可能是铁器时代早期的班图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瘟疫来临的时候，这些港口确实似乎是消失了。除了奥蓬以外，其余3个港口的确切位置到今天都还没有搞清楚。

在非洲内陆，班图人的农业似乎急剧减产，并且班图人看起来好像很迅速地逐步接受了库希特人的游牧经济以及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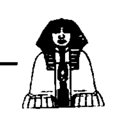
者类型特别的陶器。在公元7世纪（也就是在瘟疫爆发之后），这一以养牛为基础的传统游牧经济开始向非洲南部传播，并取代了整个非洲南部的谷物种植。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解答：瘟疫如何使得游牧经济（一种以牲畜为基础的经济）胜过了农业（一种以庄稼为基础的经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大量的老鼠和其他的携带瘟疫病菌的老鼠，对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的兴趣也是完全不同的。庄稼，不论是在地里还是在仓库里，都是非常吸引老鼠的。而以四条腿的动物作为食物来源，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看来，正是这一区别，使得游牧经济在这一危急的时刻胜过了农业经济。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船只会愿意往来于非洲东部与罗马帝国之间从事贸易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象牙是罗马帝国所需的价格最为昂贵的日用品之一。而在公元6世纪以前，在古代被作为打仗之用的红海地区的厄立特里亚象已被猎杀绝迹了。因此，非洲东部地区，包括现在的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就变成了罗马帝国所需的大量象牙的惟一产地。

截至瘟疫爆发及其摧毁非洲东部地区的港口为止，罗马帝国每年从非洲东部地区进口的象牙多达50吨。这一数量就相当于要求每年猎杀5000头大象。在价格方面，根据垄断这一交易的阿拉伯商人及希腊商人的价格，50吨象牙的总价达22万金“索利迪”（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亿5千万英镑）。

在非洲东部地区，象牙贸易不仅仅支撑起了一系列的港口，而且也支撑着一系列海岸酋长的领地，后者正是通过对



贸易货物的保护以及由其支配的武器进口，才得以具备程度不一的地区势力。在瘟疫令该地区人口减少并摧毁了港口之后，象牙贸易也就中断了。

从公元 400 年到瘟疫爆发前夕（大约为公元 540 年），据估计共有 40 万件主要的象牙艺术品问世，其中仅有 120 件得以传世；从公元 540 年到公元 700 年，仅有 6 件传世。在两个时期当中，得以存世的象牙艺术品的数量相差如此之巨，由此可以肯定，在公元 6 世纪中期以后，进入罗马帝国的象牙数量极为稀少。象牙艺术的黄金时期被瘟疫扼杀掉了。

超级富翁们对象牙制作的华丽椅子、精致的儿童玩具、写字桌、宗教遗物盒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象牙艺术品的需求，激发了一个延伸进非洲纵深腹地的贸易体系的形成。但是，也正是这种对优秀艺术的热爱，在公元 541 年带来了滋生于饥饿的跳蚤背上的死亡天使，它屠杀了罗马帝国并且改变了历史。

一个世纪之后，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人口水平大规模下降，而君士坦丁堡则从一个拥有 50 万人口的都市变成了一个人口不足 10 万的小城。同时，公元 6 世纪中期的气候危机及其后果引发了其他的机理，而通过这些机理，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将发生变化，偏远的蒙古草原将会成为令人厌恶的变化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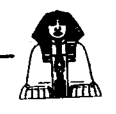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天谴者

或者是 [illegible] 来打 [illegible]

——罗 [illegible] 里斯



第三章　大草原上的灾难

在公元557年或者公元558年，有一个叫做阿瓦尔的慓悍的亚洲民族从蒙古到达了欧洲东部边缘。20年过后，他们统治了欧洲大陆东半部分的许多重要地区，并且，他们还以直接或者通过其附庸国进行间接战争的方式，侵犯了包括希腊本土在内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借以袭扰罗马帝国。

阿瓦尔人成为了一个持续时间相当长的过程当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在这一过程当中，罗马帝国逐步丧失掉了其大部分的领土及其兵力。通过这一过程，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阿瓦尔人的迁移，一直是个谜。

所有相关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录的时间，皆在公元545年之前。在阿瓦尔人统治蒙古150年之后，其统治地位受到了来自另一个蒙古民族早期突厥人的挑战。根据历史资料来看，很明显，阿瓦尔人在与其附庸突厥人的关系当中，积弱到了无法用言语加以形容的地步。到公元552年，突厥人完全扭转了自己与阿瓦尔领主之间的位置，并统治了蒙古。于是，那些幸而未被胜利的突厥人屠杀的阿瓦尔人残部，艰难地向西逃亡——朝着欧洲的方向。

那么，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蒙古部落的革命呢？为了对可能的诱因进行一个调查，我们有必要首先看看发生在蒙



古大草原上的其他类似的变化，并特别关注一下草地生态学。

干旱与饥荒，最终在公元2世纪中期促成了匈奴帝国的终结。阿瓦尔人的祖先选择了蒙古东部的半山地形定居，正是在他们手上断送了匈奴帝国。也恰恰是干旱与饥荒，在公元840年左右，导致了现在知之极少的维吾尔帝国的崩溃。那场饥荒所导致的饥饿，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削弱了曾一度强大的维吾尔帝国，并使得该帝国成为了来自邻近森林地区的凶残的克尔克兹部落的征服对象。

世界各地的树木年轮、冰核研究、历史以及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在公元6世纪30年代，气候发生了重大波动。更具体一些，最近的有文字的文明——中国北部的历史记载揭示出，公元537年及公元538年的严重干旱导致了许多中国人的死亡。

要想让干旱与饥荒“礼貌地”停留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内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推断，蒙古也遭到了这场灾难的袭击。实际上，在位于蒙古另一侧的西伯利亚所发现的树木年轮方面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35年至公元545年这一时期内，该地区饱受了过去1900年里最糟糕气候的袭扰。

大灾难同时影响到了蒙古的阿瓦尔人和突厥人——领主与附庸，但是，突厥人受影响的程度肯定轻于其阿瓦尔领主。虽然有一些突厥部落居住在平坦的大草原上，然而，多数的突厥部落居住在草原以北、部分被森林所覆盖的小山上和山区内。青草覆盖的草地在干旱袭来时，要比森林覆盖的高地敏感。在临时无水的情况下，青草由于根系太短，将无



法继续生长，而树木甚至是成片的森林都能将根深深地扎入地下，伸入地表下的潮湿土壤当中。此外，附近的云层在到达山区的时候都可能产生降雨。因此即使是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山区的短暂降雨量一般也比邻近的平原地区要多。

另外，突厥人的经济也比阿瓦尔人更为多样化。举个例子，突厥人狩猎、采集、开矿、制作金属器具、并饲养山羊、绵羊、马匹和牛。相反，阿瓦尔人的经济则完全集中于狩猎、饲养绵羊以及马匹。

对阿瓦尔人来说，马匹就是一切，因为马匹提供了他们所需的肉、奶、干酪、酸乳酪以及一种被称之为“科米斯”的带甜味的发酵马奶酒。此外，马匹是阿瓦尔人军事力量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正是阿瓦尔部落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得以在蒙古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是，马匹同时也恰恰正是阿瓦尔人的致命弱点。由于马的消化系统较之牛而言区别甚大，这就使得马在干旱的情况下，其生存能力远不如牛。

马所吃的蛋白质中的75%都因其无法消化而排泄掉了，而对牛而言，因无法消化而排泄掉的蛋白质仅有25%。这样，当只有枯死的（也就是说，蛋白质含量较低的）草可吃的时候，牛就明显胜过了马。

马的较高的蛋白质浪费率，皆因其消化系统的构造而致。牛和马的体内都有将植物蛋白质转换为细菌蛋白质的“发酵桶”。但是，马体内的“发酵桶”却处在一个食物已被消化的位置——也就是说，处于肠道的主要部分和肛门之间，因此，其作用就大打折扣了。相反，牛的“发酵桶”在牛的体内却处在一个食物尚未被消化的位置。这样，在发生



干旱的情况下，牛较之马而言，其优势是巨大的。

在牛的体内，大部分的植物蛋白质都在一个被称作瘤胃的发酵器官内，通过细菌活动转化为细菌蛋白质。由于大部分蛋白质都包含在细胞壁内，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消化办法，所以这是确保大部分蛋白质能被吸收的惟一途径。然后，刚刚形成的细菌蛋白质进入牛的十二指肠，在那里，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随后，氨基酸在小肠内被吸收，进入血液，用以制造肌肉蛋白、奶蛋白以及用于修补损伤组织和滋养胎儿的蛋白。

但是，马的发酵桶处于尾肠之中——刚好是食物已经过了瘤胃和小肠之后。因此，马不能制造出大量的氨基酸，并且也不能通过其小肠壁吸收到大量的蛋白质。相反，马体内的植物蛋白质通过细菌作用转化为细菌蛋白质的过程，是在一个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器官内进行的，而在这一过程之后，不过是富含氮的（即富含分解蛋白质的）排泄物的大量堆积罢了。这对土壤而言，好处颇多，但是对马本身而言，则没有多少短期的好处。

在没有发生干旱（即正常）的情况下，由于植物蛋白质极大丰富，因此不论是马也好牛也罢，都不会面临要保留住它们所吃下去的全部蛋白质的问题。但是，一旦真正发生了干旱，植物蛋白就会变得稀少——活着的草大约含15%的蛋白质，而死了的草仅含4%的蛋白质。这样，是否有较高的蛋白质吸收率，就变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马只能保留住它所吃下去的蛋白质当中的25%，却要排泄掉剩余的75%。与之相比，牛则能保留住它所吃下去的蛋白质当中的75%，仅仅排泄掉25%。因



此，牛的更为有效的蛋白质吸收系统所能保留住的蛋白质数量，就是马的相对无用的系统所能保留住的蛋白质数量的3倍。

虽然马在军事上的用处明显比牛要大，但是，在持续时间较长的干旱情况下或是在严寒的冬天，它们较之牛而言比较脆弱的生存能力，便等于是将它们的主人置于了一个相对于突厥人而言很糟糕的不利境地。即便仅仅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加上一个过干的夏天，就能致大量的阿瓦尔人的马匹于死地。那么，两三个连续的坏年份毫无疑问地将会使阿瓦尔人饱受其苦。

在公元6世纪30年代晚期所发生的干旱当中，由于母马不能哺乳幼驹，致使幼驹死亡。几个月以后，饥饿的成年马也开始死亡。这样，失去了马奶、干酪及酸乳酪来源的阿瓦尔部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只能以死马肉为食了。

由于在大灾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年头里接踵而至的是寒冷的冬季和干旱，所以人们开始饿死。阿瓦尔人找不到食物，也不能从别人（马匹曾是他们的财富）那里交换来食物。没有马匹，他们无法有效地劫掠，也不能完全保护好他们自己，阿瓦尔人一定感到了山穷水尽之日的降临。虽然最糟糕的干旱在公元6世纪40年代中期甚至是早期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经济和地缘政治已经遭到了破坏。

首先，公元545年，突厥人通过与中国北部的封建政府建立起直接的外交联系，轻慢了其已是日薄西山的领主——阿瓦尔人。其次，公元551年，突厥人挽救了险些被反叛部落摧毁的业已衰落的阿瓦尔部落。并且，在之后的一年里，即公元552年，突厥人通过要求阿瓦尔统治者将其一个女儿



许配给突厥可汗为妻，企图谋求与其阿瓦尔主人平等的政治地位。骄傲的阿瓦尔统治者拒绝了突厥人的要求，突厥人便以此为借口，推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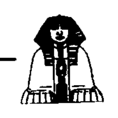
成千上万的阿瓦尔人或被屠杀，或被贬为奴。他们的首领阿拿龟自杀身亡，也许他是为了不被突厥人俘虏而受到羞辱。如果突厥人生俘了他，那么按照突厥人的惯例，他将被用一条丝带勒死。因为突厥人认为首领人选是由天定的，所以绝不容许让首领的血沾染尘土。

但是，还是有极少数的皇室成员被生俘了。据我们所知，有一些俘虏被贬为奴隶。另外一些俘虏，特别是地位更为重要的俘虏，则被按照草原上的传统方式处死了，他们的身体在两棵小树之间被撕成了碎片。许多幸免于难的阿瓦尔人则开始逃亡，踏上了长达3000英里的西逃欧洲的漫漫不归路。

虽然没有任何有关这次西进大逃亡的目击记录，但是根据其后的草原移民的考古与历史记录，也可以对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作一个合理的推论。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了逃亡大军——大多数人是骑着马的。整个逃难的队伍有一英里多长。每个家庭的财产，包括他们的圆顶毡毛帐篷（通常叫作“蒙古包”），都被装在巨大的牛车上。

逃难的队伍中，也许还夹杂着大量的备用马匹以及一群群的绵羊。从蒙古到欧洲，阿瓦尔人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是相对偏北的一条路线，因为这样才能避开宗格利亚沙漠以及中亚地区的其他沙漠。

阿瓦人在沿额尔齐斯河行进了600英里以后，抄近路越过了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继而沿里海北岸进入了高加索山脉



以北的肥沃草地。在这里，他们征服了一个被称之为“库特里格尔”的匈奴部落。而他们的人口也因一个与之类似的民族——一个被称作“赫普塔里特”或者“白色匈奴”的部分为蒙古人种、部分为匈奴人种的民族——而增加了。

现在，游牧部落阿瓦尔和它的库特里格尔附庸以及赫普塔里特盟友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发。他们进入乌克兰，并征服了乌克兰的斯拉夫人。接下来，不断扩张的阿瓦尔移民队伍（现在还要包括一些斯拉夫人和库特里格尔人）又继续前进了。其后，他们停了下来，并向当地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未能实现的土地要求。由于从这个地方进入罗马帝国的企图失败了，因此他们沿喀尔巴阡山脉北端向西前进，进入了今天的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征服了当地人——盖庇德人。

到公元568年，阿瓦尔人已经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每一个细节给人的印象之深刻，恰如阿瓦尔人16年前在3000英里外的蒙古所曾经统治过的那个帝国。它涵盖了匈牙利东部、罗马尼亚西部、斯洛文尼亚、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德国东部以及乌克兰西部的广大地域。它的面积大约为100万平方英里，西距今天的德国约1500英里，东抵伏尔加河，北距波罗的海800英里，南接罗马帝国的巴尔干边境。

也许阿瓦尔人的附庸当中，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该是斯拉夫人。因为相对而言，斯拉夫人本身对欧洲东部的大多数地区来说也还是新移民。阿瓦尔人与斯拉夫人这两个野蛮的民族一起，合力推动了世界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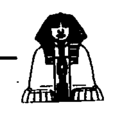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恐怖的野蛮人

“他们奸诈、邪恶、靠不住，并且对财富有着永不知足的贪求。这些恶棍极富军事斗争的经验，较之以武力打败敌人，他们更喜欢通过欺骗、奇袭或者是切断敌方的供给线来打败敌人。”

公元6世纪晚期，罗马皇帝莫里斯在一本详细的军队指南当中，以一种完全贬斥的语气准确描述了横穿亚洲移居至此的蒙古阿瓦尔部落，后者已经开始针对他的帝国制造一些大麻烦了。

引发了一系列招致阿瓦尔人迁徙事件的气候问题，看来已经导致了斯拉夫人对罗马帝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正如第一章当中所述，自公元541年至公元543年起，几次重大瘟疫的爆发，已经大大削减了帝国的人口数量。

虽然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所有由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混乱所引发的问题，逐步导致了一场人民革命，并永远地改写了罗马历史与世界历史，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莫里斯都是一个非常胜任的皇帝。那么，罗马帝国是如何失去控制的呢？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那样，莫里斯及其家族成员几乎全部被砍了头，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起义与灾难呢？



在公元536或公元537年，袭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问题似乎也没有放过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波兰以及乌克兰西半部，从公元6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也定居于罗马尼亚的某些地区。

根据莫里斯皇帝的法令我们可以得知，公元537年，在与斯拉夫地区邻近的罗马帝国的省份莫西亚斯康达（保加利亚东北）和锡西厄（罗马尼亚东南），粮食危机已经演变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并且，同样的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越过边境，侵入了斯拉夫的领地。

在当时，也即是公元536年或者公元537年，形势一定非常危急，因为斯拉夫人潮水般地越过了多瑙河边境，并且据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称，斯拉夫人“抢劫邻国，并且奴役了大量的罗马人”。

由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的农业问题以及灾荒所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引发了欧洲东部地区的政治瓦解、人口迁移与动荡不安。

当然，斯拉夫人迁移的对象也不可能仅仅只限于罗马帝国的领地。因饥饿而四处搜寻食物，使得斯拉夫人将自己的领地扩展到了所有抵抗微弱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在这一时期，斯拉夫人也开始沿多瑙河向西扩张，穿过具有战略要隘地位的铁门关，进入了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境内。

根据罗马皇帝的看法，公元536年至537年，斯拉夫人开始真正地侵犯罗马帝国的领地。并且，此次侵犯似乎引发了斯拉夫人政治的日益动荡不安以及四处劫掠。公元545年



左右，在罗马帝国从瘟疫的第一波袭击中复苏之后，斯拉夫人发动了又一次侵略战争。

“大约在这个时间，”普罗科皮乌斯写道，“一支斯拉夫军队越过了多瑙河边境，他们杀死或者奴役了所有出现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人，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并且还掠夺了他们的财产。这支军队将悲伤传遍了整个伊利里卡姆（今天的南联盟），直至埃庇达姆内斯（今阿尔巴尼亚都拉斯）。”

接着，公元550年，斯拉夫人再次如潮水般地越过了边境，这一次，他们俘虏了一名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并占领了一座重要的罗马城市。被俘的指挥官名叫阿斯巴达斯，曾是皇帝的私人护卫之一，首先遭到了斯拉夫人的折磨。斯拉夫人将其背上的皮肤一条条地剥掉，然后将他活活烧死。斯拉夫人在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全境极尽肆虐之能事，以致于“这两地到处都是尚未埋葬的尸体”。

普罗科皮乌斯详细描述了这些侵略者是何等地野蛮，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他们要杀死受害者了。但是他们并不使用剑或者是矛，或者是按照其他通常的作法行事。他们会在地上牢牢地插上许多一头被削尖了的木棍，然后用极端的暴力强迫那些可怜的人们坐在这些木棍上面，这样，木棍就从被处死的人的两半屁股之间插了进去，一直捅到肠子为止。

“这些野蛮人还有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他们把4支木棍深深地插在地上，然后把俘虏的四肢绑在这4支木棍上面，再用棍子拼命击打俘虏的头部，把他们像狗、蛇或是其他动物那样杀死。”

普罗科乌斯描述了斯拉夫人处死俘虏的另一种方法，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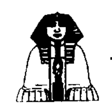
种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某种献祭仪式——将一些俘虏和牛以及绵羊关在一间小屋内，然后把小屋点燃。

最后，斯拉夫人攻击了托庇勒斯城（今土耳其境内的可鲁）并将城内全部的男性居民屠杀殆尽。普罗科乌斯写道："这些野蛮人用他们众多的投掷物压制守城者并迫使他们放弃城垛，然后他们在要塞上架上梯子，并袭取了城市。接着，他们迅速杀死了全部男人，总数达15000人，并且抢劫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作为战利品，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则变成了奴隶。"

此后，在公元558至559年，斯拉夫人又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但是，这一次进攻的诱因、动机、本质及规模都有相当的不同。这是来自蒙古的阿瓦尔移民，第一次——虽然是间接的——对罗马帝国造成影响。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过的那样，在公元6世纪50年代，一个被称之为库特里格尔的野蛮匈奴部落遭到了从蒙古逃难出来的阿瓦尔人的攻击，并且被赶到了西边。此后，这些库特里格尔匈奴人与斯拉夫人开始有所联系，并且，在库特里格尔人的指使与压力之下，斯拉夫人发动了对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进犯。

库特里格尔人和斯拉夫人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希腊，并且挥兵长驱直入著名的塞莫皮莱山口要隘——1000年之前，正是在这一瓶颈之地，波斯人陷入了绝境。第二路直逼另一条战略通道——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也是防守最为薄弱的通向小亚细亚的通关地点。最后一路则直接向罗马帝国本身的行政中心——君士坦丁堡进军。虽然乡村的破坏情况比较严重，但是市镇与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都在这一



次特殊的野蛮人狂潮中坚持住并且保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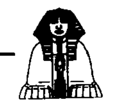
发生在公元558和559年的那场混乱的间接诱因——阿瓦尔人自己，现在抵达欧洲的门槛了。在公元6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开始向罗马政府提出了土地方面的要求，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进入了匈牙利。

几年前，阿瓦尔人进入乌克兰后，曾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替罗马帝国驱逐了库特里格尔人。现在，阿瓦尔人抵达了欧洲中部，他们带来的将是这片大陆的彻底动荡与帝国的灾难。

首先，阿瓦尔人与伦巴族人实现了结盟。伦巴族是一个日耳曼民族，居住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阿瓦尔人以伦巴人的名义进攻了盖庇德人的王国（今匈牙利东部），因为阿瓦尔人希望能得到伦巴人的帮助。但是，阿瓦尔人根本无意将新获得的土地拱手让给天真的伦巴族人，相反，他们将其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对原来的盟友报之以恐吓。

伦巴族人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远比英勇重要得多，再加上他们亲眼目睹了盖庇德人的命运，于是，他们向西逃去，并侵入了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接下来就是一场持续时间长达25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伦巴族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攻取了意大利北部、托斯卡纳大部分地区及意大利南部75%的领土。伦巴人的加入，永远地改变了意大利历史。

在随后的欧洲历史当中，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盖庇德人悲剧性的毁灭所造成的影响。阿瓦尔人在经济或社会方面，与之所侵略的斯拉夫人及其他欧洲野蛮民族完全不同。



他们是游牧的战士，他们具备创建帝国的经验与天资，他们变成了统治方面的精英分子。在他们的利剑所过之处，其隶属的民族，主要为斯拉夫人，立刻如潮水般涌入。

一些空置的盖庇德人的土地被斯拉夫人开垦了。而在伦巴族人逃走以后，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部分空置土地被斯拉夫农民占为己有。正是在公元6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在阿瓦尔人的鼓动、保护及强迫之下，斯拉夫人深入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及德国地域，直至易北河畔。

虽然阿瓦尔人本身在历史的风尘中消失已久，但是，在现代世界里，当今欧洲东部的民族及政治地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应归功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而言，阿瓦尔人是一台强暴的、一触即发的“推土机”，它经常强迫挡在它前面的民族迁移（并成为其他民族的痛苦之源），又同时使得在它庇护之下的民族因成为其新领地的殖民联盟而获益不少。

阿瓦尔人的新帝国，其面积约为100万平方英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在从波罗的海西端朝东延伸了1500英里，直至乌克兰及伏尔加河。阿瓦尔人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防护网。罗马帝国将成为他们产奶的乳牛，而斯拉夫人则将是这个防护网赖以运作的主要傀儡。

这样的超级劫掠行动持续了大约50年，阿瓦尔人从中净赚了至少7万磅黄金（相当于现代的大约70亿英镑）。公元572年，阿瓦尔人强迫罗马人开始支付每年8万金索利迪的保护费——即所谓的“和平支付”，其防护网也便开始运作了。3年以前，阿瓦尔人曾对罗马城市锡尔米尔姆（今塞尔维亚的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卡）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公元571年，在今塞尔维亚北部的一次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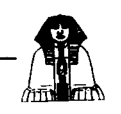


要战役中，阿瓦尔人打败了未来的罗马皇帝提比略，一年以后（公元 572 年），阿瓦尔人以不进攻罗马帝国为条件，要求罗马帝国每年向其提供“和平支付”。

但是，到了公元 578 年，阿瓦尔人重又暴露出了其侵略性的一面。这一次，锡尔米尔姆城又成了他们的目标。因为，如果阿瓦尔人想要从罗马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黄金，首要条件是他们必须从罗马人手中夺得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锡尔米尔姆城。无论是谁，只要他控制了锡尔米尔姆城，就控制住了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通道。如果锡尔米尔姆城在罗马人的手中，便意味着罗马人能够封锁对阿瓦尔人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萨瓦河，或者至少可以控制萨瓦河的下游，罗马军队则能以锡尔米尔姆城为基地，渗入位于萨瓦河以北上游的阿瓦尔人领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元 578 年，阿瓦尔人在他们的首领——全能的巴伊安可汗的带领下，开始了欧洲历史上最闻名的一次围城作战。首先，阿瓦尔人利用俘获的罗马工程师，分别在锡尔米尔姆城上游和锡尔米尔姆城下游修建了两座横跨萨瓦河的浮桥，从而切断了锡尔米尔姆城与外界的联系。由于阿瓦尔人牢牢控制了萨瓦河，所以皇帝所派出的援军未能攻破阿瓦尔人的防线。

在被围两年之后，锡尔米尔姆城饱受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城中居民当时的绝望心情，可以从考古学家在 1300 年后所发现的一段粗略刻划下来的文字当中窥见一斑。一位不知名的居民，在被围的城市的一面墙上，用不合文法的希腊文草草刻划下了一条留给上帝和后代子孙的讯息。“救世主耶稣，救救这座城市吧，”他写道，“狠狠地打击阿瓦尔人，



并且看护好罗马人的土地以及写下这些文字的人。阿门。”

当然，自那天起，“罗马人的土地”就极其需要救助。锡尔米尔姆城向围城的野蛮人投降了。并且，作为投降的条件之一，罗马当局被获准撤走城中幸存的居民。

现在，具有战略地位的锡尔米尔姆城牢牢地控制在阿瓦尔人的手心里面了，阿瓦尔人因此要求将“和平支付”增加25%——从每年8万金索利迪增加到每年10万金索利迪。罗马皇帝莫里斯却试图以送给对方一头宠物象和一架实心金床来蒙混过关。巴伊安可汗可是一点都不傻，他将大象和金床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罗马皇帝，并告诉莫里斯说，他更喜欢金币——按期送到的金币。

莫里斯——这个过分贪财以至于在他自己的军队当中都可谓是声名狼藉的皇帝——拒绝了可汗的要求。巴伊安可汗对此非常愤怒，并立刻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在攻占了锡尔米尔姆城的邻城、位于萨瓦河与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敦纳姆城（贝尔格莱德）之后，阿瓦尔人沿多瑙河南岸向东横扫而过，并在黑海岸边的罗马领土上度过了公元583年和公元584年的冬天。

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莫里斯就向巴伊安可汗提出的所有要求表示了屈服。在莫里斯支付了增加的25%的保护费之后，阿瓦尔战士撤回到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境内的阿瓦尔领地。

但是，巴伊安可汗暗中又有了新的军事方面的打算。仅仅几个月之后，居住在阿瓦尔人控制的土地上的斯拉夫人侵入了罗马领地——毫无疑问是受阿瓦尔人的鼓动，并且进攻了距君士坦丁堡以西仅100多英里之遥的大城市哈德里安诺



普利斯（今埃迪尔内）。

巴伊安可汗在拧紧了螺丝钉之后，又向罗马帝国提出了更多的金钱方面的要求，并且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在公元7世纪的一本书《圣德米特里厄斯奇事录》当中，该书作者——帖撒罗尼迦主教约翰，描述了“阿瓦尔人的首领在其派遣的使臣遭到莫里斯皇帝的拒绝之后，是如何策划给莫里斯以可能的最大程度的重创”的。

巴伊安可汗派出一支由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组成的庞大军队侵入希腊，给了莫里斯以重创。科林斯的部分地区和雅典下城遭到了洗劫。在科林斯，教堂的顶篷都被掀掉了。而在雅典，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大市场被毁的证据。

这支野蛮人的军队，甚至还试图攻占帖撒罗尼迦。公元586年9月22日，一个庞大的游牧部落逼近了帖撒罗尼迦。“这支军队是我们所曾见过的军队中最庞大的一支，”《圣德米特里厄斯奇事录》的作者这样写道，“据估计，这支军队至少有10万多人，他们喝干了河流与水井，并且把土地变成荒漠。城市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慌，因为除了那些曾在边远地区服过兵役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一支以前从不曾看到过的野蛮人的军队。每一张脸都是阴郁而沮丧的。”

虽然，当时帖撒罗尼迦城已经因在公元585年和公元586年上半年肆虐此城及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瘟疫而元气大伤，人口也部分减少了，但是，阿瓦尔人的进攻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帖撒罗尼迦城最终没有沦陷，人们认为应将功劳归于该城的守护神圣德默特里尔斯的神力的介入。

此外，阿瓦尔人在公元587年（当时，色雷斯郊区遭到



了劫掠）和公元 588 年都发动了进攻。其中，在公元 588 年，阿瓦尔人竟然攻到了君士坦丁堡以西 50 英里左右的马尔马拉海，再次加码的“和平支付”才让阿瓦尔人撤回了军队。

由于阿瓦尔人的威胁依然非常严峻，并且罗马帝国与波斯签订了和平条约（公元 591 年），莫里斯皇帝将大量军队调往与阿瓦尔人对峙的前线。在阿瓦尔人的压力与鼓动之下，斯拉夫人在大约公元 600 年左右开始从今塞尔维亚进入伊斯的利亚半岛，并沿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大肆扩张。现在，在长达 700 英里的巴尔干前沿就存在着潜在的阿瓦尔 – 斯拉夫威胁。

因此，到公元 7 世纪开始之前，拜阿瓦尔人所起的关键作用所赐，并且也是瘟疫的结果之一，罗马帝国面临着几乎是全面的经济与军事危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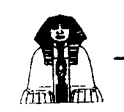
第五章 革 命

“在此次可怕的灾难当中，皇帝向人们展现了他的勇气，当时有一个保姆试图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他的一个孩子，他并没有准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还指出了自己的孩子。有人报告说，孩子被杀的时候，鲜血和着牛奶一起流淌，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痛哭不已。最终，有着超凡品质的皇帝，将生命赋予了死神。从那时起，不尽的灾难与不幸连续折磨着罗马帝国。”

如上文字是公元 8、9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写下的，描述了在公元 602 年 12 月席卷君士坦丁堡的一场普遍却又血腥的革命当中极其悲惨的一幕——大部分皇室成员被残忍地处死。这场革命不仅仅在罗马历史上占据着枢轴般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占据着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的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因为这场革命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削弱了罗马帝国，直接导致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独立，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了 70% 的领土，并且，也许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点，这场革命引发了伊斯兰教的崛起。

但是，强大的罗马帝国为何只因为一场平民革命，就元



气丧失殆尽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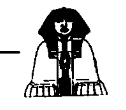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因为要向阿瓦尔人支付保护费，所以被榨走了巨额的黄金。另外，瘟疫与战争的连续反复侵袭的积累作用，使得罗马帝国的人口大为减少。因此，罗马帝国的税收基础也被削弱了。详细来说，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罗马帝国支付给阿瓦尔人的黄金达3万磅，而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由于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以及瘟疫的侵袭，罗马帝国的税收基础收缩了1/3。

莫里斯皇帝对此的解决办法是，从军队当中抽取更多的劳动力——但是，所付的报酬则更少。他试图通过削减军事开支，以及用货物取代现金支付的方式，解决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他的“以货代款”中的货物则往往是军事装备！军队为此感到很气愤。

接下来，莫里斯皇帝又改变了战利品分配制度，以确保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皇室能够获得其中的大部分，而士兵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不可能令军官和士兵感到满意。另外，军队对莫里斯皇帝拒绝向野蛮人支付赎金以换回被俘的罗马军人的做法也深感不满。

长此以往，莫里斯皇帝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吝啬与贪财的象征，而当莫里斯为了解决罗马帝国的财政问题而实行苛刻的税收制度的时候，他在公众中本已不怎么样的声望又下跌了不少。

有一名军官在大胆地发表反对皇室政府言论的时候说，皇帝的“贪财虽然并没有让他得到任何好的结果或是部下的



忠心，但是，他对金钱的贪婪却是所有麻烦的根源”。此外，莫里斯皇帝还送钱给全国的僧侣，“以确保他们会为他祈祷，这样他就能在这个世界里赎清自己的罪过，而不用到下一个世界去受罪”。

在莫里斯命令军队越过多瑙河并在野蛮人的领地上度过冬天的时候，最后的一次机会到来了。军队拒不执行命令，并且在公元602年11月中旬发动了兵变，他们选举了一个名叫弗卡斯的百人队队长作为领袖。弗卡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低级军官，他注定将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成为皇帝。

莫里斯在认识到，并且是正确地认识到弗卡斯是“一个生性嗜好鲜血与屠戮的家伙”之后，他动员了君士坦丁堡的卫戍部队加强防范，还举行了一天的战车比赛，并组织了其他的杂技表演，妄图以此阻止兵变对其人民的影响。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帝国首都的一个政治团体“格林斯”向皇帝大叫，如果他不想看到流血，就必须解雇他的财政大臣。

塞奥法尼斯写道，此刻，人民“再也无法容忍莫里斯的统治了”，他们请求皇帝的长子塞奥佐修斯就任皇位，如果塞奥佐修斯不愿意的话，他们就恳请其岳父耶尔曼内斯就任皇位。此后，莫里斯试图要“鞭打”他的儿子塞奥佐修斯并逮捕耶尔曼内斯。但是，人民保护了塞奥佐修斯和耶尔曼内斯，并爆发了起义。他们高喊着：“活剥所有莫里斯的拥护者。”

然后，皇帝在几分钟之内就丧失掉了自己的权力。在“格林斯”成员与其他人在街道上示威并将一名著名官员的官邸付之一炬的时候，其家丁全部离开了自己在城墙上的



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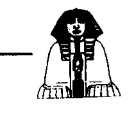
塞奥法尼斯写道："人们整夜聚集在一起，喊着针对皇帝的猥亵的口号。他们对皇帝极尽凌辱之能事，甚至还拿皇帝大开玩笑。"半夜时分，莫里斯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再也保不住了，"在脱下他的皇袍并换上了平民服装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他最信任的官员康斯坦丁·拉尔迪斯，于夜半时分登上了一艘战舰，逃命而去"。

耶尔曼内斯试图贿赂"格林斯"组织，以便他们能让他当上皇帝。但是，"格林斯"拒绝了他的要求，相反，"格林斯"的成员离城而去，并加入了兵变领导人弗卡斯的军队。弗卡斯立刻召集了一个会议，以决定谁能作皇帝，会议的结果是他本人被任命为皇帝。接着，弗卡斯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施洗者圣约翰大教堂由君士坦丁堡主教加冕称帝。两天后，弗卡斯乘坐着皇帝的战车进入了罗马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恐怖统治开始了。弗卡斯决定完全清除掉所有前皇室的成员，因此，"他派出士兵，命令他们杀死莫里斯及其家人"。

"莫里斯的5个孩子，"塞奥法尼斯写道，"被最先当着皇帝本人的面杀掉。因此，对皇帝的第一项惩罚是通过杀戮他的孩子来达成的。莫里斯以其坚强的意志承受住了这一惨剧的打击，他不断向万物的主宰上帝祈求，并且反复地自言自语：'只有您，噢，上帝，只有您能审判。'"此后，这位皇帝也被处死了。

弗卡斯命令将莫里斯及其孩子的首级示众。据塞奥法尼斯记载，"城中居民倾城而出，都来看这些首级是如何慢慢腐烂的"。



莫里斯的妻子和女儿暂时没有被处死，而是囚禁在一个女修道院中。前政府的其他支持者，遭到了有计划的围捕，并被一一处死。前地方行政长官、康斯坦丁·拉尔迪斯以及莫里斯的长子塞奥佐修斯，在迪亚德罗莫斯一个露天的大型运动场里被处死，而军队总司令，贵族科蒙提欧卢斯，“则在金角湾较远的一边，在圣科农教堂的海岸附近，被处死了，他的尸体被野狗抢吃一空”。

接下来的一年里，新皇帝开始收获革命的后果。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人们都开始感受到由兵变及莫里斯的倒台所引发的动荡。

在内部，君士坦丁堡爆发了骚乱。残酷无情的新政府也无法控制住局势了，城市的一个大区被不满的市民焚为平地，曾帮助弗卡斯获取权力的“格林斯”领导人也在混乱当中被杀死了。

在外部，罗马帝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波斯帝国的关系不幸遭到了破坏。波斯国王丘斯罗伊斯二世，一度对其与莫里斯之间极为诚挚的关系非常满意（因为丘斯罗伊斯本人的性命及皇位都因莫里斯之功才得以保全）。在听说自己的朋友被杀害了以后，他非常气愤，并且甚至拒绝接受新的罗马政府所派遣的使者。

兵变与革命不仅仅引发了民间的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军队本身四分五裂。在东部，一位经验丰富的罗马将军，纳尔西斯——他曾饱受波斯恐吓之苦——起兵反对弗卡斯，他控制了埃得萨城（今土耳其东南的乌尔法），并“写信给丘斯罗伊斯，请求他集合波斯军队，侵略罗马领地”。

作为对罗马政权动荡的直接反应，波斯人在公元6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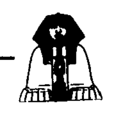


晚些时候，如秃鹰扑食般突袭了积弱的罗马帝国。在第一次遭遇战中，罗马指挥官耶尔曼内斯身受致命重伤。弗卡斯将与阿瓦尔人对峙的前线部队调往新的波斯前线。在第一次重大战役当中——时间是公元 604 年早期，地点为阿尔扎蒙河（位于土耳其东南部马尔丁附近）——罗马帝国的军队被彻底打垮了。

塞奥法尼斯写道，波斯王“将他的大象排列得像个阵营一样，并投入战斗。他大获全胜，俘虏了相当多的罗马人。他将所有的俘虏全部斩首”。罗马将军里昂提亚斯逃脱了波斯人的追捕，却又被弗卡斯下令逮捕并被押解到了君士坦丁堡。反叛的纳尔西斯最终也被逮捕，并在首都被当众杀死。

弗卡斯的命令在安提俄克、巴勒斯坦和埃及——这 3 个地方的税收额至少占罗马全部税收的 1/3——也遭到了抗拒。在安提俄克，军队砍杀了聚集在城中主要教堂内的人们。据历史学家，尼丘的约翰记载，大屠杀直到士兵们“使每一座建筑物都充满了鲜血”方才停止。安提俄克的动乱最终被一名罗马将军镇压了，此人下令把造反者或是扼死，或是淹死，或者“拿去喂野兽”。

在埃及，反对弗卡斯的造反者袭击了罗马帝国驻当地的总督府，并“将总督和他的随从刺在剑上”。有 5 个罗马城市落入了造反者的手中，并且，到公元 603 年晚些时候或是公元 604 年，虽然弗卡斯已经以“和平支付”的名义给了阿瓦尔人大量的财富，但是，一旦罗马军队不得不从阿瓦尔前线撤回以对付波斯人，阿瓦尔人的附庸斯拉夫人就忍不住要侵略罗马帝国了。斯拉夫人的一个经常性的目标是帖撒罗尼迦。据我们所知，在公元 604 年 10 月，一支约 5000 人的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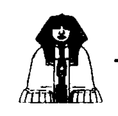
拉夫军队曾对该城发动过一次不成功的进攻，而该城居民的“耳朵已经非常习惯于”听到斯拉夫人在作战时的呐喊了。

一个真正的黑暗时代开始降临这个“永恒的帝国”。其后的一年，即公元605年的情况，与前些年相比毫无改观。在君士坦丁堡，流下了更多的鲜血。而波斯人则横扫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接任其被斩首的前任的新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个名叫塞奥佐修斯的男人，也和其他5名重要官员一起被处死了。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斩首，这惟一的例外则是在“被带到海岸边挖去双眼，并被扔进一艘小船里烧死”之前，“被割掉舌头，四肢伸开地绑在一副担架上，并被拖着绕城示众”。

对于弗卡斯的行为，究竟是否该归咎于酗酒、疯狂或者仅仅只是兴奋，尚不可知。也许该是这三者的综合体。举个例子，公元606年，在其女儿的婚礼上，弗卡斯对新娘和新郎变得极为嫉妒，于是他开始策划要将所有过分热情地称赞这对新人的支持者处死。在公元607年和公元608年，在获得了不忠诚的证据之后，他下令杀死了几十名行政官员，其中包括前皇帝莫里斯的妻子康斯坦提娜和她的3个女儿。并且，弗卡斯处死他们的地方，正是当年处死莫里斯的那条城门外的沟渠。

那一年的其他受害者则或者在被砍掉手和脚以后被活活烧死，或者被扼死，或者幸运一些——被直接斩首。那些弗卡斯在兵变之前就不怎么喜欢的人的整个家族，特别是与莫里斯和前将军科蒙提欧卢斯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无一幸免地被全部消灭了。

正当君士坦丁堡散发着恐惧与贵族鲜血的臭味的时候，



波斯人夺取了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和东安那托利亚省，并开始威胁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可是，弗卡斯却开始慢慢失去他的权势。起义开始在罗马帝国全境四处爆发。在君士坦丁堡，民众开始动荡不安；许多市民或是被杀，或是被投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曾是弗卡斯的支持者的“格林斯”组织也谴责他是个喝得烂醉的精神病人。“你又从高脚玻璃杯中饮酒，你又失去了理智。”他们高喊道。但是，日益偏执的皇帝对此的反应却是，“砍掉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肢体，并把他们吊在（城中的战车竞赛）竞技场中央”。另外一些人则要么被他砍了头，要么“被装在系紧的麻袋里面，扔进了大海”。

在这一背景下，内战正式爆发了。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格林斯”组织发动了暴乱，他们将该城的行政机构付之一炬，并打开了监狱的大门。在安提俄克，犹太人也爆发了起义，并捉住了当地的基督教大主教。他们把他的睾丸塞进了他的嘴里，并在杀死他之前，拖着他穿城而过。富人的家全部被焚为平地。而在此刻，在非洲的大城市迦太基，当地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儿子，一个名叫赫尔拉克留斯的年轻人，与一支舰队一起启程前往目的地君士坦丁堡。这个年轻人的目标是要取代弗卡斯，由他来作皇帝。

其时，虽然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或是被处死，但是，仍有许多针对皇帝弗卡斯的密谋在策划之中。弗卡斯似乎已经对惯例的斩首生出了厌倦，因此，他下令将一名指挥官用作竞技场上箭术训练的靶子，然后，再把还没有断气的这个人吊在他特别喜爱的军营的旗杆上。

最后，赫尔拉克留斯的舰队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弗卡斯



的统治就这样突然地却也是适当地终结了。“格林斯”成员和其他人抓住了弗卡斯，并将他活活烧死。

从内部而言，这场恶梦结束了。但是，从外部而言，罗马帝国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第六章　“苦难之杯”

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由于赫尔拉克留斯的介入，弗卡斯皇帝在罗马帝国内部制造的流血已经终结，但是，一个导致罗马帝国在30年内失去其70%领土的进程，仍在加速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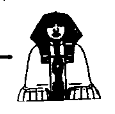
继公元602年的兵变之后，罗马帝国与波斯人及野蛮人的关系变得动荡不安，其影响已经凸显出来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就算是如赫尔拉克留斯一般坚决而又固执的统治者，也无法再把盖子盖回去了。

塞奥法尼斯在描述罗马帝国正在经历的混乱局势时这样写道：

“赫尔拉克留斯在成为皇帝的时候发现，整个罗马帝国的情况可谓是一团糟。

“因为野蛮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已将欧洲变成了荒漠，而波斯人则从亚洲倾巢出动来打家劫舍。他们曾将整座的城池围得水泄不通，也曾将整支整支的罗马军队消灭得一干二净。

“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新皇帝对于该做些什么充满了悲观的怀疑。因为，军队已经完全四分五裂。他通过询问得知，当年和弗卡斯一起反对莫里斯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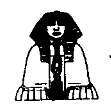


兵团当中任职。"

在罗马帝国的西北部，斯拉夫人打垮了所有驻扎在伊斯特拉半岛上的罗马军队，并且进攻了亚得里亚海沿岸所有主要的罗马城镇。在短短的3年之内，欧洲大部分的城市，其中一些还是欧洲最繁华的，变成了一片瓦砾。大部分居民都逃走了。他们的城镇——萨洛纳、斯卡尔多纳、纳罗那、里辛尼尔姆、多西利以及埃皮道热姆，全部变成了燃烧着的废墟。

难民们在永久性移居意大利的同时，也如潮水般涌入了沿海岸的几个可以防守的关键地方。埃皮道热姆的居民一路向前，直至海岸边，他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新城——拉古锡亚姆城（今杜布罗夫尼克）。难民们决心要在他们的新家站稳脚跟，所以他们修筑了一大圈厚实的防护墙，并且最终生存了下来。就在几英里之外，也许是里辛尼尔姆人修建了卡特塔洛城（今黑山之科托城）。而在拉古锡亚姆城以北140英里处，逃难至附近的海岸城镇斯普利特的萨洛纳人，把公元3世纪的皇帝戴奥西勒提安的陵墓变成了一座大教堂。但是，最令人崇敬的萨洛纳殉道者留下的遗物，却在斯拉夫人围攻时被神秘地带到了罗马。斯普利特城曾在公元5、6世纪衰落，是移居此地的难民又重建了该城（500年后，该城将在推动中世纪的克罗地亚国家的出现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3个避难之地，有着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与难民们当初逃离的内陆城镇不同，杜布罗夫尼克城和斯普利特城就建在海边，而科托城则地处一个类似于海湾的小港。如果必要的话，这3个地方全部都能从海上获得给养补充，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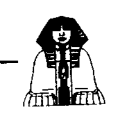


野蛮人在陆地上所进行的围城战就会变得效果不明显、无法持久，而且不再像从前那样威力巨大。

其时，其他的斯拉夫部落——“一个由德罗古比特人、萨古达特人、贝勒格兹特人、拜欧尼特人以及贝尔兹特人组成的人口极多的游牧部落”，突然出现在希腊，他们甚至还攻击了希腊诸岛及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地区。正是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公元610年至公元620年，希腊在野蛮人的手中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地中海地区的种族，主要由传统民族和罗马-希腊人构成，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斯拉夫战士以及他们的家人侵入希腊并在希腊全境安营扎寨之后，这种种族构成就被永远地改变了。

一项对希腊保留下来的地名的分析研究表明，从这个时间往后，希腊的每一个地区都确实曾有过斯拉夫部落居住，事实上，在好几个地区，斯拉夫人还是当地的多数民族。据一个名叫瓦斯默的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地名研究显示，即便到了本世纪，在希腊全境，保留下来的斯拉夫地名仍有大约2000个。其中的730个地名是在希腊北部发现的，尤其是在以下这些地区：佛罗林那（165个）、塞萨洛尼卡（152个）、科扎尼（116个）、尼格里塔（111个）、佩拉（94个）以及德拉马（92个）。

在希腊中部地区又发现了509个斯拉夫地名，集中在以下地区：约安尼纳（334个）、特里克卡拉（122个）、拉利萨（38个）以及马格尼西亚（15个）。在远南-伯罗奔尼撒，保留下来429个斯拉夫地名，集中在阿查亚（95个）、兰科尼亚（81个）、特里菲林（42个）、麦森尼亚（41个）、埃里斯（34个）、科林斯（24个）以及阿尔戈利斯（18个）。



在希腊南部其他的地区，则发现了382个保留下来的斯拉夫地名：埃托利亚（98个）、菲提奥提斯（55个）、尤利坦内（48个）、弗基斯（45个）、阿尔塔（44个）、普雷维扎（33个）、波奥提亚（22个）、尤波伊奥（19个）以及阿提卡（18个）。

正是在这个时期，斯拉夫人开始将海船用于军事目的。《圣德米特里厄斯奇事录》的作者写道："他们开始进行海战，袭击塞克拉迪克诸岛以及塞萨利外的岛屿。"

另外，这些海上扩张的大部分看来是通过熟练操纵一种其复杂程度不超过大型独木舟的船只来完成的。据《奇事录》的作者称，"他们懂得如何用一整根树干掏挖出一艘船来"。

虽然要航行至某些岛屿无疑需要更大型的船只，但是，现在对地名证据的分析研究确证，他们到达过这些岛屿，极有可能是驾驶他们俘获的船只到达的。

斯拉夫语的地名突然出现在了塞克拉迪克诸岛中的安德罗斯岛和滕罗斯岛上，而这两个岛屿都因其周围危险的海流而与希腊陆地及其他岛屿分隔开了。斯拉夫语的地名也同样出现在斯盖罗斯岛（出产丰富的蜂蜜、葡萄及淡水）、埃及纳和海尔达岛、雅典南部、著名的伊塔卡岛（传说中是特洛伊战争英雄奥德赛的故乡），以及甚至是边远的、距伯罗奔尼撒本身最南端70英里的克里特岛上。事实上，150英里长的克里特岛上保留下来的地名不到17个。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斯拉夫人从阿瓦尔帝国的领地当中如潮水般喷涌而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斯拉夫人的扩张不仅仅得到了阿瓦尔人的同意，还受到了阿瓦尔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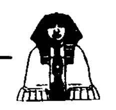
鼓动，甚至阿瓦尔人本身也参与了斯拉夫人的扩张行动。公元615年，斯拉夫人甚至将一部分战利品赠与了阿瓦尔可汗，这就表明，他们是以阿瓦尔附庸的身份进行这些扩张行动的。此外，他们还告诉可汗，如果他想得到更多的战利品，就应当在下一次进攻时派遣阿瓦尔军队参战。

从公元617年晚些时候或是公元618年早期开始，慓悍的阿瓦尔（而不是阿瓦尔附庸）军队风卷残云般攻入了罗马境内，并一直进逼到距君士坦丁堡仅数英里之遥的地方。可汗的计划似乎是要首先进行劫掠，然后再榨取保护费。公元623年，阿瓦尔人撕毁了一项临时停战协议，并“对赫尔拉克留斯发动了一次突然性的武装进攻”。

“皇帝为这一无法预料的事件而惊慌失措，并逃回城去。”塞奥法尼斯写道，“野蛮人缴获了皇帝的全部装备和其他所有他们能攫取的东西，然后收兵而去。”

到公元626年，阿瓦尔人对保护费的要求不断加码。他们已经开始威胁君士坦丁堡本身了，而他们所发动的又一次突袭一直逼近到了首都的城墙边上。

“他的军队到达了黄金门，他们将城墙外和郊区当中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男人和牲畜，全部作为战利品带走了。”《巴斯切利历代记》的不知名的作者这样写道，“他们强行进入了圣科斯马斯教堂以及布兰切尔内的达米恩，并且进入了在城市另外一边的、位于普罗莫特斯郊区内的神圣天使长教堂。他们不仅拿走了圣杯和教堂里的金银餐具，还打碎了圣坛。然后，他们带着包括他们的囚犯在内的所有东西越过多瑙河而去，途中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当时，在亚洲，继弗卡斯革命之后开始的波斯战争继续打击着罗马帝国。公元611年，波斯人占领了卡帕多西亚和安提俄克，到公元613年，他们攻取了大马士革。在随后的一年里，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系统面临了一个双重的打击，这既是一个领土方面的打击，也是一个宗教方面的打击，因为基督教最神圣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波斯军队占领了。

丢掉了耶路撒冷，罗马帝国的士气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打击。就心理角度而言，这也许是整个波斯战争中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次攻击。波斯军队屠杀了耶路撒冷城中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并且俘虏了好几千人押往美索不达米亚，这些俘虏"在巴比伦河边坐了下来，痛哭不已"。

但是，更多的基督徒则死于波斯人临时搭建的监狱中的高温与过度拥挤。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由来已久的宗教、种族及文化冲突，也导致了更多基督徒的死亡。此外，"邪恶的波斯人"夺取了基督教最神圣的遗物，并将其带回了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圣物是一个木制十字架的碎片，信徒们认为当年耶稣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被钉死的。

从此以后，似乎有一种危险的失败主义情绪在罗马帝国扎下根来。当然，并没有人把耶路撒冷丢失的责任归因于"上帝憎恨的邪恶的波斯人"，人们认为，一切都应归因于上帝本身，因为是他把波斯军队"当作了惩罚罗马人的一根棍棒，当作了责难罗马人的一剂良药"。

人们开始把发生在罗马帝国的一切视做是神的旨意。安提俄丘斯描述了波斯人攻进罗马大肆杀戮的情形，从而向我们展示了罗马人受宿命论影响之深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他写道：



“并且，正因为我们既不知道上帝也没有遵守他的戒律，所以上帝才把我们送到了我们的敌人手上。上帝已经将这座圣城交付给敌人了。

“波斯人感觉到上帝已经抛弃了基督徒，并且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帮手了。所以，他们带着与日俱增的愤怒，开始绕城修建高大的木塔。在木塔上面，他们放置了弹弓。斗争持续了 20 天，他们狠狠地发射他们的弹弓，在第 21 天攻破了城墙。这样，敌人就带着极端的愤怒进入了城市，如同愤怒的野兽和被激怒了的毒蛇。

“防守城墙的男人们逃到山洞、沟渠和蓄水池里面躲了起来并得以幸存；而人们则成群地逃向教堂和他们的圣坛，在那儿，他们遭到了屠杀。

“敌人在盛怒中进了城。他们个个咬牙切齿，如邪恶的野兽般嘶鸣着，如狮子般咆哮着，如凶猛的毒蛇般吐着信子，并且杀死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他们就像疯狗般用牙齿撕碎信徒的血肉，他们谁都不尊重，根本不管面前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孩子还是婴儿，是牧师还是僧侣，是少女还是寡妇。

“他们消灭掉这个年龄段的人，就像杀死野兽般地杀死他们，把他们切成碎片，像割卷心菜一样把许多人砍倒在地，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满饮一杯苦难。”

在城市陷落之后，安提俄丘斯牧师接着描述了一群逃脱的耶路撒冷居民，在回望他们自己的城市时所见到的景象：

“他们再一次抬起眼帘，凝视着耶路撒冷以及城中神圣的教堂。一股如同从炉子当中窜出来的火焰，一直烧到了云端。

“他们开始呜咽，接着是痛哭，再然后则是悲声一片。当他们看到神圣复苏教堂已是一片火海的时候，有的人狠狠地掴打自己的脸，有的人把脸埋在尘土当中磨来磨去，有的人往自己的头上扔灰烬，还有的人则撕扯自己的头发。锡安教堂被笼罩在浓烟与火焰之中，耶路撒冷被毁掉了。”

很快，埃及全境、利比亚以及雷范特地区都在波斯人的控制之中了。公元616年，一支波斯军队进至波斯弗雷斯东岸，此地距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不到一英里。

罗马帝国的首都会遭到与耶路撒冷城同样的命运吗？罗马人再一次将逼近的厄运视作是上帝的旨意——视作是上帝对他们的皇帝弗卡斯的所作所为的惩罚，其中又以他发动革命的罪过为重。一群罗马要人越过波斯弗雷斯，给波斯国王送去了一封信，信中满是内疚与敬畏的字句。

“正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才招致了您的进攻，罗马人已经衰弱到如此可怜的地步了。”他们写道。

在信中，帝国首都的大人物们可悲地乞求“最伟大的陛下，最爱和平的陛下”——在不像这么尴尬的情况下，罗马人称之为“上帝憎恨的人”——能“以上帝的仁慈”尽快恢复和平。要人们如此卑躬屈膝地说道：

“我们还要请求您以您的仁爱，把我们最尽职的皇帝赫尔拉克留斯视作是您忠诚的儿子。因为他正在做好一切准备，以向您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表达其所理应有的尊重。如果您能这样办，您将获得双重的光荣，首先是因为您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其次是因为您带来了和平。

“我们自己将会永远铭记您那波澜不惊的天资，并且从此以后，我们将会天天为您的健康长寿而祈祷。只要罗马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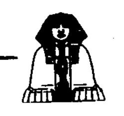
国存在一天，所有领受到您的仁慈的人就绝不会忘记您的功德。”

事实上，罗马帝国在绝望中已经变得极其自卑。帝国通货处于崩溃的边缘，而领土的丧失也很快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粮食供应的减少。公元618年，政府面包分发终止了。罗马帝国3/4的领土已经丧失掉了：雷范特地区、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及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大部已落入波斯人之手；而色雷斯大部、希腊以及意大利，已被阿瓦尔、斯拉夫和居住在意大利的伦巴族野蛮人占据。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军队虎视眈眈，准备要大开杀戒。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破产，但却仍在君士坦丁堡苦苦支撑的罗马政府请求教会，为了帝国的生存交出其所拥有的金银财宝、金银餐具以及祈祷坛用品。罗马政府在这一地区收集了20万磅的黄金（约合今天的200亿英镑），并在表面上称这笔钱是为了筹建一支对抗波斯人的新军队。

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已经听说罗马皇帝又搞到一笔财富的阿瓦尔人，强迫罗马人将保护费加倍，增加到每年20万金索利迪。

到公元626年，君士坦丁堡完全被包围了。形势看起来已经是无可挽回。在城外，西边是阿瓦尔人及其附庸斯拉夫人，而在东边，越过波斯弗雷斯就是波斯军队。阿瓦尔人与波斯人取得了联系，并开始共同行动。

阿瓦尔可汗——正如罗马人所担心的那样，他也是个“上帝憎恨的人”——甚至向罗马首都的居民提议作一笔交易，也就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要他们交出自己



的全部财产。

“如果城中有人想要离开这个城市，除了你脚上的鞋和身上的衬衣以外，你的身上不应该再有任何别的东西。接下来，让我和我的朋友沙巴拉兹（波斯将军）签定一个协议。”阿瓦尔可汗对一个居民代表这样说道。

“如果你过河前往他处，他不会伤害你。把你的城市和你的财产留给我，因为除非你能把自己变成一条鱼从海里溜走，或者是变成一只鸟儿从空中飞走，否则你若想要获得安全的话，你就别无选择。”他这样警告道。

但是，公元626年对罗马帝国的命运来说，却将会是一个临时的转折点，因为最终阿瓦尔人的进攻失败了，而波斯人也被打退了。

在接下来的4年里，赫尔拉克留斯皇帝筹划着要收回所有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被占土地。但是，在这长达25年的战争当中的财力、人力消耗，无论对罗马帝国来说还是对波斯来说，都是相当巨大的。

对前者而言，这是一个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胜利，但是对后者来说，这却是最终的大灾难的一个前奏。

从公元6世纪40年代开始，瘟疫与野蛮人进攻的累积，最终引发了财政问题，而财政问题又招致了兵变和革命。那一关键的事件——弗卡斯的接管——给了波斯人以在罗马帝国最虚弱的时候进攻它的借口，也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虚弱，导致了战争的长期性，并且使得罗马帝国暂时性地丢失了不少领土。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在公元630年，当战争结束



的时候，双方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已元气耗尽。

但是，瘟疫与阿瓦尔人的冲击究竟如何合力打垮了罗马帝国呢？



第七章　瘟疫与野蛮人

虽然数百万人死于瘟疫，但是，如果据此就说是瘟疫将罗马帝国的血汗榨干，直至将帝国逼到死亡门前，那就太过于简单了。瘟疫的作用远比上面所述复杂得多。

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瘟疫在加重每一个单独的纳税人负担的同时，也使得税收基础与净余税收减少。在摧毁公元602年革命时的军队、帝国以及地缘政治的过程当中，正是瘟疫与阿瓦尔人的“保护费”要求的合力，起到了一种虽从未被人们明言过，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公元541年到公元602年这一时期，包括4次大规模瘟疫在内，总共爆发了几十次瘟疫，罗马帝国的人口缩减了约1/3。而在经济方面，其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减少了10%，并且其减少的百分比可能高达15%。到公元602年，由于瘟疫，罗马帝国累计已损失了至少3000万金索利迪。另外，支付给阿瓦尔人的保护费达200万金索利迪，而由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占领巴尔干而给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累计达到了500多万金索利迪。

这样，瘟疫与野蛮人的影响的合力最终就导致了公元602年的革命、地缘政治的瓦解以及与波斯人的战争。毫无疑问，在某些时期，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也曾经有过兵戎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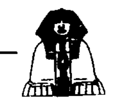
见，但是，公元602年的独特的动荡不安的环境，最终决定了这二者间战争的时间，也决定了战争的类型，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

罗马帝国在紧随公元602年的动荡与革命之后爆发的波斯战争当中，财产损失之巨，甚至超过了瘟疫所直接造成的损失。在20年左右的战争当中，罗马帝国的累计财产损失，估计达4000万金索利迪（约合今天的500亿英镑）。而由阿瓦尔人在帝国西部的军事行动及波斯人在帝国东部的攻城掠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累计达800万金索利迪。而在没有被波斯人或阿瓦尔人占领的帝国领土上，由过去的瘟疫所造成的持续的财产损失也达500万金索利迪。

在波斯战争的后14年里（公元616年至公元630年），罗马帝国的财产损失已经达到了一个灾难性的比例——平均每年350万金索利迪（主要是由波斯人占领了罗马领土而造成的），占罗马帝国岁入的70%。

从长远来看，罗马帝国在公元541年到公元631年的这90年间，总共损失了大约9000万金索利迪。直接由瘟疫所造成的损失，估计达3500万。波斯战争（一场主要是由瘟疫所造成的经济与政治的动荡所引发的战争）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估计达4000万。罗马帝国在波斯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总数又是数千万金索利迪。支付给阿瓦尔人的保护费约为500万，而由于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占领罗马帝国的土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总数，可能高达1300万。

瘟疫还导致了城市市场的萧条，从而破坏了乡村的经济。农村和城市的政府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的政府邮政服务和公路驿站系统——特别是在亚洲——已经完



全关闭。城市在防御方面的战略性作用，也因主要由瘟疫所导致的人口剧减而遭到了破坏。而处于收缩状态的城市本身，相对于内陆腹地的政治权威也大大削弱了。

阿瓦尔人及其附庸占领了巴尔干大部分地区，这就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了其主要的兵员补充基地。而且，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瘟疫很可能会以更加猛烈的来势，经常性地到狭窄的兵营里袭击军人。

就组织机构方面而言，公元7世纪30年代的军队与公元7世纪早期的军队有相当大的区别。当时，罗马皇帝可以调遣主要由正规军组成的10万人的混成机动部队。但是，到了公元630年，当波斯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财政窘迫、人力资源的损失（部分原因是因为瘟疫的爆发）以及关键的兵员补充基地的丢失，罗马皇帝所能够调动的部队仅仅只有3万到4万人了，并且，这些兵员还要划归不同的司令部指挥。

可是，罗马帝国剧减了的资源和缩小了的军事机器，很快就将在波斯战争的最后5年内经受严峻的考验。而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却将要带着如火山喷发般的力度与速度，在阿拉伯半岛外的沙滩上崛起了。这支完全出人意料并且是非常成功的地缘政治新军，自称为“伊斯兰”。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它完全摧毁了波斯帝国，把罗马帝国的面积减少了一半，并且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很快就将从大西洋扩张至印度边境。

有一些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甚至把伊斯兰教的创建者穆罕默德视作是一个新的亚历山大大帝。并且，在1400



年后的今天，伊斯兰教对这个世界仍有着巨大的政治与宗教的影响。

穆罕默德本人是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半岛之子，但是，引发了新宗教的创立的一些因素及其明显扩张的大部分原因，却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以外，来自罗马及更广阔的世界。

此外，虽然穆罕默德出生在大约公元575年，并且从大约公元610年才开始他的神职工作，但是，许多影响了他并引导他走向胜利的外部因素却是源于上一个生死攸关的50年，即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灾难。

那么，那些气候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又是通过何种机理推动了70～100年后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并引发了它的扩张的呢？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之剑

“他们（人类）的邪恶才招致我们将伊拉姆（马利卜水坝）的洪水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并且（我们）用两个结苦果的（坏）花园取代了他们的两个（好）花园……

“因为他们的忘恩负义，我们才将此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自己作孽……所以我们……令他们分居各处，完全分散开来。”

——古兰经

第八章　沙漠中的崛起

据伊斯兰教称，在公元7世纪20年代的某一时刻，真主这样对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圣徒穆罕默德说道：

“他们（人类）的邪恶才招致我们将伊拉姆（马利卜水坝）的洪水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并且（我们）用两个结苦果的（坏）花园取代了他们的两个（好）花园……

“因为他们的忘恩负义，我们才将此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自己作孽……所以我们……令他们分居各处——完全分散开来。”

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上面所提到的洪水和其后的“分散”犯了错的人，指的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位于也门贫瘠内陆马利卜的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水坝的溃决。

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也门都一直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一支本土政治力量。但是，公元6世纪30年代后半期及公元6世纪40年代的全球气候紊乱，对也门打击不小。

首先，瘟疫摧毁了这个国家——也许是从公元539年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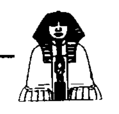
者公元540年以后开始的。可以肯定的是，到公元6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期，瘟疫已经到达了也门。其次，马利卜水坝的溃决，使得也门一个重要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完全破坏。

虽然这一巨大的水坝工程不在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列，但是，也许它应该位列其中。这一工程是人类在现代以前所完成的最大、并且也是最壮观的土木工程奇迹之一。主要的大坝高53英尺，长2046英尺，其底基宽度至少为200英尺。大坝主要用于汇集洪水。当它所汇集的洪水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就将洪水通过两道主要的水闸导入一条3700英尺长的沟渠，再由此处通过15道二级水闸和121道三级水闸进入一个由成百上千英里沟渠组成的庞大灌溉系统。这一系统累计灌溉了24000英亩土地，并供应了3万至5万人的用水。

马利卜在公元3世纪晚期以前，曾是强大的萨巴王国（圣经当中通常称之为希巴王国）的首都。随后，在古代萨巴王国变成了喜姆雅尔人的臣属国后，马利卜就成了萨巴与喜姆雅尔联合王国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地区。

全球范围的气候紊乱开始于公元535年并持续了30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一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系列的洪水与水坝溃决，并最终导致了水坝的退化与废弃，而农业生产也因之完全崩溃。

我们应该把马利卜水坝系统的退化及其最终在大约公元590年左右的被废弃，看做是一个延续时间为50至60年的过程——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而非单独的一次大灾难。但是，这一过程最初却是由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紊乱所引



起的。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公元6世纪40年代及公元6世纪50年代的全球性气候紊乱，好像不仅仅只是制造了干旱，有时也制造出极为严重的暴风雨。其中的一次反常的暴雨引发了滔天的洪水，以至于在公元6世纪40年代的某一时间，马利卜大坝在其1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倒塌了。

这一事件记录在一块皇家的碑铭当中。由于大坝的损坏情况相当严重，因此，统治者从也门全国征召了一支劳动大军来修补大坝。据在大坝遗址处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显示，此次洪水的威力是空前的。当然，也门统治者也采取了空前的措施，以防止这样的洪水再次发生。人们从这第一次修补开始使用大块的石头来加固大坝。

严重的洪水从两个较为明显的方面损坏了大坝系统。首先，洪水趋向于削弱或者冲垮大坝本身，其次，洪水将成千上万吨的淤泥冲进了大坝后面的水库。一旦水库淤满了冲击沉淀物，库底到大坝顶端的距离就会被缩短，这样，它作为一个水库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

对大坝所作的地理形态方面的研究显示，从公元6世纪40年代大坝溃决之后开始的10年里，大坝的淤泥沉积与日俱增。在库池的一个部分，沉积物水平在10年内增加了30英尺。虽然由于库池各相关部分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可比的，但是，对比的结果仍是惊人的：在大坝于大约公元450年左右的那次溃决到公元6世纪40年代的那次溃决之间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沉积下来的淤泥仅16英尺；而在此前的90年间，沉积物也不过只有23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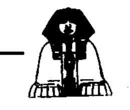


在公元6世纪50年代，大坝似乎又一次溃决了。不过，这一次水库的淤泥沉积情况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对大坝系统的整体设计作重新考虑的地步。将大坝增高也许曾是人们考虑过的一个解决沉积物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花费甚巨。因此，也门统治者决定采取另一个办法：放弃主要的水闸系统及大部分农田，并改用水库来浇灌它北边地势较低的尚未开垦的土地。受此影响，农田和粮食生产减少了50%。

因此，公元6世纪50年代以后，马利卜水坝也许再也不能哺育其人民和许多绿洲中的部落以及游牧部落。并且，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他们各自只好移居外地，或者改变他们每年迁移的习惯。无论如何，其功能现在已经缩减到了仅仅灌溉水库以北地区的马利卜水坝系统，仍在使用当中。

但是，公元6世纪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的持续干旱和间歇性暴风雨的合力，并非仅仅只是毁坏了大坝和水库，高地的生态系统也毫无疑问地遭到了破坏，而水流却正是从高地上流下来的。干旱无疑使得高地上的大多数植物都枯死了，这就使得土壤的保水性能大大下降。流水的冲刷因素及侵蚀明显增加了，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淤泥被冲进了马利卜水库。

即使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紊乱平息以后，要想植物生态系统完全恢复、侵蚀和淤积情况减少，也差不多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地理形态方面的证据表明，在大约公元560年到大约公元590年的这个时期内，被冲刷下来的沉积物数量仍然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在这30年间，水库当中又淤积了20英尺厚的沉积物。



因此，到大约公元590年，在大坝再次被洪水冲垮以后，人们废弃了大坝，而马利卜的农业生产情况，相对于其在公元6世纪30年代之前的水平来说，已经衰退到了纯粹微乎其微的地步。由于马利卜的人口在最近又减少了，而也门人口也已遭瘟疫洗劫，因此，也门再也无力支付不断增加的修复大坝所需的资金。这样，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便湮没在历史当中了，而马利卜的人口水平则可能从3万至5万人下降到了5000至1万人。

根据《古兰经》和其他阿拉伯的资料所示，马利卜大坝的退化与废弃，确实迫使许多人为寻找新的土地而离开了马利卜。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个部落巴奴迦散部落和阿兹德部落，向北迁移到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麦地那绿洲。

与此同时，从公元6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气候问题，正在以另外两种方式加速阿拉伯半岛上的变迁进程。首先，阿拉伯半岛中部和北部的气候问题，这次也许是干旱，导致了农业歉收与饥荒。

在麦加城——40年后，穆罕默德将出生在这个城市——也许在公元6世纪中期到晚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据几位公元8、9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称，麦加发生饥荒的时间是在穆罕默德的曾祖父艾米尔在世的时候。

虽然最早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伊宾·伊沙克是在艾米尔之后500年记述此次饥荒的，但是，因为这次饥荒爆发时，正值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地区因公元6世纪30年代的全球气候问题而爆发了类似的饥荒，所以，此次饥荒在历史上可能真有其事。

可考的文字证据表明，饥荒相当严重，以至于作为人民



的领导者之一，艾米尔不得不从远至叙利亚的地方获取小麦，并且用一种碎肉熬成的肉汤让人民果腹。

“艾米尔为他的人民——一个因歉收而受苦的麦加民族，寻找面包和肉汤。”伊宾·伊沙克引用过其作品的、一位生活在公元6世纪或公元7世纪的麦加诗人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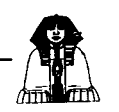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麦加诗人，生活在公元6世纪的沃卜·伊宾·阿卜德·奎萨伊——公元9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尔－塔巴利引用了他的作品——描述了艾米尔是如何从饥荒中拯救他的人民的：

> （艾米尔）主动承担起
> 别人都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
> 他从叙利亚给他的人民
> 带回来了一袋袋脱糠的小麦，
> 并让他的人民饱餐碎面包。
> 人们被高高摞起的木碗包围着，
> 碗里是装得快要溢出来了的面包和新鲜肉汤。

另一位其作品也曾被阿尔－塔巴利引用过的麦加诗人马特鲁德这样写道：

> 在麦加人民饱受干旱与饥荒之苦的时候，
> 艾米尔为他的人民准备了碎面包和塔里得（肉汤）。

艾米尔在应对饥荒时所取得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好名声。此后，他差不多就以“哈希姆”而四海闻名（“哈希姆”一词，表面看来是由“哈沙马”即“弄碎”一词而来，以纪念他将自己从叙利亚带回来对付饥荒的小麦所制成的面包弄碎或者是撕碎一事）。



艾米尔在拯救他的人民时所起到的作用，使得他的家族的地位与日俱增。诗人马特鲁德称他本人为“崇高的人”，而其他人则称他为一个“创造非凡业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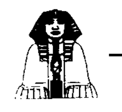
也许，正是艾米尔在公元6世纪30年代饥荒的严峻考验中所赢得的声望，促进了他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地位的巩固——其中包括他的曾孙，穆罕默德。

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阿拉伯，还有另外一个由气候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即源自非洲东部的瘟疫。根据伊宾·伊沙克、《古兰经》及一块碑铭所提供的证据，在公元6世纪40年代，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地区都遭到了腹股沟腺炎袭击的折磨。而其发生的日期使得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认定这种疾病就是瘟疫。因为经由非洲东部到地中海地区再到也门的瘟疫，在公元6世纪40年代正好有可能在也门肆虐。

有关也门所爆发的瘟疫情况的最早参考资料来自《古兰经》本身最早的一个部分。《古兰经》认为瘟疫是上天降下的，而黑色的皮肤疖子则是上帝派遣的“飞着的生物”扔下的“烤过的粘土”。《古兰经》描述了一支大约在公元550年威胁麦加的也门军队所经受的遭遇：

> 你难道不曾看到真主是如何处置敌人的吗？
> 难道真主没有教他们的阴谋化为乌有，
> 并且将大批向他们投掷烤过的粘土石块的飞行生物派遣到他们中间，
> 叫他们像绿色的庄稼般被牛吃掉？

伊宾·伊沙克详述了军队撤退的情况：“他们不断地倒在



路边，悲惨地死在每一个水洞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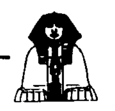
> 敌军首领的身体遭到了重击，
> 在他们把他带走的时候，
> 他的指头一个接一个地掉了下来。
> 在每一个指头脱落的地方，
> 将是流着脓水和鲜血的不尽的痛苦。
> 他们宣称，
> 在他死去的时候，
> 他的心脏从他的身体里面爆裂而出。

最后，据考古学家在马利卜发现的一块碑铭记载，因为劳动大军大批地死于瘟疫，所以，对大坝的修补工作在公元6世纪40年代不得不拖延了下来。

马利卜大坝的溃决、无数小型灌溉系统的毁坏以及瘟疫，正是导致了也门统治者的势力在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开始让位的关键性因素。

也门在至少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内的主要本土势力。事实上，也门的人口占阿拉伯半岛全部人口的一半，而在也门衰落之后，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然，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在穆罕默德的帮助下，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力量转移到了麦地那绿洲——一个到当时为止仍被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部落统治着的阿拉伯中部城镇！

但是，给穆罕默德以兴盛发达的机会还不仅仅只限于一个权力真空，其他的因素也正在为伊斯兰教崛起所需环境的形成而运作着。



“世界末日”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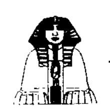
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导致伊斯兰教崛起的关键因素是穆罕默德在开创其宗教思想时，广阔世界中所存在着的独特的政治与神学形势。

他的宗教哲学的最早部分，是先加以阐明，再进行记忆，然后再在公元610年到公元620年这一时期，将它们以《古兰经》的早期章节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在阿拉伯半岛和整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亲眼目睹统治地中海达800年之久的罗马帝国的最后终结。

就好像整个世界的政治体制都即将要土崩瓦解一样，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都不仅仅只从纯粹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而且还从宗教和宇宙的角度来看待显然已经迫近的大灾难。

基督教和犹太人团体——包括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的——有着流传已久的“世界末日”传说。根据这一传说，他们认为人类历史的主要轮廓是一个由神力按年代顺序预先确定好的结构，并且这一结构会随着死者复活、最后审判日、人类世界消亡并由正直的人将在其中获得永生的“神之国度”取代之日的到来而终结。根据犹太人和基督教的预言传说，世界的终结将分3个不同的阶段到来——魔鬼统治与野蛮人入侵；弥赛亚（救世主）降临并打败魔鬼；死者复生与最后的审判。这一整套程序被视作是上帝对人类历史的结局的安排计划。

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以更加完全的宇宙的角



度，看待公元605年至公元630年的波斯战争。并且，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都把罗马帝国在公元610年至公元620年之间（恰恰正是穆罕默德出现的时间）的明显已经逼近的分崩离析，看做是弥赛亚到来及世界终结的预报。

事实上，在波斯人于公元614年攻取耶路撒冷之时，有人称“大群的天使”都不愿“违背上帝”放弃圣城的“意愿”，因为基督徒所犯下的过错已经“超过了上帝所能容忍的限度”，所以上帝将圣城送给了敌人。据一份传说是写在波斯战争之前（但实际上是写于波斯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基督教预言称，“没有黑夜的日子”很快就要降临人间，并且所有凡尘的力量都将归于结束。

那份预言更详细地阐述了由基督徒——以弗所的约翰，在阿瓦尔战争（罗马帝国在公元570年到公元626年饱受其害）的较早阶段所宣扬的世界末日观点。他在大约公元580年写到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动荡与屠戮”，因此“如果这个世界真能延续得更长久一点的话，为了能让未来的人们知悉一切”，我们可以“解释并搞清楚救世主教导我们，警告我们，并向我们展示的有关于世界终结的时间的这些事情”。

犹太人也同样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事件，其程度也许要比自公元1、2世纪犹太人发动反对罗马人的起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而耶稣本人正是在犹太人发动反罗马起义的时期出现的。

居住在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的一位名叫哲鲁巴贝尔的犹太拉比（博学之士），在公元7世纪的第一个25年里所著的



所谓《哲鲁巴贝尔书》中，预言了犹太弥赛亚（及其母亲！）的降临，以及他们将打败基督罗马妖怪——一个名叫亚美勒斯的皇帝（或教皇）——撒旦之子。此外，一个曾被罗马人在迦太基强行施洗的名叫雅各布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以一种典型的启示录的语言称罗马帝国为"第四头野兽"，并且这"第四头野兽"正在"被各国撕成碎片，十只角将会取胜，而小角赫尔默劳斯·撒旦将会降临"。

犹太人把罗马帝国在公元7世纪的第一个25年当中已明显迫近的分崩离析，看做是"野兽"（以前是异教徒，但现在是罗马帝国）已经命定的证据，而穿着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或是基督教皇装束的魔鬼将被即将降临的弥赛亚消灭掉。他们将波斯人以及几年后的阿拉伯人，视作是帮助摧毁"罗马野兽"的代理人。暴力的和弥赛亚式的犹太革命的情况，在公元6世纪的整个后半时期与日俱增，并且在罗马帝国开始摇摇欲坠的公元7世纪的第一个25年里进入了超速运转的阶段。

公元608年，在安提俄克，当波斯人进逼该城的时刻，基督徒企图强迫犹太人改变信仰，结果引发了城中犹太人聚居区的一次大起义。最初，犹太起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俘获了他们首要的敌人——城中颇有实力的基督教大主教安纳斯塔西亚斯。犹太人将安纳斯塔西亚斯处死，并毁掉了他的尸体。但是，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有着800年历史的安提俄克犹太人聚居区几乎被清洗一空。

在耶路撒冷沦陷时以及埃德萨（今土耳其乌尔法）被围时，犹太人的反罗马、反基督起义与敌军的进攻一样血腥而又坚决。而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后，随着早期穆斯林开始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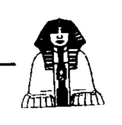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饱受压迫并且在等待着弥赛亚式的救助的犹太人大喜过望。有些犹太人认为穆罕默德显然就是一个来为弥赛亚的降临铺平道路的先知。

“阿拉伯人已杀死了坎迪达特尔斯（一名罗马官员），我们犹太人大喜过望。他们说，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已经出现（在阿拉伯人当中），并宣布弥赛亚就将降临。”公元634年，巴勒斯坦西克米内姆的犹太人这样说道。

当然，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宜于那个时代的信条，是一种从当时的世界末日氛围之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宗教。在《古兰经》早期的章节当中，世界末日的意味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据说，被描绘成上帝使者的穆罕默德是来就最后审判日之前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向人类发出警告的。在被穆斯林视作是上帝言辞的《古兰经》当中，“尤姆阿尔－基亚马”（复活日）一词出现的次数不下70次，而对同一事件的另外一种表述——“阿尔－萨阿”（最后时刻）在《古兰经》当中又出现了40次。而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日这两种表述则分别出现了45次和22次，其他的诸如“尤姆阿尔－希萨卜”（最后清算日）一类表述的出现频率也比较高。

据《古兰经》中至关重要的一章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从波斯人逼近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并攻占耶路撒冷城之后的一两年开始的），真主告诉穆罕默德，“罗马人已被打败”，“他们只知道世间生命的一些表象，并且对今后的事情毫不在意”。

“不幸是那些经营邪恶者的下场，因为他们无视真主的启示，并且还对之加以嘲笑。”时间标注为几年以后的《古兰经》当中这样讲道，其中所指既包括罗马人，也包括波斯



人。“当那一天降临，当最后的时刻来到，罪孽深重者将会绝望。”

《古兰经》当中，对异教徒和犯罪者的命运的描述非常清楚。“在复活日那一天”，他们将会“被集中起来”，并且“他们的居所将是地狱”。无论何时，只要火焰变弱了，“我们就应该加柴进去”。在复活日那天，“当喇叭吹响的时候”，我们将“让有罪的白眼人当中充满了恐惧”。

“任何忘记我（真主）的人，他的生命都将不再长久，我会让他失明，并把他带到复活日的集会上来。”《古兰经》中这样讲道，“这样，我们就惩罚了所有大肆挥霍的人和所有不相信真主的启示以及今后的厄运将会更加严峻、持续得更加长久的人。”

在整部《古兰经》中，穆罕默德被看做是真主派来的信使，他是来对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人类将会经受些什么，向人类提出警告的。据《古兰经》的第七章第一百八十八节当中所记载，真主让穆罕默德告诉人类：“我是信仰者的告诫者，也是好消息的传送者。”

虽然，《古兰经》中从不曾确言世界末日究竟会在何时到来，但是，其中第七章也暗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注定的时刻（最后审判日）在天堂和凡尘孕育。”《古兰经》第七章第一百八十七节中这样讲道。这句话是模仿早期的非穆斯林预言而来，原话直译过来是这样的：怀孕的宇宙分娩出了世界末日里的事件。

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兴趣与认同不断增加。更准确地说，是对世界末日即将逼近的兴趣与认同，其程度达到了相当深



的地步，这就为伊斯兰教的创建与传播准备好了先决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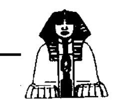
伊斯兰教在当时——并且，在今天又再次（当然，对此是有争议的）——是一种政治与流行神学（即世界末日）相适应的宗教。但是，虽然伊斯兰教出现及兴盛的原因是清楚的，仍然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些世界末日和一神论的思想——从传统上来说，是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相关的思想——是如何传播到阿拉伯沙漠的呢？

当然，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阿拉伯半岛北缘，曾经存在过基督徒部落和小国，而在半岛南部的也门，同样也有基督教的存在。犹太教在也门的影响也同样广泛，并且，它在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尤其是麦地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麦地那与麦加正是穆罕默德的家族成员居住的城市，并且，穆罕默德在公元621年与麦地那人进行了谈判之后，他将麦地那当作了主要的权力基地。

虽然，也许公元6世纪早期盛行于地中海和中东世界的世界末日氛围，是推动伊斯兰教诞生的主要因素，但是，这还仅仅只是在这种新宗教的初始阶段推动了其兴盛的因素之一。

波斯战争使得战争的双方在阿拉伯半岛施加政治影响的能力都大大削弱了，同时，这一战争还使得自也门的影响在上一个世纪衰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权力真空更加突出了。这场战争同时也削弱了战争双方抵御第三方进攻的能力，这就为阿拉伯人以劫掠或是领土扩张的形式所进行的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一新的外部机会的来临正是引发了，后来又加速了阿



拉伯半岛内部的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事实上，阿拉伯人在公元 7 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领土所进行的一系列掠夺活动，都发生在伊斯兰教开始小规模地在他们当中发挥作用之前。阿拉伯人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进攻行动，发生在公元 612 年。“阿拉伯人劫掠了叙利亚，毁掉了城镇和许多房屋，然后收兵撤回。”公元 8 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这样写道。他所引用的资料是现在已经失传的一份公元 7 世纪的资料。

从根本上来说，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上及宗教上的进步，它是一种信仰方面的革新，正是通过这一革新，阿拉伯社会才得以适应新的政治和军事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罗马帝国与波斯的衰弱。穆罕默德的教义使得人们不仅仅从利益的角度，而且还从信仰的角度渴望着进攻这两个已经衰落的超级大国。

“安拉说：‘我的正直的仆人们应该得到这个世界。’现在，这是你们的遗产了，你们的主人已经许诺给你们了。”穆斯林指挥官们在攻占波斯帝国的前夕，这样对他们的部队讲道，“如果你们获胜，（敌人的）财产、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国家就是你们的了。”

获胜的阿拉伯指挥官对战败的波斯将军说，真主已经“从（阿拉伯人）当中选派了一名信使，而他的许诺之一就是我们应当占领并征服这些土地”。

根据穆斯林的传说，穆罕默德曾向罗马和波斯的统治当局传达过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许是通过这两国的前线总督），但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实际上，穆罕默德派往罗马的使者被抓住并被处死了。毫无疑问，早期的穆斯林认为，这两



个帝国竟然拒不接受真主的教诲，也就等于把他们自己置于被占领的境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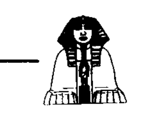
《古兰经》中众所周知的题为“战争的报酬”的一章，极为详细地讲述了伊斯兰教将如何帮助这一胜利进程。该章列举以色列子民们在出埃及前去征服希望之乡时，与埃及人发生的冲突的经历为例。不信仰者的下场，“就像法老的士兵一样……他们不相信安拉的启示，安拉就因其罪过惩罚了他们。瞧！在施予惩罚的时候，安拉是强大而又冷酷的”。《古兰经》这样讲道。

不信仰者的下场，“就像法老的士兵一样；他们无视他们的主人的启示，所以我们因其罪过毁灭了他们。我们将法老的士兵淹死，所有的士兵全是为恶者”。“战争的报酬”一章当中的第五十四节这样写道。该章注明的日期是从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大战役的时间开始，即公元624年与异教徒麦加人之间的巴德尔战役。

“瞧！安拉眼中最坏的野兽是那些不信仰他的忘恩负义者。”

“哦，先知！劝诫信仰者战斗。如果他们当中有20个人是坚定的，那么他们就能战胜200个不信仰真主的人，而如果他们当中有100个人是坚定的，那么他们就能战胜1000个不信仰真主的人，因为那些不信仰真主的人是一个愚蠢的民族。”

伊斯兰教的教义，恰恰正是麦地那人需要用来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信仰基础，而此后，伊斯兰教的教义更成为了全体阿拉伯人征服元气耗尽、已然积弱的罗马和波斯帝国的信仰基础。



这一新的信仰，将普通的针对某一个敌人的对抗性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实际上，伊斯兰教是从命运和责任的角度，而不是从物质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征服与胜利的：

“当真主在激励天使的时候，他说‘我和你们在一起’，这样就使信仰者们愈加坚定。我将把恐惧扔进那些不信仰真主的人的心中，然后再掐他们的脖子，并且打掉他们的每一根指头。那是因为他们反对安拉和他的信使（穆罕默德）。那些反对安拉和他的信使的人，瞧，安拉的惩罚是严峻无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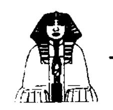
“战争的报酬”一章中的一段文字，在谈及宗教需要决心与勇气时这样讲道：“哦，所有的信仰者们！当你们在战场上与不信仰真主的人相遇的时候，不要转过脸去背对他们。任何在那一天背对他们的人，除非是为了战斗的策略或是为了参加集体行动，都将会招致安拉的愤怒，而他在一段倒霉的历程之后，将会居于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就是在战斗中杀死了一个不信仰真主的敌人，也是真主的功劳。

“不是你们（穆斯林）杀死了他们，而是真主杀死了他们。你在投掷的时候，并不是你在投掷，而是真主在投掷。”写于巴德尔战役时的《古兰经》第八章第十七节这样讲道。

甚至就连抓俘虏，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受到神力的阻碍——“在杀死敌人之前，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抓到俘虏。”

同样，当事件发生在犹太人逃出埃及这一时间左右时，我们在《旧约全书》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文字。在早期的古代以色列，存在着圣战的观念，因此，人们将为上帝而战看做是一种神圣的行为。《约书亚书》（第六章第十八节至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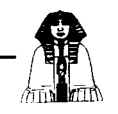
十四节）当中有一个恐怖的实例——攻占耶利哥。在耶利哥被攻占以后，因为这是一次宗教仪式般的毁灭，所以城中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男人、女人、孩子以及动物，全部被处死，而城中所有的建筑物和财产则全部被焚烧掉了。

在公元7世纪20年代的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能否坐稳他作为一个激进的政教合一领袖的位子，取决于他在军事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为了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不断扩张，他不得不把胜利带给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想要成为他的追随者的人们。

"如果我们效忠于您，并且真主让您打败您的敌人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和您一样的权威吗?"据说，一位满怀希望的阿拉伯艾米利部落首领曾这样问穆罕默德。

此外，阿拉伯部落非常好战，并且历来如此。"我们的战马已经把多少统治者和强大的首领踏在蹄下……我们行军的目的就是战争。"一位生活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诗人在赞扬战争时这样写道，"当我把我的剑刺进去的时候，它几乎对折了过来。我用一柄锋利的马什拉夫剑杀死了我的敌人，而我则像一匹奶水过多的骆驼一样渴望着死亡。"

因此，人们把异教徒的下场看做是在政治生存、部落因袭以及宗教义务方面而言最根本的好事。正如伊斯兰教早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西亚·克隆所评述的那样，"穆罕默德不得不四处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而他的神叫他去四处征服"。



第九章　穆斯林的征服

穆斯林的推进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推进之一。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将伊斯兰教早期的迅速推进，比作是10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一份绘图手稿当中，亚历山大被看做穆罕默德的某种先驱，并且，亚历山大在画像当中就站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麦加的卡巴圣堂（其中供有黑石）旁边。

穆斯林与罗马军队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公元629年（穆塔战役）。当时，由于波斯势力刚刚撤出（公元628年），形成了政治与军事真空，而罗马帝国的统治则略有起色。虽然罗马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并没有能够阻挡住4个罗马控制下的阿拉伯城镇（亚喀巴城、贾尔巴城、阿德鲁城以及马安城）在一年之后的倒戈——这4个城镇倒向了新兴的伊斯兰教势力。罗马人决心要阻止这样的民众叛变，因此，这几个城镇当中的马安城的首领立刻被逮捕并被处死了。

在几年当中（其中包括公元632年，即穆罕默德逝世的那一年），早期伊斯兰教静待时机，并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然后，在公元633年，穆斯林军队不仅侵入了波斯帝国，而且也侵入了罗马帝国，并且在对波斯军队的血河战役及对罗



马军队的达廷战役、阿吉纳达英战役和法尔战役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穆斯林军队甚至还一度攻占了大马士革城和希姆斯城。

饱尝战败之苦的罗马皇帝下令发动反击。虽然大马士革重又回到了罗马人的手中，不过，大马士革城的罗马人——但却是阿拉伯族罗马人——首席行政官曼苏尔却拒绝与罗马军队合作，并且还拒不提供至关重要的补给。

不久，公元636年，由1.5万到2万名左右的士兵组成的强大的罗马反击部队——其指挥权分属两个互相猜疑的将军——与穆斯林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80英里处的亚比亚-雅尔穆克遭遇了。

此次战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系列的冲突累积而成的一个大战役，持续了一个半月时间。当时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地位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团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罗马人行动的态度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要么就甚至是倾向于敌视。并且正如上面所述，罗马军队终因意见不合而分裂了。

最终，穆斯林军队发动了一次夜袭，打败了纪律与指挥都非常松懈的罗马军队。在紧随其后的第二天黎明时分的战斗当中，罗马军队被彻底歼灭了。在此次战役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而许多其他已毫无斗志的人，则干脆坐了下来，准备投降。但是，因为穆斯林军队不抓俘虏，所以所有坐着的人都被杀死在他们所坐的地方，而那些逃跑的人则遭到了无情的追杀。事实上，据说有一群逃跑的士兵被敌人追杀了整整500英里！

亚比亚-雅尔穆克之战，在世界历史上位列重要战役之

中。罗马帝国经过了此次战败以后，它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实际上也就烟消云散了，并且，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几乎是很快地就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了，并且在其后的13个世纪当中，90%的时间里都在穆斯林统治下。加沙也遭到了穆斯林军队的突袭，其卫戍部队被全部杀死，并且在罗马皇帝的坚持下，被教会宣布为烈士。

胜利又带来胜利，穆斯林军队士气高涨。毫无疑问，穆斯林军队进行了许多额外的征兵工作——皆是被战利品的存在而吸引。事实上，在亚比亚-雅尔穆克之战一年之后，在穆斯林军队准备再次侵略波斯帝国时，士兵们被告知他们将获得整个地球——“安拉说……‘我的正直的仆人们应该得到这个世界。’现在，这是你们的遗产了，你们的主人已经许诺给你们了。如果你们获胜……那么，你们的敌人的财产、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国家就是你们的了。”

带着这些不断在他们的耳朵里回响的许诺，穆斯林士兵在距今伊拉克南部城镇阿尔哈马姆不远的卡迪西亚一战中再次取得了胜利。今伊拉克（当时是波斯帝国西部）大部落入了伊斯兰教之手。波斯帝国以珠宝装饰的雄伟壮观的首都泽锡篷（位于今巴格达东南29英里处），遭到了洗劫并被占领。

公元639年，穆斯林军队占领了更多的罗马城镇（色萨利亚城和阿斯卡伦城）。公元640年，当时已经大规模扩充了的穆斯林军队侵入了埃及、亚美尼亚以及已经被围的波斯帝国中心地带，即波斯高地本身。波斯在尼哈文得战役中沦陷了，阿拉伯人的传统将此次战役称之为“胜利中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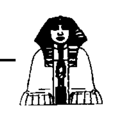
伊斯兰教最早的征服情况

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当中提到过的主要城镇与战役

图例
● 城镇
× 战役
现代国境线

君士坦丁堡
亚美尼亚
安提俄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大马士革
泽锡逢
×内哈文得战役
耶路撒冷
×卡迪西亚战役
塞伦乃卡
埃及
红海嵌入部分
麦地那
麦加
×巴德尔
马利卜水坝
250英里
250千米

地中海
大马士革
加利里海
西克米内姆
亚比亚一雅尔穆克战役
色萨利亚
法尔战役
约旦河
阿斯卡伦
死海
阿吉纳达英战役
达廷战役
穆塔战役
贾尔巴
阿德鲁
马安
亚喀巴



两年以后，即公元642年，穆斯林军队完全控制了埃及全境，这样，罗马帝国残存的财富及其主要粮食基地至少被穆斯林掠走了一半。随后，穆斯林征服者侵略并最终占领了塞伦乃卡（今利比亚）。

到公元652年，伊斯兰教帝国的疆域已经与印度接壤；公元653年，一支穆斯林水军夺取了罗马的塞浦路斯岛；到公元670年，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本身也陷入了穆斯林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尽管穆斯林军队并不曾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事实上，穆罕默德教义的一流传承者，当时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战士，就在那场失败的战役中因病逝去，并被埋葬在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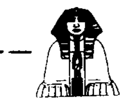
在西面，穆斯林军队不断推进，直抵罗马帝国统治了900年之久的非洲北部，并在一场从公元698年一直打到了公元705年的“七年战争”中，结束了罗马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随后，他们又侵入了欧洲南部，征服了西班牙大部（公元711年），并在公元718年至公元732年之间突入了（虽然仅仅是短暂地）法兰西纵深地带。

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当中，伊斯兰教的势力将会穿越撒哈拉沙漠直至非洲西部；将会沿非洲东海岸一直进至莫桑比克，向东则直逼中国西部、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

今天，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追随者多达5000万之众，并且，它还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伊斯兰教却是在1400年前诞生的——就像当今世界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其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皆应归功于由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紊乱所导致的政治的、经济的、流行病的以及宗教的因素。



伊斯兰教势力最初渗入地中海，应归功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如果罗马帝国没有在公元7世纪30年代明显地撤退，穆斯林的推进就不会得逞，至少说，穆斯林将只会侵略波斯和东方。那么，为什么罗马人会做出如此灾难性的退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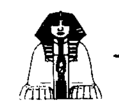


第十章　罗马帝国的崩溃

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在公元7世纪出现部分瓦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原因，都是从5个根本的、有时还是互相联系的历史问题当中的一个或多个问题里面滋生出来的：资金的长期匮乏；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对巴尔干的占领；波斯人的占领；瘟疫；还有宗教纷争。归根结底来说，所有这5个问题都是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地由一个世纪之前，即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问题所引发的。

我们在第七章当中，已经详细叙述了导致了罗马帝国可怕的财政问题的综合因素（特别是瘟疫与阿瓦尔人），但是，由现金的匮乏在公元7世纪所导致的军事灾难的原因，也是同样复杂，并且差不多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

首先，资金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罗马军队的规模与类型。如果用招募的当地阿拉伯人来应付穆斯林的起义，那么不仅花费要少得多，而且也要方便得多。现在，罗马军队的规模已经变小，这就意味着，在阿拉伯半岛前线地区的基地里面只可能派驻小股部队。这就迫使罗马军队选择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军队的大部分都驻扎在了城墙包围着的城镇当中——这一方针的实行就消蚀了军队



作战的意志和能力，并且，这一方针就其本质来说，等于是将罗马军队分割成了许多互相间往往无法协同的支离破碎的小片段。

很快，这种以城镇为基地的防御战略，就在面对伊斯兰教敌人对乡村的进攻时，显得束手无策了。接下来，这又使得驻扎在各个城镇的部队之间的通讯与协同更加困难了。

罗马帝国的财政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其阿拉伯前线部队的运作方式的改变。也许因为在赫尔拉克留斯皇帝的心目当中，资金的控制问题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他任命了一个名叫西奥多·特利图里欧斯的会计簿记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来指挥这台生死攸关的军事机器。虽然这一任命也许可以向忧心忡忡的军人们保证，他们至少可以得到薪饷，但是，这一任命也几乎就等于是说，对预算和现金流转的考虑，肯定经常会优先于对军事的考虑。

中央财政紧张，同时也就意味着粮食和其他供给品，不得不从当地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当中征集。这并不是什么新点子，但是，因为罗马帝国财政紧张，并且皇帝又任命了一名会计为高级指挥官，这也许就导致了这种地方“战争税”在一个已有许多年不曾经历过此种体系的地区，又被以极大的热情重新提了出来。

此外，因为不能轻易离开其“战争税”来源地太远，因此，“战争税”体系还限制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并且这一体系的实行几乎毫无疑问地使得军队根本无法赢得当地人的友谊。实际上，就在一次重大的战役（公元 636 年的亚比亚－雅尔穆克战役）之前，大马士革城的首席行政官曼苏尔就拒不向军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补给品——并且，他甚至对一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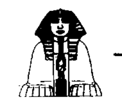
罗马士兵发动了一次假进攻，目的是要吓退他们，让他们无法强行征收战争税。

第二个困扰罗马帝国已久、并影响到军队的问题，是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占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行动始于公元6世纪的后半期，并且在公元7世纪第一个25年当中变本加厉。这一地区从传统上来说，是罗马军队主要的兵员补充基地。既然这一基地已无法再使用，罗马帝国政府就不得不寻找其他适合的兵员补充地了。

由于阿拉伯前线所需的兵员数量增加，所以罗马帝国当局就征召了更多的当地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但是，不论是阿拉伯分遣队还是亚美尼亚兵团，实际上都是由他们自己的首领指挥的——阿拉伯酋长和亚美尼亚将军。事实上，在关键的却也是损失惨重的亚比亚－雅尔穆克战役当中，罗马军队是在3个不同的、并且是互相猜疑的将军指挥下作战的。这3人当中的两个人——亚美尼亚军团的瓦汉将军与全区指挥官、会计特利图里欧斯，互不信任，而第三个军事指挥官，当地君主亚巴拉酋长，也许对他的两个同事都不信任。

在亚美尼亚军团内部也存在着冲突。在亚比亚－雅尔穆克战役前夕，亚美尼亚军团右翼的一名高级军官拒不执行其上级的命令。一份阿拉伯方面的资料宣称，就在战役之前，一名亚美尼亚高级军官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份资料虽然不怎么可信，但是它却提供了有关亚美尼亚军队中程度更深的不和的线索。

有关亚美尼亚军队在此次生死攸关的战役前夕的混乱情



况的另外一份资料同样奇异，据它称，亚美尼亚军团企图发动一次兵变推翻赫尔拉克留斯，其帝位则由瓦汉将军取而代之。也许这些故事的细节都是错误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故事表明了罗马帝国军队内部的严重不和。

不仅仅是罗马军队的类型，而且还包括由此决定的罗马军队的效能，受财政方面的考虑的限制程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毫无疑问，在罗马帝国军事机器当中的阿拉伯军队，也受到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罗马帝国的地方行政当局拒不向阿拉伯盟军支付薪饷的情况，至少出现了一次。

第三个引发了许多消极因素的背景问题是波斯的占领本身。波斯军队在占领罗马帝国的领土 15 到 20 年后撤了出去。但是，罗马帝国当局却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占领这些地区，并且甚至就是在罗马军队重新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他们对这些领土及当地政治仍不熟悉。

公元 628 年，在波斯撤军条约签订以后，波斯人也对这一领土失去了兴趣。公元 629 年，当此地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军事与政治真空时，伊斯兰教众开始渗入罗马帝国的最东边的一个部分，即死海以东的地区。事实上，公元 628 年，乌姆阿尔 - 拉萨斯城的一名穆斯林被基督徒谋杀了，而公元 629 年，罗马帝国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第一次大的战役就在该城向南 35 英里处的穆塔爆发了。

波斯人占领罗马帝国领土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马帝国内的反闪米特主义大规模增加。犹太人长期受到基督徒统治者的压迫，当波斯人在公元 7 世纪的第一个 25 年里攻占了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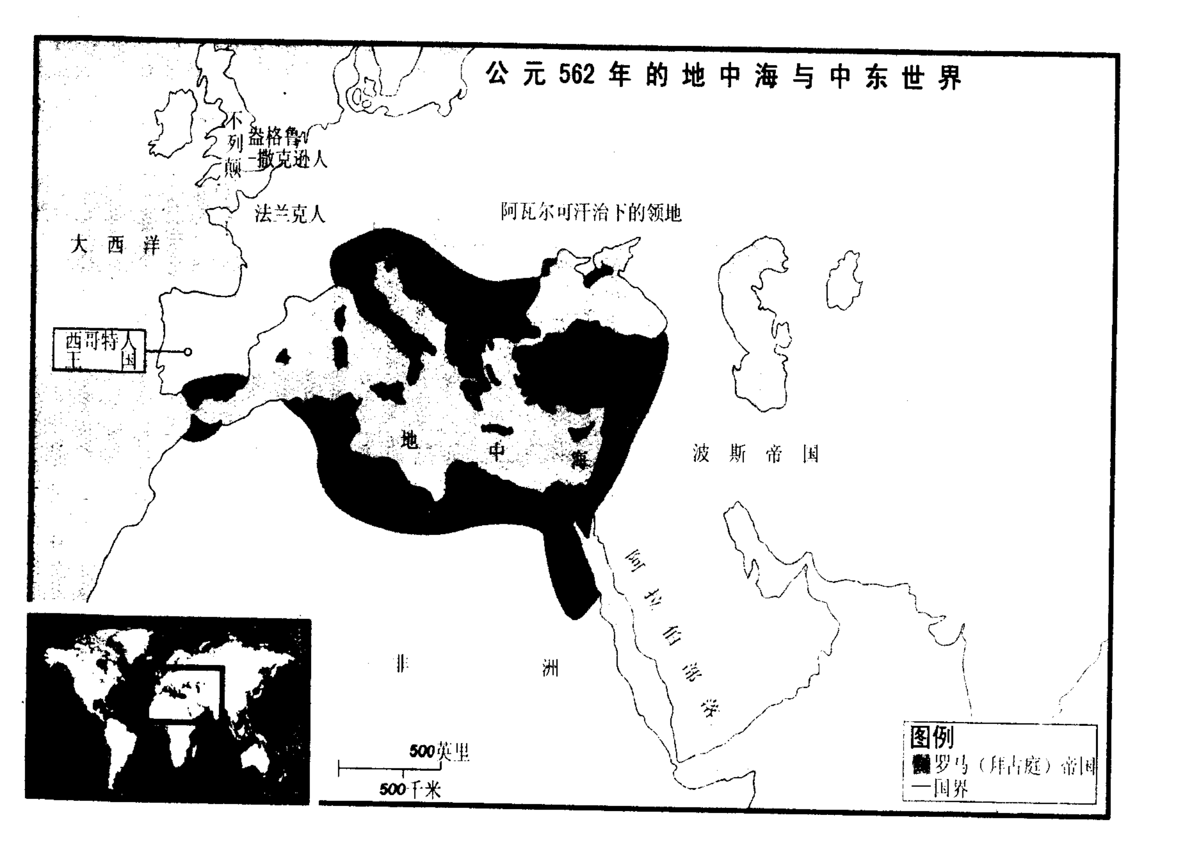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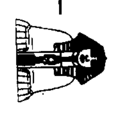
多罗马帝国的领土时，他们曾欣喜异常。犹太人一度将波斯人视为解放者，而将罗马人看做是反基督的叛逆者。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使得曾经还算平静的中东地区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动荡了35年。当罗马人扭转了与其波斯敌人之间的形势时，犹太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公元630年，在当地基督徒和他们的牧师的压力下，赫尔拉克留斯皇帝下令屠杀耶路撒冷和加利里地区的犹太人。教会当局甚至还安排了一个庆祝仪式和一次斋戒活动，来为这次屠杀行动赎罪。赫尔拉克留斯皇帝同时还下令进行了一系列强制的浸洗。

公元626年，穆斯林对待遥远的麦地那犹太人的态度也的确是相当恶劣的。但是由于公元630年由罗马皇帝下令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都要近得多，所以犹太人对罗马帝国的敌视情绪的程度要深得多。也因此，犹太人社团从总体上来说，是亲穆斯林而反罗马的。据一份接近同一时期的记录称，当一名高级军官，可能是罗马皇帝的朋友，在公元634年中的达廷战役当中被穆斯林杀死以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简直是大喜过望。有人甚至认为穆罕默德就是弥赛亚的先驱，他将会让犹太人从罗马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犹太人对穆斯林的亲近情感，决定了虽然只有一个半月但却是决定性的亚比亚－雅尔穆克战役将对罗马人不利。因此，如果罗马军队知道两个最近的城镇——纳瓦城与阿得利亚特城——愿意秘密地帮助穆斯林的话，他们也就再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了。


公元562年的地中海与中东世界
不列颠
盎格鲁-撒克逊人
法兰克人
阿瓦尔可汗治下的领地
大西洋
西哥特人王国
地中海
波斯帝国
阿拉伯部落
非洲
500英里
500千米
图例
罗马（拜占庭）帝国
国界



公元720年的地中海与中东世界

大西洋
不列颠
盎格鲁－撒克逊人
伦巴王国
法兰克人
斯拉夫人
阿瓦尔人
斯拉夫人
保加利亚人
卡扎尔人
地中海
非洲

500英里
500千米

图例
罗马（拜占庭）帝国
阿拉伯人治下领地



波斯人的占领，一定也在进一步削弱与罗马人完全不同的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本来已不调和的罗马认同感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虽然波斯人的占领仅仅持续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但是，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毫无任何成形记忆的完全崭新的一代人要成长起来，时间已经足够了。

这一地区在公元2世纪至公元5世纪曾经相当强烈的罗马认同感，到了公元6世纪已开始恶化了，原因则是由于罗马帝国对当地流行的一种所谓“蒙诺菲赛特异教”的基督教派的镇压。这种所谓的异教宣称，耶稣并不是十分的神或人(天主教的观点恰恰是肯定的)，而是神的替代品。这种异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和埃及的主要宗教。罗马帝国对这一异教的迫害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但是，公元603年，在罗马帝国内部及全球的政治形势被弗卡斯的革命所动摇之时，罗马帝国的宗教平衡也被打破了。弗卡斯——一个满腔热情的天主教徒——亲自指挥了对中东地区蒙诺菲赛特教派心脏地带的残酷迫害。

正是这一行动引发了一股反罗马情绪的潮流，并且也促进了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尤以埃及地区最为显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至少是蒙诺菲赛特是主要宗教的地区）地区的人，开始日益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而非罗马人。在埃及，则出现了一种对于古代法老时代的新的自豪感。事实上，故事讲的是有关于一个蒙诺菲赛特主教，这名主教从波斯逃了出来，躲藏在了一个死去的并且可能被做成了木乃伊的法老的华丽陵墓里面。法老的鬼魂开始骚扰这个不幸的主教，但是最终，这个一贯勤奋的牧师决定为这个逝去已久的统治者施行浸洗。不论这个故事



是真是假，也不论圣水是否真的曾撒到了这具木乃伊的身上，这个故事表明了对埃及光荣历史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以及反过来对前罗马帝国希腊灵魂的认同感的衰落。

这样，在这个世纪之初重新开始的反蒙诺菲赛特教派的迫害以及几乎是紧随其后的波斯人的占领，就合力消蚀了中东地区人民对罗马帝国的忠诚。这些因素再加上不受大众欢迎的当地“战争税”，其结果就导致了民众的不忠诚、冷漠、通敌甚至是进行反罗马的破坏活动。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勾勒出的那样，罗马帝国在伊斯兰教手中的分崩离析有5个根本的、互相联系的原因：资金的长期匮乏；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波斯人的占领；瘟疫；还有宗教纷争。

这5个原因都是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问题或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并且就在阿瓦尔部落紧随蒙古的气候动荡之后向西迁移的时候，作为与之相同的那次气候紊乱的结果，另一个亚洲中部的民族也要扬名于世了。

第五部分

苍狼之子

“我们一边为自己的[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一章 “奴隶兵”

正如气候通过被打败了的阿瓦尔人的中介作用，诱发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变革以及西欧和中东历史的重塑一样，同样的气候因素，这一次通过胜利了的突厥人的有力推动，最终导致了巴尔干半岛、非洲北部、中东以及印度和犹太人世界的巨大改变。

不过，虽然与阿瓦尔人相关的变化仅仅用了150年的时间就达成了，但是，在突厥世界，同样变化的最终达成却花费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那么，历经了1000多年之后方才结束的、公元6世纪中期由气候原因所诱发的蒙古政治与种族的“革命”，又是如何对从波希米亚直到巴格达的人类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呢？

全部事件发生的次序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件的诱因就是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紊乱。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当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正是由于阿瓦尔人与其附庸突厥人在面对干旱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弱点，导致强大的阿瓦尔帝国被人推翻了。虽然阿瓦尔可汗自杀身亡，而且许多阿瓦尔人都西逃而去，但是，突厥人还是准备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草原帝国。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突



厥人的帝国就已覆盖了从朝鲜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广大地区。帝国的核心是一个皇室家族、一位皇帝（即众所周知的可汗）、一个神秘的传说以及一个神圣的山洞。

突厥的皇室家族被称为“阿什纳”（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贵族领主”家族之意），按典型的图腾传说，其祖先可追溯至某种动物，而不是一个人。他们的家族神话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孩子是一次部落大屠杀的惟一幸存者。他的家人和朋友全部被杀害了，他一个人逃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躲了起来。在那儿，他遇到了一头母狼，并被这头母狼收养（就像古代罗马的罗姆勒斯和雷姆斯一样）。孩子与母狼之间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在这个孩子成人以后，他与这头母狼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诞生了一个男孩儿——第一个阿什纳，第一个贵族领主。

这个神圣的山洞——据传说所称，那个在部落大屠杀中惟一幸存下来的小男孩就是在这个山洞当中被那头母狼养育成人，而第一个阿什纳的孕育也是在这个山洞当中完成的——成为了突厥帝国的宗教中心。虽然突厥人所祭祀的至高无上的神是天神腾格里，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对狼的崇拜要重要得多。这个山洞其具体位置现在久已无人知晓，它位于突厥国家神圣的核心地区的某个地方。蒙古的这一块名为奥图肯伊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奥图肯为森林所覆盖的山区”）的地区，相当于突厥人的圣地。

根据古代中国的资料，突厥人的狼祖先所居的山洞是一个献祭与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也许突厥可汗们的奇异的“加冕礼”就是在此地进行的。当他们骑马穿越草原时，他们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舞，虽然大风凛冽，但是他们的大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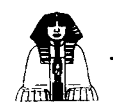
子却仍然刚硬不倒。成千上万的贵族和他们的家人们以及扈从们云集到这块圣地上来，无数的马蹄与满载的牛拉车的巨大车轮所卷起的尘土，弥漫了整个由圆形毡制帐篷——开始在神圣的山洞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帐篷——所形成的城市。

在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新的可汗坐在一块巨大的毡毯上面被抬了出来。他将被旋转9次并被扔进空中9次，然后再被放到一匹马的背上。同样，他将骑马绕9圈。接下来，现在也许已经有点头晕目眩的新可汗被从马背上抬下来放在了地上，再被用一条丝带扼个半死。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就在他的意识开始变化并且减弱的时候，他还必须回答一个惯例的问题。“你要统治多久?”折磨他的人大喊道。

现在已经产生幻觉且意识都已只剩下一半的准可汗所作的回答，被认为是得到了神的授权。云集于此的突厥人也认为，与其说这个回答是从他们的新君主的嘴中说出来的，还不如说是第一个阿什纳或者他的狼母亲的灵魂所给出的。

一旦得到了答案，神意已明，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已经确定，勒着新可汗的丝套就放松了，他又可以自由呼吸了，并且他将按神所准许的统治时间开始他的统治。

虽然可汗是突厥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还必须与一个虽然在技术上来说属于下级但是颇有实权的伙伴（即雅布古）共同进行统治。这位合作统治者负责突厥帝国整个西部地区的事务。实际上，第一任雅布古，是一位极具天资的阿什纳突厥将军，他首先征服了从蒙古直至乌克兰的2500英里草原地带。他的名字叫伊什特米。他作为第一任可汗布



皿的兄弟，在突厥世界内的政治权威几乎无人可比。

用弓箭、刀剑、长矛以及能把敌人从马上拉下来的战索武装起来的大群突厥骑兵，深入到了草原上的每一个地区。在突厥人的压力之下，亲蒙古的白匈奴王国瓦解了，而在草原的南缘，伟大的伊朗城邦布卡拉、萨马尔康得以及克瓦尔拉兹姆都向伊什特米及其军队举起了降旗。

伊什特米任雅布古共 24 年（从公元 552 年至公元 576 年）。虽然他不曾成为至高无上的可汗，但是，在一段时期内，他曾是突厥帝国内惟一的一个持久统治者。其兄布皿于公元 553 年逝世，而布皿的继承人（他所有的儿子）分别在公元 553 年、公元 556 年以及公元 573 年接替王位。

突厥帝国延续了（除了一个短暂的 25 年的间隔以外）差不多两个世纪，直到公元 8 世纪 40 年代，阿什纳统治家族被包括维吾尔人（阿什纳家族长期的对手）、卡尔卢克人（其首领其实也是阿什纳血统）以及欧古泽人在内的其他突厥人联合推翻为止。接着，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维吾尔人掌握了统治权，并且开始转而对付其卡尔卢克盟友，甚至准备将他们全部消灭。幸存者们于公元 745 年向西逃去，并在公元 766 年之前，成功地控制了突厥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

这样，突厥帝国的西部就经历了一次内部转变——从阿什纳突厥人治下的帝国，转变为了同样是阿什纳血统的卡尔卢克人治下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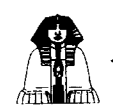
就此程度来说，由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的气候大灾难所首先引发的突厥人的影响与势力的扩张与演变，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公元 10 世纪早期和中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由穆罕默德开创并由其继承者统治的伊斯兰教国

家）与卡尔卢克国家之间时断时续的冲突，导致了大量的卡尔卢克人及其他突厥人被哈里发国家俘虏。

哈里发国家的战略（由其东部附庸，萨曼尼得人，作为代表进行实施）是要首先获得奴隶，并且通过这样的做法让潜在的突厥侵略者感到不安与沮丧。阿拉伯人把被俘的突厥人用作奴隶兵，并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从异教徒转变成伊斯兰教徒，而且，如果他们对哈里发国家忠心耿耿的话，他们就能获得自由。

但是，最终这一政策的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因为，所有的好奴隶或是前奴隶们不仅不按他们应该做到的那样，在理所当然应当服从的一生中勤奋工作，相反，这些突厥“奴隶兵”在公元962年企图帮助萨曼尼得人继位。他们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继续努力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自己的突厥“奴隶兵”国家（即加兹纳维兹）。

在40年之内，阿拉伯哈里发就正式授予了“奴隶兵”国家的首领以苏丹头衔。有他的士兵和臣民的武装，有哈里发授予的苏丹的“荣誉外衣”，这个国家的首领，马穆德，继续在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内部和外部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帝国，其领土从伊朗向东一直延伸至今巴基斯坦北部。正是突厥势力卷入后一个地区，才引发了其后数个世纪当中的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转变。因为，从公元1040年之后，由于其敌人的压力，迫使“奴隶兵”突厥帝国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印度西北部地区。而在那一时间之前，他们已经首先对抢劫富裕的印度教神庙非常感兴趣了，但是，从那一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加紧了在诸如克什米尔地区、拉合尔地区、辛德北部地区以及俾路支地区等等地区建立起政治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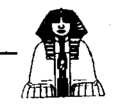
制的行动。

正是这种政治控制，见证了伊斯兰教的最早引入印度——一个在其后的数个世纪当中，在后来的突厥人及随后的莫卧儿统治者治下被加速实施了的进程。并且也正是这一进程，最终导致了印度在1947年的分割以及巴基斯坦国的产生。假如公元11世纪的突厥“奴隶兵”帝国，没有在印度内部修建起一个伊斯兰教“桥头堡”，以此来改变印度的宗教并由此改变地缘政治的平衡的话，那么在其后的莫卧儿王朝时期，聚集于此的穆斯林教徒能否完成这项工作就令人怀疑了。

正如卡尔卢克族突厥人在公元745年逃离了自己的昔日盟友（维吾尔族突厥人）一样，他们的造反同伙，欧古泽族突厥人也在一代人之后，于公元8世纪70年代逃亡而去。并且，正如卡尔卢克人对印度造成了影响一样，欧古泽人则注定要给欧洲和中东造成与卡尔卢克人对印度的影响相当的影响。

逃命的欧古泽难民抵达了咸海沿岸，并迅速沿那片广大的内陆水域的北部、东部以及西部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土耳其（“突厥”一词的变音）帝国。接下来，他们准备在锡尔达尔亚河边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首都”——扬格肯特（字面意义为“新城”）。

逐渐地，一个欧古泽人家族，塞尔柱家族——开始作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在欧古泽土耳其帝国内部崛起。这一家族于公元985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就使得他们在进攻其他仍是异教徒的欧古泽人时显得更加正当合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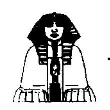


很快，塞尔柱家族就成为了欧古泽人当中的领导力量，并且，他们的这一地位在他们带领欧古泽人与其卡尔卢克“奴隶兵”帝国的突厥人同胞打了一仗并取得了胜利之后，得到了大大加强。此役有着双重的作用：迫使“奴隶兵”帝国撤退并集中于遥远的印度；使得塞尔柱家族成为了一支超级强大的势力！

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者在听说了塞尔柱人的胜利之后，邀请塞尔柱家族进入他的领地——实际上是进入他的首都巴格达——清除他的敌人！于是塞尔柱家族及其欧古泽军队，在公元 1055 年消灭了在过去的 110 年时间里完全无视哈里发的意愿，统治着哈里发国家的伊朗将领。

此次胜利，使得塞尔柱家族成为了伊斯兰教世界实际上的主人。哈里发本人任命了两个非凡的兄弟——托格鲁尔和查格里，为哈里发国家的苏丹。很快，欧古泽人就与拜占庭（罗马）帝国的东部前线遭遇了，公元 1071 年，在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曼泽克尔特战役中，查格里的儿子及继承人，阿尔普·阿尔斯兰（字面意义为“勇敢的狮子”）将拜占庭军队击得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战役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其皇室统治系统甚至还自称为“罗马帝国”。因为到公元 13 世纪晚期之前，另外一个欧古泽人集团将会在哈里发国家与拜占庭帝国相遭遇的前沿国家内崛起。这个欧古泽人集团的领导人是奥斯曼，正是他开创了奥斯曼王朝（英语当中称之为奥特曼），这个王朝注定将要创建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在50年之内——公元14世纪中期，奥斯曼人已经攻占了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已被邀请参与处理拜占庭帝国的内部事务。很快，在公元14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们就已进入了欧洲并抵达了多瑙河边。

罗马帝国已是孤立无援且元气耗尽，因此，公元1453年，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宣布将土耳其草原、哈里发国家及罗马帝国本身全部并入自己治下，至此，历经1750年的罗马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征服并统治了整个欧洲东南部、非洲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包括埃及）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16世纪早期和公元17世纪晚期，帝国的军队甚至抵达了维也纳的郊区。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存在以及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土耳其飞地，就是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推进的历史遗产。

但是，一个更加涉及根本的地缘政治遗产，也许该算是将欧洲东部和西部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分割开来的分层线。因为虽然奥斯曼帝国是公元15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世界上最耀眼的政治成就之一，但是到公元1700年左右，这个帝国已经变得相当保守，把任何的变革都拒之门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而言，欧洲东部在其沉闷的保守政权统治下长达180年，而这一时期，恰恰正是欧洲西部实现工业化和国际化的时间。

且先不论好坏，公元6世纪的气候大灾难正是这样释放



了突厥人建造帝国与改造帝国的天赋。并且，土耳其人也正是这样向西（并且向南）席卷而过，将今天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塑造完成。

不过，土耳其人并不是惟一一个在铸造世界历史时发挥了相当作用的突厥民族。另外一个突厥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同样有着非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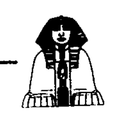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神秘的的犹太帝国

“我们一边为自己的流亡感到丢脸，感到耻辱，一边又不得不安静地听那些人这样讲道：‘每个民族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土地，而惟独你们（犹太人），在这个地球上甚至连一个国家的影子都没有。’我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想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块可以由疲惫的以色列人自己来统治的土地，那是一块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

中世纪穆斯林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建都于科尔多瓦的倭马亚伊斯兰王朝的犹太人首席大臣，在写给远方的一位帝国国王的信中这样写道。而这个帝国，据到达西班牙的报告称，是一个犹太人国家！

“如果我知道了事实情况，我将不再有任何的犹豫，我会放弃所有的荣誉，我会辞掉高官之位，我会放弃我的家庭，再越过高山、平原，越过陆地与海洋，直到我抵达我的真主，犹太王统治的地方。”

在公元60年罗马帝国合并了犹太人的领地朱迪亚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面，犹太人被分散到了已知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大约公元955年，当西班牙的犹太人首席大臣哈斯代·伊宾·沙普鲁特听说，在距西班牙以东1500英里、距耶路撒冷700英里、今乌克兰境内及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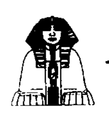
东的地方有一个犹太人王国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犹太帝国已经存在了200年之久了（中世纪时期的信息传送和人们的国际政治知识都极其落后，以至于对哈斯代而言，乌克兰简直就像是位于月亮的背面一样）。这个帝国已经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最终也将会再次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犹太帝国是如何在欧亚大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呢？它在世界舞台上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紧随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问题之后，突厥人在蒙古推翻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并且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大帝国。但是，仅仅在100年之内，那个突厥帝国当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一个可能与其统治家族有关的部落，脱离出去以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个部落——卡扎尔人——迅速地做好了准备，要将自己的帝国建成一个从亚洲中部一直延伸到波兰边境的大帝国。随着卡扎尔帝国日益强大起来，它成了基督教的后罗马（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哈里发的穆斯林帝国之间的一个北方缓冲区。

由于要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因此保持中立在政治上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作为异教徒的卡扎尔人也许认识到，大多数的“文明”世界总是追随这种或那种在政治上较为强大的一神论宗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卡扎尔人感到有必要使自己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同样的一神论宗教（以及由此而得到的政治）水平上，但是，他们又很敏感地不愿意站在



处于颠峰时期的卡扎尔帝国

图例
● 城镇
国界

250英里
250千米

咸海

里海

艾提尔的可能位置

伏尔加河

顿河

顿涅茨河

卡扎尔帝国

高加索山脉

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萨尔克尔

克里米亚

黑海

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之下

基辅

第聂伯河

亚速海

第聂斯特河

地中海

阿瓦尔人

斯拉夫人



两个超级大国当中的任何一边。

实际上，中立就意味着必须选择一种“公分母式的”宗教从属关系，以确保看起来既不偏向于基督教也不偏向于伊斯兰教，而犹太教恰恰满足这个条件。另外，与某些基督徒针对犹太教徒的敌对情绪所不同的是，不论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还是穆斯林哈里发，都将犹太教视作是一种正统宗教。基督教教义与犹太教教义不同的地方，远远少于它与伊斯兰教教义之间的分歧；同样，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厌恶程度，远小于其对基督教教义当中固有的“人－神”思想的厌恶程度。并且，在这3种宗教的神圣经文当中，《旧约全书》——犹太教的基础——同时被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接受为上帝的言辞。因此，犹太教作为一种公分母式的但又是中立的宗教从属关系，对卡扎尔人而言，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因此，他们将犹太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据公元11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尔·巴克利所称，一名卡扎尔高级官员向国王提出，“拥有神圣经文的人分成了3个团体”。他建议国王“召见他们并让他们陈述各自的信仰”，然后再“选择拥有真理的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根据另外一种说法（由公元10世纪的卡扎尔国王约瑟夫记述），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家都派遣了使者——这一次是在并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况下，并且带着“贵重的礼品、金钱以及博学之士前来劝说卡扎尔国王信奉他们的宗教”。

“但是，”约瑟夫这样写道，“卡扎尔国王非常聪明，他召来了一个知识渊博且机敏过人的犹太人，让他们3人（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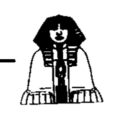


个使者及那个犹太人）坐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各自的教义。”

在经过了一番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当时的卡扎尔君主，一位名叫布兰的国王，宣布休会3天。然后，他问3人当中的那个基督徒，在另外两种宗教当中，他推荐哪一种。信仰基督教的使者，可能是个主教，选择了犹太教作为自己对国王的回答。卡扎尔国王又转而向穆斯林使者问了同样的问题，并且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看起来，好像卡扎尔统治者——脑子里满是犹太人的建议以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思想——在此次大辩论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要选择犹太教。但是，可以这么说，他也考虑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两个超级大国以参与其中的机会，对自己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卡扎尔国王在对自己的信仰进行选择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被看做是与其两个超级邻邦的意愿相一致的。

此次辩论可能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当中的某一时间。但是，卡扎尔国王所信奉的犹太教，看来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犹太教有着非常不同的、也许是根本不同的差别。由于国内犹太人的原因，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以，新皈依的卡扎尔国王及其犹太顾问们对于《旧约全书》的信奉程度，达到了排他的地步，并且对犹太法学博士的教义或者是《塔木德经》——编纂于公元5世纪的犹太法律与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毫不在意。公元8世纪，在犹太教内部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地理上处于外围的地区，出现了对犹太法典及其实践的塔木德式（其本源主要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犹太人）解释的强烈反对情况。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本身，也由这一趋势引发了一次重要的教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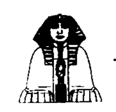
裂，在此次分裂当中，反对《塔木德经》的保守教派从犹太教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犹太教圣经派信徒。

在卡扎尔地区，对犹太教的接受是基于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对《旧约全书》的共同认同，因此，如果对《塔木德经》加以任何强调的话，都会毫无疑问地被看做是“画蛇添足”。卡扎尔人之所以没有接受《古兰经》和《新约全书》的原因，就在于这二者未能通过共同认同的测试。由于政治上的中立要求以及对《塔木德经》明显缺乏热情，导致了早期的卡扎尔犹太教看起来像是十足的保守教派。

很可能就是在这一阶段，帝国的臣民当中少有皈依犹太教的。可能当时的皈依者仅限于国王及其直系的家族成员。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宗教形势当中，由于越来越多的亲《塔木德经》的因素，导致了一些犹太人移居卡扎尔，这样，在卡扎尔团体内部以及帝国内的其他种族（主要也是突厥人）内部，引发了一股皈依犹太教的浪潮。

公元8世纪30年代，有关反画蛇添足的辩论确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这种辩论在政治上就不再是至关重要的了。这样，到大约公元800年前，卡扎尔国王奥巴迪亚——“一个勇敢而又令人崇敬的人”，得以“根据传统与惯例改革其统治并加强法制”。这位革新派国王接下来“修建了犹太教会堂与学校，将大批的以色列圣贤之士集中起来，赏赐给他们相当多的金银礼品，并要求他们翻译其中讲到了礼拜仪式的24本圣书、《密西拿》、《塔木德经》以及一些法令”。

上面提及的“相当多的金银礼品”表明，虽然卡扎尔帝



国在大约公元800年以前就已经皈依了犹太教，但是，有关《塔木德经》的知识并没有传入该地。这样看来，卡扎尔帝国就必须从海外邀请来《塔木德经》方面的专家，并且，由于对经文和《塔木德经》的翻译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专家就在卡扎尔帝国境内定居了。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奥巴迪亚对卡扎尔犹太教的改革是，至少部分地是，源于其自身对宗教的信仰及热情。并且，在这一阶段，皈依伊斯兰教似乎变得更加流行了。当然，皈依伊斯兰教在卡扎尔民众当中的广为流行，肯定是从某一阶段开始的，因为在种族上全然不同的犹太人团体，在中世纪的卡扎尔帝国，被证明坚持了信奉犹太教或者是保持了犹太人的习俗。

首先，在帝国当中有帝国的统治精英卡扎尔人。卡扎尔人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属于突厥人，其人口约为75万人，据猜测大约占帝国总共约150万到300万人口的25%。

一些欧古泽族突厥人，特别是在公元9世纪及公元10世纪为卡扎尔人工作的那部分欧古泽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被犹太化了，或者甚至是完全被犹太化了。举个例子，据我们所知，著名的塞尔柱帝国的创建者——塞尔柱本人，为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为“以色列”，而他的孙子则名叫“都德”(大卫)，这两个名字都无疑是犹太人的名字；并且，由一个阿拉伯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塞尔柱家族的礼拜堂，可能就是一个犹太教会堂。

另外一个在公元11世纪中期向西横扫而过的突厥民族——库曼人，也或部分或全部地被犹太化了。举个例子，



一位库曼王子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伊萨克”和“丹尼尔”。而在俄罗斯南部（今属乌克兰）草原上的突厥游牧部落，也部分或全部地信奉了犹太教。

据公元12世纪的犹太人探险家，雷金斯伯格的培塔希亚记录称，他在草原上遇到了这样的游牧部落——库曼人或者欧古泽人，他们信奉一种非传统形式的犹太教，认为安息日那一天应该是完全黑暗的（他们在这一天不允许有任何人为的亮光），并且甚至禁止在那一天当中切面包。

此后，卡扎尔人也对匈牙利人造成了影响。马扎尔部落原居住在卡扎尔影响所及的草原上。在大约公元800年，一个卡扎尔部落——卡巴尔人，因与卡扎尔国王不和，从卡扎尔腹地逃跑了出来。这个作为卡扎尔民族一部分的部落毫无疑问是犹太教徒，而这个部落成为了在早期马扎尔人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团体。

接着，在50年左右之后，作为马扎尔人的最高统治者的卡扎尔君王，赋予马扎尔人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国王的权力。到公元900年前，别的部落——培车尼格族突厥人，已经强迫马扎尔人向西迁移到了今匈牙利境内。但是，旧有的马扎尔-卡扎尔人链环并未中断，并且在大约公元950年，有一些卡扎尔人（可能是犹太人）受匈牙利人的邀请进入了匈牙利。在公元14世纪，许多匈牙利犹太人仍然被官方确认为卡扎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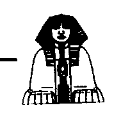
公元12世纪早期，库曼人对卡扎尔人本身的压力也引发了一次新的犹太人殖民，其目标曾是卡扎尔的领地，而现在则是维京人的基辅公国。这个新城在公元1117年前建成，名为贝拉维扎（与卡扎尔帝国在里海北部的最大要塞同名），



位于基辅以北 90 英里处，在切尔尼戈夫的附近。我们从一封保存至今的公元 10 世纪的信函当中可以得知，在基辅地区，肯定存在过一个建立已久的犹太人社团。事实上，基辅本身都有可能是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在公元 9 世纪之前或在公元 9 世纪当中——恰恰是在维京人于公元 882 年攻占基辅之前——建立起来的。

可能被其卡扎尔最高统治者或卡扎尔邻居部分地犹太化了的部落，绝不仅仅只限于库曼人和欧古泽人。虽然其犹太教来源究竟是卡扎尔人还是伊朗的犹太教，或者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同时都受到了两者的影响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居住在高加索山脉地区的讲北部伊朗语的塔特部落至今仍信奉犹太教。事实上，一部成书于公元 1346 年的俄罗斯编年史，就将高加索东部地区称之为“犹太人的土地”。

最后，虽然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存在起源肯定是卡扎尔帝国出现之前的事情，但是，在克里米亚半岛，存在着有可能部分源自卡扎尔或者是受到了它的影响的古代犹太人社团（克里姆查克人）。可以肯定的是，在别处的卡扎尔势力消亡以后，某种犹太人的政治残余在克里米亚半岛得以保存并继续下去，因为一些克里米亚卡扎尔人直到晚至公元 1079 年，还企图夺取克里米亚半岛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而他们所企图夺取的地区，直到公元 15 世纪仍被叫作“加扎尔里亚”（卡扎尔里亚），这些犹太人则一直被称作“加扎里”（卡扎尔人）。此外，在犹太人进入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之时，有几个卡扎尔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要塞城镇却保存了下来。



这个证据就非常明确地证明，在犹太教的卡扎尔帝国——其本身的种族也是非犹太人的突厥人——控制或是影响之下的几个大的、居民为非犹太种族的地区的犹太化历程无可否认。因为据与之同时代的阿拉伯旁观者称，所有的卡扎尔人都是犹太人，并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推断过的那样，核心的卡扎尔人口多达75万人。

但是，卡扎尔帝国，以及大多数突厥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犹太化，究竟有何影响长远的意义呢?

其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卡扎尔帝国，以及该帝国为一神论国家这一事实，阻止了伊斯兰教向西扩张。如果不是因为卡扎尔帝国军力强大且信奉一神论宗教（即犹太教）的话，伊斯兰教可能在公元8世纪和公元9世纪已经横扫了异教的欧洲东部，并且甚至已经一直逼进了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如果没有卡扎尔人阻止伊斯兰教的扩张，那么最后成为了基督徒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可能早已被伊斯兰教同化了。从理论上讲，如果卡扎尔帝国没有阻止伊斯兰教的扩张，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奥地利东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德国、丹麦、瑞典、挪威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所统治的英格兰东部，都可能成为穆斯林地区，而在公元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的诺曼第人（最初是来自丹麦的维京人），甚至可能已经做了200年的穆斯林了！此外，如果阿拉伯人占领并用伊斯兰教同化了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话，一个被称作罗斯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就永远不可能从波罗的海向南部和东部推进，建立起俄罗斯了。



但是，阻止伊斯兰教的推进，并不是卡扎尔帝国在历史上所起到的惟一的影响深远的作用。这个犹太人帝国的另外一份遗产是，造就了大量的最初并不是犹太种族的犹太人，他们在后来成为了欧洲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当中，以及后来的世界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也许甚至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分。

世界犹太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根据不同的历史因袭，分为许多种系，其中主要的是西班牙系犹太人（西班牙裔的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欧洲北部的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数目最多的德系犹太人起源于欧洲东部，特别是立陶宛、波兰以及俄罗斯。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犹太人具有很大的卡扎尔或者受卡扎尔影响（即在种族上是突厥人、斯拉夫人以及马扎尔人）的遗传成分。

人类最近发现了有关这一点的潜在的身体方面的证据，但是，这一证据的发现者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而是遗传学家。对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所作的DNA 测试表明，后者的至少一个关键片断携带发生在公元700 年以后——这一时间正是西班牙系犹太人的祖先与德系犹太人的祖先开始在地理上分割开来的时间——一次可能的大规模的、甚至是全面基因转变的证据。从历史上来说，首先，欧洲西部从不曾发生过这种全面的转变；其次，至少从公元 1200 年开始，欧洲东部（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于此的转变。

这就暗示，任何此类的转变都只可能发生在公元 700 年至公元 1200 年的欧洲东部。而且，我们所知的发生在那一段时间之内以及那一个地理范围之内的全面转变史，就有卡



扎尔人在公元8世纪和公元9世纪的转变。

很明显，德系犹太人的基因中暗示起源部分发生改变的那一片段，正是时至今日仍被说成是完全从古代以色列的辅助牧师那儿遗传而来的那个基因片段。根据世代因袭，这一部分犹太人主要由古代利未族以色列部落组成，而他们至今仍被称作利未人。显然，其中并未包括一个利未亚族——辅助牧师们，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作科恩人。利未人的姓名、特征以及今天的辅助牧师身份和作用，都是以男性为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像DNA中决定是否男性的一个特殊的基因物质片段——Y染色体——一样。

因此，一个人在Y染色体上的基因密码是从其遥远的男性祖先那儿遗传得来的。通过对西班牙系犹太人与德系犹太人当中的利未人和非利未人的基因进行分析，遗传学家们发现，德系利未犹太人当中有高达30%的人的Y染色体上有一种特别的DNA组合，而这种组合无论是在非利未人的德系犹太人的基因当中，还是在所有西班牙系犹太人的基因当中，都不存在。

这种基因标志甚至在科恩人的基因（古代以色列首席牧师的后代）当中都不存在，而仅仅存在于辅助牧师的后代，也就是后来的德系（欧洲北部）犹太人的基因当中。

也许在历史上，不仅仅只是非犹太的民族——其中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例子就是卡扎尔人——大规模地转变成了犹太教徒，而且，卡扎尔皈依者中的一部分人还取代了利未人（辅助牧师）的身份。这样的分析得到了从卡扎尔时期保存至今的文字资料的支持。在基辅犹太人社团写给卡扎尔帝国之外的犹太人社团的一封推荐信当中，签名的犹太人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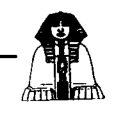
是传统的突厥名字，而他们的突厥卡扎尔人祖先却已经采用了利未人的姓。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论是将科恩（一个利未人亚族）用作姓还是将其用作名，都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古代利未人部落的后裔，或者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如果卡扎尔人当中的上层人士接替了科恩利未人的职务（即首席牧师的后代）的话，那么，其他为数众多的卡扎尔人出任普通利未人职务（即辅助牧师的后代）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皈依者出任科恩人或者普通的利未人的职务是被犹太法典所禁止的，因此，卡扎尔人就不得不为得到出任利未人的职务的权利而编造一个神话。他们宣称他们自己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以色列部落的后代，他们根本就不是皈依犹太教，而不过是重新回到犹太教的怀抱当中而已。此外，他们宣称那个部落的祖先是西蒙——正是利未部落创始人的兄弟。实际上，在《圣经》（《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西蒙与利未的后代命运相同。

也许正是在犹太化之前的原来的卡扎尔牧师，即所谓的卡姆，在皈依伊斯兰教时，全体都转为了利未人，而与此同时，其他的卡扎尔人（也许还包括受到卡扎尔影响的附庸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则成为了普通的非利未族犹太人。

在公元10世纪和公元11世纪，正当卡扎尔帝国土崩瓦解之时，尤其是在公元11世纪和公元13世纪，当库曼部落与蒙古部落将大量难民逼上西进之路的时候，公开宣布信仰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以及受卡扎尔影响的也信仰了犹太教的其他社团，其中可能包括地位很高的利未人，迁移进入了欧洲东部，并在那里和东从德国、北从意大利迁移而来的犹太人



社团融合在了一起。这样，许多讲着不同语言的不同的民族就必须得有一种通用的混合语言了，这种语言最后变成了意第绪语——它是一种以中世纪德语为基础的合成语言，由好几种德国方言构成，但是它在词汇和句法方面又包含了斯拉夫语、罗曼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突厥语以及其他语种方面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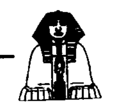
德系犹太人很及时地就成为了世界犹太人的主流，但是，将其推到这个位置上的无数的力量归根结底，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卡扎尔犹太帝国——一个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的国家，一个被大多数历史书籍遗忘了的国家。

正是这样，公元6世纪中期蒙古的气候问题及其后来的政治事件，通过突厥人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卡扎尔帝国的建立，既造就了欧洲的非伊斯兰化的性质，也成就了世界犹太民族的分布范围、种族以及主要的文化取向。

蒙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紊乱、阿瓦尔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以及卡扎尔人所赐，欧洲历史被永远地改变了。

第六部分

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第十三章　发生在不列颠的灾难

从内部而言，在欧洲，同样的气候问题，直接也好，通过瘟疫的中介作用也好，同样都引发了一些根本的改变，推动古代西欧走向终结，并由其原现代的继承者取而代之。当今西欧许多国家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公元6世纪的气候与流行病所造成的大混乱所赐。举个例子，有一个尚有争议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当中，不列颠岛上的两大种族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在公元5世纪以前，不列颠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凯尔特人。然后，到了公元5世纪40年代，相当数量的日耳曼人越过北海来到岛上，并在今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定居下来。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建立起了成百上千个势单力薄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些小王国当中的一部分合并形成了几个相对较大的国家——南撒克斯、萨肯、肯特、东撒克斯、早期西撒克斯、东英吉利以及早期麦西亚。

到公元6世纪早期（可能是公元510年或公元520年），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行动在遭到凯尔特人(不列颠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抵抗后，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这一时期往往是与一位成功的泛不列颠战争指挥者、带有传



奇色彩的人物亚瑟王联系在一起的。此后，居于不列颠岛东部的日耳曼人和居于该岛西部的凯尔特人开始了各自独立的、分别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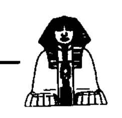
历史方面的证据表明，整体而言，不列颠岛上的原住民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极无好感，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想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搅在一起，甚至连生意都不愿意与他们做。考古方面的证据也证明，居住在岛西的凯尔特人与居住在岛东的日耳曼人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贸易往来（因此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人员间的接触）。就地理环境来说，大片茂密的森林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边境分界线，将这两个民族分隔开来了。但是，已经占领了凯尔特人大片土地的日耳曼族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会进行新的侵略扩张，并且注定会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缘政治力量。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公元6世纪早期到中期的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会发生崩溃呢？仅仅不过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想要改变当时的状况，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外部机遇，而他们只不过是抓住了这个机遇而已吗？

答案是：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在中国引发了饥荒、在蒙古导致了政治动荡、在非洲东部引发了瘟疫的首次爆发以及在君士坦丁堡令太阳无光的气候混乱，同样也直接或间接地对不列颠造成了影响。

在不列颠岛上所发现的树木年轮方面的证据表明，公元535年到公元536年，不列颠岛上的树木的生长明显减缓，并且直到公元555年方才完全恢复正常生长状态。

对不列颠岛上从公元480年到公元650年的天气情况作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535年到公元555年这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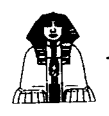
时期内，气候极其不稳定。在从公元535年到公元555年的这20年间，重大的气候问题频频发生，其发生频度是从公元480年到公元650年的这170年间，其他同等时间段内重大气候问题发生频度的7倍。

公元536年，在君士坦丁堡，太阳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暗淡无光，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厄斯对此曾经有所记述。但是，在任何不列颠或者是英格兰的历史资料中都没有对同样事件的记载，倒是公元8世纪的英格兰历史学家比德，在其所著的《英格兰教会及其人民的历史》一书结尾处的大事年表中，提到在与上述事件相近的时间——公元538年和公元540年，发生了两次奇异的日全食。

根据这两条记录，公元538年的那次日食“发生在2月16日，并且从黎明一直持续到了两个小时之后”，而公元540年的那一次日食则“发生在6月20日，在黎明之后，星星在天空中出现了长达半个小时之久”。

比德的大事年表是从公元前60年写起的，止于公元731年。在这一个时间段内，在不列颠岛上可以看到的日食总共有13次，而在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可以观察到的日食总数更是高达28次。但是，比德仅将其中两次日食记录在册了。

比德丝毫没有提及发生在公元19年、公元118年、公元129年、公元158年、公元183年、公元228年、公元319年、公元393年、公元413年、公元458年、公元594年以及公元639年的日全食，而这些日全食都是可以让整个英格兰陷入黑暗之中的。并且，他也没有提及发生在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为数更多的日食现象——发生在公元538年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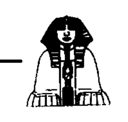
英国与爱尔兰

本书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当中提及的城镇与地区

埃奥纳
爱丁堡
伯尼西亚
雷吉德
坎特里克
马恩岛
安格尔西
德甘维
格维尼德
切斯特
林肯
波维斯
的纳斯爱姆利斯
罗克斯特
戴菲德
格劳色斯特
色伦斯特
巴斯
坎特伯雷·康格雷斯伯雷
基里伯雷
廷坦格尔
楚恩
格拉姆巴拉
海皮克
蒙特科蒙比
斯尼戈湾
厄尔斯特
克尔斯
梅特
科隆马克诺伊斯
科隆菲尔特
洛赫德尔格
提普拉里
雷因斯特
加瑞因斯

100英里
100千米

图例
● 城镇或其他地点



公元540年的两次日食除外。他甚至完全忽略了发生在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所有的日全食（即发生在公元603年、公元646年、公元655年以及公元693年的日全食），尽管这些日全食发生的时间较之公元540年而言，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他在世的时间。

据他的记录称，公元538年和公元540年的日食在英格兰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他却不知道，由于这两次日食都是显著的日全食，所以在英格兰是无法看见其发生过程的。很明显，他在自己的大事年表当中直接照搬了罗马帝国晚期意大利的或者是地中海地区的编年史或者年鉴当中的记录，在这些编年史或是年鉴当中记述了在地中海地区观察到的这两次日全食现象。

那么，比德的记录当中为何只提及了发生在公元538年和公元540年的两次日全食，却对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英格兰的其他十几次日全食现象只字不提呢？

原因可能在于，公元538年或公元540年在时间上接近于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而后者正是发生了太阳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暗淡无光的时段。

比德最终决定在他的记述当中取发生在公元538年和公元540年的两次日全食，而舍弃其他所有发生在他所记述的时间段内的日全食，这就有力地表明，比德知道——也许是从如今早已失传的不列颠历史记载中了解到的——在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某一时刻，整个天空曾经大面积地暗淡了下来，并且，他推测，这种现象一定是由某种极其彻底的日食引起的。

作为一个爱好研究的历史学家，比德肯定翻遍了所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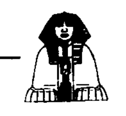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英国的气候

标记	年份	标记	年份
	500		551
	501		552
	502		553
	503	C	554
	504	S	555
	505		556
	506		557
C	507		558
	508		559
	509		560
	510		561
	511		562
	512	s	563
	513	f	564
	514		565
	515	s	566
	516		567
	517		568
	518		569
	519		570
	520		571
	521		572
	522		573
	523		574
C	524	f	575
	525		576
	526		577
	527		578
	528	s	579
f	529	f	580
	530		581
	531		582
	532		583
	533		584
	534		585
彩色的降雨	535		586
彩色的降雨	536		587
	537	C	588
	538		589
	539	S,FAM	590
	540		591
	541	D	592
	542		593
	543		594
	544		595
C	545	s	596
	546		597
	547		598
S	548		599
	549		600
s	550		

c 非常冷
f 洪水
s 风暴
FAM 饥荒
e 流行病
d 干旱

表中字母表示主要由公元17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学者所提及的、发生在任意一个年份的气候问题的种类。大写字母表示非常重大或者非常异常的天气方面的或者与天气有关的事件。）



能找到的罗马帝国的日食记录，并且将重点放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加以考察。结果，他一定在偶然间就发现了恰恰发生在公元538年和公元540年的日食，并且错误地据此综合推测，这两次日食是与公元6世纪30年代的“太阳失光”现象同出一辙的事件。

但是，在历史上有据可考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一轮失色了的太阳。对于天空暗淡下来这一现象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尘土或化学品污染，在英国以及法国的史书上也有所提及。据称，公元535年或公元541年，从云端降下了“真正的鲜血”。此处之所以对具体年代不太肯定，原因是公元13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文德弗的罗杰引用一份较之他在世时更早，并且也许在年代上不太确切的资料，这样写道：“从云端降下了真正的鲜血，紧随其后的就是可怕的死亡。”而另外一份在时间上更接近现代（公元18世纪）的资料却显示，那一事件发生在公元535年。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在公元535年到公元555年这一时期内，在英国也发生了气候紊乱的现象。据爱尔兰编年史的记载，公元538年，在爱尔兰发生了一次饥荒（“面包不足”），而这次饥荒的起因几乎可以肯定地归于气候问题。

气象部门对英国（有时是近大陆地区）历史上天气的调查表明：公元536年，“特维德发生了洪灾并且伤亡惨重”；公元545年，“冬天极冷”；公元548年，有250人在“发生在伦敦的一场风暴”当中丧生，另外，在这场风暴当中，“许多房屋倒塌”；公元550年，“在苏格兰，大如鸡蛋的冰雹如石块般从天空中砸下”；公元552年，“在苏格兰，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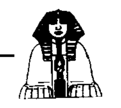


倾盆长达 5 个月”；公元 554 年，“冬季极冷，且伴之以霜冻与大雪，被冻僵了的鸟儿们和野生动物变得极其温驯，用手就可以捉住”；公元 555 年，“在英国全境，到处都是严重的雷暴”。

以上这些条目的意义并不在于每一个单独的条目本身，而在于将这些条目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公元 535 年到公元 555 年这一时段内发生的频度，相对于同一时期其他时段更加集中。

尽管从表面看，气候环境是比较严峻的，尽管那场饥荒（公元 538 年或者公元 536 年发生在爱尔兰，并且同时在不列颠岛上发生了）与这些事件的肇端不无关联，但是，至少从直接的方面来说，这些事件也许并没有造成什么持久的影响。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记载，发生饥荒的时间要比亚瑟王驾崩的时间——公元 537 年——晚得多（可能一直晚到公元 10 世纪中期）。这次饥荒是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的气候紊乱所间接产生的后果，而气候的紊乱注定要在不列颠岛上引起重大的、永远的变化。在大约公元 549 年，已经从非洲东部横扫而过，并跨越了中东和欧洲的瘟疫，最终在不列颠诸岛登陆了。

在爱尔兰，据《厄尔斯特编年史》的记载，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流行病”（一场“范围较广的死亡”）。在贵族当中，至少有 7 个重要的贵族家族——菲尼亚、莫库、特尔堆伯、科拉姆、马克·泰尔、辛舍尔以及因尼斯·凯尔特拉的科勒姆，自此消失了。在威尔士，据《威尔士编年史》的记载，公元 547 年（一些当代的历史学家指正这一时间其实应为公元 549 年），格温内思王——一个名叫梅尔格温的强有



力的君主，死于瘟疫。

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列颠岛上所爆发的瘟疫是经由船只从法兰西西南部，或者更有可能是从地中海地区登陆的。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种可怕疾病的携带者仍然是偷渡而来的黑鼠。由于从公元6世纪上半叶一直到瘟疫爆发之时为止，正是地中海地区与不列颠诸岛之间的贸易往来繁荣发达之时，因此，在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瘟疫有许多的机会得以进入不列颠本土。

有两个地方极有可能就是瘟疫最初登陆英国的地点：位于北科尔尼什海岸的廷坦格尔和位于耶欧河边的坎特伯雷·康格雷斯伯雷，后者距布里斯托尔运河有两英里。这两个地方差不多可以肯定地都与从地中海地区开出的船只有着直接的联系。

廷坦格尔，传说是亚瑟王的发祥地，在公元5世纪与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一度是皇室要地。在该地的遗址上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石头建筑物，并且发现了数量可观的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陶器。在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在相对整个遗址而言较小的一个区域当中所进行的发掘，已经出土了3000片陶瓷碎片，而且，尚未被发掘出来的陶瓷碎片，其数量可能将数以万计。对所发掘出来的陶瓷碎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当年在廷坦格尔的皇室成员从今土耳其西部的福卡亚进口制作精美的餐具，从迦太基地区（今突尼斯）进口其他餐具，从土耳其西部的萨尔迪斯进口瓶罐，再从西里西亚（土耳其南部）和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口橄榄油或者双耳葡萄酒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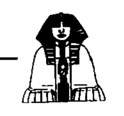


地中海地区对廷坦格尔的影响，恐怕远远不仅仅是向它提供满足其需求的精美绝伦的餐具与酒具。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们，或者甚至是外交人员，也进入了廷坦格尔的皇室朝廷。

在对廷坦格尔附近的一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两个更加深入的地中海地区对该地有影响的证据：一个是石碑上所刻的风格化的十字架——属于通常被发现于地中海地区的那种类型的十字架；另外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墓碑上所记载的葬礼上的集会是属于通常会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非洲北部）的葬礼上进行的那种集会。

由此可知，廷坦格尔与地中海地区之间，不论是商业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联系都是相当紧密的。而准备再次向西推进的罗马帝国，仅仅只是将不列颠西部看作是罗马各领地当中一个处于半脱离状态的地区。但是，到了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间，廷坦格尔却被人们弃置了。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就是那场瘟疫。在不列颠的所有城镇当中，廷坦格尔与自地中海地区发肇的瘟疫接触的机会是最多的，并且其被弃置的时间也是与瘟疫爆发的时间最接近的。

瘟疫在不列颠大陆上的第二个登陆点，是位于索默斯特之耶欧河边的小镇坎特伯雷·康格雷斯伯雷。对这个距离布里斯托尔运河两英里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其结果和在廷坦格尔所进行的发掘工作一样，找到了许多当年此地与地中海地区曾有贸易往来的证据。在这一遗址上，出土了来自希腊南部的制作精美的双耳葡萄酒瓶碎片、来自土耳其西部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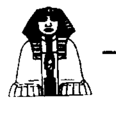


洲北部的盘碟以及来自土耳其南部的双耳橄榄油瓶。所有文物的日期都是始自公元6世纪上半叶。并且，同样地，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早期，这一遗址也被人们废弃了。

此外，还有几个地点是携带瘟疫的老鼠进入不列颠诸岛的通道，其中包括：都柏林以北的一个叫做拉夫·辛内的海岸定居点，该地在公元6世纪中期就消失了；接着，科尔克附近的加伦要塞也湮没在了历史的风尘之中；位于威尔士北部海岸的德干维——公元5世纪或公元6世纪的一个皇室中心，它与著名的死于瘟疫的梅尔格温王联系在一起；以及同样位于威尔士境内的波特曼道格或波特-伊-格斯特地区，该地地处卡尔迪干湾东北角。

上面所提及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瘟疫进入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距此地向北10英里处的皇室大本营迪纳斯·爱姆利斯，可能正是通过曼道克港地区遭到瘟疫感染的。当然，在瘟疫席卷不列颠岛的时候（即公元6世纪中期），迪纳斯·爱姆利斯和许多其他的英国城镇一样彻底歇业了。虽然在迪纳斯·爱姆利斯所发现的与地中海地区有贸易往来的考古方面的证据远没有在其他遗址上发现的多，但是，在迪纳斯·爱姆利斯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却发现了一片土耳其西部出产的双耳罐的碎片以及一片法兰西出产的盘子的碎片（上面饰有一个基督教用以代表耶稣的标志）。

瘟疫经由上面所提到的一个或者是多个登陆点进入不列颠岛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它就将使不列颠西南部及威尔士的广大地域变成一片荒原。考古研究表明，恰恰在瘟疫极其肆虐的时候，许多定居地变得人烟全无。据推测这



可能正是瘟疫的直接结果。

在康沃尔郡，在距大西洋海岸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楚恩的定居地。这个有着20英尺厚、12英尺高的城墙环绕的城镇，在公元6世纪中期变成了一座“鬼”城。由于此地从事着锡矿的开采与出口，因此，此地可能与海外的商人有直接的接触。康沃尔郡的另外一个防御森严的、较大的定居地基里伯雷——人口数目大约为200人到300人，在同一时间，也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正如圣埃维斯附近的格拉姆巴拉的一个村庄所出现的情况一样。

在德文郡，海皮克——一个设防的小城，如今只是一些有风吹过的悬崖顶上的被弃置了的土建工程而已，在繁荣了700年以后烟消云散了。德文郡境内的另外一个海岸定居地——莫特卡蒙比，看起来同样也在公元6世纪中期消失了。差不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还有几十个定居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由于黑暗时代的大多数可能的遗址迄今为止尚未能进行考古方面的调查，因此，这些定居地也就尚未被人们发现。

除了那些在瘟疫肆虐时消失无影的定居地以外，还有其他几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发现了大量有趣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当时这些地方曾经发生了迅速改变或是人口剧减。毫无疑问，最为重要的是古代罗马城市维罗康涅姆（罗克斯特），该城在经历了一场城市经济区域的彻底重新划分以后，紧接着又经历了城市人口的剧减。

在该城遗址上发现的证据表明，在公元6世纪中期，该城主要的市场被废弃了（据推测，原因可能在于贸易量与顾客人数的减少），城镇收缩了。在几十年内，这一切的发生

都紧随在城市经济区域的彻底重新划分之后。在收缩情况更为剧烈的城市里面，就在市场的遗址上，一位地方富豪决定要修建一座大的私人住宅。这种对过去的经济区域以及过去的公共财产的不敬明显表明，大约在瘟疫肆虐的时间，人口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在瘟疫降临之前，该城可能拥有几千人口，占地面积超过了 195 英亩，并且有建在坚固的土木工事之上的长达两英里的木栅环绕四周作防护屏障。同时，该城肯定还有几座教堂，其中的一座教堂最近被考古学家使用地下探测雷达发现了。该城收缩至仅余 25 英亩，其防护墙也做了相应调整。而在过去的财产遗址之上则建起了大量的新房屋，明显对瘟疫爆发之前的财产拥有人毫无尊重之心。在过去的罗马公共浴室（旁边曾是市场所在地）的部分区域内，那些宽敞的新房的住户们修起了小礼拜堂，其残垣保留至今。

瘟疫可能反复发作了好几次，这样，疾病（与发生在这之前的饥荒）的累积作用造成了不列颠岛西南部（今英格兰西南部、威尔士以及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西部）的人口减少了60%。

没有任何有关公元 6 世纪不列颠岛上死于瘟疫的人数的统计数字保存下来（或者说根本就不曾有人统计过）。有关死亡率的仅存线索，是记述工作要做得好得多的公元 14 世纪的那次瘟疫（黑死病）爆发的情况、公元 6 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公元 6 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相较于更加温暖、干燥的



欧洲大陆南端而言，要更为容易，更为迅速。相较于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的干燥的地中海地区而言，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

不列颠岛西南部的60%的人口都死去了（在某些典型的瘟疫破坏地区，死亡人口可能高达90%），正常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量农田荒芜；并且，正如考古记录证实的那样，许多城镇和村庄因变得人烟全无而被废弃了。

毁坏程度如此严重，为什么似乎没有关于此次大灾难的民间记忆呢？

第十四章 “荒原”传说

与大家所公认的相反，有关公元6世纪的瘟疫大灾难的内容，可能的确曾在口头传说与文学作品中得以流传，并且在数个世纪之后，成为了中世纪的亚瑟王传奇故事中某些特殊的方面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在与寻找圣杯有关的故事当中。

亚瑟王传奇故事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一个发端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饥荒与瘟疫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荒原”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标注时间为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至少半打亚瑟王传奇故事当中出现过。这一概念还出现在一部完全无关亚瑟王的、公元11世纪中期的一部叫做《玛比诺吉》的威尔士史诗当中。此外，公元12世纪，蒙默特的杰弗里所著的《不列颠历代国王史》中，对这一概念也有所提及。

在好些传奇故事当中，都用“荒原”来特指上述现象。而在另外一些传奇故事当中，以及《玛比诺吉》当中，虽然明确提到了这一概念，但却并没有给这个概念一个正式的名称。

有3个关键的间接证据表明，荒原的概念可能部分地起



源于公元6世纪的那次真实的大灾难。

其中之一是时间上的相似。在所有的荒原概念故事当中，除了两则以外，其余的故事全部都出现在关于具有半传奇色彩的黑暗时代的达克斯·贝罗勒姆国王亚瑟的作品当中。据称，亚瑟王死于公元537年或者公元542年：前面一个年代是公元10世纪中期的《坎布里亚编年史》（《威尔士编年史》）当中给出的，后一个年代则是公元12世纪的《不列颠历代国王史》当中所给出的。亚瑟王传奇故事的作者们肯定是知道《不列颠历代国王史》以及其他许多现在久已失传的相关资料的，也正是通过这些资料，他们得以熟知公元6世纪时亚瑟王在世的时间。

此外，文学作品的实质性内容与真正的"荒原"大灾难也是相似的。在《威尔士编年史》里，恰恰是在记述亚瑟王的死亡的同一个句子当中，提及了公元6世纪30年代的饥荒：在对公元537年的记录当中，称之为"发生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次大死亡"。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说的"大死亡"与《厄尔斯特编年史》当中所提到的公元536年及公元537年发生的"面包匮乏"（饥荒）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不列颠历代国王史》中指出，之所以会发生荒原式的大毁灭，其原因在于亚瑟王死后的某一时期爆发了一场战争。也许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给的亚瑟王死亡的日期恰恰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所记录的瘟疫大灾难开始在君士坦丁堡以及欧洲（公元542年）肆虐的时间。有意思的是，为亚瑟王所"选择"的死亡日期正好就是主要的自然灾难发生的时间。



看来，中世纪的亚瑟王传奇是与饥荒、疾病以及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明显地反映出了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的真实境况：饥荒继之以瘟疫，瘟疫又继之以侵略与战争。一点都不奇怪，相关的年表会在涉及亚瑟王传奇时期时让人感到困惑不解，因为所有的因素——饥荒、疾病以及战争，都已经在这儿了。

甚至就是疾病的种类，也就是瘟疫，在有关这块即将被废弃土地的国王所受的那些神秘创伤的内容当中，也有着暗示。这种创伤——如魔法般导致了这片土地被废弃的创伤（并且因此成为了整个荒原概念的象征）——的症状，表现为整个大腿区域，尤其是腹股沟和生殖器区域出现流血不止的伤口。事实上，导致了公元6世纪出现荒原的主要因素正是瘟疫，而这种瘟疫在人的身体上的表现，即是所谓的腹股沟腺炎（大疖子）。这种疖子尤其会在人的腹股沟（以及腋窝）部位血淋淋地爆开，造成疮伤。

在亚瑟王传奇之一的《寻找圣杯》（公元13世纪早期）中，在对荒原现象进行描述时，确实曾提到过“一场大瘟疫”。而在《后拉丁文圣经》（同样属于公元13世纪）当中，这个传奇故事则讲道，村庄当中一半的人躺着死掉了，“劳动者则死在了地里”——恰恰在发生瘟疫时才可能出现的高死亡率的情况。事实上，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是，我们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有关于公元6世纪40年代的君士坦丁堡城和安提俄克城的情况的历史记录。

在英国，第一次简要提到接近于“废弃”土地这样的表述的，是《威尔士编年史》中对公元537年的情况记录。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这部分记录指出：“在卡姆



兰一役中，亚瑟王与梅德劳特战败，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发生了大面积的人口死亡。”

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前部分所提到过的那样，对荒原现象的最早的恰如其分的描述（虽然与亚瑟王毫无牵连），出现于一部在公元11世纪内逐渐成书的威尔士民族史诗《玛比诺吉》中。故事讲述了一场有魔力的尘土是如何降临的，而当这场尘土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地上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动物，没有了烟，没有了火，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住处。”尊贵的皇宫里的那些房间已经“变空了，被废弃了，再也没有人或者是动物居于其中了”。接着，在所有的麦穗都被一支老鼠大军从麦秆上偷走以后，人们面临着一场饥荒的危胁。“在灰色的黎明里，只有光秃秃的麦秆”还留在田间。最后，这个故事写明，这种“荒原”现象是由一个可能代表着死亡的邪恶男巫师所引起的，这个巫师就叫做“老家伙”。

在地理范围方面，文学作品当中所说的荒原与公元6世纪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也具有相近性。实际上，在亚瑟王传奇以及其他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当中提到的大多数荒原，据称都位于威尔士境内，或者更准确地说，位于南威尔士或洛格雷斯以及罗格里亚。

而不列颠或者里斯特诺伊斯（可能是不列颠的另外一个名称或者是不列颠的一部分），则更加经常地被引为荒原所在地。总体而言，亚瑟王传奇故事——荒原的文学背景，倾向于与索默斯特或南威尔士地区联系在一起。这样，人们通常把不列颠西南部地区视做被废弃的地区。因为这样就与公元6世纪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瘟疫造成）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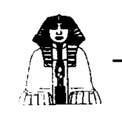
了。

接下来，公元12世纪中期，蒙默特的杰弗里在其所著的《不列颠历代国王史》当中对荒原现象进行了描述，并且，他还记述了在亚瑟王死后若干年——令人信服的时间为公元6世纪60年代或者公元6世纪70年代，色尔伦斯特城被进逼而至的野蛮人攻占并被付之一炬，被追赶的英国人则越过塞文河进入了威尔士。接着，野蛮人的头领“劫掠了这一地区，将所有邻近的城镇付之一炬。直到差不多烧光了岛上从西边到东边的全部土地，他的怒火才平息下来”。

“所有的定居点都被威力强大的攻城槌击得粉碎。所有的居民都在闪光的刀剑与爆裂的火焰当中命丧黄泉。而那些侥幸活着逃了出来的人们，则被这些可怕的灾难震骇了。”杰弗里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他的这本书虽然在名称和日期方面不甚精确，但是，在就更广泛的主题方面而言，却颇有说明力。

再接下来，公元12世纪晚期，法兰西作家谢雷廷·德·特洛伊在其所著的《圣杯的故事》（有时也简单地称之为《珀斯瓦拉》）中描述了第一个真正的亚瑟王荒原。在书中，此地是与英雄珀斯瓦拉在找到圣杯所在地（所谓的“圣杯城堡”）之前所拜访过的城堡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战争以及食物匮乏，城堡里面的士兵们“被饥荒和长时间的守夜拖垮了，他们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并且正如珀斯瓦拉发现城墙外的土地已经全部荒芜、废弃了一样，“他发现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无论他走到哪儿，进入他视野的都是废弃的街道与断壁残垣，看不到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他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了人烟，没有了面包、



糕点，也没有了葡萄酒、苹果酒或者啤酒。”

另外一份写于公元13世纪的记录《珀勒斯沃斯》（有时也称之为《圣杯正史》），描述了一块荒原，一块遥远而广阔的土地：“在那儿既没有动物也没有鸟类，因为那儿的土壤实在太干枯贫瘠，所以连一根草都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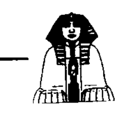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是如此巨大，就好像它要占掉一个国家的全部土地似的。”但是，城市的城墙却“破破烂烂地环绕四周，城门也因年久失修而显得歪歪斜斜”。城中“空无一人，巨大的宫殿被废弃了，市场和交易已不再存在；占地颇广的墓地当中满是坟茔，教堂已全部成了残垣断壁”。

此后，在公元13世纪的《圣杯传》手稿之一的增补当中（这个增补名叫《说明》），又有另外一个荒原故事，故事中有着明显的凯尔特人意味。与蒙默特的杰弗里笔下的荒原或是谢雷廷·德·特洛伊版的荒原都不同的是，这个荒原的出现时间是在亚瑟王时代之前，而且据称亚瑟王的圆桌武士们曾发誓要通过重新找到“圣杯城堡”来使此地重获生机。

故事是从一个邪恶的国王及他的手下开始讲起的。这个国王和他的手下强奸了一群神秘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少女。而这群少女守卫着一眼神圣的水井，并且为所有的过路人在金杯——实际上就是圣杯的原型——里倒满井水。强奸事件的发生以及金杯的被盗，迫使少女们离去，并且井水也断流了。水井都干涸了，而土地则荒芜了。

“洛格雷斯王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土地一片死寂，并且被废弃了，就好像它还不如几个榛果有价值一样。因此他们再也听不到井水和在那儿的少女们的声音了。”

在《寻找圣杯》当中的另外一个公元13世纪的亚瑟王



传奇故事中，首次将荒原视做是一个地理方面的术语——一个专有名词，并视其为一个国王残害（从表面上而言，是用一把剑）的直接结果。虽然这一时间被放在了亚瑟王之前，但是，它同时也被视做是一次大的流行病从这一残害行动中释放出的时间。

“这是由洛格雷斯王国的那把剑进行的第一次打击。而这次打击导致的是一次大瘟疫，并且在所有的王国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以至于土地即使开垦出来，也不再能生长出庄稼了。从那时起，那里再也不生长小麦和其他的粮食作物了，树木也不再结果，而海里面的鱼也变得极其稀少。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王国被称之为‘荒原’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这次不幸的打击之后都被人们废弃了。”

另外一次打击（从表面上来看是用一把长矛），即所谓的悲痛的打击，在公元13世纪的《圣杯传·续篇》中作了描述。根据该书的叙述，这次“打击”发生在亚瑟王时期之前，且被认为是导致荒原现象的起因。

据该书叙述，双剑武士巴雷厄因用双手抓住了圣矛（用于伤害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武器），“用力狠狠地击打位于自己身后的培勒汉国王，以致把自己的两条大腿都刺穿了”。

“国王倒在了地上，伤势严重。”接着宫殿颤抖并摇晃了起来，一个巨大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城堡，到处都是昏倒在地的人。

“正史中记载，他们毫无知觉地躺了两天两夜，他们的恐惧要比宫殿中死去的那100人深得多。”然后，巴雷厄因离开了城堡。

“当他骑马穿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发现树木都倒下了，



粮食已荡然无存，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废弃了，就好像闪电击中了每一个地方一样；并且毫无疑问，闪电虽然没有击遍每一个角落，但是确实击中了许多地方。他发现村庄里面半数以上的人都死去了，其中既有商人也有骑士，他还发现劳动者死在了田野当中。他看到整个里斯特诺伊斯（不列颠）王国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所以后来的人们都把它称之为荒原王国或生地王国，因为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已被废弃并且变得极为陌生，让人无法辨认。”

当然，有关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和中世纪的荒原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全部是和历史无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根据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地点，以及饥荒、腹股沟区域的伤口、瘟疫、人口减少和战争的综合因素，荒原这一概念可能部分地是通过口头或久已失传的文字记录始发的。这反映了从公元6世纪中期至晚期，不列颠西南部确实遭受过饥荒打击、瘟疫折磨、战争摧残、人口剧减的真实情况。



第十五章　英格兰的诞生

辛迪兰的大厅今夜一片黑暗，
没有一点闪耀的灯光，
也没有一张铺好的床。
我哭泣了片刻，然后归于沉寂。

辛迪兰的大厅今夜一片黑暗，
没有火光，也没有烛光，
但上帝会保佑我的。

辛迪兰的大厅。
看到它没屋顶，
也没了火光，
我是多么忧伤。
死去的是我的主人，
依然活着的却是我。

辛迪兰的大厅今夜这般凄凉，
这个当初我曾有幸坐过的地方。
拥有它的男人们都已死去，
女人们也都消失了踪迹。



辛迪兰的大厅，黑暗笼罩了它，
自从英格兰人毁掉了辛迪兰，
毁掉了波维斯的埃尔凡。

一位名字早已湮灭在时间的风尘当中的威尔士诗人，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写下了上面的诗句。跨越了数个世纪的历史，这些诗句仍然在以一种悲剧的力量，讲述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今英格兰的统治的终结。辛迪兰是公元7世纪中期威尔士中部波维斯王国的统治者，他的大厅（皇宫）坐落在罗克斯特城内。正是在这座城市里面，一个世纪之前爆发过瘟疫。

在公元6世纪中期袭击了罗克斯特（以及不列颠西南部其他地区）的瘟疫，以及罗克斯特在公元7世纪中期的衰落这两件事情，乍看起来，好像它们两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可言。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能远离真相的，正是这场瘟疫从根本上摧毁了不列颠的地缘政治。

虽然不列颠人统治下的西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被毁灭掉了，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东部地区却并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时间进入公元7世纪为止，瘟疫并没有进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区域。从本质上来说，公元6世纪的不列颠是一个种族分离之地。据同时代的英国僧侣、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格尔达斯记载，朝圣者们甚至都无法前去拜访位于东部地区的殉教者神殿，原因就是“令人不快的不列颠的分裂”。

总体而言，不列颠人肯定是憎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并且拒绝与他们有较多的接触。甚至在欧洲大陆上的几个作家也被震惊了，因为当不列颠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陆

上相遇的时候，不列颠人顽固地拒绝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进餐，甚至拒绝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睡在同一个屋顶下面。

格尔达斯甚至连低声嘟哝"撒克逊"这个词都不愿意。他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为"邪恶的东部佬"、"长着可怕的爪子的坏蛋"。他将他们描述为"凶恶的撒克逊，人神共愤"。事实上，他本人以及大多数其他东不列颠人都极希望盎格鲁-撒克逊人被消灭干净！

在被分离的不列颠的两"半"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贸易往来。从考古学方面看，实际上，在不列颠西部从不曾发现过制作时间在大约公元570年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物品；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治下的东部地区，也从未曾过发现任何明确属于公元6世纪的西不列颠人生产的产品。好像在不列颠西部地区使用的公元6世纪早期到中期的中世纪陶器当中，从不曾有一件抵达过英国东部地区。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邻近的大陆之间的贸易来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肯特郡（离法兰西相当近），也是直到公元6世纪80年代或者是公元6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与欧洲大陆进行经常性的贸易。实际上，在肯特郡几乎就没有发现过铸造时间在大约公元570年以前的欧洲大陆硬币。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不列颠西部地区却不仅忙着和欧洲大陆作生意，而且还和地中海地区贸易往来频繁。可以肯定的是，不列颠西部地区与法兰西西南部（波热杜克斯等等）以及西班牙之间有直接的船只往来，与非洲北部地区、希腊以及小亚细亚之间，则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船只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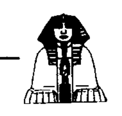
来。在廷坦格尔所发现的葬礼集会风俗方面的证据表明，除了地中海地区的货物之外，地中海地区的人民也到达了此地。西不列颠对瘟疫感染是完全开放的，并且被瘟疫摧毁了。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治下的东不列颠，由于种族仇恨、不列颠人的恐惧以及广袤的森林而与西部完全隔绝的东部，则幸运地逃脱了——至少到公元7世纪之前是逃脱了的。

瘟疫对地缘政治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方面。不列颠西部地区的人口下降了，但在东部却没有下降。在不列颠西部地区，瘟疫曾于公元547年袭来，并且如果瘟疫按其惯常的做法行事的话，它极有可能在公元6世纪50年代再次袭击这一地区。不久之后，盎格鲁－撒克逊族移民就开始向西推进，去填补肯定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人口与政治真空。这样，已经停滞了40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活动又重新开始了。

到公元6世纪60年代，复兴的西进行动差不多可以肯定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有关冲突的记录，甚至在公元6世纪50年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都出现了。公元571年，英格兰中南部地区可能已经落入了撒克逊人手中，而6年以后，格劳色斯特、色伦斯特和巴斯也沦陷了。大约与此同时，撒克逊人推进到了多塞特境内。

其时，在英格兰中部的西南部地区，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希维克塞人，到大约公元580年，正在渗入沃尔斯特郡和格劳色斯特郡北部。到大约公元600年，另外一个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马冈散特人，开始渗入赫里福郡和希洛普郡南部。

填补了人口真空之后，往往就意味着由人口真空所造成



的紧随其后的政治真空也将被填补，这样，人口减少了的地区就会慢慢地被殖民化。这就削弱了传统的不列颠政治权威。在此阶段，在每一个地区，政治现实要“跟上”人口现实，而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力量就将会逐步取代各自为阵的、被削弱了的、并且是孤立无援的不列颠政治力量。

在希洛普郡南部地区，进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大约公元656年，当时，辛迪兰国王被杀，罗克斯特城也最终陷落了。罗克斯特城的诗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名已在时间的风尘中湮灭了的吟游诗人，在他的城市沦陷之后，这样感人肺腑地写道：

> 我的同胞兄弟皆已离去，
> 离开了塞文的土地，
> 就在德维利维河的岸边。
> 可是，我却还在苟延。
> 我是何等的悲哀，
> 我的上帝。

在公元6世纪中期，瘟疫已经动摇了不列颠南部地区的地缘政治现状。虽然不列颠西北地区是否也受到了瘟疫的影响尚不清楚，但是，就算这一地区没有受到影响（就像似乎可能的那样），不列颠西南地区的人口与政治大灾难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动荡，也会对不列颠北部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造成间接的影响。虽然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机理，可能引发了这一切，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南部地区重新开始他们的推进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到公元570年，一个被称之为伯尔尼希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使用武力，宣布自己从软弱的当地不列颠政权下独立了出来。差不多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培克散特人，开始扩张进入了皮克地区。到公元590年，另外一个部落已经攻取了东部的林肯地区以及北部的利兹和哈德尔斯菲尔德地区。到公元595年，地缘政治的平衡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程度，以致最大的一个不列颠王国——位于奔宁山脉北部的雷格德，也分崩离析了。

甚至就连位于最北边的不列颠王国爱丁堡的军事干预，也未能阻止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攻城掠地。公元598年，爱丁堡的救兵在英国古代史上一场最具历史意义的重要战役——约克郡坎特里克之战，被击溃。

一篇诗一般的悼词使此役的英雄们得以永垂不朽：

男人们去了坎特里克，
高喊着冲向战场。
一队战马，
让他们的盔甲与盾牌放出蓝光，
高举起的长矛锋芒闪耀，
盔甲与刀剑在闪闪发亮。
虽然他们遭到杀戮，他们也杀死敌人，
但是并没有人回还家乡。
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是他们亲人的悲痛却那般久长。
他们杀死了七倍于自己的敌人，
多少妇女从此独自寡居，
多少母亲从此泪断肝肠。

饱饮了美酒，
他们披上铠甲，告别而去。
听到他们的死讯，我是何等悲伤。
他们遭到了杀戮，
他们永远无法知道老年时光是什么模样。
明尼达维克军队陷入极大的悲伤，
三百人出征，只有一人回还故乡。

军事干预最后以失败告终，雷格德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敌手。正当罗克斯特的行吟诗人在满怀悲伤地回忆国王被废弃的宫殿的时候，一位北方诗人却很快对雷格德曾一度温暖的皇宫壁炉与大厅的命运进行了一番描述：

壁炉，这个被野花覆盖的壁炉。
当欧文和埃尔芬在世的时候，
有多少战利品在其中燃烧。
壁炉，这个被高高的荆棘覆盖的壁炉。
它曾是那般从容悠闲，
雷格德对给予已经习以为常。
壁炉，这个被酸模草叶覆盖的壁炉。
在它的地板上面常常满是
蜂蜜酒与饮者吐出的秽物。
这个柱子与那边的那个柱子，
就在它的周围，
曾经总是胜利的欢呼与赏赐。

在雷格德瓦解之后的十年之内，古代切斯特落入了伯尔尼希人之手。威尔士第一次被与其他保留下来的凯尔特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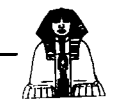


颠领土——科恩沃尔、德弗半岛以及西北部地区，隔离开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尔士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与完整的地理实体，正是从那时诞生的。到公元650年，除了科恩沃尔和德弗仍然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下以外，撒克逊人对今英格兰的攻占实际上已经完全结束。

虽然“英格兰”仍然被分成了十几个不同的王国，但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其中第一个王国（扩大了的伯尔尼希亚-诺塔姆布里亚）以及后来的另外一个王国。居于支配地位的王国的统治者则不仅是他所在国家的国王，同时也是全英格兰的“布里特瓦尔达”（最高统治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英格兰是由公元6世纪的气候危机和瘟疫之后一百年间人口与政治方面的变迁之中分娩出的。从某种确实的角度来说，瘟疫是英格兰的助产士——不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且还包括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

人口真空和政治真空，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凯尔特语从将要成为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的现况中被完全抹去。事实上，仅仅只有10个凯尔特单词从曾是“英格兰的”居民所讲的语言当中转入了英语之中。在法律、政府，甚至在民间传说方面，英格兰都使用了它的日耳曼语，而不是它过去的凯尔特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从未停止过。到公元840年，科恩沃尔已丢失了它统治下的大部分土地，而到公元930年，则完全落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到公元1200年，爱尔兰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已经处于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的控制之下了。到公元1300年，威尔士被攻占。而第一次跨越大陆之间的扩张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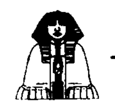


图，则在公元 15 世纪晚期和公元 16 世纪付诸实施。公元 1607 年，英格兰对北美洲的殖民正式启动（弗吉尼亚）。到公元 1624 年和公元 1630 年，对加勒比海地区和对中部美洲的殖民也拉开了序幕。公元 1703 年，苏格兰王国被并入了不列颠国。公元 1801 年，爱尔兰步此后尘。在公元 18 世纪，印度和澳大利亚被占领。而在公元 19 世纪，大英帝国则覆盖了包括新西兰、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许多遍布世界各地的领地在内的广大地域。

现在，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广（除汉语以外），并且地域分布最广的语言。英语文化已经成功地移植北美和澳大利亚，并且与印度、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语言联合体。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从根本上来说，实质也是英国人的一个杰作。

在继公元 6 世纪发生在不列颠的气候与流行病事件之后的若干个世纪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最终改变了世界，并且改变的程度可能要比公元 535 年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当中留下的遗产都要明显得多。

虽然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公元 6 世纪中期至公元 6 世纪晚期的气候紊乱与流行病，还是以差不多类似的方式推动了 3 个重要的西欧国家的诞生。



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情况示意图

图例

日耳曼人（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约公元440年到大约公元510年间占领的土地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约公元550年到大约公元630年间占领的土地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约公元630年到大约公元680年间占领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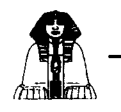
英里

千米

第十六章　地狱挣脱了束缚

武器在奋力向前，人也在奋力向前。
在戴尔·洛太尔的大德利沼泽，
冲突的起因，
令厄尔斯特的克鲁伊廷国王
埃德·布雷克极为懊恼。
全克鲁伊廷范围的战役打响了，
他们纵火烧掉了小王国爱尔尼。
加巴尔·利菲战役打响，
然后是克维尔·德雷姆尼之战，
战争结束之后，人质全被带向西去。
就像是一次人类的大丰收一样，
领主们俘获了福尔格斯、多姆纳尔、爱因米尔
以及多伊的儿子南尼德。
绝妙的行动，
贝坦国王的战马驮着主人。
感到相当满意的是黄头发的贝坦。

《厄尔斯特编年史》用以上的文字，对促进了爱尔兰广



阔地域臣服于一个最高国王统治之下的一系列战役作了描述。

这些始于公元6世纪70年代的战役，标志着长期的、血腥的军事斗争的开端，而正是通过这些军事斗争，逐步为4个世纪之后爱尔兰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其他方面而言，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如果还谈不上诞生的话，那么至少原现代的爱尔兰概念也形成了——特别是在宗教和语言方面。并且，正如发生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几乎可以肯定，正是动摇了地缘政治与文化现状的公元6世纪中期的自然大灾难，为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爱尔兰，公元538年到公元553年这个时段，几乎全部充满了灾难。世界范围的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气候紊乱，在爱尔兰导致了农业歉收与饥荒。正如我们已经在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当中提到过的那样，《厄尔斯特编年史》称，公元538年，发生了“面包匮乏”。

实际上，农业歉收还只不过是全爱尔兰境内极其严重的所有植物生长中断的一个部分，这一点已为公元536年至公元540年的树木年轮记录所证实——这一记录是通过对在爱尔兰泥炭沼所发现的浸足了水的古代橡树树干进行横截取面以及分析研究所得到的。

接下来，在公元6世纪早期或者公元6世纪中期，一场可怕的流行病爆发了。关于这一灾难，爱尔兰编年史方面的资料提供了两个互相冲突的日期。其中之一，中世纪的《克罗尼卡姆·斯科托勒姆》所给出的时间是公元541年，这一日期就暗示流行病（可能是天花或其他与此类似的疾病）是



由公元538年的饥荒所引起的。而可能性更大的日期是由《厄尔斯特编年史》记载的，即公元54[illegible]年。

在那一年当中，法兰西和西班牙都已经被瘟疫感染，并且瘟疫有可能从这些地区当中的任意一个或者甚至是从地中海地区直接传播至爱尔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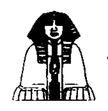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十三章当中已经提到那样，从考古发掘中得知，一些爱尔兰人口中心（都柏林附近的拉夫·辛内以及科尔克附近的皇家要塞加伦），在公元6世纪中期内或其后不久就停止运作了。瘟疫甚至连爱尔兰土地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没有放过。据编年史记载，该国宗教领袖之一莫·比·克拉莱因尼什，就死于瘟疫。

但是，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公元550年，爱尔兰又被第二轮的流行病吞没了——这次几乎可以肯定是瘟疫。被编年史称之为“大灭亡”的瘟疫肯定消灭了相当比例的人口，其中包括为数不多的学者与统治精英分子。

在《厄尔斯特编年史》当中，就记述了5个地区的杰出人物——爱尔兰东北部的班格尔、南部的提培拉利、东部的都柏林地区以及中部与西部的雷因斯特和拉夫·德尔格的高级牧师们，因瘟疫而丧生。仅仅在瘟疫的这一次爆发当中，死亡的牧师总人数就占到了全部高级牧师的20%到30%。

接着，在公元553年，差不多也就是幸存者们还尚未从公元550年瘟疫爆发所造成的惊骇当中完全恢复的时候，第三波的流行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又是瘟疫，爆发了。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瘟疫发作的时期以及瘟疫爆发前的时期都是处于相对和平之中的。在公元555年前的45年间，据爱尔兰编年史的记载，仅仅只发生了11次战争。



但是，在经历了饥荒和瘟疫年份所造成的人口减少之后不久，所有的地狱却好像一下子挣脱了束缚一样。在公元555年之后的45年间，爱尔兰编年史中有据可考的战争达27次——这个数字几乎是前面提到的同样长短的时期内战争总数的2.5倍。实际上，在从公元556年到公元565年的10年间，有不少于8次的战争被记录在册——这个数字几乎是这之前的4个半世纪内已知的平均战争频率的3.3倍。

和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瘟疫影响了爱尔兰的部分地区，且影响的程度较之其他地区而言为深。如果瘟疫按其一般方式发作的话，那么人口较为密集、也往往较为富饶的地区遭到瘟疫破坏的程度，相对于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就要重得多。因此，流行病在富饶的地区与不怎么富饶的地区所造成的人口减少的具体水平是不一样的。这就为居住在不怎么富饶、因而人口也不怎么稠密的地区的不怎么富裕的军事首领们，在瘟疫过后进行扩张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特别是那些远离大陆、地处偏僻之地。

而上面所提到的似乎正是真实发生了的一切。因为在流行病过去之后折磨爱尔兰的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贫瘠的爱尔兰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家族——厄内尔——的崛起与对权力的问鼎。

在瘟疫发生之前，厄内尔家族曾是当地军事首领，虽然他们在瘟疫临近结束的10年内，占领了厄尔斯特中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以及梅特的大块土地，但是，在厄尔斯特·康纳科特边境的斯利果地区以外，并没有人对他们有所了解。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诗人，曾记述了公元6世纪50年代时，他们在厄尔斯特以及爱尔兰中部地区所取得的胜利。



《厄尔斯特编年史》中所说的，“感到相当满意的”是“黄头发的贝坦”，指的就是沉浸在征服的喜悦之中的厄内尔国王。

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战争，全部都是厄内尔的冲突。通常情况下，在这些战争当中，雷因斯特人、梅特人或者厄尔斯特人总是试图击退或摆脱不停扩张的厄内尔。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是一个厄内尔时代，在这一时期之内，这个发源于边远的西北地区的家族，逐步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其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

正是这种带霸权性质的松散的统一，为公元9世纪到公元11世纪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王国的慢慢出现铺平了道路。这样，追根溯源的话，厄内尔家族统治之下的爱尔兰就是现代爱尔兰民族国家的政治祖先。同发生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瘟疫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助产士。

但是，大饥荒和大瘟疫不仅仅只在政治方面铸造了爱尔兰的特色和性质。在宗教方面，饥荒和瘟疫的经历看起来也有一定影响。爱尔兰第一批真正重要的教堂和修道院就是在瘟疫发作期间和瘟疫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其中有4所在不同的爱尔兰编年史当中有所提及：德利修道院（建于公元546年）、科龙马克诺伊斯修道院（建于公元543年至公元548年）、班格尔修道院（建于公元557年）以及科龙菲尔特修道院（建于公元562年）。虽然爱尔兰贵族正式成为基督徒已有两三代人的时间了，并且也一定已经有一些小教堂的存在，但是，瘟疫发作期间和瘟疫过后不久所建立起来的教堂才首次在编年史中有所记述。

大饥荒和3次瘟疫流行的经历，似乎使得人们愈加渴盼神力的干预。传统的督伊德教的神灵与流行的异教神灵，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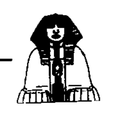
没有能有效地抵御饥饿、疾病以及死亡。人们一定非常盼望能够获得一种更加有效的神灵的保护，并且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的希望。

主要的教堂和修道院，由于它们是由统治集团的成员掌管的，因此在政治方面也有重要的地位。假如统治者们——通常是厄内尔人，能够通过教会的作用使得神和人都站在自己一边的话，那么至关重要的政治与宗教目的也就得以实现了。

渐渐地，教会的扩张与政治的扩张开始齐头并进了。在厄内尔战士攻取敌人的领地与王国的同时，厄内尔的牧师们也开始接收敌人的教堂与修道院了。但是，瘟疫本身在宗教方面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建教堂现象的影响，在于将大量的人口变成了基督徒，而且人数之众是以前从未达到过的。由于基督教不仅仅拯救了受苦者，而且还支援了厄内尔统治集团的出现，因此，残留的督伊德教的影响就在藤蔓上枯萎了。

公元6世纪中期的大灾难，还迫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泛地发生了改变。由于战争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通病（紧随其后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动摇），所以安全水平似乎也普遍下降了。

从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甚至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开始在他们相对粗陋的家园外面修建防护设施。在典型情况下，他们会环绕他们的农庄修筑起石头的壁垒或者是土木工事，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多事之时保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牲畜。在战争日益频繁的同时，强盗团伙和远离此地的一些小规模的军队也开始更为频繁地进行盗窃。在公元6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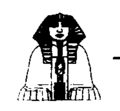
中期到公元9世纪的这段时间内，据估计总共大约有七万处农庄防御围栏（今天的考古学家称之为环形堡垒）建成，其中有4.5万处的残垣保存至今。

在瘟疫引发了地缘政治的动荡之后，继之而起的混乱无序的状态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只限于激发了人们对安全的担忧，同时也在推动爱尔兰特有的语言与文化的形成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公元6世纪的大灾难，在爱尔兰的语言当中引发了巨大的改变。现代爱尔兰语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存在于公元6世纪晚期的凯尔特语的发展版本。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大饥荒和瘟疫大流行之前，爱尔兰人所讲的是一种通用凯尔特语(不列颠诸岛上现存的所有凯尔特语的祖先)。此后，在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语言发生了一次非常快速的“塌方”。在一个被语言学家称之为“尾略”的过程当中，许多单词的词尾都被取消掉了；而在一个被语言学家称之为“中略”的、与之平等的过程当中，许多单词中间的音节也被省略了。这样，大约总共有33%的单词被缩短了。此外，单词的发音方法也发生了改变。一种新的重读规则发展了起来，或者说更为广大的人都接受了这一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单词的开始都有非常强的重音，而非词首的长元音则被缩短了。

语言学家通过运用对已知的语言演变机制的理解，对现存的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碑铭和书籍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如上的推论。

事实上，由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灾难造成了人口平衡方



面的改变，所以经瘟疫之手，整个语言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

旧有的建制，由于它的基础存在于人口较为稠密的爱尔兰南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差不多完全绝灭了。由于外围的地方军事力量利用了这一人口剧减的机会，所以外围的新的口音也就随之填补了语言真空。此外，人数本就不多的具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阶层，极有可能在大灾难当中变得所剩无几，因此，就可能会出现部分抄写员的中断，而在此之后，新的抄写员们则更加容易受到非传统的语言的影响。同时，甚至就连爱尔兰诗歌的种类也发生了改变。爱尔兰传统的长行格律被基于拉丁基督教赞美诗的格律取而代之。

在灾难与说不清的痛苦当中，原现代的爱尔兰与它的语言、大众宗教以及其文化的某些方面一起成型了。但是，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瘟疫，同时也迫使西欧大陆发生了改变。



第十七章　假先知

“当瘟疫最终开始肆虐的时候，在整个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丧失生命，到处都是尸体，数目之众，根本就不可能一一清点。由于棺材和墓碑都极其缺乏，所以一个墓穴当中往往埋了 10 具甚至更多的尸体。在一个星期天，仅仅就在一座教堂内，合计就有 300 具尸体。死亡来得非常迅速。患者先是在其腹股沟或者是腋窝出现一个就像是被蛇咬了的外伤伤口，然后患者在两三天内就会因感染而死去。”

上述文字见诸于《法兰西史》中，作者是公元 6 世纪伟大的高卢－罗马主教、历史学家，图尔的格雷戈里。他用上面的文字，描述了腹股沟腺炎在法兰西中部的克雷蒙特所造成的破坏情况。

在格雷戈里生活的那个世纪当中，瘟疫毁灭今法国的部分地区至少达 4 次：公元 543 年至公元 544 年，公元 571 年至公元 572 年，公元 581 年至公元 584 年以及公元 588 年至公元 590 年。正如瘟疫在帮助塑造英国的未来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一样，它对后来的法国历史的性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公元前 1 世纪和公元前 2 世纪期间，高卢（今法国的旧称）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随着世纪的变迁，罗马的文



化与罗马的语言在高卢也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了，但是在公元 3 世纪中期，日耳曼民族——其中包括一个叫作法兰克的民族，攻进了高卢纵深地带。几十年后，他们被击退了，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法兰克侵略者们再次发动了进攻，而且这一次，再也无法打退他们了。他们获准在高卢 - 罗马领地上属于今比利时的地区，作为罗马的联盟国存在。

接着，公元 5 世纪，由于罗马帝国西部在大量的日耳曼侵略者的压力之下开始瓦解，所以法兰克人趁机占领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到公元 507 年，法兰克人已经控制了除布里丹尼、伯冈迪以及远南（包括普罗旺斯）之外的今法国全境。到公元 537 年，伯冈迪和普罗旺斯也落入了法兰克人之手。法兰克人不仅准备开始建立一个帝国，而且还自视为是罗马帝国在西方的继承人。

他们采用了罗马的法律与语言、罗马式的统治准则与宫庭礼仪、罗马的天主教以及罗马的头衔。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却令人惊讶地没有沿袭罗马的先例。法兰克人没有将他们自己的大本营扎在当年罗马政权所在的法国南半部。罗马人在阿尔兹和莱昂斯的宫殿全部被弃置不用，至少法兰克人的君王没有利用这些罗马人的宫殿。

法兰克人除了在政权中心的地理位置的选择方面没有遵循旧例以外，在其他所有可能的方面都照搬了罗马人的旧制，这一点不仅仅在法国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法兰克皇室没有选择法国南部的那些古代的皇权中心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呢？从公元 537 年开始，他们就有机会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没有利用机会。就这方面而



言，法兰克人与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颇为不同，因为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以及非洲北部的汪达尔人，都将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建在了他们各自领地上的古代皇权中心所在地上。

原因在于此：当法兰克人有机会在南部建立自己的中心的时候（公元6世纪中期），南部所有的主要城市正在经历最严重的衰落——在瘟疫的手上。所有已知的曾遭受瘟疫打击的城市当中，除了一个城市以外，其他所有城市都位于高卢中部地区或南部地区。

瘟疫对高卢全境所造成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看来，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南部地区遭受瘟疫打击的程度要远胜于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北部地区。这样（正如发生在不列颠的情况一样），就产生了政治与经济的重新排序，在这一过程当中，曾经一度作为辉煌、富庶的皇权中心的南部地区，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失去了吸引力：财政方面、人口资源方面、贸易方面以及健康方面。

如果法兰克人早半个世纪攻占法国南半部地区的话，他们也可能就在南部安营扎寨了，就像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沿用了托莱多，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沿用了拉文纳（公元493年），以及今突尼斯的汪达尔人沿用了迦太基（公元442年）一样。但是，在瘟疫开始毁灭南部城市的生命与经济的时候，法兰克人开始向高卢南部扩张才不过几年时间而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高卢-罗马皇冠上的南部宝石就不再熠熠生辉了。

公元543年，阿尔兹城（肯定还包括其他的南部城市）遭到了屠戮。在公元6世纪50年代或公元6世纪60年代，



瘟疫可能再次席卷了南部地区（就像它在地中海其他地区复发一样），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记录保存下来。公元 571 年，瘟疫再次回过头来毁坏了克勒蒙特和奥文格尼、莱昂、保尔格、蒂绒以及沙伦－苏尔－萨翁。接着，在公元 581 年到公元 584 年，瘟疫横扫了纳尔波尼、阿尔比、南特斯以及其他尚未命名的地区；而在公元 588 年到公元 590 年间，瘟疫则席卷了马尔色勒、阿维贡以及北至莱昂地区的绒内山谷。

当然，瘟疫不仅仅侵袭了高卢，同时也侵袭了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其他领地。整个地区的贸易都衰退了，到了公元 6 世纪末，能够从南部港口榨取到的税费已经减少到了让法兰克行政当局不再有任何兴趣的地步。贸易减少了，人口减少了，财富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也便自然从前高卢－罗马南部地区的权力龙椅上消失了。瘟疫的打击确实使得南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不再像以前那般重要了，与此同时，北部却日益强盛了起来。

回想起来，法兰克国王们留在高卢北部的决定无疑是关系重大的。这个决定确保巴黎盆地成为了即将诞生的法兰西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且这个决定也可能确保了法兰克人治下的“原法国”发展成为今日的法国。

一个以阿尔兹或者莱昂为大本营的国家，渐渐就会失去保持其对北方的控制的兴趣，正如这一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因为来自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的潜在侵略势力的原因而成为了边缘地区一样。相较而言，也许北部要想控制住南部（其侧翼是地中海，而没有直接接壤的对手）要比南部要想控制住北部容易。

此外，北部——巴黎盆地，作为原法国的政治中心出



现，在鼓励北海海峡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商业经济的发展则推动了荷兰、英格兰以及法兰西作为大西洋强国而非地中海强国崛起。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在全球都具有了一定的前景，而非仅仅限于地中海。

但是，瘟疫同时也造成了其他一些地缘政治色彩不怎么浓厚的后果。瘟疫在杀死不计其数的人口并且毁灭无数生灵的同时，也使得宗教的关键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城市面对着大规模的死亡，在瘟疫所带来的大量现象的煽动下，一种新的大众对圣歌的应唱又日渐兴盛了起来。祈祷与朝圣不再仅仅只是个体的事情了，城市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朝圣。朝圣成为了一种集体的活动，在信仰与祈祷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活动。

这些活动——成千上万的市民将会在绝望当中走上数英里的活动，人们称之为祷告。这一概念最早是在公元5世纪晚期高卢南部的维也内“发明”出来的，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对付一次地震时获得神的帮助。此后，祷告的形式得到了改进，并在公元6世纪中期和公元6世纪晚期广为流传，因为所有的市民都想要击退连续肆虐的瘟疫。最终，祷告的传统开始向法兰西帝国疆界之外传播，并逐步在整个欧洲西部都变得流行起来。

在瘟疫折磨的气氛充斥四野的公元6世纪的法兰西，另外两种宗教现象也占领了相当的阵地。至少从公元581年到公元584年的那一次瘟疫爆发开始，反闪米特主义在官方有所增加。公元582年，法兰西国王下令对大批犹太人强行施行浸礼。

公元587年及公元590年，据图尔的格雷戈里在其《法



兰西史》当中的记载，出现了假先知、假圣徒甚至是假救世主。据他的记载，在瘟疫袭击马尔色勒的时候，一个来自法兰西中部的男子，披着兽皮，向南而去。及至此人到达阿尔兹后，就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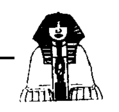
“大群人聚拢来看他，并告诉他自己的病痛。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以此使他们恢复健康。围在他身边的人们给了他衣物以及金银礼物。别人给他的所有东西，他都转手给了穷人。他会躺在地上，一刻不停地念着祈祷词。然后站起来，叫围在他身边的人们再次礼拜他。

“他预测未来，宣称有些人会生病，有些人会遭受痛苦的折磨，只有少部分人才会有好运。许多人被他骗了，其中不仅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包括优秀的教士。他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有三千多人跟随。接下来，他开始对在路上碰到的人强取豪夺，对贫困者则以其抢掠所获相赠。

“他草拟了一条作战方针，并准备进攻当时的戴奥克斯主教欧雷留斯。他派了一些赤身裸体并且蹦来跳去的人作他的信使，前去宣告他的驾临。

“主教非常气愤。他挑选出他最强壮的仆人们，并命令他们去打探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派出去的这群仆人当中的头领，假装弯腰去亲吻这个人的膝盖，然后趁机将他紧紧抱住。头领命令其他人把那个家伙抓住，并剥掉了他的衣服。接着，那个头领抽出剑来，将他砍倒在站立的地方。这样，这个‘救世主’，准确地说应该叫他做‘反救世主’，就这样倒下死去了。”

当然，在公元6世纪对法兰西造成了如此严重影响的腹



股沟腺炎（瘟疫），归根结底，最初是由公元6世纪30年代气候对非洲东部的野生啮齿动物生态系统的破坏所引起的。但是，公元6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问题，同时也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法兰西历史。公元536年，在气候紊乱折磨着全世界的时候，怪异的天气现象也成功地阻止了一场战争，并且极有可能改变了法兰西历史的进程。

当时，法兰克人世界被分成3个王国，这3个王国的统治者——两个兄弟和一个侄子，对其他两者的感觉都是如鲠在喉。巴黎国王希尔德贝特和梅斯国王特德贝特打算进攻苏瓦松国王洛塔。由于正是通过洛塔的努力，全法兰克（梅罗文加）王朝在公元6世纪之后得以继续繁荣昌盛，所以假如洛塔在战争中战死的话，法兰克历史以及其后的法国历史就可能会永远地改变了。从而就不会有卡洛林王朝、查里曼帝国，也就不会有中世纪的或者是现代的法兰西国家了。

但是，这次进攻行动虽然计划周详，却并没有付诸实施。大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巨大的冰雹阻止了这场战争的发生。图尔的格雷戈里对此亦有记述：

“希尔德贝特和特德贝特集结了一支军队并准备前去攻打洛塔。他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意识到凭自己的实力是无法抵御住他们的联合进攻的。

“洛塔去了森林，他在树木之间修建了巨大的环形路障，并将自己的希望寄于上帝的怜悯。克洛西尔德王后（那两个国王的母亲）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她去了图尔的圣马丁墓，跪下祈愿，并祷告了整整一夜，希望内战不要爆发。

“希尔德贝特和特德贝特挥军直进，包围了洛塔的阵地，并且计划好在早晨消灭洛塔。天色破晓之时，一场猛烈的暴



风雨席卷了他们扎营的地方。他们的帐篷被掀翻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七零八落，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个儿。电闪雷鸣，他们遭到了冰雹的猛烈轰击。

“他们面朝下地倒在了冰雹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的地上，遭到了不断从天空中砸下的冰雹的痛击。除了盾牌以外，他们再也没有任何防护器具了，而且他们还害怕自己会被雷电击中。他们的战马四散奔逃。两位国王倒在地上的时候，遭到了冰雹的击杀。

“他们向上帝忏悔，乞求他能宽恕他们进攻自己的近邻兼一脉血亲的罪过。所有的人都相信这等奇事是因了皇后的祷告而由圣马丁降下的。”

这个故事乍看之下似乎颇为奇异，但是，在不列颠和中国，确有在此时间上天降下巨大冰雹的记载，并且全部都与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低迷有关。

可以肯定，假如希尔德贝特和特德贝特成功地消灭了洛塔的话，由于没有理所当然的继承者，随后而来的一定是将持续一代人时间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法兰克帝国则可能要么分崩离析，要么被其境内的勃艮第人夺取。而无论是前面两种情况当中的哪一种成为了事实，毫无疑问，法兰西历史都会全然不同。这样说来，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危机除了通过瘟疫的作用以外，还可能也通过了冰雹的作用来改变法兰西的历史。



第十八章　阿里乌斯教的末日

对于西班牙，以及相当多的其他国家来说，公元6世纪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班牙正是在那时诞生的。

西班牙曾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大海外省，并且在长达六百多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时间里面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公元5世纪当中，罗马帝国渐渐失去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

传奇开始于公元375年，当时，一个叫做西哥特的部落联邦（居于今罗马尼亚南部地区），受到了一个亚洲民族匈奴人的威胁。西哥特人请求并获准进入了罗马帝国境内。他们获准在巴尔干地区定居，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因他们与其罗马主人的战争而终结了。公元410年，他们攻占并洗劫了罗马帝国。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在两年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盟友，并受命征服其他在公元406年进攻罗马帝国，且已挥戈横越法兰西、占领西班牙大部的日耳曼族野蛮人。

西哥特人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并且得到了奖赏——高卢西南部的土地。但是，在西班牙的日耳曼族野蛮人很快又重新组织了起来，因此，公元455年，罗马帝国要



求西哥特人再次进行干预。野蛮人再次被打败。但是，公元468年，罗马帝国改变了倾向，并与他们曾要求西哥特人予以征服的一个野蛮人集团形成了同盟。

西哥特人对罗马人这种背信弃义的作法的回答，是占领了大片罗马帝国的正式领地，从而于公元475年形成了半个高卢（法兰西）帝国——包括他们自己原有的领地，以及西班牙的3/4的领地。由于与此同时，日耳曼民族也在意大利进行了攻城掠地的行动，所以在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在欧洲西部地区崩塌了，而意大利则像西班牙一样，到公元493年，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哥特王国。

由此，大约从公元457年开始，西哥特人成为了西班牙境内的主要政治势力。公元507年，他们失掉了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大部分领地，所以从那时起，他们的王国所辖就主要限于伊比利亚半岛之内了。

谁是西哥特人？

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叫做哥特人的日耳曼民族原本（在公元前1世纪之内或之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但是，罗马方面的资料则显示，到公元1世纪，他们已在维斯瓦河河口附近，沿波罗的海东南海岸定居了下来。但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的后半叶里，他们越过欧洲东部，迁居到了黑海北部和西北部海岸。并且，他们将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进攻罗马帝国的达锡亚省（今罗马尼亚）的出发基地。

在公元3世纪70年代，哥特人迫使罗马帝国放弃了达锡亚省，该地区转而归于哥特人统治之下。这些哥特族人侵



者渐渐开始以“骁勇的哥特人”（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叫西哥特人）而为世人所知，而在更北方的哥特人则被人们称之为“北哥特人”（北方的哥特人）。

基督教最早是在公元3世纪中期，由西哥特人在侵略罗马帝国辖下的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时所俘获的基督徒战俘们介绍到一小部分西哥特人当中的。

仅仅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在公元376年，西哥特人获准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今塞尔维亚定居。在那里，他们在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了哥特语的、叫做乌尔菲拉斯的哥特裔牧师的带领下，皈依了基督教（作为获准进入罗马帝国的一个条件）。但是，乌尔菲拉斯信奉的是一种非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即人所周知的温和的阿里乌斯教——一种曾在公元376年得到皇室支持，但是在公元381年的一次宗教理事会后失去了支持并且变成了异端邪说的宗教信仰。

虽然也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是阿里乌斯教派的神学与天主教教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天主教称，耶稣基督和上帝都是同一个神的显灵，虽然耶稣基督和上帝是不同的、独特的“人”，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相反，阿里乌斯派认为这二者间的本质也极不相同。他们认为虽然上帝是永恒的，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永恒的，他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件事物而已。温和的阿里乌斯教称耶稣基督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但并不是和圣父一样的神。激进派的阿里乌斯教则更进一步，称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任何神力，虽然他对人类而言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也仅仅只是一个上帝的创造物。

天主教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破坏了基督教的中心理念，即耶稣基督能够从永恒的诅咒中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如果



耶稣基督不是神的话，那么他是否真具有这种能力就值得怀疑了。正是这－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后的西哥特－西班牙的历史。

西哥特人的瓦解

瘟疫最早出现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是在公元542年，并对这块土地造成了至少两种主要影响。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瘟疫在西班牙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破坏。同时，瘟疫可能也有力地颠倒了西哥特统治阶级与其治下的罗马－西班牙臣民之间的力量平衡。

瘟疫通过杀死纳税者以及同样难逃厄运的征税者，导致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瘟疫在杀死大量普通人的同时，并没有对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方面的重要人物们另眼相看。在历史上，一旦在统治者高层出现反常的大量空缺，其结果通常都导致同样大规模的竞争，并且往往是以极端暴力的行为来填补所出现的空缺。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因瘟疫的破坏作用而被颠倒了过来。瘟疫爆发之前，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人口大约为400万，其中仅有30万是西哥特人。因此，人口减少对于占人口多数的罗马－西班牙人而言，承受起来还是相当轻松的，但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占人口少数的西哥特人来说，那可就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在瘟疫爆发之后不久的数年间，西班牙完全陷入了混乱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以上那些因素的综合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整个公元6世纪和公元7世纪，仅有4位西



哥特国王遭到刺杀，但是这4次刺杀事件中的3起就发生在瘟疫爆发后的12年之内。公元548年，特迪斯国王在托莱多的皇宫遇刺身亡。公元549年，特迪希塞尔国王在塞维利亚的一次宴会上于欢饮之时被刺。而他的继任者，阿希拉国王则于公元555年被自己的军队杀死。可以肯定地说，在公元6世纪中期，作一个西哥特国王可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

瘟疫的第一次爆发及其直接后果（大约是公元542年至公元552年），还导致了政治上的瓦解。可以肯定的是，科多巴城内的罗马-西班牙人，可能是在当地参议院的带领下，在公元550年或者是略早于公元550年，揭竿起义，反对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国家。阿希拉国王试图镇压此次起义，但结果却是遭到了惨败，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失去了皇室的珍宝，还失去了他的大部分军队。

有关其他的城市起义——奥伦塞起义、阿斯图利亚斯起义、科多巴起义以及康塔布里亚起义（全部都位于北部地区）的情况，虽然历史资料只对它们在20年后最终结束时有所提及，但是，这些起义可能也是与科多巴起义同时爆发的。

公元6世纪当中，一次颇有些不同意味的起义发生在公元551年。当时，一个名叫亚太纳希尔德的西哥特贵族趁皇室衰微，占领了塞维利亚并企图问鼎阿希拉国王的王位。

而在当时控制着地中海地区大部、并已在公元534年夺取了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边的塞乌塔的罗马皇室，也在耐心等待时机重新征服西班牙，重新征服这块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对其统治权达80年之久的土地。

公元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混乱状态，尤其是亚太纳希尔



德的叛乱，给了罗马人等待已久的机会。公元551年晚些时候，反叛的西哥特人请求罗马皇帝查尔丁尼一世施以援手。远在1800英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立刻就作出了回应。大约公元552年6月左右，一支罗马军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登陆。接下来，在当年夏天的塞维利亚之战中，罗马帝国与反叛者的联军打败了阿希拉国王的军队，迫使后者撤退。

在这个阶段，罗马帝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只是亚太纳希尔德的盟友，但是，在西班牙建立起了桥头堡以后，他们就不再满足于长期充当一个野蛮的反叛者的副手了。这样，在公元555年，罗马人发动了对西班牙的又一次侵略。在这一次侵略当中，罗马人直接从现在已是势单力薄的阿希拉国王手中夺取了海岸大城市卡塔赫纳。此次进攻肯定是一次突袭，并且它带给亚太纳希尔德的惊慌丝毫不比带给阿希拉的少。

对亚太纳希尔德而言，罗马人的此次进攻行动，意味着罗马人从盟友变成了争夺对西班牙的控制权的对手。而对阿希拉而言，此次进攻就意味着丧钟敲响了。卡塔赫纳失守令阿希纳完全陷入了耻辱之中。

这样，在公元555年3月，西班牙历史发生了重大变故。反叛的亚太纳希尔德否认了自己与罗马人的盟友关系，而阿希拉国王则在梅里达的皇宫里被自己人杀死。接着，这些杀死了阿希拉国王的人进而拥戴他们的敌人，反叛的亚太纳希尔德为王。

现在，统一起来的西哥特军队至少能够阻挡住罗马人的推进了。但是，在接下来的70年里面，他们却没并有能力



将罗马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

罗马的作用

罗马占领的西班牙成为了一个复活的，几乎可以说是再生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现代为大众所知的罗马帝国系统在公元 5 世纪的时候，至少在西方已经是不存在了。大多数人对罗马帝国的终结的印象，总是让他们首先想到发生在不列颠的情况（即公元 410 年，罗马帝国从其不列颠各省撤退），再继之以被不朽的吉本作了生动描述的发生在罗马的情况（即永恒之城被哥特人攻破）。

但是，在公元 6 世纪的第二个 25 年的时间里，当时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实施了一项非凡的计划——重新征服西方。他的策略大体上来说就是要见机行事，也就是说，要在他发现了对手的弱点以及他获得了机会的时候攻城掠地。

事实上，西班牙远南地区之所以会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新征服计划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查士丁尼一世发现了对手的弱点（公元 6 世纪中期的西班牙一片混乱），并抓住了机遇——亚太纳西尔德的反叛。

查士丁尼一世不仅仅为罗马帝国重新夺回了西班牙南部地区，而且还重新攻占了非洲北部地区、意大利、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岛屿（撒丁岛、科西嘉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以及今天通常叫作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地区。在 35 年的时间里，他把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展了 50%，罗马帝国再一次横跨了从波斯直至大西洋的广大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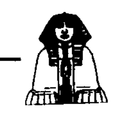


虽然四处扩张的罗马帝国在公元625年失去了其对西班牙的控制权，但是，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6世纪所发起的重新征服西方的行动，却一直持续到了4个多世纪之后，直到诺曼第人在公元1050年攻占意大利南部地区方才宣告了这一行动的终结。

罗马人重新统治了西班牙南部地区，这样，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就站在了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大门前（或者，实际上应该说是已经进入了前厅一半的地方！）。罗马帝国的这个新省的总督被授予了“西班牙士兵的主人”头衔，并且他还有直接向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报告的特权。但是，有保存至今的文字资料证明，教皇对罗马帝国所委任的西班牙总督也有一定的非官方的影响。

由于罗马帝国的这一省份（通常叫作西班尼亚）占据着大约700英里左右的海岸线，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它也同时控制了西哥特人贸易中的相当部分。西班尼亚对其后的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意义往往被人低估。现存的资料却非常有力地证明，西班尼亚对西哥特－西班牙有着直接以及间接的影响。西班尼亚趋向于作为一块政治与文化磁铁，改变伊比利亚半岛上其他事件的方向。

一连串的这种改变对于改变，西哥特世界的力量平衡，是具有累积的影响力的。虽然尚无这二者间一定有任何直接关联的结论性证据，但是，罗马人的影响所造成的第一个可能的后果，从更广大的政治舞台而言，是西哥特的敌人、地处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苏伊维王国决定弃阿里乌斯教而改信天主教。此次宗教皈依的行动发生在公元6世纪50年代，而实际上正是在这一时间内，或者是在这一时间之后不久，



罗马的干预以及随后对西哥特－西班牙的侵略爆发了。

西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斯教，而罗马帝国自然是坚定的天主教国度。因此，苏伊维人在西哥特王国被一个天主教国家搅得寝食难安的时候皈依天主教，自然会被西哥特人视作是一种敌对的亲罗马帝国的行为。接下来，当然就是罗马帝国的干预最终使得阿希拉国王撒手人寰，而阿希拉国王可能是所有的西哥特君王当中最反对天主教的。当年正是他发布禁令，一道长达35年的禁令，禁止了天主教理事会。

从表面上看来，取代阿希拉的是另外一个阿里乌斯教徒，但是，须知正是这个阿里乌斯教徒，在罗马帝国干预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之前，曾经准备要和一个天主教帝国结盟，以反对其信仰阿里乌斯教的国王。

此后，在公元550年内或之后不久，在科多巴又爆发了本土的罗马－西班牙人反对西哥特人的起义。如果罗马帝国没有在公元6世纪50年代或者公元6世纪60年代占领西班牙南部地区的话，这次起义很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实际上，科多巴反叛国家成为了夹在罗马帝国与西哥特领土之间的一块相当大的、独立的天主教飞地。可以肯定的是，这块飞地与信仰天主教的罗马帝国之间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而且，正是罗马势力的存在使得其独立的时间延长了许多。

罗马－西哥特边境是一片开阔地带。老百姓、商人、神职人员以及其他人都可以在边境地区通行无阻。因此，毫无疑问地，相当数量的罗马社团在被占领地上的存在带来了当地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往来的大量增加，并且这种增加不仅仅限于西班尼亚省，还波及了西哥特人治下的西班牙本身（取道西班尼亚省的两个重要港口，马拉加与卡塔赫纳）。



上述历史事实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公元6世纪晚期，哥特式的服装开始消失不见了。同时，西哥特人受地中海东部地区（即东罗马帝国）的都市化思想影响也很大。

公元578年和公元580年，西哥特国王莱奥维希尔德成为了欧洲惟一的一个开始修建新城市的日耳曼族统治者，而且，虽然肯定新城当中居住的都是西哥特人，但是他却决定给这些城市取一些希腊语的或者是拉丁语的名字。他所修建的第一座城市是为了祝贺他最小的儿子雷卡雷德的诞生，他将此城命名为雷卡堡利斯（希腊语，“雷卡雷德之城”的意思）。莱奥维希尔德之所以如此命名，差不多明显是模仿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利斯（君士坦丁堡）之名的由来——君士坦丁堡是按其建立者君士坦丁皇帝的名字命名的。

公元581年，莱奥维希尔德国王建立起了他的第二座新城市，并再次为之取了一个罗马式的名字——维克托利亚卡姆（拉丁语，“胜利”的意思）。大约也就在与此同时的时间，莱奥维希尔德开始在其托莱多皇宫采用东罗马帝国的宫庭礼仪。

但是，到目前为止，罗马帝国的西班尼亚省对西哥特人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最大影响的，还是它参与了爆发于公元580年的第二次反对西哥特君主政体的起义。此次起义不仅对其后的西班牙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我个人认为，也是最大的悲剧之一。当然，这后一点尚待论证。

故事要从公元578年讲起，当时，莱奥维希尔德决定让他的长子埃梅内希尔德娶法兰克统治者西日贝的女儿为妻。法兰克人信奉天主教，但是，莱奥维希尔德大概希望西日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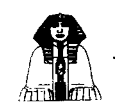
的女儿，一位名叫因贡迪斯的公主，能够皈依阿里乌斯教。他认为，毕竟所有下嫁法兰克皇室的西哥特公主从来都是皈依了法兰克人所信奉的天主教的。

但是，因贡迪斯这位刚刚 12 岁、并且被寄希望为有相当可塑性的法兰克公主，在抵达西哥特首都托莱多时，却拒绝皈依阿里乌斯教。由于皇室之间联姻的缘故，莱奥维希尔德的第二个妻子戈伊苏图塔是因贡迪斯公主的姑母。但是她却并未能给予年轻的公主以任何姑母般的关爱或是耐心，而且，她也未能通过使用任何非常规的说服方法，向公主说明阿里乌斯教的正确性。

戈伊苏图塔开始扯小姑娘的头发，继而是把她推倒在地，用脚踢到她流血为止。但是，这个冥顽不化的 12 岁小姑娘仍然不顺从，于是，戈伊苏图塔把她拖到外面，剥去她的衣服并且把她扔进了鱼塘。然而，即便如此，这位公主依然不为所动。

不管是部分地因为上面这些可怕的对峙，还是因为其他完全与此不同的原因，总之莱奥维希尔德国王决定让埃梅内希尔德主管贝提卡省。该省与罗马帝国所占的西班牙南部地区接壤，是具有关键性的战略地位的地区。根据这一命令，埃梅内希尔德和他年轻的妻子离开了托莱多，前往贝提卡省的主要城市塞维利亚定居。

但是，一旦到了塞维利亚，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年轻的公主与一位叫作莱安德的天主教高级僧侣（当地主教的兄弟）联合了起来，他们一起劝说她的丈夫放弃阿里乌斯教而改信天主教。不寻常的是，他们成功了。身为王位继承人的长子埃梅内希尔德，竟然公然采取这种违背其父意愿的行



动，其实质就是对西哥特君主体制的一种直接挑战。

从传统上来说，西哥特人通过他们的宗教（阿里乌斯教）以及他们的语言（哥特语）来达成他们的民族认同，而其属民——本土罗马-西班牙人，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天主教与拉丁语）来进行民族认同的。实际上，西哥特人治下的西班牙是一个拥有两个民族的国家。而且，该国事实上甚至拥有两套法律系统：一套适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西哥特-西班牙人，而另一套则适用于本土的罗马-西班牙人。这两个民族间的通婚则被认为是非法的。虽然西哥特人的属民罗马-西班牙人，并没有受到压迫，生活得也相对较为自由，甚至还控制着（在市政层次）大多数的城镇，但是，以上提出到的那些做法却含有种族隔离的意味。

不论埃梅内希尔德王子的本意是否真的倾向于此，但是，他皈依了天主教，因此也就对整个西哥特政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莱奥维希尔德国王拼命地想要挽回残局，他试图和自己犯了错误的儿子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但是，这位王子甚至连讨论一下这件事情都不愿意。与此相悖的是，王子派莱安德前往君士坦丁堡，向罗马皇帝求援。接着，埃梅内希尔德王子开始自称国王（这个国王前面的地理名词是什么尚不清楚，推论起来的话，可能仅仅是贝提卡国王），并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埃梅内希尔德控制了西哥特-西班牙5个省府中的两个，即塞维利与梅里达，并与罗马帝国以及苏伊维王国结盟。同时，居住在贝提卡的好几千西哥特人也步他们首领的后尘，皈依了天主教。

其实，埃梅内希尔德最初对皈依天主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且，如果他的贝提卡省没有与罗马帝国的领地及其强



大的军事力量毗邻的话，他也不会采取如此之冒险的行动。

实际上，他实施了他认为是可靠的保险政策：与罗马帝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在该条约当中，罗马帝国承诺，一旦埃梅内希尔德需要，罗马军队将提供帮助。有了罗马帝国撑腰，埃梅内希尔德的天主教小国开始“强迫”信奉阿里乌斯教的莱奥维希尔德国王做出重大的宗教转变。

埃梅内希尔德针对其父的宣传，在内容上宗教色彩极其浓厚。他宣称，莱奥维希尔德国王之所以会迫害自己的亲生儿子，纯粹是站在了宗教的立场上，不过是一种意在迎合罗马－西班牙人或新近皈依的西哥特人，或者说，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在教皇影响之下的罗马帝国的西班尼亚省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

这样一来，如果莱奥维希德国王想要堵住他儿子的嘴，从而制止他纠集反叛部队，国王就不得不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装得非常宽宏大量。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之下，莱奥维希德国王在公元 582 年实施了两个关键的行动，与此同时，他开始做讨伐埃梅内希尔德的准备。

首先，国王宣布从此以后，他准备前往天主教殉教者神堂参拜，而且，他甚至偶尔地还会前去天主教的教堂礼拜。这些都是信奉阿里乌斯教的西哥特君王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接着，并且也是更加触及根本地，他发布了一项声明，称耶稣基督与上帝同样重要，并且也都是一样的神。虽然他并没有再进一步将这种同等性扩展到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部分（圣灵），但是，这样的一番声明已足已使他成为一个在神学观念上与他的儿子以及他儿子的罗马后台相近的信奉阿



里乌斯教的国王了。

在把耶稣基督与上帝置于相同地位的时候，公元582年的皇家声明放弃了已沿用了两个多世纪的阿里乌斯教核心教义的一些措词。这是一种惊人的让步，它实质上也就否定了整个阿里乌斯教存在的理论基础。这种针对反叛王子的宣传，逐步成为了一种战术性的公关策略，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为短短5年之后的更加触及根本的转变打好了基础。

莱奥维希德国王正是在这种适当的、公开的，对天主教的友好态度以及对宗教分歧的极其淡漠的态度下，迅速对其子埃梅内希尔德进行了反攻。在攻陷了梅里达城之后，莱奥维希德国王下令特别铸造了一些上面刻有传奇性人物"维多利亚"的纪念币。接着，在公元538年早些时候，就在距塞维利亚几英里处，他又攻占了叛军的重要堡垒奥塞特和古代城镇意塔利卡。

再接下来，莱奥维希德国王就得面对与罗马帝国军队作战的可能了。这支军队是埃梅内希尔德根据其与罗马帝国所签订的条约召来的。但是，莱奥维希德国王成功地用3万枚金币贿赂了罗马将军，这样，在莱奥维希德国王挥军席卷塞维利亚的时候，所有罗马军队全都待在营地里面，按兵不动。不过，他的儿子埃梅内希尔德还是成功地逃掉了，并且得到了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科多巴城的庇护。不久，莱奥维希德国王攻下了科多巴城，并将他逃进一所教堂寻求庇护的儿子围困了起来。

莱奥维希德国王派他的小儿子雷卡雷德去教堂，劝说反叛的王子投降并请求皇室的宽恕。埃梅内希尔德俯卧在他父



亲的面前，而莱奥维希德国王则把他扶了起来并且亲吻了他。这就表明，国王宽恕了自己的儿子。但是，这位反叛的王子很快就被流放到了巴伦西亚，接着又被戴着镣铐关进了塔拉贡纳的监狱。

在公元585年的复活节，莱奥维希德国王试图哄骗埃梅内希尔德接受一位阿里乌斯主教所赐的圣餐，但却遭到了仍是天主教徒的王子的拒绝，于是，他的父亲下令处死了他。

埃梅内希尔德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悲剧在西班牙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是，已经开始进行了的宗教变革却再也不可能停止下来了。

不久（公元586年），曾在国王与埃梅内希尔德的战争中离乡背井的几名天主教高级牧师重又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一些当时的天主教资料甚至宣称，西哥特国王莱奥维希德本人也在他公元586年4月逝世之前秘密地皈依了天主教。

被处死的王子埃梅内希尔德已经死去并被埋葬了，这样，莱奥维希德国王的小儿子雷卡雷德就接任了王位。而这位新国王在10个月之后就秘密地皈依了天主教。因为害怕阿里乌斯教徒会反应强烈，所以连他的浸礼仪式都是秘密进行的。

首先，新国王召集阿里乌斯教的主教们开了一个会，试图劝说他们接纳天主教，但是收效甚微。接着，他又召集天主教的主教们和阿里乌斯教的主教们开了一个联合会议。最后，他单独召集天主教的主教们开了一个会，并在会上宣布他将皈依天主教。此后，阿里乌斯教徒至少有两次企图暗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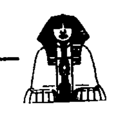
雷卡雷德，而且还爆发了一次阿里乌斯教徒的武装起义，但是，这3次行动全部都以失败告终了。

接下来，所有阿里乌斯教堂的财产都被赏赐给了天主教教会。对天主教宗教理事会的禁令被取消了，而阿里乌斯教在西班牙成为了一种非法的异教——就像它多年在欧洲其他的许多地区所遭受到的命运一样。

最后，公元589年，在托莱多，雷卡雷德主持了40年里在西班牙所举行的第一次天主教宗教理事会议。雷卡雷德对聚在一起的主教们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其父的阿里乌斯教，并建议在教会仪式中采用一种别具东方特色的东罗马帝国的做法，也即是君士坦丁堡信条：他说，应该在主祷文之前齐声背诵这一信条："这样人们就会相信自己经常重述的东西，并且再也没有了不知道真正的信仰的借口。"

雷卡雷德还同意了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提出来的压制犹太人的要求。实际上，为了更加进一步地讨好天主教神职人员，他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对西班牙的犹太人加以压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相当一批公共事务，而犹太人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两性接触则完全被禁止。在某些地区，天主教会进一步颁布法令，对犹太人进行种种压制。举个例子，犹太人被禁止在葬礼上唱圣歌，而如果犹太奴隶在天主教的安息日不休息的话，就将被鞭打100下。

从某种真实的意义来说，公元587年的皈依就标志着现代西班牙的诞生。公元587年以前，西班牙的确曾一度是一个双民族的国家，拥有两种绝对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两种语言、两种宗教传统以及两种政治体制。而现在，突然就



只剩下了一种宗教——天主教。哥特语作为一种语言即将消失，而一种本土的拉丁语方言——原西班牙语，却即将被广泛使用。罗马式的服装和风尚居于主导潮流的地位。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哥特－西班牙人与罗马－西班牙人之间的通婚得到了批准。同时，西班牙人当中的反闪米特主义也开始咆哮而出，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西班牙人当中达到了可怕的比例，而且还作为基督教西班牙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存在了数个世纪。

日耳曼人过去的那种缺少世袭规定、权力较为分散的君主体制已经消失了15年，并且被一种权力更加集中、更加尊贵、半世袭的体制取而代之了。这后一种体制通过将大多数罗马－西班牙人都信奉的天主教教会变成政府实质上的工具，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由于来自内部的对君主体制的需求以及来自外部的罗马帝国势力的催化，就导致了原现代西班牙——一个迅速发展成为了更加中央集权的、虔诚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的并且是极为反闪米特的实体——的概念的产生。而以上这些传统与特征，正是在反对伊斯兰教的征服与占领的过程当中复苏，又在伊斯兰教统治中遭到流放，但最终又重新出现，并成为了君主制的西班牙以及现代西班牙的信仰基础的主要传统及特征。

西班牙以及整个欧洲，被公元6世纪的气候与流行病的演变改造了。从一种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公元535年的事件及其后果推动了古代欧洲与古代中东走向终结，并推动了这两者各自的原现代后继者的诞生。

在东方，在中国、朝鲜以及日本，恰巧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古代的东方被一个原现代的东方取而代之了。但是，东方社会受公元6世纪大灾难的影响的情况，与欧洲的经历是一样的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呢？



第七部分

东方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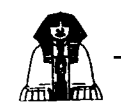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发生在中国的大灾难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数的大约20%。就其所覆盖的地域而言，中国在地球上排名第三。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统一的大国，很有可能因其统一，因其人口众多，而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起到主要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概念，以及“中国”这一名称的开始出现，要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但是，从真正的政治连贯性方面来说，中国的统一则应追溯到公元6世纪晚期。

虽然，中国曾在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200年的这段时间里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在随后的380年（公元200年至公元5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在政治上被分裂成许多个各自独立的国家（在北方分裂出了16个国家，在南方则仅仅只分裂出了一两个国家）。这样，除了公元10世纪当中出现的持续60年的完全分裂以及公元12世纪和公元13世纪的直接的南北分裂之外，中国自公元6世纪以来，差不多已经静享了1500年的政治统一。

这种统一的产生，正该拜公元6世纪历史所赐，而在塑造这个世纪历史的过程当中，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灾



难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比其他因素的作用都要大。

黄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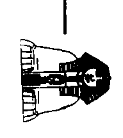
“黄尘如雪片般降下。”

公元6世纪，中国的伟大编年史之一《南史》（南朝的历史）的作者，这样描述了从公元535年11月中、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2月上旬的一连串可怕的、致命的事件的开端。

在有关公元536年12月的记录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文字，所增加的不过是说尘土可以“一把把地捧起来”。另外一份有关公元537年2月1日的情况记录则称，当天“天降灰”，其“色黄”。同时，“灰”一词还出现在了另一部史书——《隋史》（隋朝的历史）对公元536年的事件的记述当中。在汉语当中，“尘”的意思是指“尘土”或者“污垢”，“灰”则指“尘土”或者“灰烬”。

上面词语意义上的不同，取决于大的气候之谜的本质。公元535年晚期及公元536年或公元537年，从天空中降下的神秘的尘（灰），既可能是火山灰，也可能是完全由大规模的气候失常所导致的一连串特别的、不合季节的尘暴。但是，无论这种从天而降的黄尘究竟该姓甚名谁，它终究是一个严重的气候混乱时期在中国的第一个证据。

而有关气候紊乱的其他证据，也并没有让我们等待得太久。公元537年7月，中国遭到了霜冻的袭击，而在8月则是大雪。据《南史》的记载，“7月，青州有霜降”，“8月，青州降雪”，大雪“毁坏了庄稼”。青州是一个低地省份，地



中国与朝鲜

本书第十九章、第二十章以及第二十一章当中所提及的地方

高句丽

公元6世纪中期，新罗征服了高句丽南部以后的边境

北朝

新罗

百济

卡亚（在公元6世纪为新罗所吸纳）

山东

叶

黄河

大兴城 / 长安（西安）

陕西

建康（南京）

吴州（苏州）

四川

九江（江州）

安城

长江

江西

南朝

太平洋

河内

500英里

500千米

图例

● 城镇

边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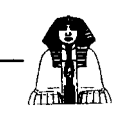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中国的主要气候事件

租税大赦与皇室耕作仪式情况

北朝	年	南朝	北朝	年	南朝
D	500			551	a
D	501			552	
D	502	D		553	
	503			554	
	504			555	
	505			556	
D	506			557	
	507			558	
D	508			559	
	509			560	
	510			561	
D	511			562	
D,F	512	D		563	
D	513	P		564	
	514			565	
	515			566	
	516		F	567	
D	517	P		568	
D	518			569	
	519			570	H
	520			571	
	521			572	
	522			573	
	523	P		574	
	524		F	575	
	525			576	
	526			577	
	527			578	H
	528			579	
	529			580	
	530			581	
	531			582	
	532			583	
	533	P	D	584	
	534			585	
D,D	535	P,Y	F,D	586	
D,D,D	536	P,Y		587	
D	537	P,D,F,S,Y	D	588	
F	538	P,A,D,F		589	
	539			590	
	540	P		591	
	541	A,P		592	
	542	a		593	
	543	a	D	594	
D	544	a	F	595	
	545	a		596	
	546	A		597	
	547	P,a	F	598	
	548	D,a		599	
D	549	D,a		600	
D	550	D,Y,a			

D 干旱　　P 耕作仪式　　Y 黄尘　　a 大赦之年；
F 洪水　　S 夏天降雪　　A 宣布租税大赦　　H 夏天落冰雹

资料来源：《南史》以及《北史》



处北纬36度，与西班牙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中部地区差不多处在同一纬度上面；对这样一个省份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夏天出现霜冻与大雪根本就是闻所未闻的。

由于青州以及其他几个省份的庄稼都被毁掉了，所以出现了涉及地域较广的饥荒。农业方面的歉收肯定持续了两年，因为在公元538年9月，"由于已经有人死于饥荒"，所以进行了租税大赦。

以上的全部记录都摘自《南史》之《本纪》（基本编年史）。但是，除此之外，在中国北部的编年史（《北史》）当中，也记录了发生在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的剧烈的气候恶化以及一连串的饥荒。

据《北史》的记载，公元535年4月下旬到公元535年5月上旬，"由于干旱，皇帝专门下诏，命令埋掉京城长安、各州、各封邑以及各县的尸体。"

"发生了大干旱。政府不得不在长安城城门处、皇宫大门处以及政府各部门大门处向居民供水。"对同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情况的记录这样写道。接着，在公元536年9月，在中国北部，"汴州、汜州、涿州以及建州等地天降冰雹"，并发生了"大饥荒"。到12月，形势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致政府不得不派出特别巡视员"去调查游荡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极其饥饿的难民的情况"。

另外，据《北史》中《西魏编年史》记载，在陕西省，也即是"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饥荒"，"人们开始自相残杀，70%至80%的人口都死去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3月份因为在九州发生了冰雹与干旱，所以引发了大饥荒。正在人们为寻找食物而四处逃难

的时候，我乞求皇上打开国家粮仓赈济灾民。”在气候混乱继续发展之时，一位大臣在奏章里这样写道。公元538年夏天，在今山东省，发生了巨大的洪灾。水位上涨到了如此高的地步，以致于“癞蛤蟆和青蛙都在树上鸣叫了”。

气候的混乱以及由其所导致的农业歉收，可能产生了两个直接的政治后果。第一，南朝的皇帝试图通过祈求上天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他决定由他本人亲自来执行国家主要的年度农业宗教仪式——象征性地耕种皇家的麦田。

公元534年、公元535年、公元536年、公元537年、公元538年、公元540年以及公元541年的3月，南朝的皇帝都亲自在麦田里犁出了第一道犁沟。然后，由级别最高的3名朝庭大臣来犁接下来的9道犁沟（每人犁3道犁沟），其他的大臣们则每人犁5道。剩下的工作由挑选出来的老百姓来完成。在这个耕作仪式开始之前，先要向一位中国传统中的农业的神灵，即所谓的神农氏，祭献谷物。中国人认为，正是这位神灵在很久以前将农业方面的知识教给了他们。

这种皇家的耕作仪式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几乎已经被废止了，但是，在公元514年又得到了重新恢复。3年之后，再次举行了这一仪式，而到公元523年，这一仪式已经是在专门修建的祭祀大殿里面进行。

在公元517年至公元523年之间，这一仪式曾经一度中断了6年。但是，须知从公元523年直到公元534年，这一仪式有11年没有进行。接下来，公元535年，发生了气候灾难与农业歉收，这就可能迫使南朝皇帝将这一仪式改为每年都要进行一次。



在整个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举行这样的仪式，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为了疗救当时的形势而做的一点努力——当时的形势是数以万计的人，甚至可能是数以十万计的人都已奄奄一息。

饥荒所造成的第二个政治后果，可比上面的第一个后果要严重得多了。农业歉收、社会混乱的结果以及贫困，极大地破坏了南中国的经济。可能由于已没有什么多余的财富可资征收，所以税收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公元 538 年因饥荒造成人口死亡，在 12 个州实施了的税收大赦，在公元 541 年又再次实施，但是这一次涉及的地域是整个南中国地区，并且持续时间达 5 年之久。4 年之后，大赦时间又第三次延长，第一次直到公元 546 年为止，继而又是直到公元 549 年为止。接着，在公元 546 年，又再一次延长到了公元 551 年为止。

税收系统之所以会崩溃，最初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饥荒导致了贫困，但是，也不可否认存在于连续不断的大赦背后的其他相关的原因。由于贫困现象一直不曾改观，而缺乏税收又摧毁了政府有效统治的能力，因此，民众起义开始爆发了。我们所知道的起义有 3 次：一次是民族起义，一次可能部分地是宗教起义，还有一次是政治起义。可能还有因为缺少保存至今的记载，故而不为人知的其他起义。

民族起义爆发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地归于中央政府在这个关头上的衰弱状态。第一次起义的中心在越南的河内地区——当时这一地区是南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个名叫李纷（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越南人）的平民领导下，起义者先是（在公元 541 年）打败了当地的中国总督，继而又在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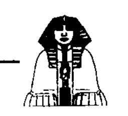
之后挫败了皇室成员之一临沂王所率领的一支军队的进攻。

很快，这位为自信所鼓舞的起义领导者开始自称皇帝了。由于中央政府财力极度空虚，所以又过了两年之后，起义才被镇压下去。公元546年，李纷被俘并被关进了一个山洞。他可能就在这个山洞中死去了。

第二次起义持续的时间比越南起义的时间要短一些，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次起义要比越南起义严重得多。此次起义爆发于公元542年，涉及地区为安城附近、距都城仅300英里的一个地区。而这次起义的原因，在两个方面应该归于饥荒的作用。第一，与越南起义类似，安城起义者利用了中央政府因税收不足而造成的财力空虚。其次，也可能是别具意义的一点，安城的起义者们可能是从一种千年宗教的角度来看待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的。

佛教一般认为，在人们忘记了佛陀最后的伦理教化、世界重又全部回到不幸之中的时候，下一个佛——未来佛，将会回来拯救世界。但是，这个“第二次降临”并不会马上来到。这个过程要在千万年后才会变得必要。但是，非常规的佛教观点——所谓的旁门左道——则认为，未来佛很快就将降临人世。安城的起义者们是被救世主的信念所激起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贫困与痛苦的不断增加，正是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而且衰微的时期的证据，而他们的救世主不久就会降临人世。并且，他们也将自己的起义视做是在为救世主的降临铺平道路。

《南史》中，对公元542年早期的记录相当简明扼要，其中暗示起义者与异教之间可能有广泛的联系。其记录是这样的：“安城乡民刘敬恭笃信旁门左道，反叛朝廷。”其追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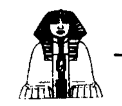
者们实际数量达到数万人，他们占领了今江西省北部地区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最后，皇帝的儿子绎王（后面将会讲到关于这位王子的更多的内容）派出一支军队打败了起义军，并俘虏了他们的头领刘敬恭。刘敬恭被押至京城，并在城中的中心市场被斩首。

到公元546年，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地步，以至于货币都开始贬值。公元547年，据说有更多的谋反在酝酿之中。正如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气候事件在中国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气候不稳定，并且导致中国在公元544年、公元548年以及公元549年，遭到了另外3次洪灾的袭击。

据《北史》记载，公元548年在北中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干旱，而据《南史》的记载，公元548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干旱，并导致在随后的公元549年和公元550年里发生了饥荒。在某些地区，人与人之间已经开始互相残食了。据史料记载，在公元549年的饥荒当中，由于有相当多的死尸，在地处长江南岸的江州，“人们互相残食”。而在公元550年，“从春至夏，干旱严重，人们互相残食，而尤以都城（今南京）的情况最为严重。”

伴随着这些旱灾横行肆虐，而政府又势力衰弱、税收匮乏，第三次起义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爆发了。这次起义需从公元547年讲起。当时，一位中国北朝的将军侯景，倒戈转投南方军队帐下，这样，他所控制的大片北朝领地至少在名义上就归于南朝所有了。

但是北朝政府立刻采取了行动，恢复失地。在一年的时间之内，侯景被北朝军队打败，他所控制的领地重又划归回



了北朝的版图，而这位战败的将军本人则逃往了南方。后来，南朝政府与北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而侯景因为害怕条约当中有将自己转交给北朝处置的条款，所以，在面对可能被杀命运的情况下，这名深知南朝政府衰弱的将军于公元548年8月发动了叛乱。虽然叛乱的起因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压力，但是，倘若没有干旱与饥荒所导致的大规模增加的贫困与政府衰弱的话，他的反叛是不可能有任何胜利的可能的。

侯景公开吸引饱受贫困之苦的乡村农民和城市贫民加入他的反叛部队，而在他的农民支持者当中，有一部分抱着"旁门左道"对救世主的希望，就像6年前的安城农民一样。

侯景领军前往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并在建康城巨大的城墙外扎下营来。在围城战斗仅仅进行了4个月后，建康城投降了。这位将军出身突厥血统，而非中华血统，一向瞧不起中国南朝的贵族。许多城中的贫民都从城中逃了出来，并受到了叛军的欢迎。实际上，当叛军进入建康城内的时候，他们发现高级贵族们都饿死在了他们自己的宫殿当中。虽然这些贵族们仍然穿着他们传统的华贵服饰，但却被他们自己的家臣们抛弃了。而现已是八十多岁的皇帝则被叛军抓住，并且据说被扔在了他自己的皇宫当中，直至被活活饿死。

侯景最终于公元552年被击败，但是南朝也气数耗尽，四分五裂了。从很多方面的意义来说，这位将军的反抗变成了针对贫困、饥荒以及传统的贵族统治的大众革命。在南朝一位文职官员、大诗人庾信所写的一首赋，是中国最伟大的史诗之一的《哀江南赋》中，隐喻地描述了公元6世纪中期的环境是如何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的："乘渍水以胶舟，驭

奔驹以朽索。”

但是，大灾难并未在建康沦陷之时就停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康城沦陷不过使得大灾难进一步恶化了。因南朝的日益积弱而取得成功的侯景叛乱，完全动摇了南中国。叛乱的胜利造成了一种政治真空。由于侯景是个外人，他不过是一个与统治王朝毫无关系的平民反叛分子，甚至在种族上都不是中国人，所以根本没有人认为他短命的政权具有什么合理性。而他的傀儡皇帝——一个最终被他杀掉了的阶下囚，在他看来，不过是个牵线木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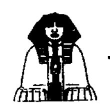
自都城沦陷之日起，一场血腥的、并且往往是多方参与的内战，在旧的统治王朝的破碎山河里爆发了。

在接下来的 8 年间，中国南方出现了不下 10 个皇帝——傀儡、小孩以及各色的自大狂。一般情况下，会有两三个人同时称帝，而其中的大多数“皇帝”最终要么成为杀人犯，要么成为杀人犯的刀下鬼，要么就既杀人自己也被人杀掉。手上沾满鲜血最多的大屠夫，是前皇帝的儿子萧绎。他杀死了自己的侄儿和自己的兄弟，并且还逼死了他的另一个兄弟，而这个杀人犯自己最后又死在了他的另一个侄子的手上。

中国南部分裂成了 3 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东部的建康、西部的四川以及位于中部的长江中游地区。正当中国南部各王族兄弟手足相残之时，地处中国北部的北齐政权与西魏政权，却抓紧时间尽可能地攫取南朝的领地。

西魏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并且还将后一地区的都城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奴隶。

这种多方对权力的争斗是极其残酷的，不顾一切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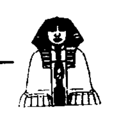
总会采用一些不顾一切的手段。整个整个的家族都被杀得一个不剩。反叛的侯景当年为了预防他们以后会报复，所以将他曾利用作傀儡的皇帝的儿子们全部杀光了，皇帝本人则在公元551年被他杀死了。在此之后不久，侯景本人也被仇敌杀死，并且据说敌人将他的尸体煮来吃掉了，而他的头盖骨则被留下来作了酒具。

公元554年，在大屠夫萧绎死于自己侄子的剑下之后，他的大多数孩子也遭到了杀戮。萧绎除了杀死自己家族当中的大多数成员以外，据说还沉湎于巫术之中。在公元553年早期，他做了一个他兄弟的木偶像，并往木偶身上扎钉子。不管怎么说，也不论那些钉子到底起没起作用，到了8月份，他的兄弟炽被打败了，炽本人被俘并被斩首。

《哀江南赋》——一个相当适合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标题，称萧绎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并且也正是他自己性格当中的原因，种下了他后来毁灭的种子："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已。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

《哀江南赋》记述了萧绎的末日，同时也对公元541年时其治下领地的悲惨状况作了描述："地惟黑子，城犹弹丸。其怨则黩，其盟则寒。"

最后，在反叛者侯景以及大多数皇室成员都已死去以后，两位南朝将军掌握了实权，并让南朝皇室剩下的最后成员当中的一位（萧益的一个儿子）作了皇帝。但是，由于来自北朝的压力，迫使其中一位将军将另一位皇室成员——北朝所提名的人选，扶上了帝位。另一位姓陈的将军，迅速地发动了对他以前的同事的进攻并处死了他，然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傀儡皇帝。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57年，这位活下来的



将军强迫皇帝退位，并自立为帝，建立起了最后一个独立的南方朝庭。

气候灾难导致了饥荒与贫困，而饥荒与贫困又在中国南朝导致了税收系统以及积弱政府的崩溃。贫困日益增加，有时还会伴之以对救世主宗教的疯狂执迷，而政府内的财政与管理方面的衰弱之态亦日趋严重，这些因素的合力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与反叛。然后，反叛，再加上其他所有的因素，最终动摇了古老的南朝帝制，继而导致了这一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就在旧的南朝地域内，一个新的南朝帝制系统又发展起来了。但是，这个新系统已与那个在公元 535 年到公元 557 的混乱之前，曾繁荣昌盛过的旧南朝完全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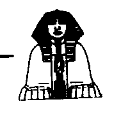
旧有的统治系统相对而言是中央集权的，反之，在新的统治系统当中，权力则是极其分散的。在混乱时期，各地诸侯相对于积弱的中央政权而言，实力却在不断增加，但既然混乱的状态已经结束，权力分散的情况却已是无法改变了。此外，政治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并且再无复兴的可能。传统统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贵族，在混乱的年代当中死在了反叛者的刀下或是他们之间的互相争斗之中。另外，这个新的权力分散的南朝也要比原来的旧南朝小得多。北朝的西魏和北齐，乘南朝正忙于将自己搞得四分五裂的时候，占领了大片的南朝领地。

现在，对没有遭受由公元 6 世纪中期的饥荒所导致的如此可怕的政治后果的北朝人来说，完成对全部南朝的统治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强大的北周王朝在哄骗南朝加入了一



个反对北齐的联盟之后，又对南朝发动攻击，这就很明显是利用了新的南朝政权在公元 575 年到公元 577 年之间的软弱。南朝人在战争中被打跨了，并失去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人员。如果不是因为北朝在政治上有所分心的话，恐怕南朝在那时就已经被全部吞并掉了。

南朝又进一步遭到了削弱，在北朝看来，它不过是静待屠戮的牺牲品，不过是一棵等待着收割者镰刀的庄稼。



第二十章　南京之死

“你是一个奢靡、淫佚的统治者，你无视自己作为皇帝的职责，你压迫人民，你杀掉正直的人，你处死清白的人，你无视上天的力量。”

以上是北朝皇帝于公元588年3月写给软弱的南朝统治者的话。北朝使者向南朝统治者当面递交了一封北朝皇帝亲笔写的书信，其中列举了南朝皇帝的所谓二十大“政治罪行”——奢靡无度、无视职责、道德松弛等等，并指责他应对世间所有的弊病负实际责任——从所有凶险之兆的出现到自然灾难的反复发生。这封信是对一个衰弱邻居的私下警告，但是，北朝皇帝接着下令将此信印制了30万份，并在南朝领地内四处散发。

北朝的收割者实际上已经磨好了他的镰刀。一个新的王朝——隋朝，已于公元581年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并且其第一位皇帝隋文帝，决心要完成吞灭南朝残地的工作。到公元584年，一个包括有陆路和运河的新的军事运输系统已经修建完成。公元586年，重要的军事部署也已完成。而且，隋朝还派出了一个特别的购买使团，从中国北部的马场购回了10万匹战马。

公元587年，北朝侵略并占领了一个虽然小但战略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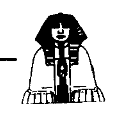
却至关重要的独立小国，这样，隋朝实际上就已控制了与南朝接壤的长江防线的整个北岸地区。

到公元588年，隋朝建立起了两支巨大的舰队，其中一支用于海战，而另一支则专为应付长江上的水面战斗。接着，在经过了长达7个月之久的宣传战（散发那30万份小册子）以后，所有在北方的南朝使臣全部遭到了囚禁，为战争所做的最后准备工作开始了。在短短数天之内，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就要爆发了。

北朝远征军由51.8万名步兵、骑兵、水军以及海军组成。号称拥有数百艘海战及水战战舰的隋军兵分八路，如潮水般涌过了长江。然而，面对如此凌厉进攻，南朝竟然毫无防备，由此，南朝政治状况衰弱之境况亦可见一斑。南朝皇帝本人则终日酩酊大醉，以致于无法批阅其将领送来的有关北朝军队已经越过前线的紧急军事公文。后来，在北朝军队攻占了南朝都城之后，士兵们发现这份公文还压在南朝皇帝的床下，根本不曾拆阅过！

随着北朝远征军逼近南朝都城，南朝的将领们纷纷望风归降。有一个关键的南朝将领临阵变节，并帮助敌军打开了都城的入口。南朝皇帝极其可悲地试图逃跑或是自杀，他本想投井而死，但是攻击至此的侵略者们听到了从井下传来的尖叫声，于是把他从井底拉了上来。被拉上来的时候，这位皇帝全身湿透、一身污泥，并且还和两个妃子紧紧搂在一起！

其时，南朝的大多数贵族都投降了，都城内的抵抗也在几场各自独立却相当血腥的战斗之后结束了。但是，在南朝帝国内的其他地方，却发生了极其惨烈的战斗。在长江江面



上，4艘110英尺高的5层北朝战舰（每艘战舰上载着800名水手、弓箭手以及水军）用其装备的长达50英尺的攻城槌，将10艘南朝战船击得粉碎。紧随其后的便是南朝的节节败退，很快，整个长江流域实际上已在北方王朝的掌握之中了。

再接下来，绝望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南朝残军在吴州集结，此城地处已沦陷了的都城与大海之间。不久，在北朝陆军和水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之下，吴州城落入了敌手。南朝军队的指挥官扮作道士逃跑了，他属下的军队退守到了最后一个据点——附近一个湖的中央小岛。从南朝军队所进行的最后抵抗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次英勇的失败。

很快，整个南朝帝国就归于了北方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南朝皇帝和他的家族成员以及所有的南朝贵族则全部被永远地流放到了北方。

据古代的资料记载，南朝的高级囚犯和他们的扈从以及北方护卫所组成的队伍绵延不绝达170英里。这些人当中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许多人乘车，而大多数高级囚犯则乘坐专门的轿子。被流放的囚徒们长途跋涉，横越中国，最后到达了北方的都城——大兴城（位于今西安附近）。

正当他们行进在流放之路上的时候，他们过去的家——在过去的282年里一直是南朝的都城，被夷为了平地。正如落入罗马人之手的迦太基城一样，建康城中所有的城墙、所有的寺庙、所有的宫殿以及所有的房屋全部都消失掉了，当年的大都会的遗址重又变成了农田。

在筋疲力尽的流放者队伍终于到达了北方王朝的都城的时候，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幕也开始上演了，而那出悲剧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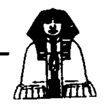
幕则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气候紊乱与饥荒。

在一个奇特的仪式当中，隋朝的禁卫军将被俘的南朝前皇帝和他的皇亲、他的前大臣们以及他的前将军们，押进了隋朝皇帝的巨大祖庙当中，并将他们作为战利品祭献在隋文帝的祖先灵前。这肯定是最奇特的祭拜，因为这些贵族囚徒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北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在大约300年前中国第一次发生分裂时从北方逃到南方去的。对于这些囚徒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不仅仅只是投降了，而且从祖先、甚至是精神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回家了。

在这一仪式举行之后的第二天，前皇帝和他最高贵的28位亲属以及他的200名前高级官员，被集中在皇宫南门以南的广场上。在那儿，隋文帝正式对他们作为一个被打败了的王朝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又对他们导致南朝走向灭亡进行了批评。

“南朝皇帝及其大臣们全部屏息凝气，拜倒在地。他们惭愧之极，根本无反驳之力。”与之同时代的隋朝编年史当中这样写道。

南朝的最终分裂耗时达半个世纪，但是南朝的崩溃使得中国的统一成为可能。而一个统一的中国除了极短的几次中断以外，保持统一直至今日。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事件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再一次与历史同步，使得一个新生的统一的原现代中国取代古代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二十一章　朝鲜的黎明

正当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之旅的时候，并且也正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开始为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事件所动摇的时候，相同的事件也在远东地区的另外一个部分——朝鲜半岛的长期历史当中，起到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关键性作用。

公元535年，也就是气候灾难在中国以及朝鲜开始肆虐的时候，朝鲜半岛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异教国家，新罗王国决定引入佛教。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正是这一决定，在最终带来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对所有的可能性都加以考察，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事件怎么会带来了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引入，而单单引入一种宗教又怎么会最终带来了朝鲜的统一呢？这个统一的国度在其后的数个世纪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政治力量。接着，在最近的岁月里，这个国家又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大国之一。

看来，公元6世纪的气候事件再一次推动了地缘政治的重组并重新设计了历史的进程，将古代朝鲜带向终结，并开启其原现代后继者之先河。但是，这一切究竟都是如何发生的呢？



公元6世纪的朝鲜气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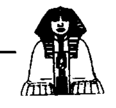
事件	年份	事件	年份
c*,d*	500		551
d*,c*	501		552
	502		553
	503		554
	504		555
	505		556
c◊, d*	506		557
	507		558
	508		559
c†	509		560
s†	510	F◊	561
	511		562
	512	D◊	563
	513		564
	514		565
	515		566
	516		567
	517		568
s◊	518		569
	519		570
	520	d◊	571
F*	521		572
	522		573
	523		574
	524	d†	575
	525		576
	526		577
	527		578
	528		579
	529		580
	530	c◊	581
	531		582
	532		583
	533		584
	534		585
f◊,s◊,P◊	535	s†	586
D◊	536		587
	537		588
	538	f†	589
	539		590
	540		591
c†	541		592
s◊,c◊	542		593
	543		594
	544		595
	545		596
c◊	546		597
	547		598
	548		599
	549	D*	600
	550		

s 风暴
d 干旱
c 非常冷
f 洪水
p 瘟疫

字母表示在任何特定的年份所发生的气候问题的类型。大写的字母表示非常重大的气候事件或是气候引发的问题

朝鲜半岛上发生气候问题的相关国家
• 百济
† 新罗
◊ 高句丽

资料来源：《萨姆古克萨吉》



根据那一时期的朝鲜历史，即所谓的《萨姆古克萨吉》记载，公元535年对朝鲜半岛而言意味着一个气候混乱时期的开始。公元535年至公元542年这一时期内，朝鲜半岛上的气候位列整个公元6世纪朝鲜半岛上两个气候最糟糕时期之中。

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萨姆古克萨吉》中有关公元6世纪情况的记载一般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如果把该书中有关气候情况的记录（特别是公元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气候情况）画成一张图表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图表上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相当一致的，这就说明，《萨姆古克萨吉》一书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如果我们把公元535年和公元536年的中国、朝鲜及日本的气候资料综合起来的话，结果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在中国北部（距朝鲜西部仅120英里），据《北史》记载，到公元535年3月，干旱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以致"上诏烧掉京城、各州、各封邑以及各县的庄稼"。据推测，到公元535年5月，不仅仅农业出现歉收，连饮用水也出现了短缺，《北史》记载："大旱，朝庭在京城各城门、皇宫各宫门及各官府衙门处供水。"

正如世界各地的遭遇一样，气候剧变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地区造成了影响。气候所处的状态，的确是一种致命的混乱不堪的状态。

举例来说，据《萨姆古克萨吉》记载：公元535年，洪水肆虐；公元536年，"一场大旱"继之以"雷鸣电闪以及瘟疫流行"。此外，公元535年，在朝鲜半岛上还发生了一次地震。有关于朝鲜半岛在公元535年和公元536年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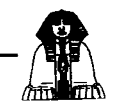
的记录，全部仅仅限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已。事实上，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在公元535年和公元536年的情况在《萨姆古克萨吉》根本无据可考，倒是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日本的有关记载表明，在朝鲜半岛南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气候混乱的情况。日本编年史《日本古史》中对公元536年的记录称，人们受尽了饥饿的煎熬，而且还"饥寒交迫"。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罗王国肯定也难逃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的气候灾难。因此，我们一定要将新罗引入佛教的事件，放在自然大灾难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待。

在公元6世纪30年代以前，在新罗占主导地位的信仰认为，自然神灵与祖先都有能力左右所有的自然现象。当时在新罗并没有一种宗教，只有一系列以当地的神灵为中心的祭拜活动存在。但是，在当时的新罗，还是有通用的仪式、节日和信仰的，并且所有的宗教方面的事务都明显在萨满教巫师的控制之中。

对不朽、至少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所有的精英人物死后在下葬时，都会以其生前所得的金银财宝及冠盖陪葬，且所有的冠盖都会摆放成鸟翼的形状，象征将帮助死者升入天国的萨满之力！在邻近的卡亚地区，随死者下葬的曾一度是一对大的鸟翅膀，其意义肯定是希望死者借此双翅飞向永生！朝鲜半岛上盛行巫术、占卜以及祖先崇拜，生活在半岛上的人们在一些重大的神圣日子里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可能其中包括有播种节和收获节。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们会敲响鼓来祈求主管农业收获的神灵或是天国中的其他神灵给予帮助，或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佛教最早在新罗永久性地扎下根来，要追溯到公元6世



纪早期。当时，一位中国派来的使臣兼佛教徒来到了新罗王国的朝廷。新罗国王对佛教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大多数贵族对这种新的宗教都表示了反对。事实上，早在公元5世纪中期，就曾有人试图将佛教引入新罗，却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而未能成功。

但是，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气候灾难降临了。并且，这些灾难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严重。到公元536年，更由之引起了大规模的疾病爆发（即前文中所提到的“瘟疫流行”），而其时间则是紧继饥荒之后。

新罗君王以及大多数新罗人一定认为，佛教是一种较之他们自己各色俱全的神灵威力更加强大的巫术。这一点从中华帝国的强大及荣耀当中得到了认同，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新罗人对佛教有了一些敬畏之情。保守派贵族及其在当时的社会与宗教现状中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反对，并且可能在气候混乱开始肆虐、庄稼开始歉收的时候，新罗王国朝廷内的亲佛教派与反佛教派之间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被认为是最能疗救当前灾难的一方倾斜了。

现在，我们把新罗王朝在公元535年正式皈依佛教看作是朝鲜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正是这一皈依使得新罗走上了扩张之路，并最终由此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朝鲜。但是，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毕竟，另外两个朝鲜半岛上的王国——百济和高句丽，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信奉佛教了，并且他们皈依佛教并没有导致他们像新罗那样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时移则事异的问题。新罗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皈依佛教的王国，这就使得新罗在半岛上的地缘政治斗争中有了相当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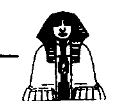


罗获得了其竞争者们从佛教中所获得了的东西——一种侵略性的民族同一感及命运注定感。但是，由于百济和高句丽都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经皈依了佛教，所以就只有新罗能够从其最近的佛教前历史的政治组织方面获益。

在百济、高句丽及其他地方，佛教都曾倾向于以损害贵族与皇族利益为代价鼓励绝对的君主政体的发展。虽然“绝对的君主政体”系统有一些优点，但是总体而言，这一系统更易引发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佛教与专制主义传入之前，相对比较倾向于少数人统治的旧体制，确保了皇族成员与高级贵族可以分享一部分权力。这一体制从很多方面而言，都要更加稳定，并且通过传统的贵族体系，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公元535年的皈依之后的数十年间，新罗从佛教当中获益匪浅，并且新罗并没有受到佛教在政治方面的缺陷的掣肘，而是仍尽享皈依之前的政治体制的种种好处——旧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在新的宗教引入之后立即消亡。那种至少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政治体制，确保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忠心不二。

这一体制是建立在一种通常叫作科普姆——字面意思是“骨头等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一原则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由继承所得的地位，所有的人分为8个等级。一些皇室的成员属于最高等级，即松戈尔（圣骨级）；小部分皇室成员和少数高级贵族属于金戈尔（忠骨级）；大多数贵族属于所谓的“头领级”六等、五等以及四等；剩下的人们则属于“头领级”三等、二等以及最底层的“头领级”一等。就像《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的体制一样，



这种组织、定序不同一般的社会，最终是由“骨”和“头”的级别系统来决定的。实际上，这一体制控制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忠骨级人物的房屋最大可达24朝尺长或24朝尺宽。但比之低一个级别的头领级六等的房屋，最大就只能达到21朝尺。头领级五等的房屋最大只能达到18朝尺，而其他人则不得超过15朝尺。

骨级和头领级人物，甚至在衣服和马饰的颜色方面也是有着严格区分的。同时，所有的官职也据此予以分配，比如头领级六等就不得担任六等以上的官职，而头领级五等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担任超过十等的官职。

一种固定的阶级体制，只要其成员不提出质疑，社会就能从其所形成的秩序及组织性当中获益，而最高的5个级别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则都能确保其世袭地位不受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公元535年后的数十年间，新罗在从佛教侵略性的“一个民族”精神当中获益的同时，又保留了其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世袭定制———种早已在其长期的信仰佛教的竞争者百济和高句丽消亡了的体制——的原因之所在。

社会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及宗教的优劣已经根本改变，而由此带来的则是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变化。公元536年，新罗国王为了表达他的王国受佛教激发所产生的决心，宣布了一个新纪元：“元初”由此开始，全然没有把仍在东亚和朝鲜地区肆虐的气候灾难放在心上。

佛教通常为帝王所推崇，因为佛教不仅捍卫了国家观念，而且还将这一观念上升到了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新罗首都，人们修建了一座9层的佛教寺庙——神龙庙。全



新罗的人，不分高低贵贱，都认为庙之所以有9层，是象征着他们的国家将要征服另外9个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和中国。新罗的佛教徒们也开始宣称，一些牺牲了的最勇敢的战士是佛主投胎转世（在技术上处理成了再生的佛——未来佛的化身）。

新罗王国受到由佛教当中衍生而出的民族主义的鼓动，并且又得到了其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到现在仍然强大的社会传统的强化，该国在公元550年到公元576年间成功地将自己的领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最初由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动荡所引发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大一统趋势，又推动了一个因面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渴望半岛统一的朝鲜的诞生。

朝鲜半岛的统一在新罗的推动下，最终于公元675年达成并得以延续，而新罗王国本身则消亡了。新罗的继承国——朝鲜，于公元10世纪早期，如一只从其自身的灰烬中新生的凤凰般成长了起来，并且还延续了由新罗开创的朝鲜大一统的传统，一个除了过去50年间的朝鲜南北分裂以外，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传统。

创造出了新罗佛教及朝鲜统一的力量，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形成，并且在其后的世纪中，在统一之树结出了硕果。但是，新罗岛的邻邦日本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呢？或者，日本在此次自然灾难中得到了豁免，置身事外呢？



第二十二章 “上万串的钱是不能疗救饥饿的”

“粮食是帝国的根基。黄金和上万串的钱是不能疗救饥饿的。一千箱珠宝，对于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又有何用?”

上面的话见于早期日本主要的编年史《日本古史》当中，据称是日本国王千贝于公元536年所发布的一项法令当中的话。上面的话是全文长达12万字的编年史当中惟一的此种类型的记录，并且其日期与当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气候灾难相当一致，也并非巧合。

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日本崛起的关键时期是公元6世纪。也正是在那个世纪当中，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混乱，成为了引发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之一。

但是，东亚地区的气候大灾难在日本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以及宗教改变，其机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一动态之中包含了4个互相关联的主要因素：气候、移民、疾病以及宗教。

据朝鲜编年史记载，公元536年（也可能从公元535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朝鲜发生了干旱，差不多可以肯定在干旱之后紧接着就会发生饥荒。这种干旱之后继之以严重饥荒的顺序模式，在中国北部的编年史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而中国北部编年史当中所提及的地区，距朝鲜仅有120英里，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朝鲜也遭受了同样的干旱－饥荒模式的袭击。

在典型情况下，饥荒会迫使饥饿的人们四处游荡，并且经常会为了寻找食物而走过相当长的距离，然后在粮食和饮水仍然有保障的几个地区集中起来。这种人口大迁移，加上临时性的人口集中，就会引发流行病。增加了的人口迁移率，使得疾病的传播速度较之平常要快得多，并且感染人数也要较平常多得多。当疾病一旦到达饥饿的人们集中的地方，其蔓延就会更加迅速。这样，地方性的疾病很快就变成了流行性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据朝鲜编年史《萨姆古克萨吉》记载，恰恰就在公元536年，朝鲜遭到了一次流行病的袭击。这是《萨姆古克萨吉》一书中提及的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惟一一次流行病，因此，此次流行病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一定是相当强烈的。来自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这次流行病有可能是天花或风疹，后一种疾病所造成的感染人群的死亡率与天花不相上下。

数个世纪，一直有朝鲜移民断断续续地迁往日本居住。在公元6世纪的头40年里，更是出现了一个稳定的移民浪潮——朝鲜的农民、抄写员、铁匠以及其他人迁往了日本。由于移民人数相当多，以至于新移民都开始对日本政治有所影响了。日本的一个高级贵族家族，十川家族，就与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结了盟。而这里所说的外国文化，通常而言即是佛教以及源自中国的文化。

《日本古史》在有关公元540年的记录当中，特别提及了移民的情况。据其记载，移民们被集合起来清点人数，结



果总共有 7053 家。公元 540 年的这次针对移民人数的统计活动，是《日本古史》当中所记载的同类活动中的第一次。这次活动表明，在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有大量移民涌入日本，而造成这样大量移民的可能原因是饥荒与流行病，因为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总是与这样的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古史》中的“黄金不能疗救饥饿”法令表明，在日本，当时的形势已经到了让日本国王及其幕僚相当忧心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史》的编者们也许是为了造成生动的对比，从更为古老的资料当中选择了一段文字，并且把这一段文字放在了公元 536 年“饥寒交迫”情况的前面。因为，在记述公元 535 年的情况时，编年史的编者们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气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那般完美无瑕云云！

“最近”，《日本古史》这样写道，“在连续几年里，庄稼都获得了丰收，人们都乐于生活。我收到的来自各行各业的重要报告，都没有关于饥荒的只言片语。良好的气氛欣欣然充塞宇宙，天地间尽是赞美的高歌。从内到外，到处都是平静安宁。国家兴旺发达，我们的欢乐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为了帝国的欢乐，就让大家狂欢 5 天吧。”

接下来的一年，公元 536 年，这个世界无疑再没有那么平静了。实际上，“黄金不能疗救饥饿”这条记录之后，就是另一条记录。而这后一条记录，大致勾画了粮食供应是如何从不同的地区转向其他地区的。举个例子，粮食必须运往将要修建粮仓的地区，“这样才能保证非常时期的粮食供应，并保证人们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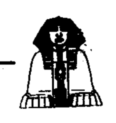
东亚地区好像连续好几年都遭到了气候问题的袭扰。大陆方面的资料援引了中国在公元535年到公元538年这一时期内的气候问题情况（参见本书第十九章），而日本的经历也与此差不多。

在长期的移民及与朝鲜半岛上的各王国接触（以及可能特别是在混乱时期起到适时安抚作用的宗教）的背景下，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的国王决定派出一个宗教使团前往日本朝廷。这个使团送给千贝大王一尊金铜佛像、一些佛教法旗和法伞，及一批经书。据说，使团首领曾告诉千贝大王说，佛教“是所有宗教当中最优秀的”，而且“人人皆可祈祷，人人都是合乎佛教的要求的”。

百济皈依佛教已有150年历史，而且以前也没有听说过百济曾经派过佛教使团前往日本朝廷。事实上，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日本近邻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完全或部分地皈依佛教分别达150年和350多年。但是日本从不曾步其后尘，即便是倾向于大陆的十川家族也没有信奉佛教。

但是，公元6世纪30年代的形势是空前的。整个地区都遭到了饥荒的袭击，而且，正如3年前在新罗所发生过的一样，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有最强大的巫术以及最强大的神灵的帮助，才能让大自然恢复正常。

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在这一时刻”冒犯传统的本地神灵而转而信奉一个外国的神，将是极不明智的。据《日本古史》记载，经营制铁与制盔甲的服部贵族与中臣军事贵族这两大家族就直截了当地警告国王：“所有曾统治这个王国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在春、夏、秋、冬四季，祭祀108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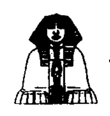
天地之间的神灵以及大地之神和粮食之神。如果在这一时刻，我们以外国神灵取代了这些神灵，恐怕会招致我们民族的神灵们的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决定妥协。但是，最热心于引入佛教的十川家族的首领获准敬奉外国的神灵，以此“作为一个试验”。

据《日本古史》记载，十川家族的头领大见大甫“跪下来，兴高采烈地接过了佛像”。“他将佛像供奉在自己家中”，然后又把另一幢建筑变成了一座寺庙。但是，随后灾难就降临了。在日本爆发了一次大灾难性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许多人都死去了。因为日本已有好几代人不曾经历过天花，所以差不多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具备对天花的免疫力。

“瘟疫在大地上横行无忌，人们一旦感染，就会迅速死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糟糕，却又无药可救。”《日本古史》中这样写道。在日本的那些遭到感染的地区——肯定是那些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大约60%的人都死去了。最初，疾病会使人出现像流感那样的症状（发烧，背痛，头痛），接着就会开始咳嗽并且发生腹泻。再接下来就是一种类似于猩红热症状的皮疹。患者感觉就像身处火上一般，或者不时地还会感觉像在被沸水蒸煮一般。

《日本古史》后来记载患者的话称，“我们的身体就像烧着了一样！”再接下来，皮疹的类型又发生变化：患者头部的皮疹越来越密集，并且开始逐步向下蔓延，但是最为密集的部位还是手和脚，患者皮肤上出现了成百上千处伤口。（同样引自后来的《日本古史》的记载）这些伤口开始是小小的肿块，然后变成明亮的水泡，最后再变成直径为7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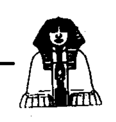
到8毫米的脓疱。

感染者当中5%的人会在开初的几天里死于内部大出血，而另外5%的人在疼痛加剧、高烧达到华氏104度以后便从这个尘世当中消失了。大多数感染者可能会躲过天花病毒的袭击。但是，在天花病毒使鼻、喉以及眼睛等处的保护性粘膜遭到破坏以后，其他病菌就能趁虚而入，感染人类。这样，就会有30%的人死于肺炎，另有30%的人死于败血病。

在日本遭到感染的地区，可能每10人中就有9人感染天花病菌，而这9个人当中又仅有3个人有可能活下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将流行病的起因归于日本国王允许在日本敬奉佛像，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对将佛教引入日本的人推测，日本本土的神灵一定相当气愤。这里所提到的本土神灵，也即是今天的日本神道教所敬奉的神灵。日本人通常叫做“卡米”的本土神灵主要有5种：居住在树上、长条石上、山间以及其他自然之物中的神灵；与某一特定的工艺或技巧有关的神灵；庇护某一特定家族或范围更大的社团的神灵；曾经居住在人类中间的神灵，其中也包括祖先；特别的精英分子神灵，如太阳神或者两个据说创造了日本诸岛的神灵。

人们认为“卡米”居无定形，他们必须在一个巫师的“召唤”下才能进入某种其形状可供他们使用的物体当中。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神灵喜欢居住在长长细细的“容器”当中——魔杖、旗帜、长长的石头、树木、特制的木偶以及人类本身。这些为神灵所选中的人——灵媒，基本上都是女人，并且她们的身体和声音都将为神所接管。甚至日本大王



本人也曾被视做是少有的男性灵媒，他的身体被他神圣的祖先太阳神长期“借用”了。这样，大王本人就被视做是神的居所、神的灵媒了。

据《日本古史》记载，正当天花肆虐日本的时候，据说服部家族与中臣家族的首领曾请求国王销毁十川家族头领所供奉的佛像。“正是因为臣下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人们才会遭受如此的死亡。如果您能在事情还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折返您的脚步的话，结果一定会是莫大的欢喜。应该把佛像马上扔掉，并且在未来不懈地寻求幸福。”对佛教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般说道。

日本国王除了对他们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几乎别无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确实应对流行病的爆发负责，因为疾病也是从朝鲜传来的，也是十川家族极感兴趣、却不受人们欢迎的一揽子“外国货”的一部分。

“照你们的建议做去吧!”国王告诉他的批评家们——《日本古史》当中这样写道。“因此，”书中继续写道，“大臣们拿走了佛像，并把佛像扔进了运河的激流之中。他们还在十川家族首领的佛寺当中放了火，直到将寺庙完全焚烧。”

关于佛教与天花大灾难的争论，一定在日本国内部造成了政治上的裂痕，因为就在流行病与宗教对抗的尘嚣之中(或者是之后不久)，日本国王被暗杀了。这是已知的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皇室被刺案。

公元6世纪30年代的事件划定了政治战线，而这些政治格局会直接影响未来一百年内的日本历史，并将永久性地塑造日本民族的未来。

刺杀国王的有可能是十川家族的人，其原因据推测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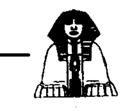
是因为他们对国王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向服部家族及中臣家族让步感到非常愤怒。

当然，接下来的一任国王肯定得到了十川家族的支持，十川家族中的显要人物纷纷成为了新国王的重要顾问、大臣以及姻亲。由于人们对佛教的非议，对十川家族及其外国朋友、外来思想的反对，使得十川家族不惜一切代价要奋力争取一个更强有力的君王，而这个君王还应该是仅仅只能被十川家族所左右的。

这样，其他贵族可能就经历了一次在权力方面相当的衰落。象征性地，在某些地区，他们甚至被限制不能修建夸耀性的300英尺长的家族墓地，虽然当时也可能是因为流行病造成了人力极度缺乏，才会出现这种限制。

十川家族还确保新国王娶了十川家的女子，而由这些联姻所生的女儿则又嫁给了她们半血亲的兄弟们，即由那些十川与皇室联姻所生的儿子。十川家族有一种包围式的思想，这种思想可能源自于他们在公元6世纪30年代的经历，正是那段经历迫使他们团结紧密，整个家族紧紧抱作一团。

新国王其实是一个媒介，而十川家族与他们那些源自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则通过这一媒介的作用修复并改造了日本。因此，从十川家族的角度而言，确立国王相对于其他非十川贵族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公元571年，木目大王死后，被葬在了古奈良城附近的一座1020英尺长、周围有护城河围绕的大墓——矢间三濑丸当中，而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日本故去国王的丧葬当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该墓按照传统的日本贵族墓葬方式修建，是一个巨大的锁眼形的阶梯式金字塔，其四周饰以宗教法器与阳伞，保护这些装饰品的是真人



大小的陶制卫兵，塔顶则耸立着一座精致的仿制宫殿。这座墓葬是其同类墓葬当中最后的一个大号产品。

很快，十川家族便又试图要将佛教引入日本。公元584年，他们修建了一所佛教寺庙并请来一位朝鲜高僧主持。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试图要通过佛教的祈祷来挫败天花的又一次爆发。自从天花于公元6世纪30年代首次爆发以来，它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复发一次。在天花又一次爆发之时，反佛教的（并且毫无疑问，也是更加反十川家族的）政治力量抓住机会，重新提出了早在45年前就已提出来过的反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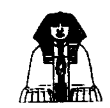
据《日本古史》记载，服部家族与中臣家族的新一代首领，因为新国王备驮杖允许十川家族修建了一座寺庙而对其进行了严责：

“您为什么不听取臣下的劝告？难道不是从先王统治时期就开始肆虐的疾病又传到了您这一时期，以致全国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而这一切的原因，绝对都是因为十川家族确立了对佛教的信奉。”

国王回答道：“既然明确如此，那就废止佛教吧。”

十川家族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在服部家族毁坏了寺庙并将寺庙与十川家族所礼拜的佛像一起烧掉的时候，十川家族曾紧握手中的权力明显滑向了其主要对手服部家族手中。《日本古史》当中甚至记述了十川家族的孩子们遭到监禁并被鞭打。

曾鼓励了十川家族在公元584年寻求佛的庇护，并且也重新点烧了宗教对抗的那场天花，现在开始蔓延到了皇宫当中了。国王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在备受痛苦折磨后死去了。



“大地上满是那些遭到感染以及由此死去的人。遭到感染的人们这样说道：‘我们的身体就像是烧着了，就像是在被毒打，就像是四分五裂了一样。’”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一个人在感染了天花以后，特别是在被感染的第二个星期当中的种种感觉，但是，这些话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寺庙被烧毁、孩子们被打而招致的神的报复。毕竟，《日本古史》是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获得胜利的人——佛教徒在一切皆已结束之后写成的。

在这次意料之外的失败之后不久，十川家族很快就意识到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行动以重掌政权。公元587年，新一任国王余间感染了天花，而他寻求佛的帮助以挽救自己生命的愿望又遭到了反对，因此，一位亲十川家族的王子谋杀了反对派的一名重要人物——中臣家族的首领。此次谋杀行动也许帮助了佛教在日本的重新复活，但却没能挽救国王的性命，他“痛得越来越厉害”，直到最终断气。

十川家族很快发现残存的主要的反佛教分子——服部家族，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因此，十川家族与皇室一起抢先采取了行动，对服部家族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有些人在战斗中被杀死了，有些人则被包围了起来并被处死。在其中的一处行刑地，干涸的河床上躺满了数百具尸体。据《日本古史》记载，“他们的尸体高度腐烂，根本无法辨认，但是，人们还是根据尸体所穿衣服的颜色将尸体加以区分，尽量把他们和自己的朋友们埋葬在一起。”

到公元590年，已有大量的佛寺在兴建，并且因为反佛教的反对派已被清算干净，所以十川家族似乎可以对自己的地位高枕无忧了。但是，新任国王条重名好像希望能够摆脱



他的守护者十川家，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并且据称，条重名大王在皇宫内屯集了许多武器。因此，十川家族再一次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杀死了国王。条重名是死在十川家族手中的第二位皇室成员；第一位受害者是千贝大王，时间是一个世纪以前。

在条重名被十川家族除掉以后，一个亲十川家族的君主，同时也是一名狂热的佛教徒——一位名叫推故的强有力的女王，登上了日本皇位。作为木目大王与他的十川家族的妻子所生的女儿，同时又曾是前国王备驮杖的妻子，推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她的侄儿，一位名叫武间矢户的王子（后来，人们通常称之为尚登矩），同样也亲佛教，亲十川家族。

日本国内始于公元6世纪30年代的宗教与政治方面的大冲突，到此差不多就结束了。在这次大冲突中败北的是传统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而获得了胜利的则是亲佛教、亲外国的改革者。

在接下来的20年间，日本从亚洲大陆，主要又是从中国全盘引进了宗教、政治、经济、行政、财政、艺术以及历法观念。公元603年，一个更为精英化的体制取代了日本朝廷当中传统的世袭体制。公元604年，中国儒家思想当中的和谐、责任以及礼貌的原则引入日本。公元607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位使臣。很快，留学生也开始前往中国求学。日本吸纳了中国与朝鲜的艺术、建筑以及雕刻思想，并且采用了中国的税收体制以及中国的历法。推故女王甚至还模仿中国皇帝的做法，自称“天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不过只是一匹用于掩护的假



马，在这匹马的后面——或者佛教甚至根本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在它的腹中便是所有这些在静候时机进入日本的变革。

由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与瘟疫事件所引发的漫长历程已经终结了。对日本来说，公元7世纪早期的日本已完全不同于公元6世纪早期的那个日本了。古代日本已经消亡，原现代日本虽然还处在胚胎的阶段，但毕竟已经开始孕育了。今天的日本民族国家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其虽然遥远但却最本初的起源是在公元6世纪。这个世纪对日本而言，是一个虽然悲惨但却起到了催化作用的世纪。

旧世界——东方和西方，已经被由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反应所改变。但是，越过太平洋与大西洋，在美洲地区，同样的历程则还正在进行之中。



第八部分

宇宙战争

第二十三章　金字塔帝国的崩溃

正如欧洲、中东以及东方世界，在继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灾难之后的那个世纪中，经历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变迁一样，美洲也不例外。在中美洲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归根结底由于气候变迁这台发动机的驱动，使得当地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全面重组。在北美洲以及除安第斯山脉地区之外的南美洲，公元6世纪同样也是一个变迁的世纪，一个充满了新的开始的世纪。

但是，这些变迁是如何展现它们自己的呢？公元6世纪30年代全球性事件的最终结果，究竟是导致了文明的毁灭，还是文明的诞生呢？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真正起作用的自然与社会机理，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

公元1519年至公元1521年，西班牙人在征服者柯南·科尔特兹的率领下征服墨西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座巨大城市的废墟。在被遗弃的城市废墟当中，有宽阔的街道、巨大的广场以及巨大的金字塔——最大的金字塔的体积丝毫不亚于埃及的基奥普斯（即埃及法老胡夫）金字塔。

西班牙征服者们向被他们打败了的阿兹特克人询问，是什么人修建了如此宏伟的建筑。阿兹特克人回答称，这个废弃的城市曾是神的地方（在当地的纳瓦特尔语中被称为特拉



奥蒂华坎)，是很久以前由巨人修建的。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后一点的真实可信，他们还出示了被他们宣称为是那些超级巨人的大腿骨的东西。但是，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知道的是，那些巨大的大腿骨实际上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史前大象的大腿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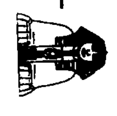
但是，想象一下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处于其中心的城市废墟以及金字塔的超大规模，那么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最大的建筑物是太阳金字塔——高达 215 英尺、由 120 万吨碎石和用太阳晒干的泥砖构成的庞然大物。城市本身占地则超过了 8 平方英里，另外据现代考古学家估计，当年城市当中的居民人口在 12.5 万人到 20 万人左右。

西班牙人记下了阿兹特克人告诉他们的有关神的地方的情况，而这一记载是现存有关特拉奥蒂华坎的最早历史记录。对遗址所进行的考古调查现在已经证明，特拉奥蒂华坎早在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前 1000 年就已被废弃了，而这个时间正好是旧世界的许多地区人口大量死去的时间。

公元 6 世纪早期，特拉奥蒂华坎处于巅峰时期——一个繁荣的大都会，一个经济的、宗教的以及可能部分地也是军事的大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影响范围所及一度包括了墨西哥南半部以及今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城大部。

这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不同国家杂交而成的帝国。其中有一些是被征服的附庸国，而其他的则是那些肯定永远也不敢反抗特拉奥蒂华坎霸权的长期盟友国。

这个帝国由宗教信仰和贸易往来紧密地联结成一体。其人口之巨，使得该城成为了美洲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人口中心。实际上，在当时，特拉奥蒂华坎是世界上第六大城市!



考古遗址

本书第二十章和第二十四章中所提到的考古遗址和其他地点



安 第 斯 地 区

本书第二十六章到第二十九章中提到的考古遗址及其他地点

秘　　鲁

巴　　西

切潘

莫契

散塔河

Lake Titicaca

华阿里

库斯科

纳斯卡地画

皮基拉克塔

古阿河

洛库姆巴河

萨马河

阿扎帕河

洛阿河

卡马罗尼斯河

提瓦纳库

科查巴姆巴

波波湖

玻 利 维 亚

阿塔卡马沙漠

阿根廷

奎布拉达德胡马华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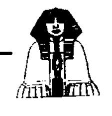
太　平　洋

图例

● 遗址或城镇

现代国境

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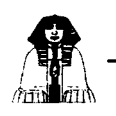
该城肯定会吞进大量从整个中美洲进口而来的货物。反过来，特拉奥蒂华坎也肯定会出口大量货物或转口货物。

数百万墨西哥人和玛雅人的生计以及经济，都得依赖特拉奥蒂华坎。该城出产上百万件由火山玻璃（黑曜石）制作的人工制品，因此，它在古代美洲的中心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钢铁工业中心。在这个可能部分地由帝国控制的产业里，工匠们在几十个火山玻璃作坊当中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黑曜石）制品，从矛头、吹箭筒用镖到小刀刀片和制作精美的人物塑像，几乎是无所不包。而其他的成百上千个作坊，则专门生产篮子、垫子、陶器和纺织品，并且还用进口的海贝制作珠宝饰品，用玄武岩石制作雕刻品。

同时，建筑业一定也相当兴旺发达。且不说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维修以及更新多达 20 万人的住房，需要专门人员维护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公共建筑物，就单单提供原料一项，就需要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劳动大军，以完成诸如调制石灰、制砖、采石、伐木、木料加工以及描绘城中那么多房屋内部装饰性的壁画之类的工作。

其他的各行各业也是同样的兴旺发达，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其中肯定也包括云母和羽毛制作以及造纸。虽然在特拉奥蒂华坎并没有发现纸的实物，但是在当时的墨西哥，造纸技术确实已经为人们掌握了，并且曾在遗址处发现了石制的纸浆搅拌器。将某一种特殊的树的内层树皮捣烂后，所造出来的纸不仅仅用于书写，而且还用来制作宗教仪式上所穿的衣服，此外，人们还在易燃的纸上面涂上熏香、橡胶和血，再将制成品用作燃料。

就在这个大都会当中，还曾有过一个庞大的商人社团。



实际上，考古发现证明，整个市郊可能曾一度为外国商人和工匠所充斥。进口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货物产地之远，以及根本就没有轮式运输工具或者甚至没有驮载的牲畜。

用于制作珠宝的海贝，必须从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海岸地区进口，而这两处海贝产地距离特拉奥蒂华坎分别有 150 英里和 180 英里。用作制球的橡胶，则几乎必须全部从位于大西洋海岸的维尔拉克鲁兹和距特拉奥蒂华坎以东 500 英里的危地马拉进口。制衣所需的大部分棉纺织品，也可能是从离特拉奥蒂华坎以东很远的玛雅地区，以及与特拉奥蒂华坎的距离分别为 270 英里、150 英里的奥克萨卡和维尔拉克鲁兹进口的。羽毛，其中包括蓝绿色的绿杜鹃的羽毛，则需从今尤卡坦和危地马拉境内或附近的丛林地区进口。用于制作颜料的矿石，诸如朱砂、赤铁矿以及孔雀石一类，则来源于距首都好几百英里之外的矿山。这些矿山有可能是在特拉奥蒂华坎控制之下的。但是，所有进口货当中最奇特的绿松石，则必须得从 1200 英里之外的今新墨西哥州直接进口。

虽然特拉奥蒂华坎的人口当中，可能足有 30% 的人在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但是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的其他人仍然从事着农业生产。

农田究竟是归单独的家族所有，还是归更大的部落所有，或者是归国家所有，现在尚不清楚。但是，根据考古调查工作所得到的人口定居情况资料，我们可以得知，人口集中居住在大都市内，是专门的政策命令的结果。在特拉奥蒂华坎外数英里内的郊区以及紧邻城市的地方，几乎根本就没有定居点。好像在某一时期，差不多方圆 200 平方英里以内



的所有人全部都被迫搬进了城内，以防止任何潜在的竞争性人口中心的出现。这种政治作用所造成的农村地区人口减少，不仅仅导致了特拉奥蒂华坎近郊步行可达地区的农田被过度使用，也导致了城市近郊之外地区大量可利用的农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农业繁荣与否不仅是关系到一个城市，而且也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生死存亡的中心问题，同时，农业也是特拉奥蒂华坎的宗教的核心。在特拉奥蒂华坎的宗教当中，最重要的神肯定是雨神特拉洛克，人们不仅仅将他视作是雨、雷以及闪电之后的力量，而且还将他与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以及宇宙本身的某些方面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他住在一座圣山当中的一个很深的山洞里面，借用了某种长着尖牙利齿的动物的外形，可能是一头咆哮着的美洲虎，也可能是一条狂怒的鳄鱼。同时，人们还认为他就存在于云端之中。

至于究竟特拉奥蒂华坎城中的哪座寺庙是属于特拉洛克的，尚无法确认，但是，最有可能的一座寺庙，是巨大的所谓“太阳金字塔”——城中最大的建筑物。公元 1971 年，考古学家在 213 英尺高的金字塔以下 20 英尺处发现了一条 330 英尺长的人工通道。这条通道通向 4 个呈三叶草叶片形状分布的地下洞穴。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将水排出山洞的管道以及进行过宗教活动的迹象，其中一些物品的存在时间甚至是在修建金字塔之前的。

特拉洛克在特拉奥蒂华坎的首要地位，金字塔内的洞穴以及排水管道的存在，把所有这些因素加以综合，无疑都表明这座巨大的建筑正是献给特拉洛克的。

特拉奥蒂华坎的其他主要神灵，包括一个可能的国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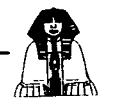
（一条长满了羽毛的大蛇，也与降雨有关）和一位伟大的女神，她可能是石头之母——“水山”的化身。水山是一座俯瞰着特拉奥蒂华坎的死火山，在其内部仍有水流动的汩汩声。在过去900年间盛行于这一地区的印第安语言当中，“城市”与“社会”两个词可能就是源自这座仍在发出汩汩水声的神圣死火山，而特拉奥蒂华坎城中第二大的建筑物，所谓的“月亮金字塔”，就正好与水山处在一条线上。

水在特拉奥蒂华坎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体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实际上，在纳瓦特尔语当中，“水山”和“社会”或“城市”是同一个词：altepetl。这3个最重要的神灵，特拉洛克（雨神）、长满了羽毛的大蛇（也与雨和水联系在一起）以及石头之母（水山），全部都与生命之源的水有关系。

特拉洛克与特拉奥蒂华坎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之间的联系，象征着雨水与农业丰收之间的关系，而长满羽毛的大蛇与神所批准的宗教信仰之间的传统联系，则巩固了特拉奥蒂华坎宗教信仰的政治地位。

该城（以及整个帝国）处于一种高度宗教化的状态，毫无疑问，其统治者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得自于神的，而且他们也许还认为自己和大都会与人类以及时间的诞生是同步一体的。

在与此相当的新世界基督教有关神“牺牲”的神学中，特拉奥蒂华坎至少被后来的文明视做是某种中美洲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众神为保全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这也便成为了全球人类灵魂一致的证据——如果真有这样的证据存在的话。根据古代阿兹特克人（并且据信也是特拉奥蒂华坎人）的传说，特拉奥蒂华坎无论是从时间或空间上来说，都是我



们这个宇宙的发祥地。

古代中美洲人相信宇宙是循环往复的。在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尽头，这个宇宙都会完全毁灭，而另一个新的宇宙则由此诞生了。特拉奥蒂华坎所处的位置被人们认为是现在的宇宙（第五个宇宙）的诞生地。该地被认为是时间远到与人类相关的时间——开始的地方。但是，为了使这个新的宇宙能够诞生，为了使生命能够重新开始，就必须要有神的牺牲。

来自阿兹特克人的传说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众神汇集到了特拉奥蒂华坎今天所在的地方，讨论他们当中究竟谁应该牺牲自己，变成第五轮新的太阳，把光明带给新生的世界。经过一番痛苦的类似于人类所进行的排序，最卑微的神纳纳胡阿廷（字面意义是“浑身流脓的家伙”）跳进了创造的焰火之中并变成了新生的太阳。但是，新宇宙的其他部分仍然没有任何成形的迹象，因此，其他的众神也不得不像纳纳胡阿廷一样牺牲了自己。

宇宙和世界在他们的自我牺牲当中开始成形了。最后，从星辰到动物，从山川到人类本身，差不多每一样都形成了。而地球上的政权的成立，也被人们视做是有着神的渊源。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在特拉奥蒂华坎这个众神创造了宇宙的地方，出现了中美洲世界最强大的政权。这即是特拉奥蒂华坎的主人，“圣贤以及神秘事物的认知者”。

社会的宗教基础、经济基础（农业）以及政治基础（神所批准的政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支撑这个大都会及其势力延续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最根本的统一力量。但是，也正是这种宗教、经济以及政治形态的紧密联结，使得



这个大都市在由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问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彻底崩溃了。

特拉奥蒂华坎当时也就相当于是古代中美洲世界的雅典、罗马以及耶路撒冷。在宗教、经济和政治方面，在已知的其所达到的古代智慧方面，或者是在其人口集中的程度方面，这个帝国将其所有全部放在了一个篮子当中。这样，当灾难袭来的时候，其打击之彻底、终结程度之迅速，甚至就是在全球都发生变化、都遭受大灾难的情况下，也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干净利落得多。

大旱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尚未在中墨西哥发现相关的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或者是冰核方面的证据，所以考古学家还无法直接探知单独的某一次干旱的情况。

虽然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墨西哥在公元 3 世纪到公元 6 世纪的气候曾普遍较为干燥，但是，要想得知在中美洲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了由灾难所引发的特别严重的旱灾，或者说发生干旱的时期，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邻近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古代气候资料，再综合诸如特拉奥蒂华坎的消亡这样可由考古探知的地面情况和可能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来进行演绎。

但是，通过对美洲所有可获得的资料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发现，在南、北美洲确曾发生过一次相当引人注目的气候事件，并且这一气候事件肯定也对中墨西哥造成了影响。

另外 7 个不同地区——加利福尼亚、南墨西哥、哥伦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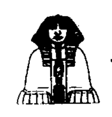
亚、秘鲁、巴西、智利以及阿根廷——的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公元6世纪中期，整个西半球气候的瓦解情况较为严重。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一位名叫瓦尔摩尔·拉·马奇的树木年轮专家，从加利福尼亚卡姆皮托山中收集了大量高海拔地区的狐尾松年轮标本。从标本上看，树木年轮各圈之间的间距曾一度有所缩减（也就是说树木的生长一度有所缩减），这就表明，公元535年到公元536年的气候情况比较恶劣，而公元539年的气候则尤为恶劣。树木的生长情况一直到公元6世纪50年代晚期方才恢复正常。而反常的，可能是较之正常情况要寒冷、干燥的气候，一直持续了差不多30年。

接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位名叫路易斯·斯古德利的教授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山脉当中收集了大量的狐尾松年轮标本。这些标本也同样表明气候确曾一度恶化，并且，这些标本还表明，这一段的气候恶化一直持续到了公元570年左右，持续时间差不多有40年。

整个公元6世纪中期当中气候持续恶化，而其中又尤以公元536年为最，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气候情况愈发恶劣了，它是此次气候恶化之中最关键的时期。

在距特拉奥蒂华坎仅500英里的尤卡坦（墨西哥东南），通过对近年的湖泊沉积物进行艰苦的分析，我们找到了证据证明，曾发生过一次持续时间为几十年（可能在20年到50年之间）的严重旱灾，而这次旱灾的起始时间可能是公元6世纪中期。在旁塔拉古纳湖，水蜗牛和一种叫做介形亚纲的微小甲壳动物向我们提供了这次大旱发生过的证据。在这些



小小生物的甲壳当中所发现的氧的同位素，与它们死亡时的气候条件下所形成的一般的氧同位素不同。因为同位素值为16的氧，较之同位素值为18的氧更易蒸发，这样，一旦气候干燥，就会导致氧16过度蒸发，从而使得氧18的含量比例不正常。因此，在湖泊沉积物的核心处，只需对木片和介形亚纲动物进行放射性碳测试，就能弄清楚任何干旱发生时所处的时期。

佛罗里达州大学的科学家们于1996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证明公元6世纪的干旱是差不多一千年间所发生的首次干旱，而且这种情况在其后的整整3个世纪内都不曾重演。

此外，我们在对尤卡坦的奇昌坎纳卜湖进行调查时，通过对湖泊沉积物中某种矿物含量情况的变化进行测量，也发现了有关公元6世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干旱的证据。在干燥的气候使得水份蒸发的同时，石膏也会沉淀出来，这样就会使得湖泊沉积物中那一层的石膏含量增加。通过对发生干旱的那一层沉积物之下和之上的水蜗牛壳以及植物化石进行放射性碳的时间测定，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干旱发生的时间。

在南美洲，通过对从古代菲兹罗亚松类木料当中所获得的树木年轮资料进行分析得知，公元540年，气温极剧下降。有关这一说法的主要证据是从智利获得的，最近也从阿根廷找到了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智利方面的资料来自该国南部的伦卡，它表明，公元540年的夏天是过去1600年间最冷的一个夏天。

在南美洲的北半部地区，没有早至公元6世纪的树木年轮资料，但还是有另外两种主要是来自秘鲁和哥伦比亚的不



同种类的资料。

1983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极地研究院的一群科学家登上了秘鲁境内高达18711英尺的奎尔卡亚冰川，并成功地取得了两块约长530英尺、直径为3英寸的冰核。因为当时秘鲁没有可以飞到那个高度的直升飞机，冷藏设备无法空运上去，所以不得不将冰核经由陆路运出。为了能够方便地运输冰核，科学家们将冰核打碎成6000块两英寸长的标本，并将每一块标本都分别放置在专门的容器当中使之融化！

接着，俄亥俄科考队使用登山绳和铁钩将全部6000份标本从冰川上运了下来。经过了两天在山间的艰苦跋涉，有时甚至是在45度的斜坡上，再经过卡车和飞机运输，这些标本最终抵达了位于俄亥俄州的极地研究院。

在研究院，通过对这些标本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冰雪堆积减少、负“重”氧18同位素值较少以及源自本地区的尘土数量增加的情况。而其中的尘土数量增加，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发生过由干旱导致的尘暴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也是发生得最为突然的一段干旱时期，看来发生在公元6世纪中期，持续时间大约为30年。

其他的有关于气候灾难的证据，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从哥伦比亚圣乔治盆地下游所获得的古代河水水位情况的资料。哥伦比亚考古学家克勒蒙西亚·普拉扎斯以及安南·法尔切蒂所作的分析表明，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是整个3300年当中最干燥的时期。

对这些资料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发现，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0年，气候几乎一律都是湿润的，但公元6世纪



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这个时段除外！此外，在巴西亚马逊河下游和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湖泊等处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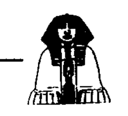
将哥伦比亚、巴西、秘鲁、阿根廷、尤卡坦以及美国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公元6世纪中期，在整个美洲地区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气候灾难。综合而来的证据有力地表明，墨西哥肯定也不会在这次气候灾难中幸免。

如果考虑由气候灾难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伟大的墨西哥大都会特拉奥蒂华坎及其帝国崩溃的时间与性质，恰恰进一步证实了此次气候灾难的真实可信。

直到3年前，人们还一直认为这座巨大的古城是在公元8世纪才开始出现人口减少，并最终消亡的。但是，最近考古学家们通过对全部证据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以后，将特拉奥蒂华坎崩溃的日期向前推了150年，也就是公元6世纪！这一重新认定的日期表明，特拉奥蒂华坎可能在公元6世纪的上半叶，或者更有可能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某个阶段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到了公元6世纪末期，特拉奥蒂华坎已经在人口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彻底瓦解了。

特拉奥蒂华坎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历史，或者至少还没有发现任何此类历史记载。虽然这个非凡的都市文明拥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原始“书写符号”，但是相对而言，这些符号都不够成熟。到目前为止，人们也不过仅仅破译了其中的某些部分而已。

要搞清楚那些导致了特拉奥蒂华坎及其帝国崩溃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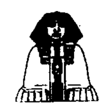
发生的时间顺序，惟一可资参考的资料就只有考古发现了。在遗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也确实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事实上，从特拉奥蒂华坎所获得的考古资料，向人们展现了这个大都会撼人心灵的末日的各个方面：烧毁的寺庙、营养不良的骨架、废弃的房屋、打碎的神像以及被谋杀的城中要人。对这些证据加以分析，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合情合理的模型，以重现在这个“中美洲耶路撒冷”的最后岁月里所发生的事情。

导致北美洲与南美洲的许多树木停止生长（以及哥伦比亚的河流干涸、秘鲁的尘暴）的气候灾难，其中包括了一场大规模的干旱。那场干旱所造成的影响情况，在考古记录当中是相当详实生动的。美国休斯顿大学一位名叫丽贝卡·斯多雷的人类学家在进行详细研究时，分析了一百五十多具遗骨的资料。这些遗骨是从特拉奥蒂华坎城南端一个普通的“劳动阶级”居住区内的小公墓当中发掘出的。

她发现，早在特拉奥蒂华坎崩溃之前的数年间，人们的死亡年龄较之过去已经提前了。实际上，年龄 25 岁以下的人的死亡率已经是原比率的两倍了。由于大旱，肯定造成了大规模的农业歉收。斯多雷的研究表明，劳动阶级当中 68.3%的人在 25 岁以前就死去了，而在平常，这个比例是 38.5%。

研究表明，在特拉奥蒂华坎，流行病的情况一直较为正常。但是，在农业生产失败以后，营养不良使得人们抵御疾病的能力大大下降。这样，传染病就在几个主要的方面表现了出来，其中包括严重的腹泻以及消化系统吸收营养物质的



能力极度下降。营养缺乏，较之完全没有食物可吃而言，更容易致人死亡。

城中居民大量死亡（这就要求新的移民加以补充），再伴以城郊经济的崩溃（由农业歉收所导致），使得大量移民迁入了这个大都会。但是，斯多雷的研究表明，由于这些新移民对城中传染病的免疫力较低，所以他们在迁入城后的几年内便纷纷死去。在特拉奥蒂华坎的最后阶段（可能是其末日阶段），新移民当中占主体的年龄段的人（15 岁至 24 岁）的死亡数在总死亡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由原来的 8.3% 上升到了 27%。这一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之所以会如此之高，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移民较低的免疫力造成的；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这些新移民的主人们所感染上的四处肆虐的疾病有着较高的传染率，从而导致了“低免疫力”的移民们感染致死。

斯多雷对遗骨的研究表明，在特拉奥蒂华坎，曾在一段时间内，极少有普通人活过了 25 岁的。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食物的缺乏。特拉奥蒂华坎的要人们，很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而且在某些阶段可能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确保了自己的食物供应。因此，社会等级区分极大地增加了，而且这种增加不仅仅只限于健康与财富方面，还包括了年龄、两代人之间的文化连贯性、父母的教导、地理起源（移民因素）以及对这一体制的忠诚度等方面。

由于大量的劳动人口在 25 岁以前就死去了，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连续性和控制都被毁掉了。能够将文化传统传给年轻一代的老人的数量远远不足。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年幼

的孤儿，这些孩子如果能够存活下来的话，那么在他们的成长时期，不要说父母双亲的教导，即便是成年人的教导也将是少之又少的。并且，这种前面所提到过的向内移民，势必会造成对这座城市及其传统的忠诚度相对较低的人口数量的增加。

对于社会的上层而言，有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在这一层次上同样也发生了变化。在特拉奥蒂华坎的末期，有关军事方面的图像也大量增加了。在以前完全仅限于宗教内容的壁画上面，也出现了可能是描绘特拉奥蒂华坎城中军事首领的部分。

军队的重要性明显增加，在这一文明最后崩溃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一趋势可能反映出，在面临农业和商业的崩溃以及社会等级差别与动荡不安增加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在后来的世纪当中的历史可资参考的话，那么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很可能会最终导致军事政变。而在政变之后，统治者为了强化社会与宗教现状，必然会不断使用越来越多的铁腕措施。

在大灾难集中出现的情况下，宗教的消亡肯定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主要的神灵——特拉洛克、羽蛇神以及石母，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与雨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旦降雨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再明显地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可能在几十年中都丝毫不见好转的话，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宗教信仰方面的危机。很可能就连石母的水山也干涸，不再发出汩汩的水流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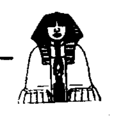


雨水不仅支撑着该城的农业与宗教体系，而且还间接地支撑着该城的政治控制体系本身。政府自认为自己有神的渊源。特拉奥蒂华坎的统治者们当然也就是按照神的指示在进行统治，或者说，这些统治者甚至就是众神的代表，也许甚至就是神或者神的化身。羽蛇神是与统治机构相关的神，所以，人们相信城中的那些精英们。一定是居住在围绕着羽蛇神庙所修建的宫殿和其他建筑当中的。

特拉奥蒂华坎作为中美洲世界的宗教中心，肯定也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当中，由神所赐的赋予生命的礼物——雨水，滋养了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宗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的干旱才会通过农业歉收与饥荒以及疾病，导致了宗教的消亡以及由之而引发的政治的破灭。

正当灾难在大都会肆虐之时，这个帝国也开始分裂了。其原因肯定是因为其衰弱的中心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其支柱，即贸易，也开始四分五裂了。从另一个主要的中墨西哥遗址丘鲁拉所获得的证据表明，该地也同样遭到了干旱的严重打击。在整个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饥荒都造成了人口减少、贫困增加，而这就最终导致了贸易水平的剧减。而残存的贸易毫无疑问必定会更受日益严峻的社会动荡、人口迁移以及盗抢行为的限制。

黑曜石产业，也许还有其他几种产业，处于特拉奥蒂华坎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这些产业的贸易量减少，肯定也就导致了政府税收岁入的减少以及实力的削弱。来自全中美洲的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6世纪的下半叶当中，特拉奥



蒂华坎的贸易及影响就结束了。

这个中美洲耶路撒冷及其帝国的末日现在已经迫近了。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暴力行动尚未付诸实施了。所有的考古证据都表明，在一次真正的烈焰与血腥的杀戮当中，特拉奥蒂华坎城内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毁灭特拉奥蒂华坎城的方法，以及非常明显的对城内要人大肆杀戮的狂热情绪，都有力地表明，终结了特拉奥蒂华坎文明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于其内部，而非外部。

差不多可以肯定，特拉奥蒂华坎的末日是以极端暴力的民众起义的形式降临的。城内几乎所有与统治阶级相关的建筑物全都遭到了洗劫，并被拆得七零八落，最后再被付之一炬。

在特拉奥蒂华坎市中心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有 147 至 178 处建筑和庙宇在一次有组织的充满仇恨的破坏活动中被焚为平地，其剧烈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几无可比拟者。而在城市的其他部分当中，有 50%到 60%的寺庙被焚毁。宗教建筑以及城市中心宫殿，是起义者的首选目标。相对来说，几乎少有居住区遭到袭击的，而那些被袭击了的居住区（根据考古发现，其比例在 5%到 14%之间），则可能属于与政府或者失败了的宗教体制有联系的大家族。

成千上万缠着腰带的愤怒城民如潮水般冲进了城市中心，并攻入了主要的宫殿，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还没来得及逃走的特拉奥蒂华坎贵族们。这些人几乎毫无准备。有些人被残忍地砍倒在地时，还戴着用翡翠、黑曜石以及玛瑙镶嵌而成，再饰以发光的蓝绿色羽毛的王冠。考古探查工作的结果，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副情景：一位贵族或者是一位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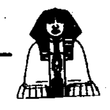
司，被起义者从所谓的色尤达德拉宫西北区的西面房屋中拖了出来，一直被拖到了宫殿中心的天井处。考古学家们在那儿发现了他身体的大部分。他的头骨散落四处，他的身体被砍成了碎块，其中少部分就散落在从西面房屋到天井的路上，到处都是。考古调查证明，这个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在他四零八落的尸体周围，发现了翡翠镶嵌物的碎片（可能是头饰上的）、翡翠、黑曜石以及贝珠。

在附近又发现了另一个被肢解了的受害者，在南面的宫殿内又发现了第三个。所发现的统治者们的遗骨数量并不多，这就表明，要么统治阶级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起义爆发前几天内成功逃跑了，要么就是这些人被起义者抓住以后，在别的地方被处死了。

在追杀了最后残存的统治阶级成员以后，起义者们开始有组织地毁坏特拉奥蒂华坎城中的政治与宗教中心。他们在神庙讲坛楼梯底部与边上的木制结构处放起了火，并且还在部分木制结构的神庙里也放起了火。考古发掘表明，在很多庙宇建筑当中，这些木制结构的地方在大火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为剧烈。

在一处与传统政府联系紧密的位于色尤达德拉宫殿内的建筑物当中，考古学家发现有5座雕像被人为地移动了，并被打得粉碎。碎片被扔得到处都是。举个例子，一座两英尺高女神像的残存碎片散落的范围达8600平方英尺。

就在同一所宫殿当中，雄伟的7层羽蛇神庙中的石雕头像被掀到了附近的通道当中，有的头像甚至还被扔到了附近宫殿的天井当中。而在这些邻近的宫殿当中，考古学家们又在灰烬与碎片中发现了被打碎了的雕像和6幅画像，描摩的



对象都是不守信用、现在肯定也是人所痛恨的雨神特拉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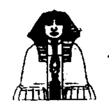
起义者们有组织地将他们所仇恨的目标打成碎片。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引发这一破坏浪潮的民众情绪的强度以及复仇的敌意的深度，但是，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在起义爆发之前，特拉奥蒂华坎的广大民众曾经遭受了何等的苦难。

在火焰吞没了城市中心的一个区以后，愤怒的起义者们又立刻如潮水般涌人其他的中心区域。在石母神庙（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月亮金字塔"）处，人们将与金字塔毗邻的大楼梯侧面的巨石都推了下来，甚至还将这些巨石推了100码远。与神庙有关的祭司和贵族的住处都遭到了洗劫，12根饰有军功章的柱子也被推倒在了一边。

在位于城中另外一个地区的一座神庙中，在所谓的美洲狮壁画建筑群当中，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巨大的石块曾被故意移动过的证据。起义者将这些大石块扔进了一个广场。这样，每一次冲击的力量都是如此巨大，以致石块实际上是跳跃着滚过广场的，并在广场上留下了一道印痕。就在这座神庙中，还有一座用珍贵的绿色玛瑙制作的神像也被打得粉碎。接着，这座神庙被付之一炬。1500年后，考古学家们甚至找到了当年烧着的大梁落下的地方。

正当特拉奥蒂华坎在毁灭它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在最后危机的酝酿时期，有关特拉奥蒂华坎文明的故事的最后一幕好戏就要开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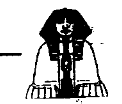
在远离特拉奥蒂华坎的一座与特拉洛克有关的圣山上，人们正在雕刻一座重达200吨的神像——可能是根据命运已定的特拉奥蒂华坎皇室及祭司们的命令而雕刻的。这座神像



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像之一，也是中美洲最大的神像。它可能正好象征了在特拉奥蒂华坎最后阶段加剧的宗教冲突。传统的对特拉洛克的信仰，使得皇室和统治阶级的成员们下令雕刻了这座巨大的神像，其目的是想要最后一搏，说服这位神灵下点雨。

但是，上天终于没有任何降雨，于是起义爆发了。这个中美洲的耶路撒冷毁灭了它自己。而那座重达200吨的特拉洛克神像则被遗弃在他自己的圣山顶峰上长达1500年，成为了这个古代世界中曾经繁荣过的伟大文明终结的象征。

但是，这场帝国的大灾难又是如何侵袭中美洲的其他地区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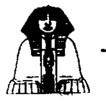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维纳斯的标枪

在公元561年晚期或者公元562年早期的某一时间，中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提卡尔的敌人们开始谋划要发动一场“星球大战”，以摧毁提卡尔的势力。

要想摧毁提卡尔这座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战争的烈度一定不能小于玛雅人所知道最残酷的战争类型，即“宇宙战争”。而这就需要祭司们运用自己高超的天文学知识，来获得一个合适的神圣宇宙形体的帮助。因此，在公元561年晚期或者公元562年早期，提卡尔城最大的对手，卡拉克穆尔城的祭司们至少“征募到了”金星这样一个盟友。

在玛雅人看来，维纳斯（金星）并不是旧世界的爱情女神，而是一个主管战争与灾难的男性神灵。他们相信，维纳斯一定会降下宇宙的标枪，并摧毁他们的提卡尔敌人。但是，为了确保神灵的支援能够得以实现，就需要金星精确到刚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只有这样，金星才能击败敌人，稳保胜利。

到那时，卡拉克穆尔的战士们将不过是神灵的工具，他们不再是依赖运气的不受拘束的人类，而是执行早已注定天命的战士。为了使卡拉克穆尔的宇宙计划能够得以实现，或者说，为了使金星能够恰在其时地打击提卡尔，就必须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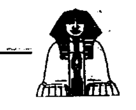
们绝对准确无误地选好进攻的日子。

这个日子必须确保金星能够在当天以其全部力量发动打击，因此，卡拉克穆尔的祭司们选择了公元 526 年 4 月 29 日这一天，因为在金星长达 18 个月的运行周期当中，只有在这一天当中，它看起来才似乎是静若处子、蓄势待发的。

也正因为如此，卡拉克穆尔及其盟友们就在那一天发动了进攻，并挫败了提卡尔。卡拉克穆尔的统治者——人称“天空见证国王”，在金星的帮助下，控制了提卡尔，并且还将一个当时不到 9 岁的名叫阿尼摩尔·斯库尔的小男孩变成了他的傀儡，以通过他来统治提卡尔。

对于提卡尔的要人们来说，被征服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充满了耻辱与血腥的日子。此次进攻并非纯粹仅仅来自外部。在提卡尔城内部，由统治家族内对现实不满的成员所组成的第五纵队，可能在此次进攻当中起到了与敌人里应外合的作用。而上面说到的名叫阿尼摩尔·斯库尔的小男孩，正是这支第五纵队中某位成员的儿子。实际上，对于提卡尔城中大广场上随意雕刻的皇家纪念碑被故意毁坏一事，这支第五纵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任的阿尼摩尔·斯库尔统治集团看来极为憎恨 4 位前君主。这 4 位君主曾在从公元 511 年直到公元 562 年提卡尔被卡拉克穆尔征服为止这段时间内成功地统治了提卡尔。他们 4 人的纪念碑被砸得粉碎，而在他们之前的两位前提卡尔君主（统治时间为公元 458 年到公元 511 年）的纪念碑却虚饰性地毫发无损。

这种表现得极不均衡的朝代憎恨，看来全部源自于公元 511 年后的第一位统治者，一个通常被玛雅文化专家叫做“提卡尔女士”的妇人。在玛雅世界当中，女性继任统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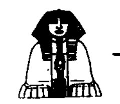
位是极为罕见的，所以人们推断她的继任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的结果——可能是某种军事政变，并且在此次政变当中，势力强大的非皇族成员希望通过将她扶上王位而获得实权。

公元562年的政权变化，似乎就是公元511年伴随提卡尔女士不寻常的继任开始的一系列朝代更迭的暴力结局。而一个儿皇帝的加冕，则象征了这个关键性年份明显屈辱性的一面。虽然这是一个在卡拉克穆尔控制之下毫无实权的皇帝，但他的继任仪式却是玛雅人所见过的继任仪式当中最华丽的。

当时，这个新国王所戴的遮住了他一部分容颜的面具由碧玉做成，而他头上所戴的精工细作的木、玉结构头饰则掩住了他面容的其他部分，上面还饰有珍贵的绿色杜鹃羽毛。他的双耳上是绘有复杂花卉图案的沉重碧玉垂饰，而在他赤裸的胸前，则是一条10英寸长的矩形碧玉带。在一条制作精细的腰带上面，有3个玉制的骷髅。在腰部以上，他还炫耀性地围了一条前面开衩的虎皮裙，脚上则穿着皮制的便鞋，上面饰以面具和羽毛。

他接过王杖———座古怪的神像，神像长长的左腿被雕刻成了一条蛇，而新国王则要抓住这条蛇——那一刻就象征着他正式继位了。在仪式进行的时候，阿尼摩尔·斯库尔坐在一把垫着美洲虎皮的大大的石制（或者是木制）宝座上，当然，这宝座上面还饰有大量豹皮、鹿皮以及虎皮。

如果来自中美洲其他考古遗址处的有限证据确实不假的话，那么，此次加冕仪式就是在提卡尔一座主要宫殿的讲坛顶上进行的。从这个地方俯瞰，在制作精美的华盖下避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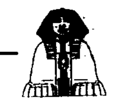
新加冕傀儡国王肯定可以看到一幅城市中心风景图。那里有涂成红色的宫殿，有金字塔神庙，有耀眼的满是白色灰泥的广场，而在那之外，则是一直延展到了目之所及处的无尽郊野。虽然提卡尔纪念性的城市中心占地只有一平方英里多一点儿，但是，其往往是人口爆满的郊区则占地 50 平方英里。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建筑精美的城市中，发生了公元 562 年的血腥惨剧。就在那个小男孩被加冕的时候，他的前任，即双鸟国王，则被卡拉克穆尔的士兵俘获，并被作为高级别的人牲，祭献给了卡拉克穆尔的宇宙盟友——战争之神维纳斯。

双鸟国王与其他被俘的提卡拉人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卡拉克穆尔人将这位当时玛雅世界最大城市的前国王的身体向后弯折，把他做成某种活人轮子，再把这个“轮子”滚到一个用于进行宗教仪式性的球赛的院子里。接下来，这位脊柱已经被弄断了的前国王又被带到附近的一所神庙内，根据中美洲传统的献祭惯例，祭司用黑曜石作成的锋利小刀将他的心脏挖了出来。

在阿尼摩尔·斯库尔加冕之时，很可能有大量的提卡尔俘虏被作为祭品杀掉了。这些要么一丝不挂，要么仅有几片树皮纸遮身的俘虏们把手放在嘴里或是交叉放在胸前——表示屈从的玛雅传统手势，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使他们得以在最终被处死以前免受痛苦的折磨。他们被开肠破肚，他们的指甲被生生拔掉，他们的下巴也被砍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最终被作为祭品处死以前。

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玛雅世界的权力、政治、战争以及宗教的操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杀戮



欲望、虐待狂心理，再加上玛雅神学，就创造出了这样一台为任何人所不齿的杀戮机器。但是，这样的杀戮机器在玛雅神学看来却是正义的，因为，玛雅人认为众神之力才使人类得以生存，人类当然应该服从神灵的旨意，对神灵报着感恩的心情并且还应回报神灵的恩赐。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被作为祭品牺牲掉的并不仅仅限于俘虏。宗教界和政界的要人们也经常将自己作为祭献给神的礼品牺牲掉——妇女们用上面满是尖刺的绳索穿过自己的舌头，而男人们则毁坏自己的私处。实际上，公元562年，在卡拉克穆尔人将傀儡国王阿尼摩尔·斯库尔扶上王位的时候，在提卡尔发生了极为普遍的这种自我牺牲祭祀以及完全的人牲祭祀情景。

维纳斯一定对此相当满意，毕竟进攻的日期是由这位神灵的特殊日子所决定的。

但是，真正使得卡拉克穆尔的“天空见证”国王决定将战争作为首选的原因，却是发生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改变。进攻日期的选择可能是由维纳斯决定的，但是征服提卡尔的战略决策则是由提卡尔本身的不断衰弱所带来的。

提卡尔这座大城市曾一度是墨西哥超级大都会特拉奥蒂华坎在玛雅地区的主要附庸国，而公元6世纪中期由干旱所引发的特拉奥蒂华坎势力的崩溃（很快就是全面的分崩离析）则使得提卡尔再也没有超级力量的保护了。

从公元4世纪上半叶开始，特拉奥蒂华坎的势力就在玛雅世界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可能是一块殖民地。最初，这个存在不过是一个立足点而已——卡明纳留于，而建立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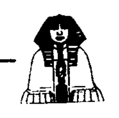


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确保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安全，这些原材料包括黑曜石、碧玉、柯巴脂（薰香）、棉花、可可以及鸟羽。就在离这个玛雅地区的第一块殖民地不远的地方，有中美洲地区仅有的几个黑曜石矿之一，以及一个更加稀有的最昂贵的物品产地，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生命之石碧玉的产地。

此后，特拉奥蒂华坎人在卡明纳留于建立起了势力以及军事中心之后，通过征服、王朝间联姻以及施以地缘政治压力的方式，获得了对至少另外两个玛雅城市的政治控制权力。

特拉奥蒂华坎王朝是于公元 378 年 1 月，在瓦夏克图恩以及提卡尔同时建立起来的。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之内，特拉奥蒂华坎的势力从提卡尔远播到了另外几个玛雅城市——附近的亚克萨、北部的贝坎，公元 426 年则远至南部 200 英里以外的科潘，甚至可能直至位于乌锡马辛塔河滨的贸易大城亚克斯奇兰。某些考古发掘所得的证据表明，特拉奥蒂华坎的势力在公元 5 世纪和公元 6 世纪早期更是远播到了提卡尔以北 300 英里处的北尤卡坦城市兹比查尔顿、阿坎克、奥克斯金托克以及乌克斯摩尔，甚至还达到了距加勒比海不远的富裕东部小城阿尔吞哈。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扩张，看来其关键还在于特拉奥蒂华坎对提卡尔城本身有力的政治影响或控制。公元 378 年以后，提卡尔成为了特拉奥蒂华坎在玛雅世界的代理政治中心。在公元 378 年特拉奥蒂华坎攻占瓦夏克图恩以及提卡尔的幕后，是一位人称“火神”的特拉奥蒂华坎将军。也正是



这位将军随后将斯皮尔·特娄尔·谢尔德国王的儿子拿恩－雅克斯－阿英（字面意思是“神秘的绿色短吻鳄”）扶上了提卡尔的王位，而斯皮尔·特娄尔·谢尔德国王正是当时特拉奥蒂华坎的统治者。至于提卡尔前国王“虎爪一世”被暴力废黜是否造成了王朝权力的真空这个问题，则仍然悬而未决。

提卡尔做为特拉奥蒂华坎在玛雅地区主要的附庸国，也就变成了玛雅地缘政治中的关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元6世纪中期，当远在西面1000英里以外的特拉奥蒂华坎因为干旱而迅速衰落下去的时候，提卡尔也会发生倒退。

特拉奥蒂华坎被视做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新生开始的地方。因此，一旦特拉奥蒂华坎处于发生大规模衰败，并且其崩溃也即将临近的情况之中，就势必会使得特拉奥蒂华坎文化中的宗教与政治可信性发生明显的动摇。而这个大都会的混乱同时也毫无疑问地造成了其军事方面的瘫痪，其中不仅仅包括军事人员，还包括军事指挥与控制都瘫痪掉了。

在经济上，迅速衰退的特拉奥蒂华坎及其帝国无疑也对整个中美洲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十三章中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这个大都会在数个世纪里曾一度是一台巨大的贸易机器——吸入大量的原材料和其他的进口货，同时又出口大量的制成品。

对玛雅世界而言，特拉奥蒂华坎的分崩离析造成了外部对棉纺织品以及柯巴脂（薰香）需求量的减少。而就进入玛雅世界的昂贵进口货方面而言，特拉奥蒂华坎的崩溃毫无疑问会伴以长途贸易线路的中断，这便对提卡尔作为玛雅世界中支配性力量的地位造成了严重损害。

外部贸易的减少，肯定造成了提卡尔税收岁入的剧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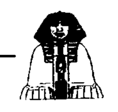
原因则恰恰是因为提卡尔作为玛雅世界中的首领，在贸易体制方面的榨取所得远多于其他强大程度还远远不够的对手。此外，外部泊来品的减少也会使得提卡尔赖以维持其附庸体制所需的货物减少。没有甜头，也就没有忠诚！

随着提卡尔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开始四分五裂，它从其他城市榨取贡品的能力也风光不再。提卡尔在面对内部纷争与外部侵略时变得愈发脆弱，而这也正是在一切皆已注定的公元 562 年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特拉奥蒂华坎的衰败、陨落以及提卡尔政权的血腥变迁会这般重要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仅仅过了 300 年后就显露了出来：当时，正是主要的玛雅文明最后崩溃的时间。在数个世纪当中，特别是从公元 4 世纪中、晚期开始，玛雅世界内的政治与人口发展步伐，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特拉奥蒂华坎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影响。此后，当这个大都会在公元 6 世纪中期衰败并迅速陨落以后，玛雅政治、经济以及人口发展的步伐就不再受特拉奥蒂华坎半殖民性质的控制了。

特拉奥蒂华坎号称拥有 12.5 万至 20 万人口——这个数字是当时最大的玛雅城市的人口数目的 5 倍至 8 倍。此外，特拉奥蒂华坎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较之玛雅城市所控制的领地大几十倍的土地。在宗教和宇宙方面，特拉奥蒂华坎更是中美洲世界的中心。这样，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头 500 年间，它的存在几乎引领了整个中美洲其他地区的历史方向。反之，特拉奥蒂华坎从舞台上迅速消失，肯定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同时也解放了整个玛雅地区的政治与经济。



在玛雅世界内部，现存的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割据势力，其中的佼佼者则是卡拉克穆尔、卡拉科尔以及科潘。

卡拉科尔在公元562年时曾是卡拉克穆尔反提卡尔的盟友。在公元6世纪晚期到公元7世纪上半期，卡拉科尔的人口猛增，从2万人增加到了4万人至10万人之间。在这个扩张的时代，卡拉科尔城内修起了基本的道路系统，纪念性建筑被翻修一新并得到了扩建。同时，还修起了成百上千英里的石梯田和好几十个水库。卡拉科尔变得极其富裕。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全体卡拉科尔人都尽享这种繁荣之乐。此时，在卡拉科尔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而这在玛雅世界当中还是首次。

同样在公元6世纪晚期或公元7世纪这个时期，卡拉克穆尔的人口也大量增加（从大约2万人增加到了大约6万人)。科潘的人口也从公元6世纪晚期开始迅速增长。甚至就连提卡尔也实现了复苏，其人口也有了相当的增长。

在公元6世纪晚期和公元7世纪，玛雅世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会出现增长，其直接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特拉奥蒂华坎在公元6世纪中期半殖民性质的存在消失以后，政治和经济环境得到了解放。而特拉奥蒂华坎的消失正是以公元562年提卡尔的衰落为象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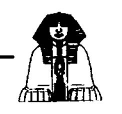
但是，悲惨的是，这种人口增长最终所带来的却是公元8世纪中期的土地耗尽、粮食短缺以及内外冲突，并且最终导致了政治和人口的全面崩溃。

玛雅文明的伟大古代时期就这样终结了。中美洲的各个



大事件，紧随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特拉奥蒂华坎干旱之后一一展开。

但是，在墨西哥北部，气候大灾难却引发了至今仍在影响着美洲的文化发展。



第二十五章　北美洲的秘密

美利坚合众国现存最古老的城市文化，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当中依然生机勃勃。今天，3.7 万名普布部落印第安人仍居住在 31 个与世隔绝的印第安城镇当中，其中最古老的城镇建于 900 年前。通过强烈的群体意识与强烈的文化守旧，这些印第安人在保存自己的特性方面，较之美国的其他印第安人都要成功。

他们那远溯到中世纪时期的祖先，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阿纳萨兹人。那时就发展了非凡的文明：他们从公元 1000 年就开始修建城镇、大型水坝和水库（每座水库的储水量达 32.5 万加仑）；他们所修建的道路宽 30 英尺，共计 500 英里长；他们还通过信号站建立起了一套快速通讯系统。在墨西哥北部，他们是最早开始使用织布机的印第安人；早在公元 750 年，他们就开始穿棉布了。

但是，在阿纳萨兹人文明史的各个方面，最让人感兴趣的可能还是这一文明源起的类型及时间。因为就这一方面而言，阿纳萨兹历史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的历史是遥相呼应的，其起源也要追溯至公元 6 世纪中期到公元 6 世纪晚期。

据信，那一时期的气候混乱确曾对今美国西部地区造成了影响。但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却不够完整，惟一确实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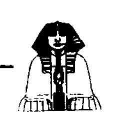
是美国西部狐尾松的年轮情况资料。这些狐尾松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而来自低海拔地区——其中包括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树木年轮方面的资料，则没有任何在公元535年后发生过气候灾变的迹象。但是，考古发掘所获的证据却表明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一次相对突然的文化改变，甚至可能是一次地缘政治上的重压造成了影响。

在公元6世纪以前，阿纳萨兹人并不喜欢居住在村庄，并且还用掷矛狩猎。当时，农业只占了他们经济体系的40%到50%。有一半的阿纳萨兹人居住地区有陶器生产，但并不普遍。而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相对也还比较原始。

接着，在公元6世纪中期、晚期，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阿纳萨兹人完全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经济体系。农业在阿纳萨兹人的经济体系中的比例达到了80%，并且和那一时期的其他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的狩猎技术也得到了改进，不再使用过去的掷矛，而改用了弓箭。定居点的规模不断扩大，第一批村庄出现了。他们开始使用制作工艺相对复杂的石斧（适用于农业生产），并且陶器生产也变得普遍多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今后阿纳萨兹城市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

阿纳萨兹社会的突然变迁——一次事实上的技术与文化革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但是，有4条线索向我们披露了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此次变革。

首先，其中关键的一个方面——弓箭的应用，同样也可见于公元6世纪时的其他印第安人，因此，这在北美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第二，在阿纳萨兹人领地的东北边缘，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的建筑物，特别是栅栏。这可能也是当时北美洲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的一部分，表明战争有所增加。

第三，也是最让人感兴趣的一点，有陶器表明，公元6世纪中期到晚期，阿纳萨兹人与另一种迅速发展的印第安文化有所接触。这另一种印第安文化，即是距阿纳萨兹人领地以东700英里、位于大平原另一端的密西西比河谷之中的晚期林地文化。

第四，上述所有这些发生的时间，恰恰正是世界大多数地区气候日益恶化的时间。

因此，即使由于当地气候的原因，使得阿纳萨兹人并未直接受到严重旱灾的袭击，他们也极有可能受到了来自以北或以西受到了旱灾之苦地区的人口竞争的压力和威胁。当然，该地区出现了距此地以东700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区的陶器样式，这就表明在这两地之间的区域内，也就是大平原地区，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在密西西比河谷，公元6世纪中期至晚期，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旧有的地缘政治排列一起全盘崩溃了。

公元6世纪晚期密西西比河谷地区与阿纳萨兹地区的陶器方面的联系，特别让人感兴趣。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经历变化的时间，恰恰正是阿纳萨兹地区正在发生变迁的时间，并且，两个地区的变化所导致的长期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两个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舍掷矛而取弓箭，都制作出了更加精美的陶器，定居点的数量都开始增加，且都由于大规模的野稻采集使得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到公元700年，建起了土垒的



神鸟像；到公元1000年，建起了第一批密西西比河谷城镇——时间上与远在西边700英里以外的阿纳萨兹的首批城市化迹象出现的时间一致。事实上，这两个地区在公元13世纪都到达了城市化的顶峰：最大的阿纳萨兹城镇和最大的密西西比城镇的人口分别达到了0.3万人和2万人。

如此，墨西哥以北的两个北美洲中世纪城市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发展的时间顺序都极其相似。二者都诞生于公元10世纪和公元11世纪，又都曾孕育于公元6世纪中期到晚期——正是在这个时间，世界经历了太多的变迁。

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其他地区，发生在公元6世纪中期、晚期的变化皆由气候灾变引发。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发生在北美洲的变化可能也是由气候灾变所引发的，不过，由于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书面记录，这一点还尚待证明。

但是，在南美洲，有关气候引发变化的证据则比较清楚，并且也更加生动。



第二十六章　破译纳斯卡地画之谜

在世界上最干燥也是最贫瘠的沙漠当中，散布着地球上最宏大的艺术作品。蚀刻在秘鲁南部沙漠上的1300幅非凡的地画，从巨鸟（长达947英尺）到杀人鲸，从类似于巨轮辐条的抽象“射线”体系到单独的直线（其中有一些长达30英里），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这些秘鲁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在20世纪20年代所发现的巨大地画，在沙漠中延展达200平方英里。这些地画在公众的想象中，已经变成了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考古之谜。对这些地画的起源及其意图的解释之多，几乎已达到了可与地画本身数量相提并论的地步。而在这些解释之中，甚至有来自文学界而非考古界的看法，认为这些地画是外太空来客的作品！

地画主要有6类：“生物形态”（动物、人类、植物等等）造型，巨型螺旋，巨大的梯形，平行线体系，射线体系，以及单独的直线。据可信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些地画的制作时间为公元前400年到公元600年，绘制这些地画的人为当地人。考古学家们将上面所提到的公元前的当地文化，称之为“帕拉卡斯文化”；而对公元元年之后的，考古界则一般称之为“纳斯卡文化”。不过，他们真正的名称早已消



失在了时间的风尘当中。

在所有的地画中，有 50 幅画作的内容不是抽象的。其中包括一只 261 英尺长的长尾僧帽猴，一只 152 英尺长的蜘蛛（可能是一只黑寡妇蜘蛛），10 个人，一只沙漠狐，一只 1620 英尺长的蜥蜴，以及 3 头杀人鲸——其中一头长达 89 英尺的杀人鲸口中还有一个人头；此外，还有 18 只鸟，其中包括一只鹈鹕、一只秃鹫、一只军舰鸟、两只蜂雀以及一只 947 英尺长的巨型湿地鸟。

那些螺旋，大约共有 30 个，可能也是生物形态。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长 30 英尺至 170 英尺的"画作"，可能是对海贝形状进行高度抽象的结果。而这些画作当中的一部分恰恰正是古代纳斯卡宗教仪式所特有的，并且人们已在沙漠上找到了四散分布的实例。

沙漠地画中的第三类，即所谓的梯形，到目前为止是最为普遍的。共计有约一千幅这样的长长的楔形图画。这些梯形的长度从 65 英尺到 5300 英尺，宽度从 15 英尺到 200 英尺不等。它们是对山谷所进行的象征性描画。一幅较为少见的直线图形——平等线，其长度甚至更长，达到了一英里半，而其宽度则仅为 23 英尺左右。

所谓的射线体系共有大约一百幅左右。由于这些射线体系尺寸巨大且非常明晰，所以可以推断，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要力图表现大部分纳斯卡地形的俯瞰情况，也就是从空中观察所见到的情况。每一个射线体系中都包含有 5 至 25 条呆板的直射线，每一条射线长两英里半。在每一个射线体系中，所有的射线都汇聚于从平坦的沙漠上冒出来的那些 30 英尺到 60 英尺高的小山处。考古学家们再次认为，这些小



山具有象征性的地志意义，是山脉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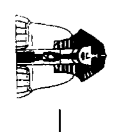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已知的纳斯卡“画作”中，最大的还是单独的直线。这些长度在30英尺到30英里之间完全笔直的直线，在现代人的眼里，简直根本就是无始亦无终！实际上，这些直线的分布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

纳斯卡线条之谜——秘鲁沙漠上的1300幅地画，长期以来一直让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就在这些画作之中所存在着的证据，不仅可以让我们弄清楚当初人们绘制这些画作的意图，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作画人的最终命运情况。

这些地画分布在方圆200平方英里的沙漠上。古代纳斯卡人慢慢地将这些地画看作是宇宙的图画。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代表了纳斯卡宇宙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或者达到这一部分的一个方法。小山、梯形以及动物，分别代表了真实的山脉、真实的山谷以及图腾的祖先或是动物的灵魂。直线——不论是单独的直线还是射线体系中的直线，是穿越了宇宙的双重目的的“管道”。一方面，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它们可以是宗教仪式中的人的行列。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恍惚中的巫师们又可以沿着它们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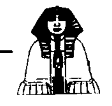
虽然，古代纳斯卡人肯定不曾从空中俯瞰过整幅“地图”，或者仅仅只是其中的小部分；但是，在当地迷幻剂的作用下，古代纳斯卡萨满教的巫师们也可以像风筝般在高高的天上，沿着那些只在他们意识的眼睛中存在的管道“飞行”。

如果您认为上面的说法太不可思议的话，那我可以向您提供相关的合理证据来证实我所言不虚。我差不多可以肯



GRIP冰核
DYE3冰核
不列颠气候资料
爱尔兰
芬兰北部
瑞典西北部
波兰
德国
雅马尔
卡塔加
卡西奥多勒斯·西尼特
以弗所的约翰
爱琴海
内华达山脉
北加利福尼亚
由气候危机所引发的大草原上的经济与政治动荡
《北史》中所提供的气候资料
《日本古史》
《南史》中所提供的气候资料
马利卜大坝的溃决
契昌卡纳卜湖与弗塔拉古纳湖
低地圣乔治盆地洪水水位较低
奎尔卡亚冰川
马尔卡科查湖
的的喀喀湖
由气候混乱引起的瘟疫爆发
智利南部
阿根廷南部
塔斯马尼亚岛
玛丽·伯德地冰核

图例
● 树木年轮
● 冰核
● 湖泊沉积物
● 历史资料 / 数据



定，在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以前，萨满教是美洲宗教信仰体系中最主要的形式。时至今日，在秘鲁的某些地区（北部和东部），萨满教都还依然存在。今天，秘鲁的萨满教徒使用一种叫做圣培德罗仙人掌的致幻植物进入幻觉，而当年的纳斯卡萨满教徒也肯定曾使用过同一种植物。因为，纳斯卡人的陶器上特有的一种植物图案正是这种仙人掌。

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和美洲的几个地方（包括秘鲁东部），萨满教的“飞行”（有时叫做“灵魂飞行”）仍然是其宗教惯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人类学家所搜集的相关证据也表明，在一些美洲印第安文化当中，“灵魂飞行”现在（以及据推测的过去）被认为是沿着绝对笔直的“飞行通道”来进行的。

今天，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所进行的萨满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和死去很久的祖先取得联系。通过使用迷幻剂，萨满教巫师进入迷幻状态，并想象他的灵魂（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他的肉体）正从生者的世界穿越宇宙去往死者的世界，然后返回。秘鲁东部的当代萨满教巫师们确曾“见过”宇宙的风光，他们为了能够更加生动地向人类学家描述他们的“亲眼所见”，还画出了宇宙示意图。

但是，假如古代纳斯卡萨满教巫师确实将笔直的沙漠直线作为拜访逝去已久祖先的“飞行通道”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为什么拜访他们的曾曾曾祖父，会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以致人们在成百上千年间不得不连续修建和复制穿越一个虚拟宇宙的数百条虚拟管道呢?

问题的答案，存在于纳斯卡人的周围环境以及他们的经



济体系之中。纳斯卡人所在地带从来都干旱缺水（最干旱地区每个世纪的水量不到 1/4 英寸）。纳斯卡人的经济体系（可能主要是玉米种植），完全依赖于从山上顺着 10 条主要的季节性河流所流下来的水。既没有降雨也没有自然泉水。从 40 英里外的安第斯山沿着纳斯卡山谷流下来的河水，是纳斯卡人惟一的生命之源。这股河水一旦断流，对纳斯卡人而言也就意味着饥荒与死亡。

正因为如此，萨满教与祖先或者神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灵魂飞行”联系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这是一条与支配他们的给水的力量直接联系的渠道。有意思的是，一种存在时间要晚得多的印加“直线”射线体系，也与确保水资源的安全有关。人们将“射线”处的尘土收集起来，并在宗教仪式当中把这些尘土撒入河流当中，以期河水能够把这些尘土带往祖先那个地方，作为支付的“水费”——神所征收的某种形式的水税。

关于纳斯卡直线，根据现在仍流传着的秘鲁民间传说称，纳斯卡人在实际的仪式队列——可能反映了萨满教的灵魂飞行旅程——当中会吹响潘神箫，以专门代表流水的声音。在最近所进行的几次远征活动中，也确实在那些“线条”处发现了古代的潘神箫。

此外，在那些居于射线体系中心的小山的顶端，也就是那些用以代表水资源来源山峰的小山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曾经举行过宗教仪式的证据，而举行这些宗教活动的目的则肯定是为了确保能够从东边 40 英里之外真正的山峰上获得给水。

正如墨西哥的特拉奥蒂华坎帝国，不论是从经济、宗教



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都依赖于水一样，对纳斯卡这个部落之首而言，同理可证。并且也正如特拉奥蒂华坎在干旱来袭时便分崩离析了一样，纳斯卡亦难逃厄运。公元6世纪中期那场席卷全球的气候灾变，对纳斯卡所造成的打击程度相当严重。从距纳斯卡以东仅230英里处的秘鲁奎尔卡亚冰川所得的冰核方面的证据表明，秘鲁曾遭受了一场起自公元540年左右，止于公元570年左右，长达30年的大规模干旱的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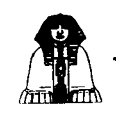
纳斯卡人究竟是怎样为生存而战却又最终战败这样一个史诗般的故事的细节，后人们将永远无法知悉。纳斯卡人没有留下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考古方面的证据都拼凑在一起的话，还是有可能重构导致了纳斯卡灭亡的可能机制。

纳斯卡危机

浑身刺青的萨满教巫师戴着用红色、蓝色及黄色羽毛制成的扇形头饰，及肩的乌黑头发不停甩动着，身体则随着鼓声与有节奏的铿锵之声战栗摇摆。

摇摆着，尖叫着，手臂伸展着，就像是一只飞翔着的鸟，萨满教的巫师在他自己意识的眼睛里，就像一只秃鹫般、像一支标枪般快速而又笔直地飞过了纳斯卡荒原，飞越了他的族人们假定的宇宙，一直到达了祖先和神灵们在东边安第斯山的僻静居所。

他目光呆滞，鼻孔中流出一股一股细细的蜜糖似的粘液——这是帮助他进入迷幻状态的草药所产生的副作用。



他的黑白两色的短袖和及膝长袍满是刺鼻的汗味，而他那镶边的斗篷则像鸟翼一样向两边伸展开去。一串用海贝制成的暗粉红色的项链，在他那件设计得仿佛一张棋盘似的长袍上有节奏地上下跳动着。汗水顺着他的面颊从额头流进了他的胡子里；画在他脸上的猎鹰般圆圆的眼睛，也开始变得污浊并慢慢模糊了起来。

夜幕开始降临，在萨满巫师进入迷幻状态的大广场上，聚集在巫师周围的人们或在诵经，或是盯着巫师，或者甚至虚脱了过去。当沙漠中的太阳开始与地平线相接的时候，这个橙色的圆球将这一切，以及广场四周一群群奇怪的“建筑物”，都沐浴在了一片温暖的红色光辉之中。

这是纳斯卡的“首都”，一座没有居民的巨大城市。这座城市是为着巫师、朝圣者以及纳斯卡式的祈祷——与“下”一个世界的灵魂飞行联系。现代考古学家称之为“卡胡阿契”（其原来的名字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的这座城市，其建筑风格是天然之物与人造之物的奇怪组合。虽然该“城”占地 375 英亩，但是从技术角度而言，城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因为卡胡阿契城中总共约四十处建筑物，全部都是阶梯式金字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从不曾真正修建过！事实上，这些金字塔都是先从整块的天然岩石中凿出雏形，再用大量的泥砖使其进一步具备金字塔的形状。其中最大的金字塔有 6 层，高达 50 英尺。

在广场上，处于“灵魂飞行”迷幻状态中的萨满教巫师继续摇摆，战栗，双手伸展着。巫师的意识发生改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大批的纳斯卡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脸上那种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神情较之往日更加明显。这一刻，萨



满教巫师的使命事关生死。大干旱已经袭击了纳斯卡山谷，紧随其后的便是饥荒与死亡。在那一刻，因为传统的萨满教灵魂之旅负有穿越宇宙确保给水的任务，所以它也显得较之平时要至关紧要得多。

上面所描述的场景，或者说某种与上面所述相当类似的场景，可能确曾发生过，虽然实际的细节情况的重构，尚需依据以下证据来进行：纳斯卡陶器和纺织品上的图案，人类学家所获得的与现存秘鲁萨满教传统有关的行为报告，以及卡胡阿契是一个宗教仪式之城而非一个居民城市的考古证据。

但是，考古与冰核方面的证据表明，纳斯卡人乞雨的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了，因为干旱一直持续了 30 年。

要在纳斯卡考古当中确定日期，是相当不精确的。不过，还是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大约就在干旱开始的时候，作为巨大的宗教仪式中心的卡胡阿契城就被人们弃置不用了。当然，甚至就是仅仅在农业歉收、饥荒肆虐的短短几年间，已有的宗教实践的可怜失败，很可能就开始引发宗教与政治局势的紧张。而这一点，根据考古记录，恰与实情相吻合。

这出戏的第一幕是从人们弃置卡胡阿契开始的，仪式和宗教的重心也从城市当中转向开阔的荒野及城市蔓生而出的“假定宇宙”，也就是沙漠上的那些巨大画作。

可能伴随着不同的纳斯卡部落在沙漠上刻画下大量新的射线体系，纳斯卡宗教活动的进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人们又新建了几十处射线体系，每一个称得上（以及一些还称不上）是小山丘的高地都被认作是一个假定的山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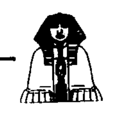
然后日益绝望的人们再在这些高地上举行宗教仪式来求水。在这些高地顶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祭品，这些祭品在大约1500前制作，是为了乞雨而祭献给神灵或者祖先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玉米穗轴、被用作祭品的骆驼和豚鼠的尸体以及大量碎陶器，而发现的地点正是公元6世纪时这些物品所在的地方。

在射线体系突然增加的同时，其他形式的沙漠"巨画"也大量增加了。在这一阶段，巨型梯形开始出现，而且人们在纳斯卡沙漠的焦土地上仔细地刻画了数目渐增的"之"字形图案，其中有一些长达300英尺。

但是，发生了改变并且增加了的并不仅仅限于沙漠地画。纳斯卡陶器上的图案——位列世界上最精美图案之中，也开始发生变化了。罐子上的图案变得比较暴力，比较不和谐。渐渐地，陶器上的图案开始以长钉、锯齿状的棍棒（可能是矛）、勇士、断了的头颅以及嘴里滴着鲜血的杀人鲸为主。一个重要的宗教图案，可能是一个神灵，则从一个人演变成了一个更具魔性、更具侵略性的妖怪。

继卡胡阿契被废弃以及"线条画"大量增加之后所发生的，不仅仅只是更具侵略性的图案，还有发生在真实世界当中的冲突。随着干旱的长期延续，不仅宗教稳定，而且还包括政治稳定都被打破了。抢夺食物成了一个人一天当中的首要大事。实际上，考古学家们成功地找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战争的增加造成了全面的恐慌。

1989年，在现代城市帕尔帕附近一处俯瞰山谷的山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处地窖，其中有48颗在公元6世纪时被砍下来的头颅。通过对这些头颅进行仔细的法医检查



后，人们发现，这些受害者是先被割断了喉咙，在他们死后，杀人者取走了他们的脑子、舌头、面部肌肉以及皮肤。接着，杀人者们再把死者的皮肤重新装回去，面颊和眼球处则填以布匹。最后，再在每具尸体的额头处打一个洞，以便能够用一条棉花或是人的头发编成的绳索把尸体吊起来。这些头颅可能是在战斗中被杀或是被俘的战士。他们的头颅被作为战利品放在胜利者所立的木制断头台上示众，而断头台所处的位置正在他们被杀戮的山谷之上。

冲突不断增加，肯定是由漫长的干旱所引发的对抗与政治混乱的必然结果。干旱时期，纳斯卡人所使用的武器做工相当粗糙，但在置人于死地方面却相当管用。陶器和纺织品上的图案表明，这些武器包括 5 英尺长的矛（用来刺杀）、木棍、石斧、投石器以及用带鲸牙把手的木制掷矛器投掷的 18 英寸长的掷矛。

战士们在作战时往往身穿无袖的短袍，可能有时也会垫上棉制的防护物。为了保护自己的头颅，战士们通常会戴上垫有棉花的头盔，每一具头盔顶上都有棕色羽毛制成的莫希干式顶饰。

但是，大旱在纳斯卡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宗教与政治的改变以及战争的爆发。在纳斯卡的几个地区，人们用他们自己的高技术向自然大灾难发动了还击，并且，高技术肯定也确实起到了作用，至少在其他因素将其压制下去之前是起到了作用的。“高技术”的解决办法是深入地下找水，将水集中起来，再引导到需要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在大旱肆虐的时期，纳斯卡人发明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修建了大约 50 处这样的汲水系统，



总长达到了30英里。其中有36处系统得以保留至今，而有一些系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些系统当中，有的是深入地下的3英尺宽的狭窄地道，有的是巨大的V形鹅卵石铺成的沟渠，底宽3英尺，顶宽30英尺。

人们通常称作“普奎欧”的这些汲水系统，每一处都纯粹仅仅是地方性的解决办法，长度一般在400码到1.5英里之间。这些系统的存在时间曾一度是个不解之谜，但是，现在有3种证据表明，这些系统是与大干旱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普奎欧所表现出来的对水情分析的仔细程度表明，这些系统的修建时间，应当是在发生了极其严重干旱的情况下，而且干旱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纳斯卡沙漠的干旱程度。

其次，要挖掘30英里的普奎欧系统，所需的时间是好几年。

第三，与此相关的陶器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全部指向了公元6世纪。

但是，还有最后一个令人着魔的伤心证据，也将这一系统与大干旱联系在一起，即当地民间传说中非比寻常的一页。当地传说称，人们在大旱时期修建了普奎欧系统，目的是要把当地印第安神灵在目睹其人民遭受痛苦时流下的眼泪收集起来。有些语言学方面的权威专家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的大干旱就在纳斯卡这一名称当中得到了体现。因为在当地的奎楚阿语中，痛苦一词“纳内”（nanay）据说演变成了“纳纳斯卡”（nanascca）这个名字，而后者再演化到今天，就成了“纳斯卡”。

如上所述，地球上最大的艺术品的创作者们变成了公元6世纪中期气候大灾难的受害者。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惟一遭到大干旱侵害的秘鲁人。

第二十七章　地狱之泥

在木制权杖杖头的打击和铜头标枪的戳刺下，这些赤身裸体、备受惊吓、已经半死的献给风神的人牲们，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解脱之地。

他们在南美洲最神圣的一个古代遗址中心——现在久已废弃的秘鲁北部的莫契城——所遭受的痛苦，构成了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大规模人牲祭祀的一部分。

有的"祭品"被砍掉了手指和脚趾，再被塞进了祭品死尸堆里。有的受害者的手指则被石头砸得粉碎。还有的受害者的脚被铜矛头刺穿。大多数受害者最后可能被斩首，或者被用大木棍殴打头部致死。但是，其他的受害者则肯定是因为血流尽而死。

仔细检查这些备受摧残的尸体，我们发现，他们所遭受的折磨情况远甚于上面所述。有的尸体被有组织地肢解，并按仪式需要重新摆放。有些尸体的头颅被放在了两腿之间，而身体则被故意地彼此叠在一起。

但是，在其可能的意义方面，这种恐怖的宗教仪式堆积最显著的一面，还在于其精确的位置——全部埋葬在一个由圣泥所构成的矩阵当中。最终用于埋葬被屠戮者尸体的粘土，恰恰正是一座巨大的砖结构寺庙"融化了的"外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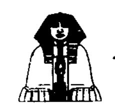
这些被牺牲掉的受害者与他们的巨大坟墓中的泥浆搅在一起，并非巧合。使用“融化”自精心装饰的寺庙外表面的圣泥，究其根本，就表明一定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暴风雨。在秘鲁北部海岸及其周围地区，也就是人牲遗址所在地，这样严重的倾盆大雨还只在偶尔发生被现代人称之为“厄尔尼诺现象”的气候变异时出现过。

最近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大规模的人牲被杀的情况与至少两次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在每一次宗教杀戮中被害的人牲都达到了 40 人。同时，考古发掘工作还找到了刽子手——肯定是某种战士巫师——的坟墓。

在其中一座坟墓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年龄为 60 岁的死者遗骨，在遗骨的旁边还发现了他那令人恐怖的职业工具——一根 3 英尺长、还涂有无数冤魂鲜血的木棍。对其遗骨所进行的医学分析表明，即使在 60 高龄时，他仍然肌肉巨大、体格强健。和他葬在一起的是一个孩子，一个 16 岁的男孩，可能是他的私仆，也许是为了能够陪伴主人去到下一个世界而被杀死的。在离这座坟墓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座双人墓。墓中除了一名年纪在 45 岁左右的成年男子以外，也有一个小男孩，不过年龄仅有 13 岁。

大规模杀害人牲，发生的时间在公元 500 年到公元 700 年之间。这一行为向我们描述了莫契文明在面对气候灾变的危胁时，在宗教方面所进行的某种极端应对的情况。就目前所进行的考古发掘的结果而言，这些相关的危胁都是大规模的厄尔尼诺暴风雨。这是一种可怕的大洪水，它足以冲走整个城镇，摧毁整个灌溉系统并把社会搞得乱作一团。

在公元 6 世纪中期的气候灾难肆虐的时候，莫契文明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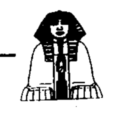


到了严重的干旱与间歇性的、并且也肯定是毁灭性的厄尔尼诺大洪水合力的无情打击。有关美洲发生大干旱的证据，在本书第二十三章当中已经提到。但是，其中用作证据之一的奎尔卡亚冰川冰核同时也揭示了在公元 6 世纪里日益增加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可能时间：约公元 490 年，约公元 526 年，约公元 556 年，约公元 580 年，约公元 590 年，约公元 592 年以及约公元 630 年。请注意，从公元 490 年到公元 592 年，每两次重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间间隔从 36 年减为 30 年，再减为 24 年、10 年，最后再减为 2 年。

安第斯地区的干旱（约公元 540 年至公元 570 年）肯定是公元 6 世纪中期的气候危机的一部分，但干旱是否在加速公元 6 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就不清楚了。但是，世界范围的气候问题，肯定使得厄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影响较之其他情况下更加严重了。

莫契城在面对严重的干旱以及大洪水时，试图用人牲来抚慰他们的神灵。同纳斯卡的宗教一样，莫契的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大部分是萨满教。与祖先的联系，特别是在发生气候灾变的情况下，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时间比后人要早，而且还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干预神灵或者自然之力来阻止灾难，终止不幸或者带来繁荣。

与死者的联系具有现实的经济及政治重要性。最近的一项考古发现可以向我们展示其究竟有多重要。考古学家们在莫契城一座寺庙某个房间的地板下，发现了一套真人大小的跳舞骨制木偶，它们是用人骨制作的。对骨头进行仔细检查后，人们发现，这些骨头是用专门的屠杀工具剔出来的，骨头与骨头之间的关节都还保存完好。



在欧洲，这样的概念肯定直接出自但丁的《地狱》，但是，在处于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秘鲁。这样的遗骨应被视为是为打破现世与下一个世界之间的障碍而进行的仪式的参与者。他们可能象征着在发生诸如大干旱这样的气候灾变的时期，人们拼命地渴求着祖先的干预。

在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可能是公元6世纪早期，莫契帝国控制着秘鲁极北地区派尤拉河到南边300英里之外海岸上的胡阿尔梅15000平方英里的领地。其势力向内陆地区的扩展，向东至少达40英里。

其首都占地至少一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为7000人，城中有两大主要建筑。其中之一是一个巨大的十字形结构，在其南端有一座高160英尺的金字塔。这一巨大的十字形建筑占地超过了14英亩，由5300万平方英尺的泥砖和其他建筑材料构建而成，而建筑材料用量达到了埃及大金字塔的3/4！大部分的建筑最终都被西班牙寻宝者们毁掉了。当年，他们为了找到隐藏的黄金，甚至不惜引河水来冲走泥砖。

但是，发现了大部分与莫契宗教及仪式相关事物的，还是该城第二大中心建筑——一座略小一点的寺庙。正是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人牲、刽子手的坟墓、骨制木偶以及一系列描述令人不寒而栗的长有大尖牙的神人合一的壁画。

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事件——大干旱以及厄尔尼诺现象，起到了动摇莫契帝国的作用。

持续时间长达30年的干旱引发了严重的饥荒，而发生在大约公元556年的厄尔尼诺洪水又摧毁了灌溉系统，这对本已严峻的粮食供应来说，简直无异于雪上加霜。本已被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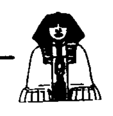
饿搞得身体虚弱的人们，接着就成了一系列传染病的牺牲品，就像同一时期的墨西哥特拉奥蒂华坎人死于饥荒和疾病一样。

虽然整个安第斯地区都遭到了气候问题的袭击，但是，本已贫瘠的海岸平原地区被袭击的严重程度肯定远远甚于东面的高地。在发生干旱时，低地的情况一般都比高地要糟糕得多。附近少有的几片雨云，通常会在遇到高山阻拦时降雨。此外，降雨量一旦减少，就无法保证发源自山峰的河流水量了，而海岸平原的灌溉完全依赖于这些河流。低地由于缺水，就会失掉其大部分植被，反过来又会导致水份保持的减少并加速土壤的侵蚀，从而使得沙漠形成并扩大。

居于海岸平原地区的大量人口，仅仅只有两个可赖以获取食物的生态小环境——平地和海洋。相反，居住在高地上的人们有多个不同海拔高度的地区可供选择。他们可以从山谷谷底、山峰、高山牧场以及湖泊中获得食物。事实上，在湖泊的面积减小的时候，通常会产生出许多新的极其肥沃的居住地，有助于农业生产。并且，所有居住在山上的人们，离重要的水源肯定也要近得多。

最初，地缘政治平衡的改变，可能会使海岸平原与高地之间的山麓小丘腹地挣脱莫契的控制。这就使得莫契人更难得到此地的食物、铜、金银以及在宗教仪式上非常重要的药用植物古柯，而高地人，特别是最强大的高地部族华阿里人，则很容易就能得到这一切了。

随着经济与地缘政治形势日益青睐山地，南北高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成为了秘鲁境内主要的“商业”通道，而这条通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另一条主要的南北通道——沿



海岸的那条通道——的衰败为代价的。

而且，海岸地区开始遭受干旱与严重的厄尔尼诺洪水带来继发影响。在这样短暂但却是严重的洪水当中，有成百万吨的沙子从干旱的土地中被冲走，被厄尔尼诺洪水一直冲向海岸的方向，并在近岸处堆积了起来。接着，沿岸海水的冲刷又使得这些沙子顺海岸铺展开来。潮水将这些沙子冲上海滩，强劲的海风则使这些沙子形成沙丘，并将沙丘推向内陆。在典型的沙漠化过程当中，沙丘向内陆进军——恰在大干旱结束之后，并摧毁农田和城镇。实际上，华卡德尔索尔周围的部分莫契城就是在这股沙潮中被淹没的。

这样，这杯致命的灾难鸡尾酒，对高地及海岸地区所造成影响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居住在相对贫穷的内陆山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程度，远不及海岸平原地区表面看来比较富裕的人们。无论是从人口方面，还是从社会组织与控制这个方面来说，海岸都不再具有任何优势了。

莫契文明最终因来自高地人，特别是华阿里人的压力而在政治上分裂了。金字塔城本身——莫契，相对而言没有受到破坏，但是，莫契城失去了它控制之下的许多领地。在莫契城以北 85 英里的一个地区，建立起了一座新城——帕姆帕格兰德。该城渐渐倾向于受到华阿里影响的文化取向，这可能反映了日益增加的华阿里地缘政治力量的影响。

事实上，就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在距莫契西北仅 23 英里处，受高地影响的人们就已经居住在一座新的城镇当中了。该城如今就是被考古学家们称之为“加林多”的一组废墟。古莫契城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虽然莫契城又继续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但是，它荣耀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



返了。

伴随莫契城势力的衰败而来的，是战争的明显增加。包括莫契在内，居住在秘鲁北部海岸的各个文明区修建了许多巨大的防护墙。毫无疑问，这些防护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位于莫契以北 100 英里处，今切潘附近崎岖不平的山峰之上的防护墙。修建此处防护墙的，正是建立了加林多城的受高地影响的文明。

这座时至今日遗弃已久的山顶城市被巨大的城墙环绕着，城墙宽 12 英尺，今天的残存高度亦达 27 英尺。该城人口估计有 5000 人左右，城中有占地达数英亩的建筑群，可能还有一座宫殿。但是，最特别的是，城中却没有供水！水可能需要搬运工从山谷中运上来，再以某种方式储存起来。

在莫契南部，在散塔山谷及乔山谷中的塞罗德拉克鲁兹，还有许多巨大的防御工事的废墟，那里有一堆堆的投石，它们静静地躺着，就像是在作无声的证明：公元 6 世纪中期的气候问题发生以后，安全形势也随之恶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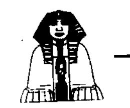
甚至就在莫契城附近，也有一道巨大的防护城墙，由石头和砖坯构成，长 1600 英尺；而在加林多，则有一道高 13 英尺、上有胸墙的防护城墙横越山谷达 1300 英尺。

当华阿里开始在秘鲁中部与北部扩张之时，在秘鲁的最南端，在玻利维亚及智利北部，一个与此类似或者说相关的过程正在发生之中，即高地的提瓦纳库帝国的扩张，并且这一次又是以海岸平原的衰落为代价。

这样，在整个安第斯地区，公元 6 世纪中期的气候混乱改变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就像它在同一时期也改变了

中东、中国以及墨西哥的地缘政治平衡一样。

但是，从这些地缘政治改变中崛起的华阿里和提瓦纳库帝国的本质是什么呢？——此外，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南美的长远未来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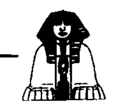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章　一个帝国的诞生

距离大海 150 英里、在秘鲁中部的纵深内陆，在高达 16000 英尺高的山峰包围之中，有一座南美洲最奇特的古代城镇。

该城占地约半平方英里，城中有 20 个矩形的广场，在每一个广场的侧面都有 150 个蜂窝似的房间，其中许多房间都有 3 层。每一个广场与其他广场之间，都被 40 英尺高的巨大石墙隔开，而全部 3000 个房间则是按 6 种基础设计修建的。

最初，考古学家们认为整个建筑群——在库斯科附近一个叫作皮基拉克塔的地方——肯定是座巨大的古代监狱。该建筑群在修建时全然的一致性以及军事上的精确性，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控制与管理之谜。甚至就是现在，其真正的作用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尤其是，该建筑不过仅仅是散布于整个秘鲁境内的这些神秘建筑中最巨大的一处而已。

这些建筑全部是基于相同的基础设计修建的，其修建日期都可追溯至第一个泛秘鲁帝国华阿里的早期阶段。华阿里帝国是继气候引发的公元 6 世纪中期至晚期的地缘政治混乱之后开始出现的一个帝制系统。当初修建这些建筑是作为帝国行政中心用的，此外，也用作官员、普通百姓居住之用，



也可能还用作军营，并用来储存大量的贡品和实物税收。

华阿里人创建了一个纵横达 13 万平方英里的帝国——领地南北距离为 900 英里，东西相距平均约为 150 英里。帝国人口约为好几百万，其首都也叫华阿里，占地 1750 英亩，约有 3 万居民。

华阿里帝国的出现，使得其后的秘鲁——实际上应该是其后的南美洲历史发生了深刻改变。因为，作为第一个泛秘鲁的帝制系统，它是一个帝国原型，为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印加帝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为公元 16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早期的西班牙 – 安第斯帝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正是华阿里人，发展了大规模的农业梯田系统。而这一系统则极其有力地推进了粮食生产与人口扩张，从而帮助这一地区的高地人（其中包括后来的印加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的大部分时间中支配了海岸地区。

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点是，人们是为了应对在公元 540 年到公元 570 年间破坏了安第斯世界的大干旱而发展农业梯田系统的，并且也正是这一应对之策，推动了华阿里人在持续 30 年之久的灾难当中及其后进行扩张。

也正是华阿里人，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路系统。通过这一道路系统，后来的印加帝国和早期的西班牙 – 安第斯帝国紧密联结，并推动了这两个不同时期帝国的经济发展。这些人也发明了独特的安第斯式的记录保存体系“奎普”。这一体系在帮助其帝国及后来的安第斯帝国体制运作中起到了作用。奎普由一套绳索组成，其中的绳节就代表数值或是单词。这一体系曾被用于记录税收、贡品以及义务劳动的情



况。

在华阿里帝国诞生之前，安第斯地区诸国基本上都是单一文化且相对较小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莫契，面积也不到 1.5 万平方英里。相反，华阿里则直接或是通过其附庸国控制着总面积约为 13 万平方英里的领地（等于英国、爱尔兰与荷兰这 3 国面积的总和），并且也因此就很自然地容纳了几十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体系。泛安第斯帝国的理念，在印加时期继续得以重新出现，并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以及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得到继续发扬光大。

华阿里帝国文化的多元性，意味着必须发展一种中央国家的宗教，以提供一种统一因素。这样，一个特别的太阳神就被提升到了超级神灵的地位。这个神灵——一个拿着两根可能是武器的棍棒的男性，并不是要取代多种文化并存的帝国内部的地方性神灵，而是要充当一个不同的万神庙中新增精英的角色，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充当一个为所有宗教所共同敬仰的居于顶端位置的神灵。皇帝本人则自视为这种宇宙安排在世俗中的反映——天堂中本是如此排列的，所以地球上也该如此排列。

在印加时期，从西班牙殖民时期至今，在印加太阳神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叠印现象。统一的宗教基督教，仍然是由多种宗教构成的蛋糕上惟一的顶层成份。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华阿里帝国可能也改变了秘鲁。有些学者认为，华阿里帝国的出现就带来了早期盖丘亚语的流传，可能最初是作为混合语，接着就成为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居于支配地位的语言。大多数观察家把盖丘亚语的传播归因于印加帝国，但是事实上，华阿里帝国在这方面



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历史的连续性上，印加帝国在时间上并不是紧接华阿里帝国之后的。这两个帝制体系之间实际上有500年的时间间隔。但是，正是在华阿里帝国所建立起的经济与通讯基础设施（尤其是农业梯田和道路网）的推动下，高地安第斯帝制系统在印加人的努力下得以重现。

此外，政治方面也是具有某种连续性的。虽然印加帝国自身在大约公元1300年才出现，但是它很可能是在两个面积虽小但却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合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两个国家是基尔克和源自华阿里的路克雷。后者的历史是从作为华阿里帝国中军事化程度最高、政治上战略地位极重要的一个省开始的。这个华阿里帝国省份的行政首都，是一个不亚于神秘之城皮基拉克塔本身的地方，其中有3000处蜂窝式的房屋及军国主义的气氛。

正如皮基拉克塔是华阿里帝国重要的军事基地一样，附近一个叫作库斯科的定居地成为了新生的高度军事化的安第斯帝国——即印加帝国——的中心。并且，在公元1530年，当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秘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而仅仅只是短时期过渡性地接管了印加帝国。

在3年里，西班牙人通过一个傀儡印加皇帝对新征服的土地进行统治。而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则成为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第一个正式的自治城市。此外，西班牙人还沿袭了印加人（以及可能的前华阿里人）的“强制劳动”制度，并运用这一制度支撑起了他们新的殖民经济。

印加帝国的边境大体上成为了西班牙总督治下领地的边境，从而间接地帮助决定了今厄瓜多尔、秘鲁以及智利的许



多边境。

因此，正是从公元6世纪的气候事件中，一套帝制传统得以一直留传到欧洲人侵入，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今日南美洲的成形。

但是，华阿里还仅仅只是早期安第斯帝制传统的一部分(虽然从领地上说，是主要部分)。另一个安第斯帝国从公元6世纪的气候混乱中分娩出了。



第二十九章　宇宙核心处的石头

根据古代安第斯神话，在很久很久以前，上帝降下了一场可怕的洪水。洪水毁灭了所有的生灵，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对男女——最初的创造物中仅存的生灵，乘着一条船在水上漂荡。洪水退去以后，他们被风吹到了安第斯山东西山脉间的一个高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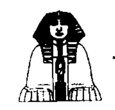
风吹送他们到达的地方叫做提瓦纳库，上帝将他们的命运放在了那个地方。从神圣创造之地的山洞里、河水里以及泉水里，他们唤起了人民，而这些人民将会处在他们代表上帝所行的统治之下。

但是人类仍未完全遵从神的旨意，所以上帝决定创造宇宙，以使人类混乱的思想能变得井井有条。

正是这样，在大风刮过的提瓦纳库高原上，上帝创造出了星座、月亮以及太阳，它们将会按照自己早已定好的旅程划过天空，以帮助人类始终遵从上帝。

安第斯的宗教认为，提瓦纳库，也就是高原上的那个地方是创造的熔炉。也就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周围，一座神圣的城市扎下了根来。这座城市的名字在当地的艾马拉语中被叫做塔伊皮卡拉——“宇宙核心处的石头”。

最初，提瓦纳库（塔伊皮卡拉），位于南美洲最大的湖



泊的的喀喀湖边，可能仅仅只是朝圣者的一个地方性住所。但是，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块“石头”不仅变成了宇宙的宗教中心，而且还变成了它的政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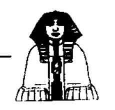
该城从一个拥有约 0.5 万到 1 万居民的地方性重要城镇，发展成为了安第斯的超级大国，一个人口达 5 万人的中心，而其内陆更是拥有 100 万人口。作为宇宙中心和政治中心，该城在南美洲的地位已经相当于墨西哥大都会特拉奥蒂华坎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提瓦纳库的扩张就是华阿里在安第斯山脉北部的扩张，在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再现。它们是同一地缘政治现象的组成部分。这两者都是高地国家，并且也都在公元 6 世纪晚期和公元 7 世纪以海岸平原文化的衰败为代价进入了帝国时代。

同华阿里一样，提瓦纳库进入帝制是继安第斯地区的政治体系混乱之后，而这一混乱现象则是出现在公元 6 世纪中期发生大干旱的时期。虽然提瓦纳库可能早在公元 4 世纪和公元 5 世纪就与偏远地区建立起了为数不多的各自孤立的附庸关系，但是推动帝国出现的主要驱动力，却是在公元 6 世纪后半期及公元 7 世纪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扩张、纪念碑的修建以及在帝国首都所进行的宗教活动产生的。

公元 6 世纪晚期的起飞，应当归因于大干旱对高地上的提瓦纳库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海岸地区本已存在的贫瘠，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又合力引起了人口、经济与军事的不平衡。

提瓦纳库不仅和华阿里一样，有能够在遭到气候打击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性开采的多种生态区域，而且提瓦纳库还拥



有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泊——面积达3200平方英里的的的喀喀湖。因为它在发生干旱时的生存能力远胜过海岸地区的文明，所以一旦持续几十年的干旱结束了，它也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繁荣、扩张。

这样，因为提瓦纳库具有比其海岸地区甚至是高地竞争对手更多的优势，所以，它可能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干旱时期就开始扩张了。实际上，该城痴迷于纪念性的建筑，可能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干旱本身可能导致了提瓦纳库最大的寺庙的修建，而修建这座寺庙的目的则很可能是为了劝服雨神。

这座寺庙为一个巨大的十字形7层金字塔，宽650英尺，高55英尺。从其形状而言，这座寺庙几乎就是位于城南3英里外的一座圣山的复制品。除了象征性的形状以外，这座金字塔还从两个特别与水有关的方面重现了南山。金字塔的塔顶，实际上部分地是用从南山的山坡上取来的特殊的蓝绿色（也就是水色的）砂砾修筑而成的。金字塔内部也有一套复杂的水力系统，当寺庙中的神职人员操作这套系统的时候，水就会像一道小瀑布般从金字塔供人行走的一侧流下。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天气状况良好时水形成瀑布从真正的山上流下的情境惊人地相似。

在金字塔中，水储存在嵌入金字塔顶部的一个60英尺×55英尺的巨大水库当中。这个水库能储存150万英加仑的水，它和模拟瀑布一起，肯定是在一系列的塞子或者是水闸的控制之下的。水力系统，也就是一系列在石头上挖出的管道，确保了水能流进金字塔，也确保了水能形成瀑布流出金字塔，而推动这一切完成的驱动力不过是地心引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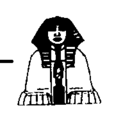
如果金字塔是在发生大干旱的时期修建的，那么明显不可能依靠降雨的补给来填满水库（假如降雨量已经足够的话，那又何苦还要劝服雨神呢?）。甚至就是在平常，光靠降雨的补给，也是无法达到制造瀑布效果所需水量的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在发生干旱的时期，人或者是骆驼费尽千辛万苦，将用兽皮袋储存起来的湖水或是河水运到了金字塔的顶部。

在对雨神进行劝服的同时，人们也运用了巫术，寄希望于运来的水色砂砾和模拟瀑布能够有助于产生真正的降雨。

现在通常称之为阿卡帕纳（字面意思为“黎明之地”）的大庙，是提瓦纳库最大的单项建筑。这座7层金字塔由粘土、泥土、砂砾以及切割精美且斜面切割精巧的石块组成，当初这座金字塔上装饰的肯定曾有纺织品、金属板，还可能有雕刻或是绘制的拟人或动物形象。该寺的神职人员，也可能同时是该城的统治者，好像是居住在遗址中某些平台上的房间当中的。其中就在阿卡帕纳上面的某处，可能位于其顶端水库的前面，曾矗立着被神化了的统治者的20英尺高的雕像，有一些雕像的碎片保存至今。

正如在发生大干旱时提瓦纳库的政治势力相对其海岸地区的竞争者有所增加一样，其人口也增加了。政治势力增加了其在商业、宗教以及人口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在干旱结束之后不久的几年间，人口的压力以及对更多食物的需求，迫使提瓦纳库人发展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新办法。

人们开垦出了许多由成千上万英里沟渠灌溉的粮田。这一新的系统不再依赖于直接降雨，而是依赖于地下泉水和附近的的喀喀湖的地表水。提瓦纳卡人知道，在地势相对较低



的地方种植一种块茎庄稼土豆，需要增高土地边缘的高度，以阻止地表水泡烂最重要的块茎。提瓦纳卡人是因为干旱所迫，还是仅仅是因为干旱过后人口的增加所迫，或者这两个原因兼有，而发展这种新的不直接依赖于降雨的灌溉系统的，目前尚不清楚。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系统投入使用，但是很快，提瓦纳库的人口就从不足 4 万人一下增加到了 50 万。

最终，该城修建了至少 75 平方英里的种植田园。但是，新的灌溉系统是怎样如此显著地推进农业产量的呢？一般情况下，每一块种植田宽 13 至 33 英尺，长 660 英尺。现代试验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些田地的产量通常至少是该地区常见的非灌溉的、直接依赖降雨的农田的 3 倍。在偶尔出现的寒冷情况下，灌溉农业的产量则是普通系统的 19 倍。最终，在 14000 英里的巨大沟渠网络范围内，修建起了 25 万多块这样的小块田地。

虽然提瓦纳库人不可能解释清楚他们所采用的应对干旱的办法——种植田园，究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现代科学成功地揭示了个中奥秘。

在最近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当中，科学家们试图用这种遗弃已久的农业技术来增加今天的农业产量。结果，科学家们发现，种植田园中营养物质的流失速度要远远慢于普通土地中营养物质的流失速度，这就增加了土壤中氮的固化，同时降低了土壤的盐浓度。人们用挖掘沟渠时所挖出的土壤来修建种植平台，这就保证了土壤得以充分透气，而且很松软，这两点，对于确保庄稼保持水分以及吸收重要水溶营养物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水渠也是一个用之不竭的自然肥料的来源。沟渠当中会很快滋生出大量的水生植物，其中包括阿左拉和其他的固氮有机物。当这种具有固化大气中所含氮元素能力的水生植物被从水中捞起来堆积到种植田园当中以后，田园中土壤的氮含量就大大增加了。

研究也表明，种植田园系统在保存热量这个方面也比普通农业要有效得多。这就保护了庄稼不受霜冻侵害。1988年2月，科学家们做了一个试验，结果表明，栽种在种植田园当中的庄稼，只有10%被霜冻严重损害，而在普通农田当中，这一比例则高达70%到90%。

达成这一切的机理固然简单，但却非常有效。白天，沟渠吸收太阳的热量，其温度较之周围空气的温度要高出华氏20度。夜晚，也就是庄稼极可能被霜冻侵害的时间，沟渠保持住了它的温度，并用一个“热量封套”把生长平台包围了起来。

沟渠中的热量向寒冷的夜空辐射，这就阻止了种植田园周围和上面的空气结冻。而水中的热量也通过毛细作用从沟渠的边上渗出来，进入到庄稼生长平台中，从而温暖了庄稼生长的土壤。这样，提瓦纳库人最重要的作物马铃薯，就得到了来自下面和来自上面的热辐射。

由此而产生的人口增加，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在它与由大干旱及其之后的农业繁荣所引发的其他重要的宗教和社会改变合而为一的时候。

总而言之，提瓦纳库从一个相对地方性的宗教与经济重地，转变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大都会，一块对安第斯人而言的



真正的“宇宙核心处的石头”。

农业的繁荣引发了进一步的人口增长，究其原因，则在于营养物质的增加和婴儿存活率的提高。此外，移民的因素也应考虑在内；并且，提瓦纳库通过向其现存的和潜在的未来附庸部落供应粮食和酒（包括平时的用酒和宗教仪式上的用酒），也扩张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祭祀雨神的阿卡帕纳神庙，并不是提瓦纳库用作宗教仪式之用的城市中心里惟一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物。现在人们称之为“普马旁库”（字面意思为“美洲狮之门”）的神庙是城中的第二大金字塔，占地面积约为 600×600 平方英尺，高仅有 20 到 25 英尺。这座金字塔和阿卡帕纳一样，其中也有一套用于制造模拟瀑布的水力系统。

此外，就在毗邻阿卡帕纳神庙的地方，也耸立着一处占地达 430×430 平方英尺的辉煌建筑，该建筑可能是一处用作祖先崇拜之用的神庙。这座寺庙被巨大的琢石和沙岩墙围了起来，须经过一段巨大的楼梯和一道门才能进入。该建筑可能曾是一座死亡王宫。其中的一些房间内部曾被饰以一系列的雕像。这些雕像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提瓦纳库人的个人“肖像”，其中包括过去的统治者和王朝的祖先。此地可能曾是统治者们被制成了木乃伊的遗体最后休息的地方。可以肯定，正如在其他的安第斯文明——其中包括会邀请祖先的木乃伊出席国家宴会的印加文明在内——当中的情况一样，在古代提瓦纳库，被木乃伊化了祖先遗体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活人甚至会安排木乃伊们互相进行社交拜访。

正如在所有的宗教与政治体系当中一样，象征主义在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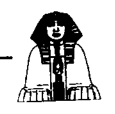
力实践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祖先授予权力，同时也授予与神灵的亲密关系。但是，在城市中心象征性地存在着的处于屈从地位的被统治者，也授予其统治者以相当的权力。

而这正精确地描述出了在一个巨大的已经沉陷下去了的庭院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庭院位于进入祖先神庙的楼梯脚下。在这个已经沉陷的广场的内部，曾经（并且今天亦是如此）装饰着成百上千颗石制的头颅，且大小、风格不尽相同。这些头颅可能是当时臣属于提瓦纳库的被统治者和附庸部落祖先的肖像。

这条“帝国画廊”的准确修建时间尚不清楚，但是，极有可能大体与阿卡帕纳神庙在同一时期修建，或者是在其之后修建——可能是公元 6 世纪晚期或者公元 7 世纪。这条长廊的修建还可能与殖民扩张时代有一定联系。而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要么是伴随着城市的成长及其巨大的仪式中心的修建开始的，要么也是在其后不久就开始了的。

从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正如公元 16 世纪时，最初驱动欧洲人的殖民行动的原因，主要是对奇珍异品的渴望而并非是对土地和征服的兴趣一样，在提瓦纳库迈向帝国的第一步当中，情况亦与此相仿。

但是，公元 16 世纪的欧洲人是为了商业利润寻找香料和黄金，而公元 6 世纪晚期和公元 7 世纪的提瓦纳库人所需的玉米是为制造啤酒用，所需的古柯则是用作药物。玉米和古柯在提瓦纳库的宗教仪式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而且提瓦纳库人也通常会在盛宴上赏赐玉米和古柯，以此来巩



固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玉米和古柯更是非同寻常了。因此，提瓦纳库人在偏远的地方建起了殖民地，以确保能够获得古柯和玉米，还有贝壳、矿物、奇物的水果以及其他的食品。提瓦纳库人也可能曾将玉米作为某种通货来使用。考古学家阿兰·科拉塔在他所著的《提瓦纳库——一个安第斯文明的肖像》一书中指出，玉米提供了“一种可储存的、高价值的、由国家控制的交换媒介，统治者可以用它来从平民们那儿‘购买’劳动”。

新兴的提瓦纳库在公元6世纪晚期到公元7世纪早期所殖民的第一批地区当中，包括了位于秘鲁南部塔姆波河与智利北部洛阿河之间的200英里海岸平原延伸地带，在这一海岸地区的至少8个河谷中建起了定居地。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殖民地——一个人口达2000人的定居地，是公元600年左右在秘鲁南部纵深地区的莫奎古阿河谷中修建的。

提瓦纳库拥有这些位于其西部及西南部150英里外的海岸地区殖民地，这就表明，这个大都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中间地带。否则的话，这个大都会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联系就无从谈起。

同样，在提瓦纳库以东150英里处，在今玻利维亚的科查巴姆巴地区，提瓦纳库人也在森林密布的群山间的潮湿山谷当中建立了几十个殖民地，以种植玉米、古柯、辣椒、胡椒以及热带水果。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提瓦纳库式的墓葬，因此，中间地带肯定也在提瓦纳库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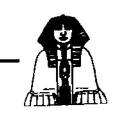
在这个大都会以南300英里处，在靠近南美洲仅次于的



的喀喀湖的第二大湖波波湖的地方，提瓦纳库人建立了定居点，以控制并开采盐、硫磺、可食用粘土，以及最重要的玄武岩。后者可用来制作从农用工具到纪念性雕像的各种高质量石制品。为了获取大量最好的岩石，提瓦纳库的工程人员和矿工不得不在地下挖出数英里长的坑道，可谓是相当壮观。至于矿石的开采（在波波湖以西15英里处的克雷米塔），究竟是由提瓦纳库殖民者开始的，还是由当地部落在殖民者来到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坑道系统的大规模延伸与扩张，至少是由提瓦纳库人来完成的。今天，波波湖地区以及的的喀喀湖地区和提瓦纳库地区，由泛美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但是，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由矿石制成的产品——工具和雕像（其中有一些重达半吨），则必须沿德萨夸德罗河运输250英里。

上面所提到的采矿建筑，可能是南美洲最不为人所知的主要考古遗址。实际上，这一遗址与提瓦纳库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玻利维亚考古学家卡尔罗斯·篷斯发现。最近，科学家们使用一种称为中子活化分析的高技术方法，对提瓦纳库的玄武石制品和克雷米塔的岩石进行匹配分析，结果发现二者完全匹配。

克雷米塔在提瓦纳库南西南250英里以外，但是提瓦纳库最偏远的殖民地——可能是贸易站，距离这些偏远的矿山都还有数百英里之遥。其中一处殖民地在提瓦纳库南西南570英里之外，位于今阿根廷奎布拉达德胡马华卡。此地是一个农业发达且矿藏丰富的地区的中心，该地区出产铜、银、金、黑曜石以及玄武岩。而在奎布拉达以西350英里处，在地球上最干燥的一个沙漠的中央，提瓦纳库人建立了



阿塔卡马这样一个贸易站殖民地，以通过贸易交换获取诸如天青石、水晶、绿宝石一类的稀罕货物。

提瓦纳库帝国至少延续了600年，而它最终崩溃的环境却也并非与其诞生的环境全然不同。公元11世纪和公元12世纪，在一场持续时间极长的干旱（持续了大约250年）摧毁了安第斯地区的地缘政治并且分解了提瓦纳库帝国之后，安第斯的历史再一次被气候灾变改变了。

到那个时候，从政治方面来说，这块“宇宙核心处的石头”也许已经衰落了，但是，从宗教方面来说，它还远远没到消亡的时候。提瓦纳库遗址保持了其在宗教方面的重要性，而且，其传统与神灵继续影响着后来的安第斯历史，从很多方面说，还包括了在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印加帝国。

正如华阿里帝国的传统推动了印加帝国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成形一样（详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提瓦纳库帝国的宗教遗产帮助形成了印加帝国的信仰遗产。实际上，在基督教这个幌子的虚饰之下，古代安第斯宗教至今仍在秘鲁以及玻利维亚的1600万印第安人当中以相当的程度存在着。

从巨大的太阳之门上方向下静静凝视着、坐落在可能的死亡王宫中，这便是提瓦纳库人的雨神图努帕。

图努帕被描绘成是站立在巨大的阶梯式金字塔——可能是普马旁库神庙或是阿卡帕纳神庙本身——的顶端，一手拿着投石器，另一只手则拿着掷矛器。最近给失传已久的提瓦纳库历史带来一丝光明的考古发掘，只可能在今天的当地印第安人祭祀过图努帕之后才能进行，而祭祀活动是在阿卡帕纳金字塔——塔伊皮卡拉的中心，宇宙核心处的石头——进



行的。

虽然，最初提瓦纳库殖民帝国从根本上来说可能并不具备军事的区域性本质，但是，仅为确保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常规运输通道的安全，提瓦纳库也必须对各殖民地间的广阔土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控制只需要通过提瓦纳库帝国的威望、其宗教的传播以及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的不断增长就能达成。许多偏远的部落可能是兴高采烈地，也许是谄媚地希望能有机会引进这样一套系统。帝国主义以奇特的方式推进开来。

整个世界——从君士坦丁堡到中国，从不列颠到非洲，从蒙古到秘鲁，人类文化与地缘政治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事件的影响之下改变了。

那么，那些气候事件又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它们自己的呢？现在，已经到了搞清楚究竟发生过些什么的时候了。



第九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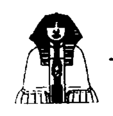
灾难之因

第三十章　最后的调查

"我们从太阳那里见到了一个征兆，那是一种既无前人见过也无前人报告过的征兆：太阳变得黯淡无光，并且这一现象持续了18个月之久。每一天，太阳都只发光大约4小时，并且即使在这4小时里，能见度也相当低。每个人都断言，太阳再也不可能恢复它往日的光彩了。"

以上的文字是一位公元6世纪的历史学家、卓越的教会领袖、以弗所的约翰写下的。它描述了公元535年和公元536年当中，我们这个星系中的恒星显而易见的情况。上面这段天启式的记录见于其伟大的历史著作《教会史》的第二卷。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各卷当中只有第三卷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但是，幸运的是，一位在时间上要晚许多的历史学家，一个被称为叙利亚人迈克尔的安提俄克大主教，在6个世纪后写作时照抄了《教会史》中有关太阳近乎消亡的情况的描述，并且还零零碎碎地引用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卷当中的一些内容。

正如我们在本书最开头的地方已经提到过的那样，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也曾记述了太阳在这个时间所出现的异常情况。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征兆，一种只会被证明是太过正确的感觉。"今年，出现了最恐怖的征



兆,”他这样写道,“因为在这一整年里,太阳发出的光就像是月光一样黯淡,如同发生了日食一样。太阳所发出的光一点都不明亮,和它以前发出的光大不一样。”这位历史学家、巴勒斯坦裔的高级政府官员这样写道。

另外一位公元6世纪的作家——麦地伦的撒迦利亚,是第三个记录了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的“黑太阳”事件的人。他在自己所编写的编年史当中写道:“白天,太阳开始变得黯淡无光,晚上则是月亮无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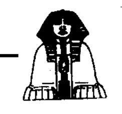
第四个对此加以记录的人,是一位安那托利亚裔的罗马官员兼学者,通常被称之为吕底亚人约翰。他报告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太阳变得暗淡了。”

上面提到的所有报告,都是由在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记录下来的。在意大利,一位当地的高级文官也记录下了太阳所发生的这一现象:

“太阳似乎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芒,呈现出一种有点蓝的颜色。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在正午都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们觉得太阳热量那无穷的活力似乎被耗得虚弱不堪了。只有在发生短暂的日食时才会出现的现象持续了差不多整整一年。”

卡西奥多勒斯·西尼特在公元536年暮夏时这样写道,“月亮也是一样,甚至就连满月的时候,它也全没了往日的自然光辉。”

看来,不仅仅太阳光线的亮度减弱了,而且它的热量似乎也减弱了。不合时令的霜冻对农业造成了破坏。“我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温暖的春季和一个没有热度的夏季”,卡西奥多勒斯写道,“本该是庄稼成熟的季节,气温却在北风的作



用下变冷了。根本就没有降雨，收割者在担心又会发生霜冻。”

正常情况下比较温暖的美索不达米亚，冬季却“极其寒冷，以致鸟儿们都死在了罕见的过量大雪中”，“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麦地伦的撒迦亚在其所编撰的编年史中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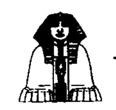
以弗所的约翰称，“水果没有成熟，葡萄酒喝着感觉就像是酸葡萄一样。”而吕底亚人约翰则称，“水果在一个不合时令的时间里就被采摘了。”

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面，也有关于反常天气情况的记载。正如本书第二十二章当中所提到过的那样，据日本古代编年史（《日本古史》）称，日本大王曾发布了一道哀叹饥饿与寒冷的诏令，他在诏令中说：“粮食是帝国的基础，黄金和上万串的钱是无法疗救饥饿的。一千箱珠宝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又有何用。”

在中国，正如本书第十九章当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人们将灾难的情况按年代顺序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公元535年，中国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干旱。《北史》在有关4月末、5月初的情况记录中称：“由于干旱，皇帝专门下诏，命令埋掉京城（长安）、各州、各封邑以及各县的尸体。”

到了5月，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于迫使政府在京城内“各城门处”向居民“供水”。

干旱很快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良田全部都变得一片贫瘠。有证据表明，巨大的尘暴开始肆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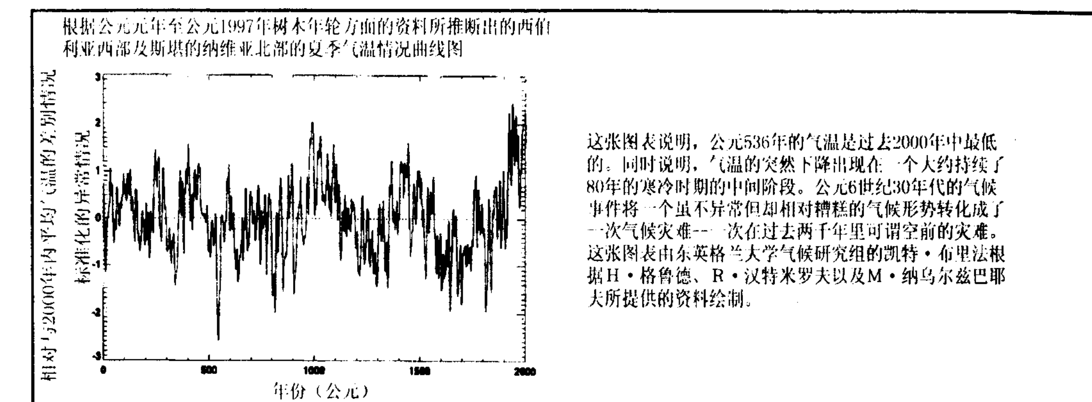
公元535年11月11日到公元535年12月9日间，中国南朝的首都南京，淹没在了从天空中降下的尘土之中。正如本书第十九章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天降黄尘如雪”。这一现象发生的年份、尘土的颜色及其数量都有力地证明，这种从天而降的尘土实际上是由风从中国内陆吹来的一种叫做“黄土”的黄色优质沙土。在正常情况下，黄土只会来自戈壁沙漠和其他的内陆干旱地区，并且风暴也仅仅只会对南京以北、以西数百英里外的地区造成影响。但是，在发生极度干旱的情况下，由于会有相当广阔的地区变成干旱地区，这样，就会有相当多的地区被尘土淹没了。

据《北史》的记载，随着干旱加剧，在中国中部省份河南，每10人中就有7至8人死去。幸存者为了能够活下去，不得不吃死人的尸体。

时间在前进，气候也日益变得越来越怪异。据《北史》记载，公元536年9月，中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汴州、汜州、涿州以及建州）天降冰雹。公元536年11月29日到公元536年12月27日，以及公元537年2月，在中国南朝首都南京，更大的尘暴如一张橘黄色的毯子般覆盖了整个城市。据《南史》记载：“天降黄尘如雪片，可以一把一把地捧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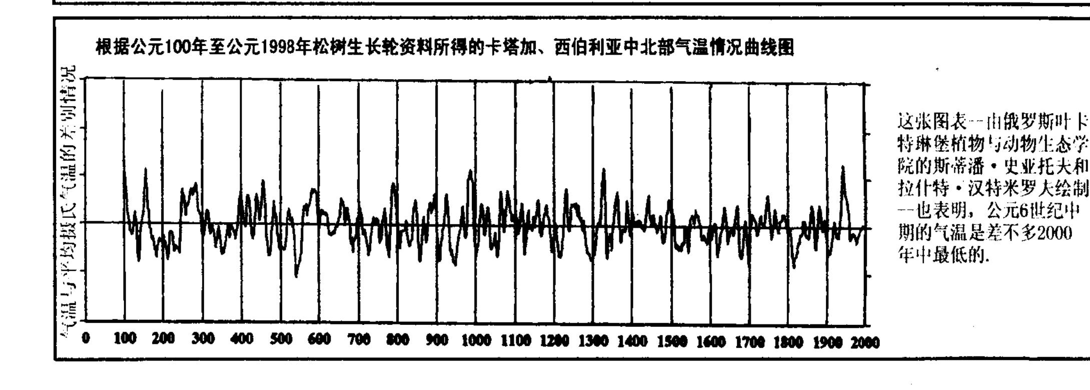
公元537年早期，在中国北部的9个州，干旱仍未结束，不过又夹杂着冰雹。接着，干旱最终在公元538年结束了，但是气候混乱的情况仍在持续——是巨大的洪水。在那一年的夏季，暴雨倾盆，据说以致癞蛤蟆和青蛙都“在树上鸣叫”。气候的这种不稳定，一直持续到了公元6世纪40年代：公元544年、公元548年、公元549年以及公元550年





根据公元元年至公元1997年树木年轮方面的资料所推断出的西伯利亚西部及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夏季气温情况曲线图

这张图表说明，公元536年的气温是过去2000年中最低的。同时说明，气温的突然下降出现在一个大约持续了80年的寒冷时期的中间阶段。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气候事件将一个虽不异常但却相对糟糕的气候形势转化成了一次气候灾难——一次在过去两千年里可谓空前的灾难。这张图表由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组的凯特·布里法根据H·格鲁德、R·汉特米罗夫以及M·纳乌尔兹巴耶夫所提供的资料绘制。



根据公元100年至公元1998年松树生长轮资料所得的卡塔加、西伯利亚中北部气温情况曲线图

这张图表——由俄罗斯叶卡特琳堡植物与动物生态学院的斯蒂潘·史亚托夫和拉什特·汉特米罗夫绘制——也表明，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温是差不多2000年中最低的。



公元6世纪芬兰北部的松树生长情况

树木年轮宽度（精确至0.0001毫米）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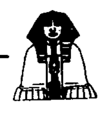
10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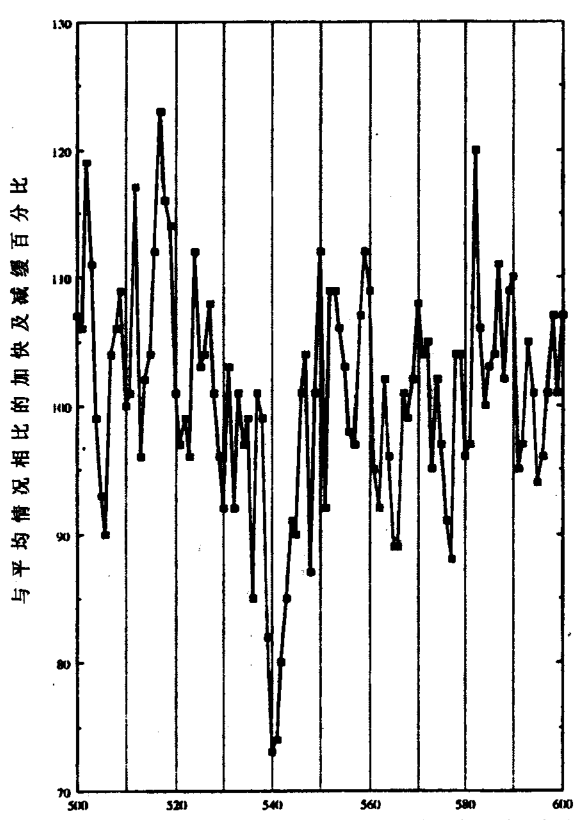
0

500　520　540　560　580　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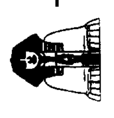
这张图表——以来自芬兰乔恩苏大学隆蒂·泽特尔伯格处的资料为基础绘制——描绘出了气温是如何在公元536年突然下降，并在公元539年和公元541年又分别再次下降，至公元542年，气温达到了一个最低点——也即是过去500年间最寒冷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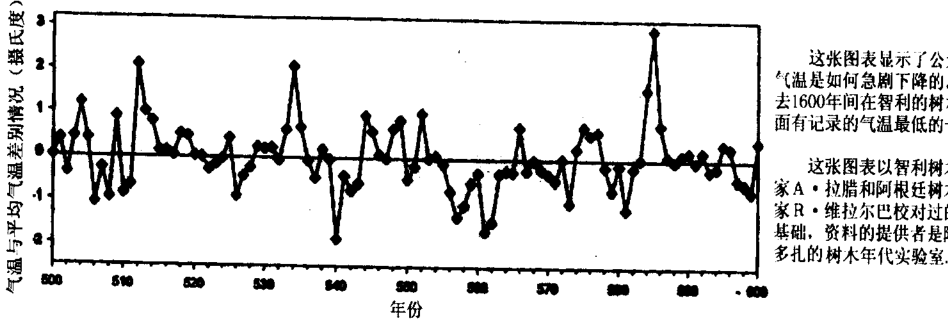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欧洲橡树的生长情况



这张图表由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的迈克·贝利根据欧洲许多不同地区（西至爱尔兰，东至波兰）的树木年代学家们所提供的资料绘制。该图显示，公元536年，树木生长有所减缓，而在公元539年和公元541年，树木生长减缓的幅度则更大。公元540年的树木年轮宽度表明，这一年是过去的15个世纪当中树木生长速度最为缓慢的年份之一。而在一些用于绘制此表的树木年轮资料当中则显示，公元539年树木的生长速度是过去的1500年里最缓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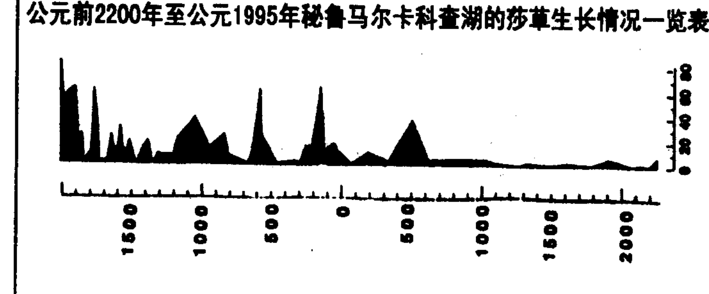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智利南部气温情况曲线图



这张图表显示了公元540年气温是如何急剧下降的。这是过去1600年间在智利的树木年轮方面有记录的气温最低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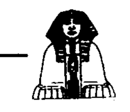
这张图表以智利树木年代学家A·拉腊和阿根廷树木年代学家R·维拉尔巴校对过的资料为基础，资料的提供者是阿根廷蒙多扎的树木年代实验室。

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1995年秘鲁马尔卡科查湖的莎草生长情况一览表



用花粉情况表示的莎草完全开花的百分比

这张图表显示了秘鲁安第斯地区马尔卡科查湖莎草（莎草科）的生长是如何在公元6世纪中期达到兴盛的--可能是因为干旱使得以前的湖底裸露了出来，而那正是肥沃之地。蒙剑桥大学A·切普斯托－拉斯蒂特许使用此图。



公元6世纪美国西部的狐尾松及刺球松的生长情况

与平均情况的差别生长指数

200
100
0
500 520 540 560 580 600

这张图表显示了刺球松的年轮宽度（小方块）以及狐尾松的十年平均生长指数（小黑圈），并且显示了气温在公元6世纪中期是如何下降的。资料基础分别由亚利桑那大学的魏斯·费尔古逊和瓦尔·拉马尔契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路易斯·斯库德利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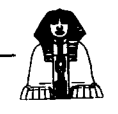
都发生了重大的旱灾。

在朝鲜，形势同样令人感到震惊。公元535年到公元542年是朝鲜半岛上从公元510年到公元600年这90年间有记录的气候最糟糕的时期，而公元535年到公元536年的24个月，则又是这90年间气候情况最糟糕的两年。

正如前面章节当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灾难同样也袭击了美洲、俄罗斯大草原、西欧以及其他地区。但是，这些遭到了袭击的地区中有许多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因此，就必须由大量非文字的资料来为这些地区的气候形势提供证据。

有关气候改变最精确的证据，就藏在树干之内。许多种类的树木的年轮都保存下了气候历史不可磨灭的年度记录。树木年轮专家可以通过研究两套泄露实情的资料，来努力重现过去的气候。其中，第一套资料是树木每一个年度生长轮的宽度，从中可以得知树木在某一确定的年份当中（实际上是某一确定的生长季节当中，通常为春季和夏季）的具体生长数据。在发生干旱或者是不合时令的霜冻的年份，树木的生长会受限制，而年轮就会变窄。第二套资料是生长在寒冷气候中的针叶树的每一个年轮的密度情况，从中可以获得有关气温的情况。天气越冷，形成在那一时期的树木年轮就会越稀疏。

我们有下列地区远溯至公元6世纪及以前的连续树木年轮年表：芬兰、瑞典、不列颠诸岛、中欧、爱琴海地区、西伯利亚、北美、智利、阿根廷以及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在



相当一部分目前已经成功重现地包括公元6世纪的树木年轮年表当中，公元535年到公元550年（有时一直持续到了公元560年甚至是其后）这一时期显得分外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树木年轮生长极其缓慢。在其中几张重要的年表上面，那25到35年间的树木年轮分布密度，是过去2000年中所知的树木年轮当中最狭窄的。

举个例子，瑞典西北部的苏格兰松在公元536年时的年轮宽度较窄、密度较小，这就表明，公元536年的夏天是过去1500年间寒冷程度居于第二位的夏天。

而加利福尼亚州的狐尾松在公元539年时的年轮的狭窄程度，足以跻身当地从公元400年到公元600年这一时期内最狭窄树木年轮评选的前五名。

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脉所发现的狭窄狐尾松年轮则表明，公元535年、公元536年和公元541年分别是过去2000年中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最寒冷年份。

在南美洲南部，气候从公元535年到公元537年开始下降（曾在公元538年达到过一个顶点），并在公元540年骤然下降，使得当年的夏天成为了当地在过去1600年间最寒冷的一个夏天。以上说法的主要树木年轮证据，来自于智利的针叶树，但是，从阿根廷获得的新证据同样也表明，公元540年的气温极低。

在塔斯马尼亚岛，树木（富兰克林氏泪柏）生长减缓的情况，在公元546年到公元552年间因恰逢那个世纪最低气温的出现而达到了极致。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中北部的哈坦加，公元6世纪30年代到公元6世纪40年代这20年间，树木生长减缓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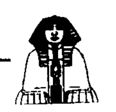
况是过去1900年间最严重的。

再往西，在波兰、德国以及不列颠诸岛上，公元539年到公元542年间，橡树的生长大幅度减慢。而在过去的2000年间，公元540年是欧洲橡树生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年份。

对世界范围内的树木年轮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搞清楚公元6世纪30年代气候重大恶化后各事件发生的确切次序。许多资料都表明，公元533年和公元534年时，树木的生长就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减缓。接下来，随着太阳在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部分地变得黯淡，在北美洲西部的部分地区、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草原以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树木的生长速度都出现了骤然减缓。此后，在一些地区（比如北美洲西部、西欧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气温在一两年内又出现了小幅度的恢复。

但是从公元538年，或者说是从许多地区的公元540年开始，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2年至8年的全球范围内的气温下降。继此之后，通常都是为期10年到30年的周期性寒冷时期。这一点在南半球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智利和塔斯马尼亚岛，气温分别直到公元6世纪80年代和公元6世纪70年代才完全恢复。

有关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灾难的其他证据，在年代上相较而言不是很精确，它们是由考古学家通过对河流洪水和湖泊水位进行研究提供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套资料，来自于哥伦比亚的低地圣乔治盆地。这套资料表明，在过去的3500年间，此地的最低洪水水位出现在公元6世纪



中期。

此外，正如本书第二十三章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在墨西哥特拉奥蒂华坎所发现的人类遗骨有力地证明，在这座城市于公元6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晚期消亡之前，它曾经遭到过大规模饥荒的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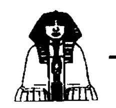
在秘鲁，纯粹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纳斯卡人曾拼命地修筑地下水源管理系统（详见本书第二十六章）。这也证明公元6世纪曾发生过一次大灾难。因为水文学方面的研究表明，正当这些地下“运河”在建的时候，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达到了可谓空前的地步。

重要的冰川冰核证据来自南美洲西部的山区。高达18700英尺的奎尔卡亚冰川——安第斯山脉中部顶上的冰“毯”，向科学家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540年到公元570年之间，由干旱所引起的尘暴曾在秘鲁肆虐。

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曾于1983年登上了奎尔卡亚冰川的顶峰，并利用太阳能将一台钻机深入了冰下。运用这一设备，科学家们成功获取了两条约长530英尺的冰核，并将冰核融水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了详细研究。

原始资料显示，公元563年到公元594年之间结的冰上满是干旱带来的尘土，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一次持续时间达30年之久的干旱——安第斯地区或者甚至可能是南美洲历史上最突然、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但是，冰川冰核在年代方面，尤其是在实质的时间深度方面，往往是不精确的。冰的紧缩作用可能会导致某些冰层（可能多达每个世纪有一两年）被忽略掉。因此，我们可以



在干旱发生的时间上加上潜在的25年，这样，就把干旱的开始时间前推到了公元530年或公元540年。值得注意的是，由智利和阿根廷的树木年轮所揭示出的气温骤然下降的时间，可以准确推算到公元540年。因此，秘鲁冰核中的尘土和智利及阿根廷的气温下降可能都是公元6世纪的同一场气候大灾难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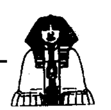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大灾难往往表现为旱灾，但是除此以外，气候的混乱也在其他许多不同的方面有所表现。

考古学家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所发现的一块碑铭表明，公元6世纪40年代，一处巨大的水坝被一场大洪水冲跨了。(详见本书第八章)

在非洲，也有发生过气候大灾难的证据，虽然是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正如本书第二章中所描述过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瘟疫是于公元6世纪30年代自非洲东部发端的。而要使瘟疫得以从其天然储藏库——具有免疫力的野生啮齿动物中爆发，则必然离不开干旱或洪水，或者是最具破坏力的干旱与洪水并发的催化作用。

这一点绝对无庸置疑：历史方面的、树木年轮方面的，以及考古方面的资料，全部都确认公元6世纪中期是一个气候条件极其不利的时期——阳光变暗、太阳的热量减弱、干旱、洪水、尘暴、不合时令的降雪以及大如高尔夫球的冰雹。

但是，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切的呢？



第三十一章　寻找罪魁祸首

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大灾难非常突然地袭击了世界的两个半球，并且，在大灾难的初始阶段，太阳明显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这一切都无情地指向一种将大量碎片抛进了大气层的诱发性事件。

事实上，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状况，与科学家们担心的核战争会在世界气候方面引起的反应，即所谓的“核冬天”是一样的。

在发生这种令人震惊的未来潜在灾难时，氢弹的爆炸会将大量的碎片、尘土以及气化了的土壤抛入大气层中。这种核污染在大气层当中形成了一道阻碍，使得太阳大部分的光与热都无法到达地球。地球上的气温会下降，全球气候系统则陷于混乱之中，紧接在流行病之后，饥荒也开始肆虐。

公元6世纪中期的气候大灾难，表现出了核冬天的所有特点。但是，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显然是没有氢弹存在的。那么，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有3个选项：小行星撞击地球，彗星撞击地球或者火山爆发。



选项一：小行星撞击地球

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所发生的事件，对气候造成影响，其中包括太阳明显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这至少在理论上是与地球和一个直径在一英里左右的小行星撞击的结果是一致的。平均来说，这样规模的小行星撞击在地球上发生的频率约在每500万年左右发生一次。

我们所知的最近一次近于这种尺寸的宇宙物体撞击地球的事件，发生在5200万年以前。而科学界之所以会知道发生过这样一次撞击，惟一的证据在于，这次撞击所产生的大坑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后来的沉积岩以下1600英尺处及海下300英尺处！这个大坑就在诺华斯科提亚海岸外，直径仅有25英里，但从坑边到坑底的深度估计为1650英尺。

当然，那时是不可能有人类来记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通过运用现代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我们可以重现当时所发生过的一切，并且，如果公元535年全球范围的大灾难确实是由小行星撞击引发的，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再现当时的可怕情境。

在太阳系当中，有上千万颗小行星，其中包括大约100万颗直径在半英里以上的小行星。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小行星并不是某些分裂了的行星的残骸，而是一些永远不可能形成行星的剩余未用的构件块。45亿年前，整个太阳系中曾经充满了数以十亿计的小行星。到距今35亿年的时候，这些小行星中的大多数都通过重力作用结合起来，形成了主要的行星。因此，直径为一英里的小行星实际上是处于胚胎

阶段的原始行星。

它们中的大多数，通常都在火星与木星之间按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转。但是，偶尔也会有相当尺寸的小行星横越过地球的轨道，并且在更加罕见的情况下，会有一颗小行星击中我们的行星。

现存横越地球轨道的直径约为一英里的小行星有60颗左右。在公元前5200万年（因此，也可能在公元535年），一个想象中的熟练观察人员最初会在小行星撞击地球前54个小时用眼睛观察到正在接近地球的小行星。但是，在距地球150万英里之外，小行星在肉眼看来不过是夜空中一块不引人注意的、无害的模糊光斑而已。

观察人员只可能在撞击发生前一个小时，才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间，小行星离地球的距离为3万英里，其形状只不过比一个光点要好辨别。半小时后，也就是撞击前30分钟，现在离地球仅有1.5万英里的小行星，将会成为夜空中除月亮之外最明亮的物体，甚至在白天也能观察到。这一阶段的小行星会仅比金星亮一点儿。

接着，在撞击前6分钟——此时的小行星仍在2700英里以外，小行星的亮度将会是金星亮度的30倍，而其大小看起来似乎足有月亮的1/10。

现在，小行星冲向了地球，它的亮度会在4分钟内增加大约9倍。这样，在撞击前的120秒，小行星的亮度将会是金星亮度的250倍，而它看起来将近有1/4个月亮那么大。

紧接着，在撞击前8秒钟，这个来自外太空的入侵者将冲进地球的大气层，并且会首次直接地发出其自身的光亮。

在撞击前几秒，小行星会变成天空中最耀眼的物体。远

在300英里之外的观察人员，将会看到一个和太阳一样明亮的火球。而近在30英里以内的观察人员，将会看到小行星极为短暂的闪光，比太阳光还要明亮10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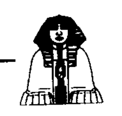
速度高达每小时4万英里（已经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提升了25%）的小行星，极可能以30°到60°之间的角度撞向地球。此时小行星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太阳的表面温度（即大约华氏11000度）。

但是，这并不是光的主要来源。大部分的光是由小行星经过处数以兆计的空气分子所发出的。小行星运动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通过摩擦，将空气分子加热到了华氏45000度到华氏54000度。

如果公元535年的事件是由小行星所引起的，那么撞击肯定是在深海处发生的。原因在于，首先，如果撞击发生在陆地上，那么就一定会留下一个直径为25英里的大坑，而这个大坑因为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地质学界就一定会有所了解。但是，陆地上并没有最近形成的如此规模的大坑。

此外，因为太阳的暗淡持续了12个月到18个月，而气候灾变则持续了多年，那么，一定会有比普通尘土要轻的东西被抛进了大气层。大多数普通尘土因为会很快从大气层中掉落下来，所以它们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媒介性质的长期影响的。而火山爆发则能达成这一点。因为火山爆发时，会将大量硫磺抛入同温层，并形成硫酸悬浮微粒，这种物质能在大气层中悬浮住，并在几年当中直接改变天气。

但是，小行星并不会产生大量硫磺。那么，这样的撞击究竟会对大气层产生怎样的影响，以致于会出现持续时间颇长的太阳失色及其他气候现象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小行星本身，而在小行星着陆时所撞击的地区。因为如果小行星撞向了海洋，就会有大量的水，其中既有气态的也有液态的，直接喷入同温层。这些水会迅速形成高同温层微粒冰晶云，这种云接下来就会阻止并分散太阳光线，使得太阳明显失色、气温下降，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引起气候的相关反应。

如果公元 535 年的大灾难确实是由小行星引发的，并且小行星撞向了大海，那么，这块全重 1000 亿吨的宇宙岩石，会在与海水及海底撞击的 1/4 秒内气化。可能会有 10% 的小行星运动能量——相当于一次 50 万亿吨级的核爆炸，以热和水流运动的方式传导给了附近的海域。(50 万亿吨级相当于 10 万颗最大的原子弹同时爆炸)

100 立方英里的海水几乎是立刻就气化了，由此产生了 14 万立方英里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将会以超过每小时 2 万英里的速度爆向天空，迅速渗入同温层当中。在气化撞击发生的地方，在撞击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的驱动下，海面上爆起了一道高达 15 到 20 英里的巨浪。这道巨浪就像是一条高速蒸汽流，其顶端部分一直渗入了同温层当中。

这道巨浪以每小时 1000 英里的速度向外运动，高度也逐渐降低，等到达离撞击地点 500 英里外的地方时，这道巨浪的高度已经降到了 200 英尺。

选项二：彗星撞击地球

正如小行星对地球的一次撞击可能会导致公元 6 世纪中期那样的气候混乱一样，彗星撞击地球也可能会产生大致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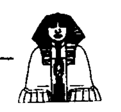
同的效果。但是，因为彗星的密度小于小行星，所以虽然彗星的运行速度通常都比小行星快，但是要产生与小行星撞击地球相当的能量，则必须有一颗彗核直径达到4英里的彗星，而不是4颗彗核直径为一英里的彗星。

而且，虽然绕太阳运行的彗星数量要比小行星多几百万倍，但是彗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却不到小行星的1/10。主要原因在于，彗星通常很少会出现在接近我们这颗行星的地方。

实际上，地处最遥远的彗星要绕其太阳轨道飞行一周所需的时间，是太阳系最遥远的一颗行星冥王星的750倍。估计有超过10万亿颗的彗星在绕太阳运转，但其中只有几千颗彗星会在距地球或者距太阳3亿英里以内的地方出现！

曾经撞击过地球的彗星真的是少之又少。据估计，大小足以引发公元6世纪中期那样的气候混乱的彗星（也就是彗核直径为4英里的彗星）平均每5亿年才会与地球相撞一次。但是，虽然彗星撞击地球是极其稀有的，我们在理论上也必须将其视做是造成公元535年大灾难的可能的罪魁祸首。

就彗星的构成情况而言，一颗彗星当中，70%是冻结了的水，15%是冻结了的一氧化碳和其他气体，还有15%的尘土、石头以及巨石。大多数彗星不过就是一大块冻在一起的冰和尘土，其温度低至华氏零下454度。但是，极少的一些彗星会到达离太阳足够近的地方并开始融化。接着，在太阳外太空3亿英里处，这些彗星开始由其“正在融化的”冻结着的“气体”彗体形成大气。当这些彗星距离太阳2.5亿英里时，大气中的元素和其中自由了的尘土开始被推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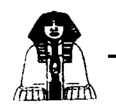


来，形成一条（或者有时是两条）可长达一亿英里的“尾巴”。正是光线（光子）对微小尘粒的物理压力，将尘土推出形成了彗尾。而构成大气的气体分子，则不是通过被（光子）推出去而形成，而是通过由太阳射出的电离化原子微粒（所谓的太阳风）赋予电荷并被运送，形成了彗尾体系的其他部分。

虽然小行星撞击事件在地球上和其他行星上相较而言比较常见，但是惟一被科学家们观察到并记录下来的宇宙撞击事件是1994年舒梅克－列维9号彗星与木星的撞击。当时，一颗彗核直径为一英里的彗星在临时性地绕木星轨道运行时分裂，由此产生的21块碎片以每秒38英里的速度冲向木星大气层。接着，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了一片核爆炸式的蘑菇云，云的顶部延展达2000英里，并极壮观地冲出了木星大气层，翻腾着进入了外太空。而这片巨大的云，只不过是由最大的一片碎片所引发的——一块直径仅半英里的冰和尘土的混合物。

如果是一颗直径为4英里的彗星（或者是一颗直径为1英里的小行星）导致了公元535年的事件，那么，就爆炸释放的能量而言，这次爆炸的强度将是木星上那次爆炸的20倍！

公元535年前的宇宙事件有所记载。据中国的《南史》记载，公元533年2月，“星辰如雨降，见彗星。”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公元532年的事件不过是对今天仍会在每年8月12号出现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描述而已。在这样的流星雨当中，虽然流星的亮度都比较高，但是它们的体积却不到一粒沙那么大。因此，公元533年的彗星可能不过是每个



世纪里都可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30颗彗星中的一颗而已。

选项三：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虽然小行星撞击说和彗星撞击说都可以解释公元6世纪大灾难的规模和本质，但是，对于这种解释，还存在着许多异议。

首先，一颗小行星（或是彗星）撞击时，肯定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释放其全部能量。假如一颗直径为一英里的小行星以每小时4万英里的速度撞击海洋，那么由此引起的爆炸将会在撞击地点周围产生极为巨大的环形海浪。这样的一道液体墙将会高达大气层，并一直渗入到同温层当中。这道撞击点上空及周围的水“镶边”包含了成百上千立方英里的水，其厚度达一英里，高度则正如已经描述过的那样，达15英里至20英里。

撞击本身以及水墙的倒塌，将会产生一系列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高速横越海洋的巨大浪潮。这种浪潮结构当中的99%，都在海洋表面以下很深的地方，距离海底仅有3英里。每一道海浪，都不过是一次表面海水大规模垂直运动表现在海面上的形状而已。这样，在任何时候，海浪的运动都会包含有成千上万立方英里的海水。在远离撞击地点的海面上，比如说在距离撞击地点2000英里外的海面上，浪潮的高度可能就仅有50英尺了。

但是，随着海浪接近陆地并进入较浅的水域，处于海平面以上的浪潮结构数量大幅度增加。实际上，在最大的浪潮到达海洋周围成千上万英里的海岸时，其高度可能在300到



1000英尺之间，其势足以摧毁数以十万平方英里计的海岸土地。只有在高高的悬崖或者海岸山脉阻挡了浪潮前进的道路时，其毁灭性的威力才可能有所限制。但是，在海岸地势为较低的平原，或者有较深的河谷穿过海岸山脉向内陆伸展的情况下，由于浪潮可以长驱直入内陆达几十甚至几百英里，所以它造成的毁灭将会十分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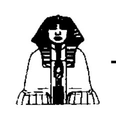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如果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次海岸大灾难，那么不可能当代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全都对其一无所知。

如此程度的一次浪潮，足以与任何传说中的诺亚洪水相提并论。因此，受到它影响的任何有文化的社会定会怀着惊骇之心将其记录在册，而且，在成千上万英里相关的海岸线上，也会留下考古和地质的遗址，供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勘测。

那样级别的一次撞击如果发生在1500年前，而今天的科学界竟对其一无所知，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是，却有另外的铁证表明，宇宙撞击说远不如选项三火山爆发说站得住脚。在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表面以下1600英尺处，有一个泄露实情的硫酸层存在。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由火山爆发而产生的硫酸地层，与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太阳在长达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里暗淡无光以及后来的“核冬天”式的气候混乱是有联系的。

1978年，一个丹麦－瑞士－美国联合科学考察队乘几架特别装配了滑雪橇的大型运输机飞抵格陵兰岛南部冰盖处。美国的军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载有大量设备，其



中包括发电机、冷冻设备、预制的生活设备以及一台巨大的钻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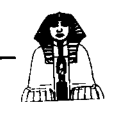
科学家们用钻机分段——每段长一英尺，钻取了总长一英里的冰核！在华氏 14 度到华氏零下 22 度的气温条件下，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天 24 小时不停向冰盖纵深钻探，进度约为每周 400 英尺。

接着，在第二个工作年度开始没多久，仅仅只钻探了几个星期，这支科考队就钻出了含括公元 6 世纪第二个 25 年间的冰核。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对冰核进行了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在那段时间内，发生过两次实实在在的火山爆发。接着，科学家们又在另一段于 1990 年夏天从格陵兰岛中部钻取的冰核中发现了这两次火山爆发的证据。

因为对那个时间跨度上的格陵兰岛冰核的时间判定，只可能是大致准确的（根据冰核的不同，精确度在 5 至 8 年以内），所以由上述两段冰核所得出的同一个硫酸地层的形成时间略有不同。时间的判定工作通常是通过回推雪的年度积层完成的，因此，少有的高度沉积有时可能会使年份增加，从而使得由此得出的某个酸层距今的年代要比实际年代略微长久一些。

判定雪的年度积层（这些雪在若干吨的压力下转变成了冰），是通过测量雪中一般都很有规律的重水含量百分比年度变化情况来达成的。

大多数水分子，不论是液态的还是冻结了的，都含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原子量为 16 的氧原子。但是，约有 0.2% 的水所含的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原子量为 18 的氧原



子构成的。氧 18 在某一年的地球表面某一点的具体沉积比例取决于天气状况。在非常寒冷的情况下，氧 18 的含量为降至 0.1964%，而在非常暖和的情况下，氧 18 的含量又会升至 0.2%。在极地环境下，氧 18 在冬天的含量为 0.1964%，而在夏天的含量则为 0.1975%。因此，科学家们通过对冰核中重水含量有规律的（一般为年度）升降情况进行研究，就可以标出冰核各层的形成时间顺序，从而得出在冰核中所发现的由火山爆发造成的酸集中的时间。这一体系的精确度在几年左右，但是，一旦出现了不合时令的气温波动或者沉积水平剧降，都可能对时间，尤其是相对较大的时间跨度的判定造成误导。

就上述第一次火山爆发而言，高海拔地区的 GRIP 冰核指明其时间为公元 527 年，而海拔较低的 Dye3 冰核（位于 GRIP 以南 300 英里）则指明其时间为公元 530 年。但是，发生过火山爆发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GRIP 冰核显示，在格陵兰岛的 GRIP 处曾经下了两年多的酸雪，而在 Dye3 处这样的雪则至少下了一年。

对于上述第二次火山爆发，高海拔地区的 GRIP 冰核指明其时间为公元 532 年，那一地区的酸雪则只下了一年多。而海拔较低的 Dye3 冰核则指明其时间为公元 534 年，并且下了 4 个月左右的酸雪。

最后的不容置疑的证据，来自格陵兰岛以南一万英里的南极冰盖的纵深处。科学家们再次通过对寒风刮过的地表以下 660 英尺处的冰核进行分析，发现了曾经发生过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火山爆发的证据。冰核标本证明，酸雪在南极连续不断地至少下了 4 年。从那一时间跨度的南极冰核中无法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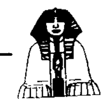


知确切的日期，只能进行粗略的、跨度范围为50年的时间推测，只能说冰核中有记录的那场持续了4年之久的酸雪发生的时间，在公元490年到公元540年之间。

但是，通过考察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发生的其他出现酸雪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出现的其他火山爆发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运用排除法得出结论，那场持续了4年的酸雪，肯定与那次气候大灾难或者可能与公元535年的火山爆发有联系。之所以这么讲，原因在于，南极地区在时间上与此接近的另两外两个冰核中含酸性物质的50年分别为公元231年至公元281年和公元614年至公元664年，而且，发生在公元490年到公元540年这个期间内的持续4年之久的酸雪到目前为止，是南极地区在整个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内有记录的最大事件。

因此，南极冰核中的4年酸雪期与格陵兰岛冰核中的2年酸雪期（公元527年至公元530年，或者也有可能性为公元532年至公元534年，不过后者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正是在历史上和树木年轮方面有记录的公元535年或公元536年的大气层污染、气候变异事件。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小得多的选择：持续了4年的南极地区的事件反映了第二次完全独立的（也可能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火山爆发事件，这次火山爆发在公元540年左右动摇了南半球的气候，并且使得本已被公元535年的大事件搞得乱作一团的北半球气候进一步恶化。在这一可能性较小的情况下，格陵兰岛上的第二个酸雪信号，可能是由公元540年的第二次火山爆发留下的这一点就令人信服了。



冰核中有记录的主要的火山爆发情况

玛丽・伯德地1968年／1989年　Dye3　GRIP

2000
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公元后
公元前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玛丽・伯德地1968年／1989年：塔姆波拉　科威厄　厄尔奇耶　1.5　4.0　1.5　3.4　3.1　4.8

Dye3：0.9　3.0　1.5　2.8　2.2　5.0　2.2　2.8　3.1　2.9　0.9　0.3　1.8　1.2　1.5　1.5　1.5　1.6　2.5

GRIP：1.1　1.6　1.8　2.3　2.7　2.2　2.4　2.9　3.0　2.9　1.5　2.2　1.7　2.5　1.5　1.5　3.1　1.7　1.2　1.4　1.1　2.1　2.7　2.1　3.5　1.7

数字指出了发生由火山爆发引起的酸沉积的年份。
资料来源：C・U・汉默尔等人著，《气候变化》，第35卷，1997年；H・克劳森等人著，《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第102／C12卷，1997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火山作用改变了后来的世界历史。但是，公元535年的大爆发究竟发生在哪里呢？哪一座火山才是罪魁祸首呢？



第三十二章 巨 响

有关公元535年火山爆发的第一个线索，是在格陵兰岛和南极地区冰核当中都有记录的那一事件。这种双重的记录表明，此次爆发一定发生在热带范围以内，否则不可能达到在地球两极的冰核中都有所反映的地步。这表明，酸雪同时在两个冰盖上降下，并被分别作用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两套独立的高海拔地区风力系统吹送到那里。而要达到这一点，则火山爆发必须是在热带地区发生的。但是，酸雪沉积在南极地区以及格陵兰岛至少发生了两次，这就表明那次火山爆发是在南热带地区而非北热带地区发生的。

幸运的是，在南热带地区内，只有部分地区有活火山活动：非洲东部（包括科摩罗群岛）、安第斯中部地区、加拉帕哥斯群岛以及从太平洋小岛萨摩亚至亚洲东南部大岛苏门答腊岛延伸5000英里的巨大火山链。

根据南极地区冰核所反映出来的当年火山爆发对气候所造成的长期巨大影响来判断，当年的火山爆发肯定相当剧烈，远远甚于1815年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塔姆波拉火山爆发，后者是一次产生了一个直径达4英里的喷火山口（大坑）的火山爆发。

在非洲东部、南美洲以及萨摩亚－苏门答腊火山链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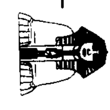


已知的喷火山口当中，只有不到20个可与上述喷火山口相提并论，并且其中有14个喷火山口分布在萨摩亚－苏门答腊火山链内。但是，在这几次火山爆发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有5次爆发的时间并不在公元6世纪。

通过仔细考察气候影响发生的时间顺序和细节（本书第三十章已经作了概述），我们可以将寻找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在所有有记录的地区当中，远东地区是最早遭到袭击并且袭击造成的破坏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这一信息与70%可能的火山都地处萨摩亚－苏门答腊火山链内这一事实相综合，它有力地证明，真正的“罪魁祸首”可能正是在那一火山链上的某个地方爆发的。纯粹靠着好运气，我们的怀疑范围得以进一步缩小。因为，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南史》当中，有记载提及公元535年2月发生了一件类似大爆炸的事件。

原文称，“有两次雷声”。您也许会认为这条记录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实际上这条记录却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条记录是整个公元6世纪上半期仅有的3条有关“雷声”的记录之一，并且它还是惟一没有将雷声视做是大风暴的一部分或者与闪电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记录。在任何一个为期50年的时期内，都会有成千上万次雷鸣可供中国的年代记录者们记录在册，但是，他们并没有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仅仅只将特别严重的雷暴或者无法解释的神秘雷鸣记录下来。

并且，在这3次雷鸣当中，只有这一次，年代记录者们特别指出它是一个双重事件。据《南史》记载，这一声音听到了“两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也同样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南热带地区内的火山

厄瓜多尔
（14座火山）

非洲东部
（23座火山）

印度尼西亚
（27座火山）

新几内亚地区
（31座火山）

所罗门群岛
地区
（5座火山）

赤道

加拉帕哥斯群岛
（14座火山）

秘鲁南部
（4座火山）

科摩罗群岛
（3座火山）

马达加斯加岛
北部
（3座火山）

瓦努阿图地区
（5座火山）

萨摩亚岛地区
（8座火山）

数字所指为那些在过去一万年间曾经至少喷发过一次的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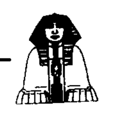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仅仅依据在中国听见了那次爆炸这个惟一的事实本身，是无法指明究竟是哪座火山爆发了。但是，幸运的是，记述简明的《南史》同时还有记录称，那两声巨响“来自西南方向”。这部编年史是由南朝首都南京的史官们写成的，因此，如果《南史》的记载可信，并且那两声巨响确实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那么，作为罪魁祸首的那座火山肯定是在南京西南某地爆发的。

乍一看，好像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最近、且其所产生的喷火山口大小符合条件的火山，也远在2800英里以外的苏门答腊或西爪哇地区。这对人的听力所及而言，可能是太远了！实际并非如此。火山爆发时的爆炸，即便是远在数千英里以外也是能够听见的。就1815年的塔姆波拉火山爆发而言，其爆炸声就曾远播至少达2000英里。

爆炸的声音通过大气层被弯曲、被反弹，传播了20次。声浪前部中那些从火山爆发处以直线路径传播的部分，消失在了大气层外的太空中。但是，声浪中的大部分却是以小于直角的角度从火山爆发处传播出来的。因为风速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从大约七英里高的地方开始，气温也会增加，这样，极像光线通过三棱镜时所发生的情况：声浪被弯曲了。

这个弯曲的过程通常都会极为有效，以致于在远至150英里到200英里的地方，声浪已经被折射到相当程度，所以它们会冲向地球表面——陆地或者是海洋。接着，低频的声音会如同一个巨大的回声一样从地面上反弹起来，重又冲进大气层，并在那里被第二次弯曲。这样的过程将反复进行，



直至声浪的能量最终在海洋里、陆地上或者空气中悉数散尽。

爆炸声从苏门答腊或西爪哇地区的某座火山横越2800英里直至南京，经过一系列"30英里"高度弯曲的回声，要用大约4个小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并非所有听得见的声音都会消失，还有几个因素可以对其进行实质性的加强。

首先，大的火山爆发会产生相当多的低频声音，而这种声音被大气层吸收的情况要远少于高频声音。

其次，由于大气层的折射作用，声浪前部的不同部分会沿不同路径传播，并被不同的风速加速。这样，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短促但却巨大的声音被延长成了可持续数分钟之久的声音。但是，由于相当多被大气层所弯曲了的声浪会从地球表面上相当多的部分反射回来，一些声浪会在不同的点上得到重新会聚，这样，它们就会彼此增强，从而形成一系列音峰。

如果《南史》中所记载的两次神秘巨响是由西南2800英里外的火山爆发所产生的，那么，究竟会是哪座火山呢?

我们已经知道，那次火山爆发发生在南热带地区内，现在再加上中国《南史》的记载，我们就可以把火山所在的地区进一步缩小到萨摩亚-苏门答腊火山链当中的南苏门答腊或西爪哇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相对较小的地区（600英里长）内，已知的只有一处喷火山口大小符合要求，并且在时间上相较而言也是最接近的。喷火山口环绕着一处不亚于喀拉喀



托的火山——喀拉喀托是一个曾在19世纪80年代把死亡与毁灭带给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恶名昭彰的火山岛。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喀拉喀托火山以前的一次更大爆发，导致了在公元6世纪折磨整个人类世界并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大灾难呢？

这里，证据本身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在一部鲜为人知并且通常都被人忽略了的印度尼西亚编年史当中，有一处非同寻常的段落，对公元535年该火山的超级爆发作了描述。

据这部编年史称，在喀拉喀托火山（在爪哇语中被称之为“腊卡塔火山”）所在的巽他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地区，有“巨大的雷鸣声”从当地的一座山峰（巴图瓦拉山，现在称之为普罗萨利山）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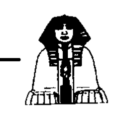
“大地剧烈地震动，四处一片黑暗，雷鸣电闪。紧接着，在剧烈的大风与滂沱的大雨以及毁灭性的风暴当中，整个世界变得漆黑一团。”

这部编年史通常称之为《普斯塔卡拉贾普尔瓦》，即《古代君王史》，它继而写道：“巴图瓦拉山中爆发了洪水，并一直向东流向卡姆拉山（现在称之为基德山）。”

据其记载，因为这次火山爆发相当剧烈，以致于大片土地都沉到了海平面以下，从而形成了今天将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分隔开来的海峡。

这部据称描述了事件的戏剧性过程的编年史写道：“当水位落下以后，可以看到爪哇岛已被一分为二，由此便诞生了苏门答腊岛。”

这部编年史现存最早的手稿是1869年的抄本。其后的一个19世纪中晚期的抄本，与这一抄本略有出入。后一个



抄本宣称对上述事件有更为详尽的描述——虽然其中某些前一抄本当中没有的细节，可能是受恶名昭彰的 1883 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启发而“推断”出来的。

这部编年史的 19 世纪 80 年代版本可能夹杂了一些 1883 年火山爆发的情况，称：“一道耀眼的火焰从山中直冲天空，整个世界地动山摇，猛烈的雷鸣伴以暴雨狂风袭卷而至。”

但是，暴雨不仅未能使爆发出来的火焰熄灭，反而使其更加变本加厉。声响极其恐怖。最后，整座山在一声巨响中炸成了两半并沉到了地底的最深处。

“巴图瓦拉山至卡姆拉山以东、拉贾巴萨以西的土地都被海水淹没了。居住在巽他北部至拉贾巴萨之间土地上的居民，和他们的财产一起全部被海水吞噬了。海水平息以后，那座炸成了两半的山峰及其周围的土地全都变成了一片汪洋，而单独的大岛则分裂成了两个部分。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分开了。”

上述两个版本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极为吻合。而从这一事件的规模来看，它要产生公元 535 年的所有气候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简直是绰绰有余。此外，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也确实是在远离中国南京西南的南回归线上的某地。并且，火山爆发的巨响也的确能在 2800 英里以外的中国南朝首都听到。

但是，《古代君王史》这部编年史所提供的证据，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现在的手稿原文是在公元 19 世纪，也就是在它所描述的事件发生过后 1300 年写成的。而且，书中称火山爆发发生在印度沙卡历的第 338 年，但这个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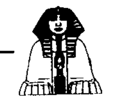


相当于西历的公元416年，而非公元535年。

几乎没有学者曾经对用爪哇语写成的《古代君王史》进行过任何研究；也没有任何人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对其内容进行恰如其分地详细分析。这部编年史（世界上最长的一本书，是长达600万字的《君王史》的一部分）一直被单纯地视做是一部19世纪的爪哇语文学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则正值反殖民主义意识大发展时期。一般情况下，这部编年史仅被看做是一个爪哇知识分子，朗加瓦尔斯塔三世企图创造一部民族历史的尝试。而研究这一时期爪哇语文学的学者们，也都一致认为《古代君王史》一书中所提供的信息完全是虚构的。他们宣称该书不过是朗加瓦尔斯塔大胆想象力的产品。

但是，其他专家，特别是那些研究早期爪哇语文献（中世纪以及公元16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材料）的专家的观点则略有不同。这样的专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凤毛麟角，但是他们倾向于对《古代君王史》持一种更加赞成的观点。

他们并不认为该书具有虚构的特性，相反，他们认为，该书是基于4种主要的“依据”写成的：第一，他们猜测，编年史中的一些材料是朗加瓦尔斯塔从爪哇或者苏门答腊的民间传说、戏剧以及口头传说中收集来的；第二，书中的有些信息是朗加瓦尔斯塔从他所认识的在爪哇的西方，通常是荷兰的知识分子那儿获得的；第三，有些材料是朗加瓦尔斯塔根据自己的直觉，或者仅仅是因为他认为曾经发生过的事而编造的；第四，书中有些资料也可能是从书写在棕榈树叶上的古代爪哇语手稿上得来的，而这些手稿则是由朗加瓦尔斯塔三世或者他的朋友们发现的，或者也可能是朗加瓦尔斯



塔家族家传的。

保存至今的这些爪哇语棕榈叶手稿至少还有 10000 份，其中有一半在印度尼西亚，一半在欧洲和澳大利亚。虽然学者们曾经见过大多数已知的手稿，但是几乎无人真正阅读过这些手稿。手稿中有一半是公元 17 世纪至公元 19 世纪的手稿，内容也是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另一半手稿则是关于公元 9 世纪至公元 16 世纪文献的公元 17 世纪至公元 19 世纪抄本。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以公元 17 世纪抄本的形式存在）为公元 9 世纪晚期和公元 11 世纪的文献，主要内容是印度教史诗的爪哇语译本。

用爪哇语记录的中世纪历史方面的内容则相当稀少。目前已知在历史真实性方面得到承认的只有两部文献：公元 14 世纪中期的《纳加尔拉克雷塔加马》和记述了爪哇从公元 1200 年到公元 1500 年历史的公元 16 世纪的《色拉特帕拉拉顿》(《君王史》)。这两部文献都是以公元 18 世纪或公元 19 世纪抄本的形式存在的。

这些成千上万的文献是用各不相同的书写符号写成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能够阅读它们的学者的数量。其中至少有 400 份是用所谓的山地符号书写的，而现在全世界能看得懂这种书写符号的学者不到六个人。但是，朗加瓦尔斯塔却能看懂好几种书写符号，包括爪哇语、巴厘语以及山地符号，所以他可以转录并理解他所见到的大多数棕榈叶手稿。他的父亲、祖父以及曾祖父也都能阅读这些旧手稿。而居住在偏远山地的隐士们也能看懂这些手稿，并可以对朗加瓦尔斯塔施以援手。

这样，朗加瓦尔斯塔三世就有可能使用那些久已失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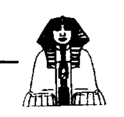
手稿，甚至包括编年史手稿（如果这种手稿在中世纪时期确实存在的话）。因为从来不曾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君王史》进行过研究，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其中有多少成分具有或者不具有历史真实性。

但是，《古代君王史》中有一些证据确实表明，曾有两次在时间上较早的火山爆发的记录被转抄或是辑入。

据说，最早记下这一切的是一位叫做贾亚巴亚的中世纪爪哇国王。随后，在公元1745年，一群在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高曾祖父帕德马纳加拉（这个名字在字面上可译为“王国的莲花”）领导下的爪哇文人抄写了这一记录（或者据推测，是根据一份公元15世纪或公元16世纪的中间译本转抄而来的）。根据《古代君王史》的记载，这群文人成功地将大量的棕榈叶手稿和注释收集了起来，并以此为基础，编写了一部今天已经失传了的爪哇早期历史。

贾亚巴亚国王（字面意思是“战胜危险”国王）——《古代君王史》称他曾监督了火山爆发情况的书面记录过程，可能生活在公元12世纪，因为据历史记载，叫那个名字的国王的统治期为公元1134年至公元1157年。但是，也可能《古代君王史》当中所提到的是一个虽同名，但却在时间上要早一些的、不为人知的国王。《古代君王史》当中所给出的时间肯定是在公元10世纪范围内的。

但是，不论这个贾亚巴亚是生活在公元10世纪还是生活在公元12世纪的君王，《古代君王史》当中都没有他究竟是从何处得到火山爆发情况的真实历史记录。书中只是说，他从印度教的神灵纳拉达那儿得知了这一情况。纳拉达从天堂来到人间，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再在研究外国（印度）历史



上浪费时间，而应该全神贯注于爪哇历史。据说纳拉达每40天就会和一个侍者从天堂降临人间，向国王的抄写员们口述一段爪哇历史。

直到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爪哇历史记录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据信，朗加瓦尔斯塔第一个创造出了一种扩展了的散文体，今天，《古代君王史》就是这种散文体的例证。但是，实际情况也有可能是朗加瓦尔斯塔三世不过仅仅将其父朗加瓦尔斯塔二世已经部分完成了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扩充而已。由于朗加瓦尔斯塔二世在那个世纪早些时候被荷兰人逮捕并被杀害了，而朗加瓦尔斯塔三世本人却是在为一个亲荷兰人的通敌卖国的爪哇国王工作，所以年轻的朗加瓦尔斯塔肯定会非常小心地远离有关他父亲的记忆，并有理由隐瞒其父在那部著作中所做的贡献。

同朗加瓦尔斯塔三世一样，朗加瓦尔斯塔二世也曾是爪哇王朝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文人。朗加瓦尔斯塔二世大约生于公元1780年。他后来成为了皇家的首席秘书，并且成为了反抗荷兰帝国统治的头号民族主义分子。公元1828年，朗加瓦尔斯塔二世在一次反对荷兰人的革命当中被俘，并于次年被看似公正地处死了。这个相当聪明的人的许多作品都被荷兰人毁掉了，而朗加瓦尔斯塔二世这个名字则被从历史中抹去了。

毫无疑问，朗加瓦尔斯塔三世不仅读到了其父幸存的作品，而且还有可能也读到了他家族中的老辈人的作品。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祖父（生于公元1756年，卒于公元1844年）曾是爪哇皇室的御用诗人，也就是该王国官方的桂冠诗人。他的名字叫作尤索迪普罗二世，别名萨斯特拉纳加拉，



翻译过来就是“皇宫中的创作者”，别名“王国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已经准确地描述出他所从事的是文学工作。

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曾祖父尤索迪普罗一世（生于公元1729年，卒于公元1803年），也曾经是桂冠诗人，并且还是一位有一定声望的历史学家。他曾经编写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宗教小册子，并且改写了印度教的经典名著和爪哇历史著作。此外，尤索迪普罗一世的父亲帕德马纳加拉、即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高曾祖父，也曾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同时还是权倾一时的朝臣。实际上，从公元16世纪爪哇中部统治者帕江苏丹哈迪维贾亚时期开始，朗加瓦尔斯塔三世的家族在至少3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爪哇社会里一个势力强大的因素。

即使不将编年史中所说的火山爆发发生在中世纪考虑在内，单就《古代君王史》中的火山爆发一条记录的两个特征而言，也为其增加了不少的可信度。

阅读过《古代君王史》1869年手稿中有关火山爆发内容的火山学家们称，这是对确实曾在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发生过的那种类型情况相当好的描述。他们认为，在公元19世纪50年代或者公元19世纪60年代，不论是西方科学家或是爪哇学者，手里都不可能掌握足够的地质资料，以重构事件发生的可能顺序以及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可能曾在巽他海峡发生的火山爆发的地理情况。所以，朗加瓦尔斯塔的描述，只可能要么基于程度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猜测工作，要么基于某一真实的、现在已经失传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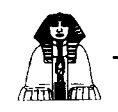


历史记录。

第二，我们应该注意到，诸如公元535年的火山爆发这样的自然大灾难，往往会在遭到侵袭的社会内部，造成政治动荡、管理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定期记录保管工作完全停滞。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君王史》在火山爆发以后，可能就记录下了这样的记录保管工作停滞的情况。将那个世纪视做是一个整体，在火山爆发前的37年里，在所有的年份当中，75%的都有编年条目。而在火山爆发过后的18年里，仅仅只有18%的年份有编年条目；在紧随其后的42年里，这一比例为63%。

这些证据表明，朗加瓦尔斯塔可能是从现在尚无人知晓或是已经失传的棕榈叶手稿中获得他记述所需的信息的。而这些棕榈叶手稿可能是依据公元8世纪或公元9世纪的原本，在公元16世纪或公元17世纪进行了重抄。原本的作者则是可能居住在所罗（朗加瓦尔斯塔居住于此，并在城中皇宫内任御用诗人）附近偏远山区内的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其他的隐士。因此，《古代君王史》中有关喀拉喀托地区发生火山爆发的记录也许至少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

有关于朗加瓦尔斯塔的记录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所标明的事件发生的日期。他在公元19世纪50年代写作此书时称，火山爆发发生在印度沙卡历的第338年（即西历公元416年）。这样，所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年中是否发生过达到他所描述程度的大规模火山爆发。要搞清楚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就是考察那一时期的冰核、特别是南极地区那一时期的冰核，因为爪哇岛地处南热带地区。



对冰核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最宽泛的差错比例情况下（+/-25年），公元416年左右在南半球也不曾发生过任何重大的火山爆发。由此可知，公元416年这个日期肯定是错了。但即使这样，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世界上许多比较古老的、与此类似的历史文献当中，个别日期不准确往往位居主要的不准确因素之列。

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历史文献一样，在《古代君王史》有关火山爆发的记录中，年代上的错误可能是由于中世纪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对本就知之甚少的早期纪年系统产生了曲解，再或者是因为后来对统治的时间长度进行了夸大。另外，这种错误也可能是由信息最初的口头传播造成的。

火山爆发后长达18年的记录保管工作萎顿（也就是管理工作停滞）时期，有可能实际上还要长得多。人所公认的考古记录缺乏，实际上就表明，在火山爆发后曾经有一个较长期的政治和管理脱节。

考古证据表明，在爪哇岛西部，曾经有一个在公元5世纪以及可能在公元6世纪早期盛极一时的文明存在。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这个文明国度好像叫荷罗坦。根据考古记录，该国最著名的国王是一个叫做普尔纳瓦尔曼的男人。通过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了皇家碑铭、一条运河的遗址，以及可能是普尔纳瓦尔曼时期的印度教寺庙和佛教寺庙的砖基。此外，还发现了少数公元5世纪的印度教毗瑟努神的雕像，以及公元后开始几个世纪内的陶器。但是，公元6世纪早期过后，所有可确定时代的、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察知或历史上有记载的高度文明的活动好像都停止了，并且直到公元7世纪中期至公元7世纪晚期才在爪哇岛中部而非西部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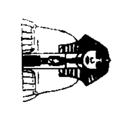


出现。

就爪哇的历史而言，公元535年的火山爆发差不多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它导致了一次文化与政治的中断。在这一中断过程当中，（以爪哇岛西部为基地的）繁荣期长达5个世纪的古代文明分崩离析了。但是，看来也恰恰正是这场灾难——爪哇岛西部政治、文化优势的毁灭，为爪哇岛中部的政治及文化势力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的崛起扫清了道路。

当爪哇岛西部在至少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还是一潭死水的时候，爪哇岛中部几个重要的新兴国家却在公元7世纪崛起了。到公元640年前，中国方面的资料已经开始对爪哇岛中部一个叫作荷林的王国评头论足了。而爪哇岛中部的第二个王国，名叫马塔拉姆，也兴盛了起来，并在公元720年前吞并了荷林王国。到公元900年前，这个爪哇岛中部的新兴国家已成功地将爪哇岛大部分地区统一成了一个单独的国家。其时，在公元8世纪晚期前，另外一个王国在沙埃伦德拉王朝的统治之下，也在爪哇岛中部的另外一个地区崛起，并创造出了蔚为奇观的纪念建筑风格。其中一座特别大的寺庙波罗波德尔庙，占地达一平方英里，耗费石料3500万立方英尺。

但是，紧接着，在公元10世纪，又一次火山爆发（梅拉庇山，大约公元928年）袭击了爪哇岛。这一次遭到摧毁的是爪哇岛中部地区，波罗波德尔庙也被部分埋在了火山灰当中（它重见天日是在一千年后）。马塔拉姆的统治者们被迫将首都从爪哇岛中部迁到了王国的东边，可能在爪哇岛东部的苏腊巴亚地区附近。



公元6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断情况

缅甸　菲律宾　泰国　马来亚及苏门答腊岛　爪哇岛　柬埔寨与越南　婆罗洲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贝克塔诺
斯利克色特拉
帕干
现代缅甸
现代菲律宾
德瓦拉瓦提（泰国的雏形）
许多泰人国家
国家重新更名为泰国
帕色马文化
马来亚西海岸
南苏门答腊文明（包括斯利维加亚、班卡以及马拉尤）
马六甲海峡苏丹国家
马来亚
马来西亚
爪哇岛东部
印度尼西亚
奥克厄欧（夫南）
钦拉各国统一成为古代高棉
金边
柬埔寨

公元535年之前及之后的东南亚地区

帕干
贝克塔诺
斯利克色特拉
南中国海
安达曼海
德瓦拉瓦提
高棉帝国
钦拉
奥克厄欧（夫南）
马六甲海峡苏丹国家
南苏门答腊文明（其中包括斯利维加亚、班卡以及马拉尤）
帕色马文化
爪哇岛西部
爪哇岛中部
爪哇岛东部

图例
* 火山爆发前的文明与文化
■ 火山爆发过后的文明与文化
▨ 后来的国家与中心
当代国境线



很快，苏腊巴亚地区就成为了包括爪哇岛在内的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中最强大的政治中心。实际上，至公元 14 世纪和公元 15 世纪，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被称做“莫约帕希特”的大帝国当中仅次于首都的中心。这个帝国统治着爪哇岛、巴厘岛、苏门答腊岛东部以及婆罗洲南部，实际上已经初现印度尼西亚的雏形。但是，这个帝国久远的中世纪早期发源，却是位于爪哇岛中部而非爪哇岛东部。而且，这个发端于爪哇岛中部的文明之所以能发扬光大，原因也许在于公元 535 年的大灾难消灭了古代爪哇岛西部的势力。

因此，现代印度尼西亚归根结底可以被视做是一个政治进程的最终产品，而这一进程则是由公元 6 世纪中期的自然灾难所引发的。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列举理由证明：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看来都应将它们的起源归于公元 535 年的火山爆发。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紧随那场大灾难之后，从公元 6 世纪中期到公元 6 世纪晚期，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脱节。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及随后发生的气候影响，肯定打击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与商贸，而这样的打击看来又接着造成了各国间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继续发展，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泰国的雏形——德瓦拉瓦提王国，于大约公元 580 年出现。而柬埔寨的雏形，钦拉王国诞生的时间，实际上是紧随在古代湄公河平原上的奥克厄欧（夫南）文明于公元 6 世纪中期某一时间消亡之后。马来西亚的雏形，中世纪的马六甲海峡苏丹国家，是从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一个文明演化而来



的。这一文明最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以斯利维加亚王国的形式崛起，而这个崛起的过程则是紧随在被考古学家称之为"帕色马文化"——一种慓悍的用巨石制作战士头像的史前文明——的消亡（可能是火山爆发造成的）之后的。更北边，缅甸的雏形，斯利－克色特拉王国，则是在比其要古老得多的竞争对手贝克塔诺王国消亡之后，于公元600年左右进入鼎盛时期的。

这样，东南亚地区以其自身的经历，与本书中所证明了的全球范围内公元6世纪的灾变摧毁继以政治变革模式，达到了相当吻合的地步。而正是这一模式推动了古代世界的毁灭与现代世界雏形的发端。

但是，究竟是什么事件引发了这些世界范围内的变化？是在公元535年的喀拉喀托或巽他海峡爆发的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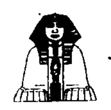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灾难的重现

要想重现与1500年前火山爆发相关的事件的发生顺序，是一项足以让任何人感到沮丧的任务，但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通过使用历史方面的、树木年轮方面的、冰核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我们就有可能将这一事件和其在气候方面造成的影响，与其他规模及影响已为人所知的发生在近期的火山爆发进行比较。

假设爪哇《古代君王史》中的记载至少部分是真实的，那么通过该书中准历史的记载，也可以对火山爆发的详细细节有所了解。再通过该地区的地质和火山资料以及近期发生的大规模火山爆发记录，我们就可以重现曾经可能出现过的情形。

在公元530年到公元535年之间，在今爪哇岛西部、苏门答腊岛南部及邻近海域，发生了持续时间较长的一连串地震。地震以及由地震引起的海啸，对该地区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就典型情况而言，在火山爆发以前，地震的频度与强度通常都会日益增加。一般情况下，火山爆发的规模越大，其序曲部分的地震持续时间也就会越长。

就公元6世纪30年代的大灾难而言，火山爆发前的前奏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几次里氏6级的地震。在整个公元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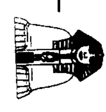


年的下半年，地震以每天一到两次的频度不停地袭击这一地区。在火山爆发前的数星期内，地震发生的频度更是逐步增加，直至达到最后 24 小时内的每小时 50 次的极限，而地震的强度则主要在里氏 1 至 3 级左右。

虽然对此尚有争议，但是从地质学的角度而言，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在公元 535 年的超级火山爆发以前可能是一个岛——正如爪哇《古代君王史》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样的话，在公元 535 年发生爆发的就是一座位于今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处的低地势火山了。在几年内，一团 250 立方英里到 500 立方英里巨大的熔化岩浆将慢慢接近地表，速度可能达到了每个月 33 英尺。这就使得其上的地表凸起形成了一个低穹地，并且穹地的高度在过去 5 年间还以每年 3 英尺的速度升高。

接着，在地下 2 英里至 3 英里处，由于岩浆的压力实在太大，使得地壳突然出现裂缝，火山爆发的第一个阶段由此拉开了序幕。一片巨大的尘云翻涌而起，继而就是红色的滚烫岩浆如喷泉般从山峰中喷涌而出。一到两个星期以后，随着岩浆愈发接近地表，伴随火山爆发的一次地震可能使得岩浆房上方的一块岩石发生了破裂，从而使得海水灌进了岩浆，从岩浆房涌向地表的直径在 300 英尺到 1700 英尺之间的管道。在一次甚至将大量的熔化岩浆以每小时 1500 英里的速度抛向空中的巨大爆炸中，火山爆发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巨大的爆炸声可能把居住在附近 15 英里以内的大多数人和动物的耳膜都震破了。

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以每小时 750 英里到 1500 英里的速度席卷而来，将其所过之处 20 英里以内的所有事物尽皆



苏门答腊岛
爪哇海
公元535年可能形成的喷火山口
选项一
拉贾巴萨山
普罗萨利山
公元535年可能形成的喷火山口
选项三
爪哇岛
喀拉喀托喷火山口
公元1883年
20英里
20千米
印度洋
公元535年可能形成的喷火山口
选项二
可能的罪魁祸首



摧毁。房屋、桥梁、寺庙以及所有单独的树木，都被夷平在地！估计在附近10英里以内，由于冲击波使得空气温度升高，还引起了大火，使得所有易燃的物质都化作了一阵轻烟。

喷涌而出的熔化岩浆中的大部分都会分裂成直径从0.001毫米到3英尺不等的碎片，并在2英里到3英里高处凝固。大一些的碎片，与巨大的、有时甚至有小汽车那么大的山体本身的碎块一起，会落回地面，并落在一个半径为3英里到7英里的范围之内。但是，极小的碎片则被强大的对流气流一直带上了天空。

随着火山爆发第二个阶段的继续，会有一片由灰烬和碎片构成的巨大蘑菇云，一直渗入同温层纵深处。这片高达30英里的蘑菇云，在极其强大的高温对流气流的推动下，以飓风般的高速在空中运动。

大火山的中心处，温度高达华氏1650度，这就产生了足够将灰烬云推上天空的热量。当这片蘑菇云逐步遮去太阳的光辉、白天都变成了黑夜的时候，远在1000英里以外，灰烬如雨般降落在森林和田野当中，而处于这一距离的房屋则因火山爆发而开始震颤。附近几十英里范围内的海面上都覆盖上了一层6英尺厚的漂浮着的浮石，而海上的船只则在这片火山沼泽中搁浅了。

现在，有几十立方英里岩浆、数千立方英里汽化海水以及大量极轻的氢化火山灰（通过岩浆与海水的互相反应而生成）被抛入了空中，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渗入了大气层的上层同温层当中。在如此高的高度上，远离火山爆发地区，这些物质开始向四处运动。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其中的水蒸气会



直接“浓缩”成巨大的冰晶云。据估计，火山爆发的整个过程当中总共形成了25立方英里的冰晶，而这些冰晶则在同温层中分布成薄薄的一层，导致阳光衍射、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而极轻的氢化火山灰（碎片直径为0.001毫米）和大量的硫磺以及二氧化碳气体也具有同样的功效。与在几个月内就会落回地面的普通火山灰不同，氢化火山灰、在高海拔地区形成的冰晶云，以及硫酸和二氧化碳悬浮微粒，可以在同温层停留数年之久，并对正常的日照及太阳热量传导形成长期阻碍。

在火山爆发第二个阶段开始后的数小时之内，火山上空的蘑菇云由于灰烬含量不断增加，以致无法继续在空中悬浮。这一部分灰烬会重新降落地面，沿地平线散布在远离火山的四面八方的陆地和海洋上，形成所谓的“火成碎屑流”。而这一火成碎屑流，较之在1997年到1998年部分摧毁了加勒比海中的蒙特塞拉特岛的类似流动要大数千倍。

这种沿地平线移动的“云”横扫过大地（实际上还有海洋），就像是一道高达1000英尺到1700英尺的沸腾浪潮，其中满是蒸汽、硫磺、空气、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灰烬以及岩石。这道滚烫的毁灭性毒墙，从火山处开始以高达每小时250英里的速度向外席卷40英里，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事物全部摧毁。

接着，随着火山爆发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个阶段开始了。这甚至是一个更为可怕的阶段。因为位于地表以下的巨大岩浆房现在有一些部分已经空了，岩浆房的顶部无法承受其上的岩石的重量。这样，上面的岩石就向岩浆房内落了下来，由此导致上面的地表突然灾难性地下沉了300英尺到



1000英尺。一旦地表降至低于邻近海平面的位置时，海水就会汹涌而至，淹没掉原来的陆地。这样，海水就再次与残存的熔化岩浆发生了直接接触，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并形成了更大的火成碎屑流。

灾难性的火成碎屑流、岩浆爆发以及喷火山口筋疲力竭之后，火山爆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开始了：在数星期甚至是数月内，火山的能量不断递减，爆炸也渐次平息。在这个平静的时期内，仅仅只有那么几天会偶尔有能量已经减弱了的爆发式爆炸。喷火山口可能会留下小岛火山口。随着喷火山口地下深处的残留岩浆渐渐冷却，在几年内，这些火山口仍然会周期性地喷出水蒸气和灰烬，直冲云霄达数英里。

在爪哇《古代君王史》赖以为基准的、早已失传的原始资料当中，对上述整个过程似乎做了有一定准确度的记述："最后，在一声巨响当中，那座山峰炸成了碎片并沉入地下。海水猛涨，淹没了陆地。陆地成了一片汪洋，而单独的大岛则一分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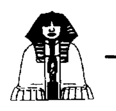
今天，那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所留下来的遗迹，就只剩了一个主体部分在水下的直径为25英里的喷火山口。在其周边，仍然还有一圈当年的火山，不过，它们现在已经是位于分隔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巽他海峡之中的火山岛了。

过去，几乎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地平面的下降只可能是地质构造力量长期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作为本书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火山学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地质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再次分析，结果证明，



在巽他海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地平面下降，很可能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这一同时还显示曾发生过剧烈火山爆发的地质证据，与中国的历史记载、爪哇的准历史记载、冰核方面的证据以及其他证据相综合，可以证明：巽他海峡喷火山口，也即是喀拉喀托火山的雏形，最有可能是公元535年那次超级火山爆发的发生地。

火山爆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详见本书第三十章）向我们展示了由之而导致的广泛的气候问题。但是，这些气候问题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特别机制发生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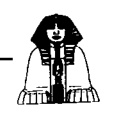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章　终极毁灭

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公元535年的火山爆发是过去5000年当中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事件之一。不论是从对气候所造成的短期到中期的影响方面，还是从所形成的喷火山口的大小方面，还是从在冰核上所留下的印迹方面来说，此次火山爆发的规模都可称得上是相当巨大的。

从气候方面来说，树木年轮方面的证据表明，那是席卷了全世界的最可怕的一次灾难。冰核方面的证据（即就酸沉积的情况而言）也表明，这一事件是过去2000年当中在北部冰盖和南部冰盖都有反映的最大事件。

就所形成的喷火山口的大小而言，据推测，喀拉喀托火山的雏形是罪魁祸首，它位居世界上已知的6个最大喷火山口之列！总共有10万立方英里的气体、水蒸气、岩浆以及岩石被抛进了大气层。粗略计算一下，其中可能含有25立方英里在熄灭后碎裂成了极轻的氢化灰烬的岩石和熔化岩浆，以及25000立方英里的水蒸气、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以及硫酸。

有一些水蒸气和硫酸混合形成了微小的硫酸悬浮微粒。但是，大多数的水蒸气则“浓缩”成了细小的冰晶，并形成了数百万立方英里的冻结灰雾。而广布在同温层内的氢化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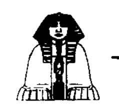
烬（每一块碎片的直径小到了 0.001 毫米），则形成了一道占领了数十万立方英里领地的尘土面纱。以上 3 种物质，在地球大部分地区上空的同温层内形成了单一的或是复合的层。其分布情况肯定是不同的，或者有时也会在分布上表现为互相重叠。

由于层的数目各不相同、各层的厚度各不相同、在同温层内的分布各不相同以及其中所含的物质各不相同（冰、硫磺氢化火山灰），所以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渗入这些层中的阳光和太阳热量被削弱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这些物质极大地分散了阳光的地区，太阳就像是失掉了它的大部分光辉一样。在大多数地区，出现了气温下降的情况。而温度降低了大气层的含水能力也会下降。一旦空气降温，则其中所含的水蒸气便会凝结成水，并以雨的形式降落地面。但是，天气较冷同时也意味着海洋和陆地上的蒸发作用减弱。因此，天空中很快也就无雨可降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干旱开始了。

当然，这恰恰正是当年曾在中国、日本、蒙古、欧洲部分地区、阿拉伯、非洲东部、墨西哥、南美洲以及其他我们没有直接资料的地区发生过的实际情况。

在北半球，夏季季风会减弱并变得较为干燥，而冬季季风虽然变得比较强烈，但也同样干燥。其中意义尤为重要的，可能是从印度吹向非洲东部的季风大约 2 到 3 年的衰竭（就降雨而言）。正是这一季风的衰竭，导致了瘟疫从其天然免疫的野生啮齿动物库中爆发，并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和欧洲，从而永久性地改变了那一地区的历史（详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衰竭的夏季西南季风与东南季风未能将雨水带至蒙古地区，从而也以一种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式打破了那一地区的政治平衡（详见本书第三章）。

在一种至今仍知之不多的“翻转”现象当中，持续多年的干旱通常都会以巨大的暴风雨和大规模的洪水为终结。由于气候紊乱，也可能会是大如高尔夫球的巨大冰雹！如果在非洲东部地区出现干旱过后继以暴风雨和洪水的情况，则瘟疫爆发的程度，甚至比单纯发生干旱时更加引人注目。而瘟疫爆发的程度有力地证明，在非洲东部曾发生过的恰恰正是这种干旱－洪水现象。

在南半球，气温下降不仅导致了干旱，而且还与周期性袭击秘鲁的厄尔尼诺大风暴互相作用。而这种互相作用又在很大程度上对厄尔尼诺现象进行了加强，从而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详见第二十七章）。

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大规模的尘暴和森林火灾，较低的大气层（对流层）受到污染的程度在一年中不同的时期会戏剧性地增加。而上面提到的两种现象都是与干旱有牵连的典型现象。中国如雪般降下的“黄尘”（详见本书第十九章）和秘鲁奎尔卡亚冰川冰核当中的尘土层（详见本书第三十章）证明，肯定曾有一场巨大的尘暴席卷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

公元 535 年的火山爆发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可能的另一座尚未标明位置的火山在大约公元 540 年的爆发所造成的影响，在北半球持续了 5 到 7 年之久，而在南半球持续的时间则可能更长。

但是，造成北半球（持续至大约公元 560 年）和南半球



(持续至公元 6 世纪 80 年代）的气候在数年间进一步动荡（包括后来的干旱）的，肯定是我们目前尚知之不多的气候反馈体系。那次火山爆发（或者可能是两次火山爆发）改变世界气候达数十年，而在某些地区更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气候的改变直接地，或是通过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疾病媒介的作用，动摇了人类的地缘政治与文化。而由于火山爆发通过其所造成的气候方面的后果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冲击，所以气候变化实际上使得世界历史又重新同步了。

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实际上，与之同时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后来在提到太阳失光这一现象时写道："自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男人们就未能再远离战争、瘟疫或是其他致人于死地的灾难。"

但是，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却正是公元 6 世纪的大灾难以及由其引发的事件之间的互相作用，在历史进程方面，以及也许是最令人担忧的脆弱的人类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方面，使现代世界的起源得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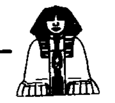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公元 6 世纪那样的超级火山爆发或者其他的自然灾难，有可能在未来再次使人类历史乱作一团并重新同步吗？

第十部分

明天之后

“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illegible]用我们的战不胜敌的[illegible]中的一[illegible]分[illegible]并用我们这些不幸的人[illegible]自己从[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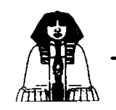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章　当前的天启

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仙境般风景区的地下约6英里，孕育着一个大如密歇根湖或爱尔兰海（就体积而言）的巨大液体定时炸弹。这个由熔化了的岩石构成的温度高达华氏1652度的地下火山岩浆库，势必会在某一天爆发，就像15个世纪以前的喀拉喀托火山雏形一样改变我们这颗行星的历史，因为黄石是全世界最大的休眠火山，一个覆盖了1500平方英里的巨大喷火山口大坑。

它可能大约每60万年至70万年爆发一次，其最近的一次爆发发生在63万年前。此外，在最近的10年内，此处潜在的爆发前活动剧烈增加。

自1988年以来，由于岩浆库及在岩浆的热度下形成的水蒸气向上的压力（约为每平方英寸35000磅），使得数百平方英里的陆地抬高了大约3英尺。此外，公园内间歇泉的活动规律也发生了改变。

在过去，已知的黄石喷火山口的大规模爆发曾有3次：200万年前的一次，喷出了590立方英里岩浆；130万年前的一次，“仅仅”喷出了70立方英里岩浆；63万年前的一次，喷出的岩浆达250立方英里。



当然，没有人知道黄石喷火山口会在什么时候再次爆发。但是，肯定会有这么一天。

北美洲另外一个潜在的大灾难，是一座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超级火山，位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谷。在过去的20年间，这座火山好像也渐渐变得不怎么稳定了。自1980年以来，从与这座火山相关的火山口当中已经喷出了1800万立方英尺的二氧化碳，致使附近地区内几十平方英里的森林死亡。此外，地震带的活动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了，每一个地震带上的地震多达1600次（每一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3.5级）。当地的温泉活动也发生了变化。

长谷的这个10英里×20英里（212平方英里）见方的喷火山口，其已知的惟一一次重大爆发发生在70万年前。由于目前只有过去50年的情况记录，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座火山目前的折腾，是预示着一次大规模的爆发即将来临，还是仅仅是恢复平静前的正常反映。

长谷喷火山口在其上一次的爆发中喷出了125立方英里的岩浆，并生成了覆盖附近数百平方英里地区达350英尺厚的火成碎屑流。

地处地球另一半的欧洲，也有一个巨大的喷火山口在开始活动它的火山肌肉了。在那不勒斯西郊仅3英里的地下，有一个含有75到250立方英里熔化岩石的巨大岩浆库。自1969年以来，由这个岩浆库产生的压力已经使地面两度升降大约一英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它在每个星期当中平均要制造300次小地震（每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4.2级）。毫无疑问，这个通常被称之为坎帕尼亚－坎皮·弗雷格雷复



合体的喷火山口，正在日益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到目前为止，已知的这个喷火山口的大规模爆发曾有两次：一次是在37000年前，当时它喷出了20立方英里的岩浆；还有一次是在12000年前，当时它喷出了1立方英里的岩浆。在上述第一次爆发当中，所产生的火成碎屑流——由极热的尘土和气体构成的浪潮，横扫而过，把远在35英里之外的一道3000英尺高的山脊都吞没了。

这个坎帕尼亚－坎皮·弗雷格雷喷火山口复合体的直径为9英里，大小约100平方英里，是附近名气要大得多的维苏威火山的喷火山口区的150倍。维苏威火山曾经在公元79年爆发过，当时仅喷出了0.25平方英里的岩浆。

仍然没有人知道这座欧洲火山会在什么时候大规模地爆发，但是，也许就像黄石和长谷一样，它迟早总是要爆发的。

第四个主要的火山喷火口，地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腊包尔，目前也正在表现出日益不稳定的征兆。自1910年以来，这座火山的小爆发似乎有所增加（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纪的记录工作比过去做得好一些）。在过去90年里，小爆发和地震总共发生了22次，而在此之前的90年间，则总共仅仅只发生了两次。此外，地震似乎也在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会发生多达13000次的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知的腊包尔在过去的大规模爆发曾有两次：3500年前一次，1250年前一次。在上述后一次爆发当中，这个9英里×5英里的喷火山口喷出了2.5立方英里的岩浆。

另外5座潜在的活动火山，地处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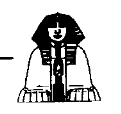
及墨西哥境内。这5座火山与本章前面所提到的4座火山，对世界未来的经济及政治安宁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一旦这些火山中的某一座爆发了，则世界气候就会像公元6世纪时那样陷入混乱之中。但是，因为现在的世界人口数是公元6世纪时的40倍，所以人口死亡数也将是数以亿计。并且正如1400多年以前，历史曾被“重新同步”过一样，将来的火山爆发也将通过对气候造成的冲击，动摇世界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现状，从而导致全球历史的第二次重新同步。

要想搞清楚在久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些什么，固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要想预测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则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两项任务又必须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未来学这一最为悬而未决的学科，几乎是完全依赖于对过去的了解，并以此预测未来，或者至少是为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提供选项。

以公元6世纪火山爆发的经验及其后果为基础，再考虑更加一体化的当今世界，我认为，今天如果发生一次类似的大灾难，则当今的地缘政治平衡最终势必会倾斜于第三世界而不是西方。

可以肯定，任何发生在热带地区范围之外的北半球火山爆发，都将会破坏整个北美洲、欧亚大陆以及非洲的气候。而腊包尔的一次爆发，因为会扰乱南北半球的风循环及洋流体系，所以也会影响到南美洲及澳大利亚的气候。

在第三世界，数量增加的尘土、硫酸悬浮微粒以及冰晶云（详见本书第三十章）可能会导致干旱及大规模的农业歉收——正如公元6世纪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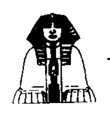
非洲以及巴西所遭受的袭击程度是最严重的。在第三世界之外，俄罗斯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从历史上而言，这些地区是最容易发生饥荒的地区。实际上，有好几次，在没有任何火山的因素的情况下，许多地区都因为世界气候的自然震荡而发生了农业歉收的现象。

最近的一次这种大灾难——被大部分的历史书籍所忽略，发生在公元 1876 年至公元 1878 年。当时，在中国北部、印度中部、摩洛哥以及巴西东北部，有 1500 万到 2000 万成人在干旱中死亡。在中国，4 个省就死亡了约 950 万人口。在情况最为严峻的山西省，1/3 强的人口（1500 万人中的近 600 万人）都消失了；而另外 3 个省份（河北、河南、山东）则分别死了约 250 万人、100 人和 50 万人。情况极其严峻，为了活下去，人们可能不得不吞食死尸或者屋顶上的茅草。为了不被饿死，穷困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卖入娼门，将儿子卖身为奴。

与此同时，在印度至少有 500 万人死去。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是马德拉斯、孟买以及迈索尔。在马德拉斯一个地区，就有 350 万人死于饥饿和霍乱。城市里满是从干旱的乡下逃难而来的难民。在孟买，除霍乱以外，还有数万居民因食物缺乏而身体虚弱，在一次毁灭性的天花肆虐时死亡。

更西边，在非洲北部，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也遭到了饥荒的袭击；而在南美洲，巴西东北部有 50 万人在干旱中丧生。某些地区一半人口都消失了。

在公元 1789 年至公元 1792 年间，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席卷多个地区的饥荒，而且这次饥荒还导致了法国革命。在那个时期，法国、美国北部、巴西东北部（大干旱）以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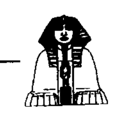
度的农业发生了歉收，而其中又尤以印度的情况最令人毛骨悚然。在印度，由此所造成的大规模饥荒，一般称之为“头号饥荒”，导致了相当多的人死亡，以致后来都无法数清楚尸体的数目了。孟买、海德拉巴、古吉拉特、奥里萨以及马德拉斯北部地区，全都难逃厄运。

不论是公元18世纪90年代的那次大灾难，还是公元19世纪70年代的那次大灾难，都不包括任何火山的因素，而且，实际上，它们与基本上是由火山引发的公元6世纪中期的大毁灭程度几无可比之处。然而，公元18世纪与公元19世纪的灾难，的确向我们展示了地球上的哪些地区最容易受到一次由火山引发的当代饥荒的袭击。

一次大的火山爆发就能轻易对气候造成破坏，而且其破坏的程度足以致数亿人于死地。如果由于某种可怕的巧合，致使火山爆发时恰逢一次自然低迷时期（就像公元18世纪90年代和公元19世纪70年代发生过的那样），那么死于饥饿和瘟疫的人数将达10亿或20亿。亚洲、非洲、俄罗斯以及巴西将遭到最惨痛的打击。

在如此程度的一次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当中，许多地区的政治管理将会迅速分裂。盗窃行为将会增加，而大量的难民潮将会出现。会爆发瘟疫，而医疗方面的基础设施则会全部毁灭。霍乱、麻疹、斑疹伤寒以及痢疾会大规模地爆发。并且，和公元6世纪的情况一样，甚至可以断言，瘟疫将会毁灭相当一部分地区。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瘟疫现在并没有消亡，至今仍在4个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在过去的10年间，至少有20万人感染此类疾病。在诸如秘鲁、越南、中国、印度、



非洲南部以及马达加斯加等地区，已有4000人因此死亡。

亚洲中部、中国西南部、非洲东部、安第斯地区中部、美国西部、巴西以及印度中部，仍有数以亿计的携带着瘟疫病菌的野生啮齿类动物。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如果基层医疗设施不得力的话，气候的紊乱仍然可能会导致在其野生啮齿动物库中爆发的瘟疫大规模传播到人类世界当中。

而难民潮则会使得瘟疫进一步传播，并引发冲突。在许多地区，当地人会认为难民是来抢夺本已不怎么充足的资源的，并且可能会屠杀相当数量的难民。虽然大多数难民会在第三世界范围以内，但是也会有部分难民渗入第一世界当中。

一旦墨西哥难民全线逼近1500英里长的墨美边境，美国政府肯定是无法容忍的。甚至就是在气候环境完全正常的现在，没有查获的墨西哥非法越境移民人数每年估计也在23万人以上。而地中海地区则更没有任何可依屏障以阻止北非难民涌入欧洲。

在第三世界饱受饥荒、瘟疫以及行政管理崩溃之苦的时候，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则会出现大规模的粮食短缺，然而也许并不是因为饥荒所致。西方产量更高的农业和更加发达的政府机器与运输系统，将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粮食需求，并且能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适当分发。毫无疑问，定量配给制度将会执行数年。

当然，不论火山爆发发生在何处，都会有相当多的人在大爆炸及随后的毁灭当中死去。那座意大利火山如果完全爆发，将会在几天之内毁掉数百万人。在火山爆发最初的冲击波所引起的大火以及从火山口当中流出来的火成碎屑流中，





会有几十个意大利南部靠近坎帕尼亚区的城镇化为乌有，其中包括那不勒斯和萨勒诺。意大利南部 1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自此不复存在。附近的庞培和赫尔库勒尼亚姆（两座被公元 79 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摧毁了的罗马城市），则会和意大利南部其后的 2000 年历史一起被再次埋葬。

监视坎帕尼亚－坎皮弗雷格雷火山活动的科学家们，将只有几天时间来发出预警并预测迫近的火山爆发的规模。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 1000 平方英里内至少 400 万人口全部撤走恐怕是不现实的。

在美国，黄石喷火山口和长谷喷火山口都在远离大的人口聚居中心的地方，所以撤退工作可能要容易一些，虽然长谷的任何一次大爆炸降下的灰烬都足以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搞得乱作一团。这两个城市都将会铺上一层厚达 3 英尺的火山灰。

在整个西方，由发生在北半球或热带区域内的任何火山爆发所引起的主要损害，都将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西欧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洲的财富，都依赖于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往来和国际投资。如果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人口、农业和政治混乱，西方很快就会感觉到由之带来的影响。这必将造成本来已经饱受粮食和汽油短缺之苦的西方经济进入低迷期，而经济的萧条则明显会造成大量失业。

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遭到打击的程度都会相同，而这势必又会造成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紧张。

毫无疑问，美国和欧洲会企图运用自己的财富，从遭到

饥荒袭击的第三世界进口稀有的粮食。西方不能向第三世界提供有效的援助，并且还抵制难民，这肯定会在第三世界中激起普遍的反西方情绪。

这一事件会在削弱西方参与以及支配第三世界事务方面起到长期的影响。欧洲、北美洲以及澳大利亚，可能会生发出一种固步自封的思想和孤立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将在解放第三世界、消除超级大国的影响方面起到相关的长期影响，其债务负担则将在藤上枯萎。毫无疑问，大灾难将会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这种支配到目前为止正是西方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所要预防的。此外，饥荒和瘟疫也可能会导致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进一步加强。

就长期而言，我认为大灾难将会在减弱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地缘政治不平衡方面起到作用。虽然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可能会死掉数亿人，但是这些地区最终相较于西方，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而非更加衰弱。正如公元 535 年的火山爆发改变了世界历史，并将古代世界带至终结一样，将来的任何一次火山超级大爆发都可能会终结我们这个以西方为主的时代，并且重塑遥远未来的地缘政治雏形。

正如本书中的证据已经表明的那样，气候具有改变历史的潜力——不仅仅在短期方面，而且还包括长期方面。火山活动不过是能够改变气候并掌握这种力量的触发器之一。全球变暖（由二氧化碳对大气层的污染日益严重所造成），太阳黑子活动，流星或彗星的撞击，地球轨道形状的周期性微



小变化，以及地球旋转轴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引发气候、以及人类历史的重大变故。

但是，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究竟是这些因素中的哪一种或是哪几种的合力，将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大灾难
作者=(英)戴维·基斯(DavidKeys)著
页数=377
SS号=0
出版日期=